

有人说，戏剧的演出永远缺少一次彩排的遗憾，否则可完美一些。我每写一本书，也会想到如能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进行修改、补充，会比较完美一些。《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初版时，二版时，我这种遗憾都很强烈。

蒋星煜 著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世纪出版

ZHONGGUOYISHI
YUZHONGGUOWENHUA

上架建议：中国史

ISBN 978-7-208-08575-6



9 787208 085756 >

定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蒋星煜 著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575 - 6

I. 中... II. 蒋... III. ①隐士—研究—中国②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908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杨钟玮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83,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8575 - 6/K · 1556

定价 30.00 元



蒋星煜肖像（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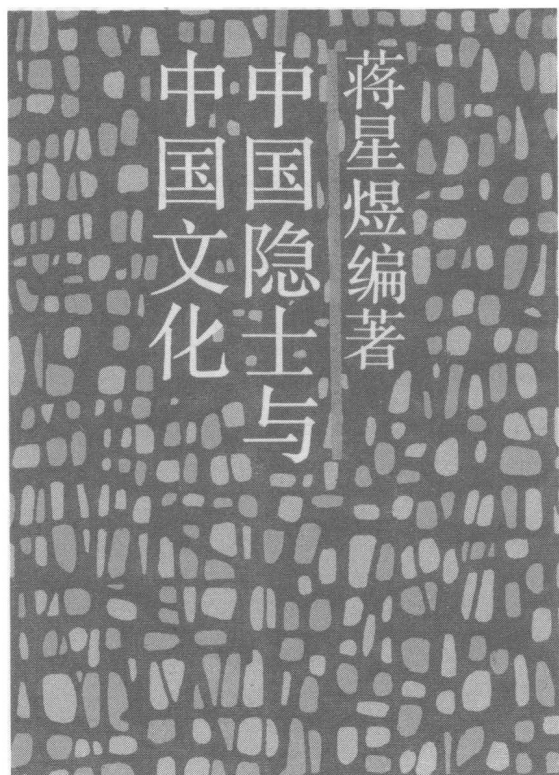
钱寿荃作于重庆北温泉

钱寿荃，1912年生，为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所教授的第一批女生，解放后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

目次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1
颜鲁公之书学	183
况鍾	285
写在书后	397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8 年版《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影印本封面

初 版 序 言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隐士”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隐士”的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且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决非欧美人所能了解的。

“隐士”是农村社会的产物,在今日全世界的生产方式,显然从农业经济转变到工商经济的道路中,中国也不是例外。工商经济的社会,人群相互依赖较深,一个人在生活上很难自给自足,所以如果陶渊明生于今日,固可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决不能遗世而独立。自然“隐士”这一类人物,在近代社会中少见了。同时“隐士”又是君主时代的产物,在君主时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清高自许的人,要不作皇帝的臣妾,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所谓“隐士”,在古代中国人物中,虽然只占极少数,但中国隐士和中国文化,却有相当的关系。第一,早在先周中国文化发扬之初,隐士人物即已开始产生,所以可以说“隐士”是与中国文化俱生的。第二,中国文化的本质,尚谦让,行中庸,薄名利,鄙财富,这些起初都有助于“隐士”思想之形

成,后来却也受了“隐士”思想的影响。第三,即使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已转变到不容许“隐士”生活的存在,但这类思想仍未泯灭,这类风格仍为人所憧憬。在我国社会中,很有不少退居乡里的士绅,他们没有职业,畏入仕途,不求闻达,读书自娱。这些人虽够不上“隐士”的程度,但多少却受着隐士思想的潜伏的支配。

今日的政治是全民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化,所谓“隐士”这一类思想,自然是不合时代,并且落伍了。但要研究中国文化“的源流”,及其民族国家的影响,对于中国隐士这一种思想的存在,显然是值得注意的。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 蒋星德序于渝郊小温泉

二 版 序 言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出版之后，历经六十五年，海峡两岸已五次影印，我虽然一直未能作修改、补充，却也进行过反思，觉得内容不够充实，而且书名也有些问题，因为主要只谈了隐士与诗歌、绘画的关系，与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的关系都没有接触到也。

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8年曾在《观察》上连载，后来1949年出了单行本。在《绪论》中说：

又有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他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虽在人数上他们占极少数，然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这些话不无是处，惜原书皆未能认真地予以论证发挥。我们今取它为第十四特征，而研究之。

我觉得批评是中肯的，的确“未能认真地予以论证发挥”，原因有二：一、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大学又读的会计系，文史哲基础单薄得很。二、全书是1941年夏到1942年的一年多时间完成的，比较仓促。更没有请任何一位前辈审阅校正过。如今梁漱溟先生仍肯定我所研究的专题，而且把中国隐士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个特点，对我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和鼓舞了。

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的《结论》部分关于隐士还有如下的论断：

说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亦没有错（惜蒋著对隐士缺乏了解）。一般高人隐士显著之共同特点有三：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试问这是任何一封建国家专制国家所能有的吗？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或任何国家亦不能有。唯独不成国家的这松散社会如中国，才得出现这种人物，不但出现，而且历代都很多，在历史传记上占一位置，在社会舆情上存其评价。第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洋人欲望本位之一中间型。他们虽不足以影响中国经济之不进步，却为中国经济难于进步之一象征。第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如我前所说，对自然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急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誉，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其结果便是使艺术造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学。

我写了一本书，罗列了许多材料，却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说明问题。而梁漱溟先生所谈的隐士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的三方面的特点却使我豁然开朗，基本上都说到了关键上。当然，隐士的问题，相当复杂，他的分析也只能说是迈进了一大步。

梁漱溟先生能够谈得比我透辟，主要是他对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数十年的研究积累，他从这个大视野观察隐士角度比较准确，容易抓住核心问题。我的学养肤浅，虽然掌握了较多具体材料，却难以理出头绪。关于隐士在政治上的共同特点，他谈得较多，却仍留下了逻辑推理上的空白点，没有能阐明何以中国才能产生隐士的原因。隐士在经济上自甘淡泊，使经济不进步的一个原因，可以成立，许多创造、发明、发展都和人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欲望有关，这方面的欲望不存在，当然创造、发明、发展都是多

余的了。他在隐士生活态度方面特别爱好自然的论述最为精彩，这个自然，应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环境；二是用单纯朴质的心态去对待一切。

这次二版，我为保存书的原貌，未作修改又写了若干章节作为“补编”。其中有一章节谈陶渊明的，就是受了梁漱溟先生这方面的论点而写的，因为陶渊明既自甘贫困，也酷爱自然，又写了许多意境悠然的诗歌，有一定的典型性。

第二版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比第一版有所补充，离开自己的愿望仍旧相当遥远。但是，限于学养、精力，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人说，戏剧的演出永远缺少一次彩排的遗憾，否则可完美一些。我每写一本书，也会想到如能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进行修改、补充，会比较完美一些。《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初版时、二版时，我这种遗憾都很强烈。

梁漱溟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所说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但都是出自肺腑的真实观点，这种学风非常可贵，可惜他已于1988年逝世，这个增补的第二版，无法再聆听他的批评了。

蒋星煜

2008.11.8

目录

初版序言	3
二版序言	5

正 编

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	12
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	16
中国隐士类型的区分	22
中国隐士的政治生活	29
中国隐士的经济生活	36
中国隐士的社会生活	44
中国隐士的地域分布	50
中国隐士与中国绘画	70
中国隐士与中国诗歌	77
中国学者怎样批判中国隐士	85

补 编

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	92
历代隐士对茶文化之贡献	106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思想倾向	119
陶渊明与菊花	132
林逋与梅花	136
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	139
易堂九子的群体隐居剖析	153
假隐士与《北山移文》	167
《北山移文》与孔尚任	170
二版后记	173

正 编

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

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而他们的名称则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遣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

《旧唐书·隐逸传》序：“坚回隐士之车。”

这是“隐士”见于典籍的开始，“隐士”虽然是现在最习用最通俗的名称，但它的历史实短促无久，不过流行了一千年左右而已。“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

《史记·鲁仲连传》：“吾闻鲁仲连先主，齐国之高士也。”

《后汉书·徐稚传》：“林宗有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高士”是根据《易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定名的。《易经注疏》说：“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

《孟子》：“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

《史记·魏公子列传》：“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

《荀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

也。”这是处士的条件。《后汉书·刘宽传·注》：“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这是处士的定义。

《后汉书·逸民列传》：“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

“逸”的解释以后在提到逸民的时候要详细分析。

士、农、工、商、兵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学的人民分类法，因此，从广义言之，士是一种知识分子，犹今日之所谓读书人、文化人。狭义言之，则限制颇多，就不是这样简单了：孔子说：“推一合十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白虎通》，以能通古今辩然否为士。在英文里面，隐士一作 A retired scholar，一作 A private gentleman，和孔子、曾子的意思非常吻合。

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四者的范畴问题亦颇有趣味：曾经出仕而退居，固然有称隐士和逸士的资格，处士则作未尝出仕之称谓，一如处女是未出嫁之女子然，宦途蹉跎者，固不得谓之处士，一如嫠妇不得谓之处女也。又高尚本非限于在野之人，官吏之不贪污不倚势而恪尽职守者，“高尚”二字当之无愧。惟高士习用为隐士之称谓已非一日，久而久之，成了隐士的专称。皇甫谧的《高士传》载晋以前九十六人，清代高兆的《续高士传》载晋至明一百四十三人，共计二百九十三人，其中没有一个不是隐士。

据《能改斋漫录》称：政和八年御笔诏命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从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从六品、方士正七品、阙士从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从八品、隐士正九品、志士从九品。则高士、逸士与隐士似又各各不同，不知其分类之标准若何。

《易经》：“幽人贞吉。”

《后汉书·逸民列传·序》：“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续世说》：“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

骆宾王：“高人悦有误，兴尽讵次还。”

《淮南子·主术训》：“处人以誉尊。”

《论语》：“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论语》：“举逸民而天下之人归心。”

颜师古注《汉书·律历志》，曾为逸民试下一定义：“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又《论语》何注：“逸民，节行超逸也。”此处逸民略同于逸材、逸品、逸格，逸作超凡不群解。《论语》朱注：“逸，遗逸，无位称。”此处逸民作逸居之民。逸居语见《孟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其实何晏和朱熹的看法并不冲突，节行超逸是逸民的主观条件，而无位则是逸民的客观条件。但还是颜师古的定义兼有何晏、朱熹之长，较为完善。

《国朝先正事略·徐俟斋先生事略》：“先生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为海内三遗民。”

本来是逊朝旧人不仕新代称遗民。又《尚书》说：“野无遗贤。”则作一般隐士解，似亦无不可。

“人”之范畴极广，可包括全人类，“民”的范畴有了一种政治的限制，如公民、国民等较“人”稍为仄狭，两者理应皆为士、农、工、商、兵之总称则无疑义。然用于上列数处时，亦仅意味“士”而已。

《论语》：“子曰隐者也。”

贾岛：“寂寥思隐者，孤独作秋霖。”

“者”意为“的人”，即英文中 verb to be 加 er 之语尾变化是，一无其他含意。

《史记·老莱子传》：“老子，隐君子也。”

苏轼《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

鲍当《题林和靖隐居诗》：“如何隐君子，长啸掩杜门。”

君子是人格高尚的完人，《论语》：“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之次即是君子，故隐君子为隐士之最尊称。

隐士之名称及名称之出处已举例于上，又有以隐君及隐居称隐士者，均在唐宋以后。又有称隐逸或逸隐者：

《后汉书·岑彭传》：“曾孙杞，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

《诸葛忠武侯全集》：“提拔逸隐，以进贤良。”

《嵇康》：“山岩多隐逸，轻举求吾师。”

他如遗逸之类皆是。

又如遁世、高蹈等皆为动词之“隐居”，而非名词之“隐士”也，兹略举于下：

《易经》：“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颜延之：“‘高蹈’独善。”

《后汉书·卓茂传》：“抱经‘隐遁’林藪。”

杜甫：“行歌非‘隐沦’，此意竟萧条。”

韦应物：“‘长栖’白云表。”

《旧唐书·萧瑀传》：“若天假余年，因此营为‘栖遁’之资耳。”

《唐书·明皇纪》：“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荐。”

苏轼：“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

词性既然完全两样，则当然不能作“隐士”解释了。

笔者在编写本书之初即决定用“隐士”这一种名称，第一是因为“隐士”在今天是最普遍、最习用的名称，大部分人对之决不会感生疏，反之若用“高人”之类，则说不定会引起读者的误解。第二是因为“隐士”的含意比较明显，范畴也比较广泛。

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

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一种最受人家喝彩拍掌的角色。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国家的领袖？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哪一点值得我们喝彩和拍掌？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其实隐士之所以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这两个因素的作祟。凡是隐士，不是个人主义者，便是失败主义者。现在我们先来研究隐士的个人主义的因素：

有许多隐士假装清高，故意漠视国家领袖和官吏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自骗自地认为做国家的领袖或者做官吏完全是一种权利，并且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义务，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做就不做。他们丝毫没有服务的观念，对于人类全体的生活和宇宙继起的生命，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付。只知道盲目地为着自己生活着，盲目地珍惜自己的物质生命。

许由、巢父是个人主义者。因为“禄亦弗及”而隐居绵山的介子推当然也是个人主义者。但是个人主义者的隐居理论，要到曾任漆园吏而不敢为楚相的庄周才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史记·庄子列传》有如下的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

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达生篇》则云：

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筮，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爓汝。十日戒，三日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为彘谋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错之牢筮之中。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傒之中，则为之，为彘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异彘者何也。

在《山木》、《秋水》、《人间世》诸篇中这种论调也时常发现。王先谦说：“余观庄子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章太炎也说：“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究其实际，庄子又何尝轻视禄位和富贵，不过照他看来做了大官，难免要被人嫉忌，或是和人家结冤仇，死的机会太多了，以整个的生命换取短时间的富贵并不合算，所以他要辞楚相。“南面”可以不可以止盗，并不是他去就的关键。

另外一个典型的最狂放的隐士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不愿做官吏的原因，是他太看重个人的自由，而忽略了民族国家的自由。做了官有公务在身，要日理万机，当然不能和老百姓一样自由。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个最好的供状。

嵇康心目中的世界——最大的大我——是他的家庭。因为“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于是他有了“顾此恨恨，如何可言”的忧郁。至于当时政治的腐败，人民在连年兵革之后经济生活的贫困，他倒能无动于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从这几句话看来，他所以不做官，一半固然是做了官，不得自由。一半又是做了官，没有功夫吃术黄精，影响到他长生不老术的修炼。这种观念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个人主义的极端。我们无从了解，他这种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一无裨益的生活有何乐处。

我们要提到梁陶宏景，他是从古至今隐士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一方面极端尊重自己的个人自由，并有服食还仙的志趣。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领袖欲、支配欲和其他欲念，更不能忘情于物质生活。他便生活在这两种矛盾的不相容的观念中。他隐居在茅山，武帝下诏书叫他出山，他没有出山，画了一幅画，上面有两条牛，一条牛很自在地在水草之旁徜徉，另一条则著了金笼头，有人用绳牵着，后面又有人用杖驱策着。意思很明白，虽然著了金笼头总没有自由的舒适，所以他不愿出山。但是他如何满足他的欲念呢？如何充实他的物质生活呢？他便以在野之身，以备武帝咨询。《梁武帝集》中有答陶宏景之诏书二、书札五，可见他们关系密切之一斑。他的物质需要的程度及其来源，我们读了梁武帝《答陶宏景请解官诏》便可知道：

卿遗累却粒，尚想清虚，由中闲静，得性所乐，当善遂嘉志也。若

有所须，便可以闻，仍赐帛十匹、烛二十挺。

以上分别举例检讨了形成隐士的个人主义的因素，现在再来检讨形成隐士的失败主义的因素。失败主义的隐士最多出现于某一政权瓦解，另一新政权崛起而代之时。隐士是忠实于已瓦解的政权的，他当然不做新政权的官吏。但他又缺乏自信心，怀疑自己的力量，不敢明目张胆地积极地举起反抗的旗帜，只是用隐居作手段对新政权表示一种消极的抗议。

伯夷和叔齐这两位贤昆仲是失败主义的隐士的典型，他们认为天下是

殷的，如今给姓姬的抢去了。姓姬的不对。那末，照理说他们应该起来反抗才是，但是哪里有这股勇气呢？于是两位贤昆仲只好隐在首阳山下采薇而歌了，最后觉悟到这薇也不属于殷的，终是饥饿而死。他们的消极行动丝毫没有影响到姓姬的所建立的王朝——周，而周竟绵延到八百年以上才为秦所灭。

古代的学者十之八九是夷齐的崇拜者。《论语·述而》云：“伯夷叔齐何人也？古之贤人也。”《季氏》云：“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但是崇拜到顶点的要算唐代的韩愈了，他有一篇《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非是；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卑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夫圣，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韩愈只看到伯夷的消极行动比一般人投降或屈服的行动要好一点，便过分地夸张起来。他没有看到这两种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虽然不同，却相差无几。当然，他更没有看到积极行动可能发生的力量，和它的可能发生的结果。

此后失败主义的隐士的大批出现是在王莽篡汉之时。《后汉书·逸民列传·向长传》曰：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

《逢萌传》曰：

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周党传》曰：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

平心而论，向长、逢萌和周党，不和王莽合作是对的，比写《剧秦美新》的扬雄人格要高尚得多。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假使襄赞光武中兴的那一般文武，也只是和向长一样不合作就算了，不去做积极的活动，那末王莽的统治毫无疑问的要绵延下去。而“后汉”这个名词是不是仍旧还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谁也不知道了。

宋末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以及明末满人入关的时候，失败主义的隐士更多如牛毛。登高一呼而兴勤王之师的大部分是农民，士大夫阶级倒反不多见。

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是形成隐士的主观因素已如上述。客观因素在这里可以综合的分析一下：

第一是由于传统的逃避的哲学思想深入了士大夫阶级，他们自己不愿意做官，更反对别人做官，于是便尽力夸张隐士的清高，而不问国家的领袖及其他官吏之是否爱护人民或虐待人民，一概像吉诃德见了风车一样，马上就要挑战，予以尖酸刻薄的讽刺或讥笑。于是少数有学识有修养的人，本来有救世的热情，也视做官更为畏途了。《易经》上面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话，又如孔子，自己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实干主义者，他东西

奔走救世的精神当然值得我们钦佩,但是他那一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贤者辟世,其次辟地……”“隐居以求志……”的违心之论却给予后世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埋藏下了一颗鄙视官吏的心理的种子。

第二是由于中国是农业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自给自足上,生活简单而安定。《击壤歌》:“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虽至老死不相往来。”很能表现古代社会生活之一斑,而这一种社会生活,就最低限度生活需要而论,可以不必仰求外来物资。就生活环境而论,因为物质文明尚未发达,人口的密度亦远逊现在,随处都是充满自然美的幽静的地方,无车马之喧当然不必说,甚且有“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的境界。因此,加强了隐士存在的可能性。

形成中国隐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已经分别地讨论过了,我们由此可知像隐士这种自私而萎缩的人生是不合理的病态的人生。就隐士本身而论,离群索居是赋性之性。对于国家社会以至整个人类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我们觉得唯一的补救办法,只有把新的人生观建立起来,加强我们的服务观念,提高我们的奋斗精神,发扬我们的创造能力。那末,我们可以断定:隐士不会再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

中国隐士类型的区分

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隐士，除了必须要分析他们之所以形成的因素而外，其次，我们最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和趣味性的，是隐士的类型这个问题。本来，隐士是一般人生中的一部分，他们之有类型的存在正和一般人生之有类型的存在无二致，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又因为他们是一般人生之中有着特殊的人格和特殊的生活形态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类型区分受到这种特殊性的限制，而和一般人生类型的区分完全异趣了。

现在为了事实上的必要，应该先提到几种区分一般人生类型的基准不同的方法：

詹姆斯(H. James)心目中的人生的类型是相对立的软性的和硬性的两种，用我们固有的术语来讲，就是阴柔和阳刚的两种。这一种方法的精密程度很成问题，用于一般人生类型，则它有不可否认的普遍性。但用于隐士，这种方法是极端的不适合，因为中国隐士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所以从一百个中国隐士之中很难找出一个阳刚的隐士来。

斯普兰格(E. Spranger)则把人生分为理论之型、经济之型、艺术之型、社会之型、政治之型和宗教之型六种类型。假使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每一种类型的特征和属性，而和中国隐士的人格，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作一个对比，以求出相同之点，那未免越出范围太远了。艺术之型和宗教之型是存在于中国隐士之中的，其他四种类型是没有的并且不可能的。因此，斯普

兰格的方法也无法应用。

比詹姆斯和斯普兰格的方法更为学者所习用的是诗的、散文的和戏剧的这—种区分的方法，这方法比较来得抽象，我们可以举出贺麟先生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中的叙述来解释：

最显著的例如中国则老子的为人据《史记》及传说，便是富于诗意的，他的生活好似一首冲淡闲适的小诗。至于孔子的人品则显然是散文式的，他的一生是一篇有抑扬顿挫的古文。而墨子的性格与耶稣相同：便是戏剧式的，因为他的生活富于惊心动魄的情节，有壮阔的波澜，令人精神兴奋紧张。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方法与詹姆斯的相当接近：诗的就是软性的，而散文的和戏剧的包括硬性的之中，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简略地检讨了三种一般人生类型区分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用于隐士如何的不适合。隐士应该另有隐士类型的区分方法，任何人不会表示反对罢。

西方的学者惯于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一切复杂的材料；如夫赖塔格(Gustav Freytag)在《出款与进款》一书中对于商人的类型曾有深刻的研究，而裴斯塔洛齐(Pestalozzi)在《瑞士人之力》(Schweizerblott)一书中对农人类型之分析亦颇有价值，或须是由于隐士在西方不像在中国一样地频频出现于历史，所以很少有人去研究隐士和隐士的类型。

中国学者如孔子、孟子、司马迁等都是隐士的崇拜者，但他们对于隐士的研究根本谈不到，仅仅替隐士唱了几篇内容空泛的赞美诗而已。南朝宋范晔虽然没有能完全扬弃一般人对隐士的传统的错误观念，他却在研究上获得初步的成功，并且在学术界起了发酵的作用。自从范晔著《后汉书》开

始，隐士才从中国历史著作中得到他们的固定地位，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文中曾对隐士加以类型的区分，他一共归纳成下列六类型：

一、隐居以求其志。

二、曲避以全其道。

三、静已以镇其躁。

四、去危以图其安。

五、垢俗以动其概。

六、疵物以激其清。

范晔自己没有明白地指出某隐士属某类型，我们只能参考唐代颜师古的注释来研究：

颜师古认为长沮、桀溺属于第一种“隐居以求其志”的隐士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长沮、桀溺曾与孔子有一面之缘，若孔子以为他们两人是“隐居以求其志”的人，则断不会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的话了。大概孔子以及范晔的所谓“隐居以求其志”，是指以隐居为手段而求达到行其志于天下的目的罢，这个假定要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姜尚应该是最理想的代表人物。

把薛方列为第二种“曲避以全其道”的隐士，我们当然同意颜师古的看法，因为王莽以安车去迎接他的时候，他曾口是心非地说过“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志也”的调皮话。他在西汉哀帝时，曾做丞相司直的官职，等到王莽要用他，他就用调皮话来诡辩，显然是曲避了。

第三种“静已以镇其躁”的隐士照我们看法惟有提出春秋间晋文公手下的介之推为代表人物最适当，因禄不及而与母偕于绵山的史实可以作为

佐证。颜师古提出逢萌是勉强的，逢萌一行的行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此于他的意气似远较介之推为和平。

第四种“去危以图其安”的隐士占有隐士的大部分，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等四皓当秦之世，避而入商山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作为代表人物亦无可。

申徒狄的确是第五种“垢俗以动其概”隐士的标准类型，他轻视轩冕和权力的程度，不知多少倍于许由、巢父、池主与北人无择，所以当汤欲以天下相授之际，他耻以不义闻己，竟激愤到极点而跳到河里去淹死了。

严光和梁鸿作为第六种“疵物以激其清”的隐士代表，大体上说来没有错误，严光非常幽默，汉光武供给他最华贵的享受，要他襄助朝政，他假痴假呆的，说说风凉话，始终不答应，梁鸿则有著名的《五噫之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肃宗听了非常不满，甚至要下令通缉他。这两个人作为“疵物以激其清”的隐士，我们也有这种种史实可以佐证。

范晔这一种类型区分的方法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用现在的目光来观察，却发现了许多缺点，最主要的是各种类型之间的界限太模糊不清，尤其是第五种和第六种，简直找不出界限来。

梁阮孝绪是范晔以后对隐士作更进一步研究的人，他搜集了自炎黄以至天监末年有关隐士的史料，著了一部《高隐传》，在这部书中，他把隐士分成三种类型，分三篇叙述：

一、言行超逸，名氏弗备。

二、始终不耗，姓名可录。

三、挂冠人世，栖心尘表。

阮孝绪自己是一个隐士，每逢到有做了官的亲戚来看他，他竟觉得比鬼怪来找他还使他厌恶，便穿篱越墙逃到郊野里去，绝对不接见。以隐士研究隐士，照理说不难有伟大的成就，然而他的成就仅在史料的搜集，关于类型的区分，他失败了，他比范晔失败得更利害。

这一种类型的区分有下列两大缺点：

第一是太主观，隐士的名字传不传的问题，并不足以表示他们类型的不同，阮孝绪把他自己不知道名氏的隐士另立成一种类型未免太主观了。隐士之中如汉之野王二老，汉阴老父与陈留老父，宋之杜生，顺昌山人与南安生，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名氏，并且姓名不过作为人的标识，譬如说野王二老和梁鸿、韩伯休又何尝能单从名字的传不传把他们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呢？

第二是太零乱。即便是主观的区分，要能有一个基准，尚有可说。阮孝绪却没有基准，我们知道以名氏传不传为基准的话，可以分成传的和不传的两种，分成三种的方法无论如何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梁书》作者唐代姚思廉说：

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驾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身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而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喑绝世，弃礼乐而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

姚思廉似乎想从隐居的地域底基准来划分，第一种是隐于山林的，第二种是隐于市朝的，但第三种列于其间，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程氏周易传》作者宋程伊川说：

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

叶仲圭的注解称：“怀抱道德，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张良疏广是也。量能度分，徐止申屠蟠是也。清介自守，严光周党是也。”程伊川举出四种，实际上只得三种：甲是尚未遇机会出仕者，乙、丁是不愿出仕者，丙是不能出仕者。叶仲圭所举的人物，大致上没有什么错误。

《新唐书》的作者宋祁说：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飞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惘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簿乐山林，内审其材，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誉焉。

宋祁的分法也是没有一个基准，可是他不是隐士的盲目的崇拜者，他看到了隐士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的一方面。

宋祁之后，以及清末虽然也常有人研究隐士的类型，但是有价值给我们参考的方法却始终不曾有过。

近人姜亮夫曾在《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中论及隐士的类型，他的意见可归纳如下：

隐士	{	修士	{	僧道……如鸠摩罗什、玄奘大师
			{	准僧道……如郭璞、郭弘、陶宏景、林逋
		逸士	……如阮籍、嵇康、刘伶、陶潜	

这方法比范晔、阮孝绪和宋祁所采用的都要合理一些，缺点是在时间上有了问题。因为佛教的传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历六五年）夜梦金人，派蔡愔等十六人迎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像来中土之时，至于道教虽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愚民方具雏形，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以姜亮夫只能举出汉以后的隐士为例，对于自轩辕氏（西历绝元前二六九七年）至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历六五年）这二千七百六十二年之间的隐士无法处理，谁为逸士？谁为僧道？谁为准僧道？他都无法区分。

我认为隐士类型的区分，必须从隐士的生活形态的各方面来观察，才能普遍地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现在我要提出我自己的方法来：

一、从隐士的政治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 真实的隐士……如巢父。
2. 虚伪的隐士……如伯夷。

二、从隐士的经济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 在业的隐士……如台佟。
2. 无业的隐士……如朱桃椎。

三、从隐士的社会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 孤僻的隐士……如林逋。
2. 交游的隐士……如唐僧渊。

四、从隐士的精神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 养性的隐士……如陈搏。
2. 求知的隐士……如陆龟蒙。

我不敢断言这一种类型的分法是尽善尽美的，不过作为一种尝试罢了。

中国隐士的政治生活

我们对于中国历代隐士作一番系统的研究以后，就可以发现隐士之中始终不变的仅占到很小的比数，这一个事实非常重要，它说明了隐士的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的思想常常会受到外来的或内在的影响而淡化，而动摇，甚至于消灭。——也就是说明了在某种情形之下，隐士自有其出山从政的可能性。

巢父式的隐士是采取无保留无条件地不从政的态度的；试先分析巢父本身，他生活在唐尧圣贤政治的时代，社会安定而有秩序，假使他的主张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那末就没有理由不接受尧以天下相让的意思。论地位是万人之上的君主，并不是为人驱策而无一权柄的下级官吏，假使他的主张是道合（条件适合）而后进，也没有理由拒绝尧的，然而事实上他竟拒绝了。在《中国隐士类型的区分》一章中，我们说从隐士的政治生活来区分，可分为真实的隐士与虚伪的隐士，前者就是指巢父一流人物而言。

严光行径亦略同巢父，光武中兴后国家政治已入正轨，不可谓无道，而光与光武之交谊殊非浅浅，既同窗共砚于少年时，及光武有国，复与之抵足而眠，谓光取卿相如拾芥并没有过分夸张之处，然光竟亦不出。

巢父、严光是必然地以隐士终其一生的：他们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一点事业欲也没有固然不必说，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人以及任何一事物在理智上不分善恶，在感情上亦无爱憎，所以能安心于小我的世界中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

韩愈在《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说：

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近人吴经熊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短文中也论及此点：

只有对这世界不发生恶感的人才能过退隐的生活，否则丑恶的幻想会滋扰你的隐居，恼得你鸡犬不宁。

这一类的理论都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我们不妨一读林逋的《深居杂兴六首小序》，这是隐士赤裸裸的供状：

诸葛孔明谢安石，畜经济之才，虽结庐南阳，携妓东山，未尝不以平一字内，跻致生民为意。鄙夫则不然，胸腹空洞，翦然无所存置，但能行樵坐钓外，寄心于小律诗时或麀兵景物，衡门情味则倒晚二君，而反有得色。

巢父式的隐士是没有政治生活的，而那些因某种条件——时局、安全、地位、报酬或其他——和他所希望的相差得太远所以不愿从政的隐士虽不一定有政治生活，但具备着这一种可能性的；现以伯夷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伯夷最初弃国以让叔齐，因为其父孤竹君的遗命要叔齐做君主，假使孤竹君的遗命要立伯夷，以父命为重的伯夷不必至弃国而逃。武王兴师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不从，伐纣而灭之，伯夷、叔齐乃饿死首阳山，若武王听从夷齐之劝告，则夷齐必不饿死首阳山下。

隐士的政治生活的内容有三：

一、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这就是说隐士由某种条件的决定而转变成官吏：《三国志·诸葛亮传》：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出师表》：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决定诸葛孔明由卧龙岗散淡之人转变成蜀汉丞相的条件，是刘备的热心与诚意，“由是感激”，感激的什么？当然是刘备的热心与诚意，假使刘备对诸葛孔明执礼不恭，则孔明必不见，即见，则必不为所用，即为所用，若不重用，则必不能使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诸葛孔明本身而论，这个条件仅仅是外来的，另外还有内在的，那就是孔明的内心存着“平一宇内跻致生民”的大志，否则的话即使刘备十顾草庐，孔明尽可不见。孔明一定要刘备去了三次才接见，有两点可以解释：第一是试验对方的诚意。第二是意识的自尊心的表现，使对方感觉到他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等闲人物，并用欲擒故纵的方法，使对方欲见他的心更为迫切，被重用的可能性由此增强。

与诸葛孔明同时的庞统、明初的开国功臣刘基，都是在同一情形之下转变成官吏的。

隐士从政大都政绩卓著，如诸葛孔明、庞统、刘基等情况基本如此，唐卢藏用为仅有之例外，登朝后越趋诡佞，专候权贵，貶笑于世。隐士既一旦从政，即失去隐士身份，故于此不拟赘述。

二、以在野之名务在朝之实。这就是说隐士者不过表面而已，实际上

无异官吏：《续世说》卷五《宠礼》：

梁陶宏景隐茅山，武帝每有征讨吉凶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陶宏景既深得梁武帝之心，一言一语，武帝自必奉之为圭臬，而当时朝中权臣显宦，亦不得与之争宠也。又陶宏景非国家官吏，理不应得国家俸禄，武帝以赏赐之方式出之，以避清议，陶宏景乃得常年不缺烛帛之奉。现存梁武帝及陶宏景之往来书札各五，“月中尝有数信”或即指此，惟未有提及征讨吉凶大事者，谅因多历年所散佚掉了，虽《续世说》为稗官野乘，不足为据，然无征不录，当不致全属于虚。

《元史·杜瑛传》：

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王，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又辞遣执政书其略曰……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杜瑛虽未接受元朝之官职与俸禄，既献计于世祖在先，贻书于执政在后，于元朝政治自多裨益，而元朝大官吏，对于元朝之贡献，亦未必皆高过于杜瑛，此为事实。

一般地说：陶宏景和杜瑛这一类隐士，都是世故极深，而绝顶聪明的人，和朝廷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使朝廷不至于和他们疏远得失了本身的

联络,也不至于和他们亲近得引起外来的嫉忌。他们不是君主的僚属,君主要想博得史官记下一笔“礼贤下士”,不得不对他们谦恭有礼。他们不负任何责任,看到容易解决的事上,一个全盘计划,遇到困难的事,顾而言他;成功了,他们有分,不成功只处分执行计划的人,与他们无关。但扮演这种角色是相当困难的,宋代的种放就是因进退失据权变无方而见笑于士林的一个。

三、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这就是说的以“在野”为手段,达“在朝”之目的。粗浅地看来,这句话是不通的,矛盾的,不合逻辑的,其实是通的,不矛盾的,合乎逻辑的,中国君主误信隐士皆有济世之才而无利欲之心,故蒲轮安车时发,求幽之诏亦时下,拟于隐士之中选贤与能,是其初意。士人有汲汲求进者,虽十载寒窗未能得意于科第,遂买山归隐,以欺世人之耳目,实则株守茅庵以静候安车而已。士人以此种诡随手段,登荣进之途者,谅必不在少数,做得漂亮,做得不漂亮,则全凭各人的本领,隋代之杜淹与韦嗣昌,就是露了形迹失败的。《续世说》:

杜淹与韦嗣昌为莫逆之交,相与谋曰:“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遂共入太白山中,扬言隐逸,实欲邀求时誉,隋文帝闻而恶之,谪戍江表。

杜淹与韦嗣昌当然是不幸的,还有许多隐士虽未受到处分,但济世的目的也始终未能达到,是和杜韦同样的不幸的。

一般人的见解是不赞成隐士有政治生活的。陆游《过野人家有感》:

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

这是指隐士政治生活的第一内容而言,陆游的思想本来相当积极,在这里却表现得消极而软弱,农业固然是很好的职业,但我们要知道,社会这

一个有机体,是需要各阶层协力合作的,否则社会就失掉发展的平衡,不能进步,而陷于停滞状态,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希望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尤其像诸葛孔明这一种对政治有研究、有修养的人,假使不能重用,则我们连惋惜也来不及,陆游反说“老死南阳未必非”,不知他是哪一种看法。

在隐士之中,诸葛孔明、庞统、刘基的作风是比较可取的,孔明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意思,在野的时候尽量充实自己,一有机会即将自己力量全部贡献给社会。学问原是济世的,不隐居最好,若隐居的话应该像孔明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断然中止隐居的生活。

章铤《中国通史》:

其名隐而不隐,其事逸而不逸,于是历史上遂多一闲人之位置。

这是指隐士政治生活的第二内容而言,章铤的意思是隐则隐,不隐则不隐,不赞成这样不尴不尬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隐士身份而参政,固然是滑稽的事,然而也要比较有热情的才能出此,我们觉得是未可厚非的。

李颀《二曲集》中《与当事论出处》:

先儒谓士人之辞受出处,非独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处之得失,乃关风俗之盛衰,故犹不可以不审也,今既以某为隐逸矣,若是以隐而叨荣,则是美官要职可以隐而坐致也,开天下以饰伪之端,其不得志于科目者,必将退而外假高尚之名,内济梯荣之实,人人争以终南作捷径矣。

这是指隐士政治生活的第三内容而言,隐士以退为进,近乎一种诡道,固然不足为法的,但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也应分担一部分过失:考试既不能正确地衡量士人的道德文章,铨叙更谈不上,很可能一个科目出身的有学

问的人，官职反不及一个外表高尚，而败絮其中，一无所长的出山隐士，在这种情形之下，士人取终南捷径是值得我们怜悯的。

我们不能用迂儒的目光来非难隐士的政治生活的，曾巩说：“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保卫国家，爱护氏族与崇敬领袖，原是人类最优美的天性，隐居才是变态，隐士能中止隐居的生活，或对政治关心，这种现象不能认为是不好的。

中国隐士的经济生活

傅有任先生(Victor Frene, Ph. D.)曾经在《文化建设》杂志发表一篇《中国论》，他认为中国人对于生理幸福和经济改善向来漫不注意，这个看法可以说相当正确。本来哲学家老子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的话，中国人的生活偏重精神休养，而鄙视物质享受是自古已然，而其中走极端的，舍僧侣而外，则不能不推隐士。中国隐士绝欲主义者占其大部分，其次是节欲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欲望会妨害“高超底”心灵之活动。中国隐士的经济生活贫乏的程度，几乎使人不敢相信：颜回困守陋巷，谢世于盛年；陶潜曳杖江村，游行以乞食，都是悲惨的事实。

现在我们试从住、衣、食三方面来一睹他们经济生活的真相：

《高士传·巢父传》：“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之曰：巢父。”

《高士传·老莱子传》：“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

《高士传·台佟传》：“凿穴而居。”

《高士传·焦先传》：“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

《晋书·孙登传》：“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

《晋书·郭玘传》：“凿石窟以居。”

《晋书·郭文传》：“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苦覆其上而居焉。”

《世说新语》：“唐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

《世说新语》：“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

《宋史·种放传》：“结草为庐，仅庇风雨。”

《明史·倪瓚传》：“所居有阁曰清阒，幽回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紫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

《国朝先正事略·余若水先生事略》：“草屋三间不蔽风雨，以鳖甲承漏。”

中国隐士住的设备是简陋不堪的，巢父、老莱子、郭文一无居室床榻，而住树丛间，和原始人相差无多了。台佟、孙登凿穴而居，照情理推测，那种穴一定不会比我们的防空洞高明，空气混浊、光线阴暗、土地潮湿，自不待言，长年生活其中的痛苦，那真只有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隐士才能忍受。焦先的草庐造得如何，无法得知，种放的仅庇风雨，不难想见其朽窳之状，余若水的草庐更等而下之，甚至“不蔽风雨”。唐僧渊的精舍比较舒适，山光水色自是入画，但与其说是设备的周全精到，还不如说是地段的适中合宜。像郗超那样不惜巨资援助隐士的人，历史上不多见，而稍有志气的隐士，也不会凭空就接受别人的资助。倪瓚的清阒阁，精致不减王公大人的别墅，因为他虽不享高位厚禄，却是一个家道裕如的地主，他的经济能力允许这样做。像唐僧渊、戴逵、倪瓚那样住得舒适的隐士极少，而大部分都是和巢父、台佟相似。

以上是说隐士的住，下面再说衣：

《高士传·善卷传》：“冬衣皮毛，夏衣絺葛。”

《高士传·披裘公传》：“五月披裘而负薪。”

《高士传·林类传》：“春披裘。”

《高士传·曾参传》：“正冠而绝缨，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

《高士传·严光传》：“披羊裘，钓泽中。”

《高士传·袁闳传》：“首不著巾，身无单衣，足着木屐。”

《高士传·管宁传》：“常着衣裙貉裘。”

《晋书·孙登传》：“夏则编草为裳。”

《晋书·郭文传》：“鹿裘葛巾。”

《晋书·杨轲传》：“衣褐襦袍。”

《晋书·公孙凤传》：“冬衣单衣。”

《晋书·张忠传》：“冬则襦袍，夏则带索。”

《晋书·石坦传》：“衣必粗弊。”

《南史·翟法赐传》：“以兽皮及结草为衣。”

《南史·张孝秀传》：“常冠谷皮巾，蹑蒲履。”

《宋史·苏云卿传》：“布褐草履，终岁不易。”

《诗话总龟》：“寇莱公镇洛，暇日写刺访魏野，野葛巾布袍。……”

《明史·张介福传》：“家贫冬不能具夹襦。”

《国朝先正事略·李筠叟先生事略》：“方袍角巾，屏迹郊野。”

《国朝先正事略·八大山人事略》：“尝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踟蹰市中。”

中国隐士的衣一般说来是粗弊的，从材料方面说善卷、披裘公、林类、严光、管宁、郭文、翟法赐都用兽皮，古代人类稀少而兽类繁衍，兽皮的经济价值当然低，上品的狐皮虽是达官贵人的专用品，中下品的鹿皮、羊皮、貉皮，隐士尚可享受，此外用棉织品、麻织品的亦伙，甚且有用草的，用丝织品

的是绝无仅有。从式样方面说，只穿便服而少穿礼服，无论家居，见客或出游，总是那一套。又如袁闳“身无单衣”，盖隐士多神往远古，渴望着“回到自然去”，以身作则地提倡裸体运动亦极可能。

以上是说隐士的衣，下面再说食：

《高士传·接舆传》：“食桂栳实，服黄菁子。”

《高士传·曾参传》：“三日不举火。”

《高士传·闵贡传》：“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

《高士传·焦先传》：“或数日一食。”

《晋书·杨轲传》：“常食粗饮水。”

《晋书·公孙凤传》：“夏则并食于器，停合臭败然后食之。”

《晋书·石垣传》：“食不求美。”

《南史·邓郁传》：“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旧唐书·王希夷传》：“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

《旧唐书·潘师正传》：“居于嵩山之逍遥谷积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

《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南枝贫无隔宿炊。”

中国隐士在食的一方面曾参和焦先是贫乏中之尤者，差不多毕生在和饥饿搏斗着，戴南枝稍优，与曾参、焦先相较，亦不过五十步之于百步耳。闵贡大概对于食物营养有极深度的研究，因此不去顾及量，而专门注意质，一片猪肝对辘辘饥肠固无异杯水车薪，而其营养价值则不容忽视。至于吃桂栳实、黄菁子、云母、松叶、柏叶等物，近于矫揉造作，是隐士自己撒的谎亦有可能性，假使是事实的话，那一定相当于嵇康吃术黄精的意义，其目的在求轻身敛神延年益寿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隐士住、衣、食三方面有三个共通点：

第一点是原始化，隐士是唯古论者，神往于无政府状态的。他们推崇原始社会，认为现代的一切无例外地没有古代的好，所以思维言行力尚古人，惟恐不及，而社会亦用“节行超逸，无谢古人”的话来赞美隐士。这一种对于“古”的爱好和追求，失去了理性的统驭，表现在经济生活上的便是原始化。原始人在吃的方面是茹毛饮血，住的方面是穴居野处，衣的方面是寒披兽皮、暑覆树叶。隐士虽然在农业社会已经具体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从那时候起，人类的生活程度已显著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方式已显著地改进，但隐士仍住在树上或岩洞中，穿兽皮，食松柏叶，这不是原始化是什么？

第二点是特殊化，隐士既然自命不凡，为了要制造这种“不凡”的根据，以欺骗自己以及世人，遂忍痛牺牲生理幸福，以表现经济生活的特殊化，披裘公的故事适足以说明这一点。《高士传》：“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披裘公曰：‘彼取金。’公投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处之高而视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我们可以有两个假设：第一是那地方天气特别冷，所以五月要披裘。第二是披裘公有疟疾或其他疾病，所以五月要披裘。从“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这话来研究，以上两点假设都不能成立，他之所以要在别人穿单衣夹衣的时候披裘，仅不过要表示他不是个平凡的人罢了。其如公孙凤，一定要等待食物腐败发酵以后再吃，也无非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是贫穷化，因为孔子说过：“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隐士遂以为非贫穷不足表现其高尚的乐以忘忧的精神，颜回的贫穷是真实的不得已的，后世隐士的贫穷大半是虚伪的故意做到这般地步的。林放问礼于孔子，孔子说：“礼，与其奢

也宁俭。”奢侈是浪费，节俭是美德，这大家都知道，但节俭得有一个分寸，像隐士那样住所不能庇风雨，衣服不能保温暖，食物不能供给适量的营养，未免太走极端了。

住、衣、食是隐士经济生活的消费一方面，至于生产一方面，我们必须从隐士的职业来观察：

《高士传·许由传》：“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

《高士传·善卷传》：“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

《高士传·老莱子传》：“逃世耕于蒙山之阳。”

《高士传·接舆传》：“躬耕以为食。”

《高士传·陈仲子传》：“相与逃去，为人灌园。”

《高士传·安期生传》：“卖药海边，老而不仕。”

《高士传·宋胜之传》：“游太原，从郇越牧羊。”

《高士传·严遵传》：“卖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

《高士传·梁鸿传》：“牧豕于上林苑中。”

“居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

《高士传·台佟传》：“采药自给。”

《高士传·韩康传》：“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

《高士传·姜歧传》：“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

《高士传·胡昭传》：“隐陆浑山中，躬耕乐道。”

《晋书·霍原传》：“山居积年，门徒数百。”

《晋书·杨轲传》：“学业精微，养徒数百。”

《晋书·宋纤传》：“子弟受业三千余人。”

《南史·顾欢传》：“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

《南史·朱百年传》：“入会稽南山伐樵采茗为业。”

《南史·范元琰传》：“家贫惟以园疏为荣。”

《旧唐书·阳城传》：“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

《元史·孙辙传》：“家居教授，门庭萧然。”

《国朝先正事略·余若水先生事略》：“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经。”

《国朝先正事略·傅青主先生事略》：“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秘方，乃资以自活。”

学而优则仕，士人为中国历代官司从出之阶，虽在乱世，情形亦复如是。士所学习的以政治哲学为主体，而以史学文学为辅助，这是历代帝王的计划教育的结果，目的使士缺乏能力自养，而不得不走入仕途，结果士遂对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一无所悉，成了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士在这种情形之下，假使又不愿做官，唯一的办法是把从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套子曰诗云再传授给别人藉以生活。所以隐士的职业，以教育从业员为多，其原因即在此。

古代的分工制度未臻细密，农民固专事耕作，而士、工、商亦多未能与农事完全断绝关系，隐士既居穷乡僻壤，聚集生徒亦不易，把本来的带有消遣性质的灌园一类工作扩展为谋生的职业并非意外，技术或不如老农，若天时正常，布衣菜饭的供给当可无缺。又古代的生产观念模糊：认为将原料品制成工艺品的工业不是生产，调节各地有无的商业更不是生产，而只有生产原料品的农业是生产，亦只有从事农业是高尚的，所以隐士躬耕陇亩的也相当多。

教育与农业是隐士两条最普遍的生活之路，他如安期生、台佟、韩康等卖药为生，史不多见，又如严遵卖卜、朱百年伐樵、傅青主悬壶，则罕有其

匹矣。

中国隐士的住、衣、食之所以原始化、特殊化、贫穷化，一方面固然是受绝欲节欲的生活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和职业也很有关系。教授生徒是清苦的，不必多说；至于耕作，从投资到获得利润的过程是缓慢的，不能和商业同日而语，再加上隐士从事耕作虽不是雇农，却是自耕农，和阡陌纵横的大地主富农们相较，又不啻小巫之见大巫了。至于无业的隐士，除非拥有厚产，否则当更为狼狈。这就是说隐士本身的经济能力也不允许他们的住、衣、食趋向于潮流化和富丽化。

中国隐士的社会生活

传记文学家常用“杜门谢客”这个成语来描写隐士，我们稍加研究，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原宪的住所丛生着蒿莱，内外没有道路相通；张仲蔚的住所则四周的蓬蒿比人还高，从这两件事来推断，不难想见隐士的社会生活是如何的贫乏。又贾岛《题隐者居》诗说：“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林和靖《孤山隐居书壁》诗说：“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直达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从这两首诗中，我们更可以看到隐士孤高自赏的劣根性之一般。

隐士对于非隐士的来客，无论其为乡亲宗族，或是政府官吏，都不愿意接见，好像接见了便有失他们“清高”的身份，因此大多数是避不见面，兹将此种事实略举于下：

《晋书·翟庄传》：“乡亲中表皆莫得见。”

《晋书·陶淡传》：“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

《晋书·陶潜传》：“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

《旧唐书·朱桃椎传》：“廉每今存问，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

《遗史记闻》：“真宗祀汾阴，登山望林麓间有亭槛问曰：何所，乃隐士魏野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鹤舞，闻使至，抱琴逾垣遁去。”

《国朝先正事略·徐俟斋先生事略》：“汤文正抚吴，屏驺从徒步造门者

再，卒不见。”

《国朝先正事略·李蜃园先生事略》：“有司慕其高，往访之，辄逾垣避。”

即使勉强予以延见，接待之间也必定非常倨傲而一无礼貌，如杜茶村辈是：

《国朝先正事略·杜茶村先生事略》：“惟故旧或守土吏促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先生午睡，或治事则外键之，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

《国朝先正事略·余若水先生事略》：“天锡破帷直入，先生拥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马疾，不得与故人为礼。’天锡执手劳苦，出门未数武，则已与一婢子担粪灌园矣。”

至于倪云林的举动，则我们更无法予以理解：

《明史·倪雲林传》：“俗客造庐，比去必涤其处。”

这已经越出孤高自赏的范围，而是一种极无聊的矫揉造作了。

隐士接待宾客的不近人情处略如上述，而人类究属群居的动物，假使隐士要过绝对的孤独生活，而日与鸟兽同群，精神必痛苦不堪，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何况中国始终是一个注重交友之道的国家，如鲍叔之与管仲，俞伯牙之与钟子期，都是历史上的佳话，隐士也无法不感受到这一种交友的高尚德性和良好习惯。《宋史·连庶传》说：“非其人不友。”《宋史·邢敦传》说：“性介僻，非妄交友。”由此可知隐士并不是不交友，不过交友的条件比较严格，并且特殊而已。

道不同不相为谋，隐士过从最密的朋友还是隐士：汉代的梁鸿和高恢、南北朝的顾欢和杜京产、宋代的陈搏和种放等都是，又清初邓起西曾单身行万山穷谷中，谒黄太冲于双瀑书院，亦足见隐士互相钦迟之情。

隐士和道士、和尚结方外交的也很多：

《旧唐书·王龟传》：“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

《旧唐书·司空图传》：“日与名僧高士游泳其中。”

《陆文学自传》：“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燕永日。”

《王休传》：“日与名僧野客往还。”

《明史·陈继儒传》：“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

《国朝先正事略·何仲渊先生事略》：“与樵翁衲子侣，行歌独哭。”

《国朝先正事略·吴野翁先生事略》：“徐步陇亩，与山夫畚叟较量晴雨，话桑麻。”

《国朝先正事略·周德林先生事略》：“呼山僧，不问其能饮与否，强酌之。”

隐士之所以和隐士以及方外人结交，彼此同有出世的思想是一个原因，地域也不无关系，因为山谷之中，寺院宫观比较多，隐士和方外人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了。在山野里，碰着农夫樵夫的机会更多，但他们智识程度大都不及方外人，所以隐士和他们比较少结交。至于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些什么玩意呢？大致不外静坐、清谈、吟诗、读书、诵经、垂钓、酌酒、啜茗、调琴、炼丹、采药、弈棋、游览等等。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隐士的社会生活大半限制在他们自己狭小的圈子里，有的结成无形的组合，有的是有形的集团。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无数隐士的集团，最著名的有下列几个：

一、汉 商山四皓 二、晋 竹林七贤 三、南北朝 莲社十八高贤 四、唐 竹溪六逸 五、五代 华山三高士 六、宋 南山三友 七、明 茗溪五隐 八、海内三遗民 九、易堂九子

商山四皓见《汉书》卷七十二：“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颜师古注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四皓事迹罕见经传，惟知高祖欲废太子时，尝一至京师。

竹林七贤见《晋书·嵇康传》：“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他们这个集团非常有趣，山涛和王戎相差达三十余岁之多，后来嵇康与山涛绝交，其余诸人也多出山，集团遂无形瓦解了。

莲社的组织旨趣见刘程之《莲社誓文》：“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荐而誓曰：惟斯一会之众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以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同人俱游绝域，其警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云峤，忘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后升，勉思汇征之道，然后妙观大义，启心贞照，识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于中流，荫琼柯以咏言。飘云衣于八极，泛香风以穷年。体妄安而弥穆，心超乐以自怡，临三台而缅谢，傲天宫而长辞，绍众灵以继轨，指大息以为期，究以斯道也岂不弘哉。”莲社表面是一个佛教组织，实际是一个庞大的隐士俱乐部。这一百二十三人之中，至今可考的仅十八人，世称十八高贤，其成分如下：

居士七人 陶渊明、刘程之、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雷次宗

梵僧二人 佛驮跋陀罗、佛驮邪舍

沙门八人 慧远、道曷、昙常、惠睿、昙说、道敞、道生、昙顺

道士一人 陆静修

慧远是一个儒者半途出家的高僧，道曷等都是他的子弟，陶渊明等对慧远也执子弟礼，他们聚会的地点是慧远所建筑的龙泉精舍。陶渊明《酬刘柴桑》（刘程之曾为柴桑令）诗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庐阜杂记》说：“远法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矣，远许之，遂造焉，因勉以入社，渊明攒眉去。”《莲社图记》说：“陶潜时弃官居栗里，每来社中，或时才至便攒眉去。”则渊明虽为社员之一，然并不见得热心。十八高贤之中渊明与刘程之、周续之又有浔阳三隐之称。当时谢康乐以文采风流盖世才华要求入社，慧远法师因为他心太乱而拒绝，则莲社的严格可以想见了。

竹溪六逸见《旧唐书·李白传》：“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济南府志》亦称：“徂徕山在泰安州代岳南七十里，岳之案山下有白鹤湾，唐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陶沔隐此，号曰竹溪六逸。”六逸以李白之盛名而闻世，其中坚分子则是孔巢父，《旧唐书·孔巢父传》称其“少力学徂徕”。韩、裴、张、陶湮没无闻，杜甫有《题张氏隐居》一诗，考其时日与地点，似即指张叔明。六逸除“日沉饮”外，有无其他活动不能断定。李白之《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为研究六逸集体生活之唯一资料：“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复秀出，俱为云霞亲。”这是李白推崇他们的话。“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可见竹溪是他们聚会之处无疑。

华山三高士见《新五代史·郑遨传》：“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

石为金，邀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之。”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饮酒弈棋，邀并能诗。

南山三友见《宋史·高泽传》：“与同时张尧、许勃，号南山三友。”

苕溪五隐见《明史·孙一元传》：“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金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陆崑善，而长兴吴琬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

海内三遗民见《国朝先正事略·徐俟斋先生事略》：“先生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

易堂九子在后面有专章作较详细之述评。

中国隐士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如此不丰富，隐士本身须负全部责任，正如近人朱光潜在《谈处群》一文中所说：“人人都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觉得社会卑鄙，不屑为伍，所以跳出来站在一边，表示自己不与人同。”隐士确实是这样“癞虾蟆跳进秤盘”自称自的，而一般世俗的人，除掉是好事的和假风雅的，假使没有极重要的事，也就不敢到隐士的门前自讨没趣，在这种情形之下，“鸡犬之声相闻，虽至老死不相往来”也就变成常有的事了。中国社会受了隐士“孤高自赏”的流毒，所以人各行其是，苦难不能共当，欢乐不能同享，这是值得我们猛省的。

中国隐士的地域分布

中国隐士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偏倚性：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观察，隐士分布在平原的极少，大部分在山谷和丘陵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分布在城市的极少，大部分在乡村。所以中国古籍上提起隐士的时候，常用“山林隐逸”和“岩穴上士”这两个成语。

平原由于可耕作的土地面积广阔，所占之百分比大，人口的密度必然高；而平原的筑路工程轻而易举，平原的河流又平漫徐缓，可通舟楫之利，所以交通也最发达；这些稠密的居民的劳动，以及各种交通工具和它的乘客的往还，结果使平原充满喧嚣而不幽静。山谷和丘陵地的地力则仅能供给极有限的居民的物质需要，同时筑路工程困难，而水速过快、斜度过大的急湍旋涡密布的山涧也难以通航运，不可能经济地大量输入平原上的生产品，平原上的生产品，用劳力运至山谷或丘陵地，售价必远高于原价格，中国交通，近百年来虽有飞速的进步，但在山顶上吃一碗面的钱可以在山脚下吃三碗面那一种情形现在到处还可发现，古代当更甚于此，因此历代都有人口向平原集中的趋势；人口既稀少，交通又阻塞，结果使山谷和丘陵地充满幽静而不喧嚣。诗人说：“琴静得古趣，心清闻妙香。”隐士无论做怡情养性的功夫，或是修求知探理的课业，对于喧嚣的环境都不合式，这是隐士舍平原而取山谷和丘陵地的第一个原因。

平原受交通的影响，使物质文明的触须最先碰到它，生产的方式进步得快，自然财货转变成经济财货的过程缩短，一切都趋向于商品化了，具有

交易价值的动物、植物、矿物遂以商品买卖于市场。举个例子来说：当地球上刚出现人类的时候，森林的分布未必有所轩轻，为什么到现在只剩了深山穷谷中有绿色参天的处女林，这是因为平原的森林给那些稠密的居民砍伐下来，用为他们的燃料以及土木工程和人工业品的原料，或者藉交通的方便，以有限的运费运到价格更高的地方去，因此平原的自然美给破坏无余，而只剩下人为的图案式的风景线了。山谷和丘陵地的居民的物质生活简单而朴素，就以森林而论，他们在同一时期所砍伐的很可能比同一时期所增产的为少，交通又困难，运到平原上去出售不合算，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山谷和丘陵地的本来面目不容易被破坏，因而触目皆是自然美的风景线，隐士是酷爱自然而鄙视人为的，这是隐士舍平原而取山谷和丘陵地的第二个原因。

平原的人口既稠密，产生了意识的宗法礼教和潜意识的风俗习惯，使全体居民毫不怀疑地生活在这一种宗法礼教和风俗习惯中，假使有人标新立异，必然地为其他人所自不满，而隐士自视超凡不群，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拘束，同时隐士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之外，更不可能接受这种拘束。山谷和丘陵地的人口既少，隐士可不顾宗法礼教和风俗习惯，而在他的茅亭之外或者石窟之中为所欲为，即使做出极荒诞不经的事情，外面也不大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去批评他、干涉他。顾况有《山中赠客》一诗：“山中好处无人别，涧梅伪作山中雪，野客相逢夜不眠，山中童子烧松节。”使设想萍水相逢的两个人，龙门阵一直摆到天亮，世俗能不视为咄咄怪事。王维有《竹里馆》一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使设想一忽儿弹琴，一忽儿拉起嗓子高声怪叫，世俗能不视为神经病大发？可是那时地点是深林里，除了明月照见他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是隐士所以舍平原而取山谷和丘陵地的第三个原因。

平原与山谷和丘陵地的相异处,就上列三方面来说,也正是城市和乡村的相异处,所以不同者,城市更必然是政治的中心,隐士之所以为隐士,关键就在对于政治的不满、冷淡或厌恶,对城市无好感是必然的道理,所以明末清初的隐士如徐俟斋、李蜃园、李汲庵、周德林、芮岩升、沈思菴辈往往三四十乃至终身不入城市。隐士逗留在城市里而不参与政治固亦不可,但这里面就潜伏着两种可能的转变:从隐士本身说,看见达官贵人的栉比华厦和高车驷马,不免有羡慕之心。说不定由此发生种种的物质的占有欲。看见国势不振,受制于人,不免有羞愤之心。看见生民困苦,饿殍载道,不免有恻隐之心,说不定由此发生救国救民的支配欲、领袖欲。俗语说:“眼不见为净”,假使隐士打算做一个彻头彻尾的隐士的话,不住城市是非常合理的。据说苦修的僧侣每逢到妙龄的绝色女子到寺庙里来进香,总是故意眼睛不看,深恐引起欲念而坏了功果,这情形适足以说明城市对于隐士的危险性。从另一方面说:很可能受到政府的劝导或强迫、家属或亲戚朋友的怂恿,被动成分居多地由隐士转变成官吏,所以大部分隐士不居城市,所以本来住城市的隐士逢到有人勉强他出仕的时候,也要出亡,如晋之戴逵与谯定、唐之杜怀恭都是。兹将隐士分布情形以地域为单位,归纳成下列各表:

一、庐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匡 俗	先秦	屡逃征聘,结庐于此山中。	详见《浔阳志》。
陆修静	晋	早为道士,隐于庐山。	
刘程之	晋	弃柴桑令入匡庐,与慧远及雷次宗游,宋高祖号之曰遗民。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慧远(释)	晋	隐于庐山三十年,未尝一出。	详见《三藏记》、《莲社高隐传》。
陶渊明	晋	往来庐山中,与慧远甚相契。	详见《晋书》、《宋书》、《南史》、《莲社高隐传》。
翟 汤	晋	笃行纯素,不屑世事,征为国子博士不起。	详见《庐山旧志》。
翟 庄	晋	立屋庐山,力耕草食,诸子史记华竺典故无所不通,辟主簿,举秀才并不就。	详见《晋书》。
刘凝之	晋	尝为颍上令,年四十,即挂冠去,隐庐山。	详见《庐山疏》。
周续之	南北朝	入庐山,师事慧远,布衣蔬食,征为太学博士,不就。	详见《宋书》、《续世说》。
雷次宗	南北朝	弱冠入庐山事慧远,宋元帝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除给事中,不就,未几复还山。	详见《庐山志》。
宗 炳	南北朝	宋武帝时辟为主簿及太尉参军,俱不就,入庐山,与慧远居。	详见《南史》、《续世说》。
张莘民	南北朝	以散骑常侍征不就,入莲社事慧远,自号东皋老农。	详见《野人传》。
张 诜	南北朝	以散骑常侍征不就,山水自放,庐于香谷,常带经而锄。	详见《十八高贤传》。
张孝秀	南北朝	弃安成王别驾,隐于庐山东林寺侧。	详见《南史》。
翟法赐	南北朝	立屋于庐山顶,不食五谷,以兽皮为衣,辟主簿,举秀才右参军著作郎,佐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	详见《宋书》。
李 渤	唐	隐于庐山东,尝养一白鹿,今有白鹿洞及白鹿书堂。	详见《唐书》。
刘 轲	唐	隐庐山万杉之东。	详见《庐山疏》。
苻 载	唐	以琴自娱,名其庐曰睡足庵,自号玉洞道人,隐居五老峰下六年。	详见《庐山疏》。
陈伯宣	唐	隐于圣治峰,尝注《史记》,诏征不赴,后辟拜著作郎。	详见《太平宫志》。
饶子卿	唐	隐居庐山,茅茨数椽,不避风雨,危坐其下,终日无闷色。	详见《十三贤共注庐山记》。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郑元素	五代	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积书千余卷。	详见《庐山疏》。
行因(释)	五代	住佛手岩,南唐李主三召不起。	
谭紫霄	五代	初事闽王昶,闽亡,隐庐山栖隐洞。	详见《真仙通鉴》。
陈 颢	五代	与权阮隐紫霄峰下,力田自食逾三十年,后征至京师,欲官之,固辞不受,赐帛遣归。	详见《庐山疏》。
薛 溉	宋	尝为南海书记,秩满入庐山筑室居之,匾曰薛处士草堂,起为谏议大夫,未几复归。	详见《庐山疏》。
刘惠斐	宋	构园于东林寺侧曰离俗园,自号曰离垢先生。	详见《续世说》。
崔诚老	宋	博学高逸,不事进取,庐于玉京之上。	详见《庐山疏》。
周茂叔	宋	归老于匡北莲花峰之麓。	详见《庐山疏》。
萧 存	金	隐于庐山西林寺侧。	详见《庐山疏》。
陶性中	明	筑庵隐居之,匾曰:吾庐。	详见《庐山疏》。
郭些庵	清	隐庐山,北京陷,悲愤不食,史可法荐南京操江,不赴,未几祝发为僧。	详见《国朝先正事略》。

二、嵩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许 由	先秦	尧欲以天下相让,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不欲闻,洗耳于颍水。	详见《高士传》。
巢 父	先秦	巢父谓许由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求其名誉”,汙吾袂口,牵袂上流饮之。	详见《高士传》。
裴 衍	南北朝	景明二年,以阴平太守致仕,归隐嵩山。	详见《魏书》。
冯 亮	南北朝	博览群书,笃好佛理,高世宗屡有征召,皆不就。	详见《魏书》、《北史》。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杨 愔	南北朝	性好山水,永初中入隐嵩山,后出山又归隐,再出山拜驃骑大将军。	详见《北齐书》。
潘师正	唐	师事王远知,清静寡欲,居于嵩山之道遥谷。	详见《旧唐书》。
刘道合	唐	隐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乙观以居之。	详见《旧唐书》。
武攸绪	唐	武则天兄子,封其为安平郡王,固辞入嵩山,中宗睿宗屡有征辟皆不就。	详见《旧唐书》。
武平一	唐	武则天时不与事,隐嵩山,屡召不应,中宗复位方出山。	详见《新唐书》。
卢藏用	唐	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偕隐少室,后出为左拾遗。	详见《旧唐书》。
卢 鸿	唐	隐于嵩山,开元初遗币礼征不至,五年应征至东部,谒见不拜。	详见《旧唐书》。
王希夷	唐	隐于嵩山,师事道士黄颐向四十年,九十六岁拜国子博士,听还山。	详见《旧唐书》。
孔述睿	唐	代宗、德宗时曾两度出山,后复归旧隐。	详见《旧唐书》。
李 渤	唐	不乐仕进,隐于少室。元和初出为右拾遗。	详见《唐书》。
孟 郊	唐	少隐嵩山,性孤介少谐合。	详见《旧唐书》。
郑 遨	五代	唐昭宗时见天下已乱,欲携妻俱隐,妻不从,乃入少室为道士。	详见《五代史》。
种 放	宋	晚年居嵩山天封观侧,帝命内侍就兴唐观旧基起第赐之。	详见《宋史》。
万 适	宋	不求仕进,隐于嵩阳,专以著述为务。	详见《宋史》。
田 浩	宋	隐嵩山,好著述,聚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	详见《嵩高志》。
杨 璞	宋	不愿仕进,自称东野逸民。	详见《宋史》。
董五经	宋	隐嵩山,为穷经之士,程子尝往访焉。	
张 升	宋	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每日晨起焚香读华严。	详见野史。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高仲振	金	与妻子偕隐,博览群书,安贫自乐,不入城市。	详见《金史》。
张 潜	金	从仲振学易,年五十始娶,夫妇相敬如宾,负薪拾穗,行歌自乐。	详见《金史》。
杜时升	金	隐嵩之少室山中,从学者甚众。	详见《金史》。
冯 历	元	以集庆军节度使致仕,居嵩山龙潭寺。	详见《嵩高志》。

三、武夷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顾野王	南北朝	仕于陈,偶入九曲遂卜居焉,尝出救平侯景之乱,复返崇安,筑室武夷山中。	详见《武夷纪要》。
张 峤	宋	南唐末居武夷,与渔樵为伍,宋太祖朝始仕。	
刘 夔	宋	生平好道家言,筑室武夷,号北山居士。	详见《宋史》。
詹野先	宋	以贤良应荐后竟不仕,隐居武夷麋江之滨,啸咏山水间,终日不倦。	
游 酢	宋	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为讲论之所。	详见《宋史》。
胡安国	宋	以宝文阁直学士致仕,退居山中,自号武夷翁。	详见《宋史》。
胡 宪	宋	初两膺征召,俱以母老辞,后与刘子翬、刘勉之共隐武夷。	详见《宋史》。
胡 寅	宋	与刘衡建夺秀亭于罗汉岩上,以为讲学之所。	详见《宋史》。
胡 宏	宋	不慕荣利,与弟宁讲学武夷山中三十年。	详见《宋史》。
刘子翬	宋	以疾辞承务郎归,主持武夷冲佑观,足不出山十七年。	详见《宋史》。
刘勉之	宋	绍兴中应召诣阙,为秦桧所忌,乃归武夷,夷犹于九曲山水之间。	
刘 衡	宋	弃官归武夷,筑小隐堂于茶洞。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蔡元定	宋	居武夷,幽贞自励,后坐伪学禁,以布衣贬道州。	详见《宋史》。
蔡 沈	宋	偕兄渊筑室虎啸岩下,匾曰南山草堂,受业晦翁之门。	详见《宋史》。
刘 甫	宋	隐于武夷山北水帘洞。	详见《宋史》。
方士繇	宋	栖止于仁智堂,随晦翁等讲授,退惟静居室中。	
江 贇	宋	居武夷,以遗逸三征不起。	
熊 禾	元	入元不仕,载书入武夷,筑洪源书堂,聚生徒讲学。	详见《新元史》。
詹师文	元	晚归武夷,隐幔亭峰下。	
熊 藩	元	筑室于鼓楼岩下,匾曰独善堂,自号独善先生。	
赵若槩	元	登科甲不赴,徜徉于武夷山水间。	
杜 本	元	初忽刺木荐其才,召人不果用,即隐武夷,文宗诏起之,不赴。	详见《元史》。

四、天台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顾 欢	南北朝	年二十隐居天台山开馆授徒,齐高帝累诏不起。	详见《天台县志》。
杜京产	南北朝	顾欢招京产偕隐于天台,今有招隐岭古迹。	详见《天台县志》。
庾肩吾	南北朝	隐天台,故其子信所著《哀江南赋》题曰:“少微真人,天台逸民。”	详见《梁书》。
徐 则	隋	绝谷养性,虽降冬严寒不服绵絮。	详见《隋书》。
司马承祯	唐	睿宗召对后归天台山。	详见《唐书》、《天台县志》。
甘泉先生	唐	隐于华顶峰,屡召不起。	详见《天台县志》。
陈寡言	唐	隐于玉霄峰,以诗歌自娱。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徐灵府	唐	居天台云盖峰石室,以修炼自乐,会昌初频召不起。	详见《天台县志》。
夏侯隐	唐	本中末游天台,独止一室或宿草树间,每登山渡水闭目而睡,比至则觉。	详见《仙传拾遗》。
丰干(释)	唐	居国清寺,形貌寝,被发布裘,或时歌唱。	详见《天台县志》。
寒山(释)	唐	容貌枯悴,布襦零落,时来国清寺乞残羹。	详见《传灯录》。
拾得(释)	唐	在国清寺厨房中涂器。	
许 仁	宋	初以临安知府劾黄潜善、汪伯彦,卜居天台之墨湖建思敬堂、金波亭。	
季思可	宋	居天台山,于雷马山筑读书堂。	
张无梦	宋	庐于天台之琼台,真宗辟为著作郎,不受,赐号处士亦不受。	
杜 本	元	隐居天台,学者称清碧先生,脱脱召为国史编修,称疾固辞。	详见《元史》。
潘和道	明	隐于华顶,筑云山一览亭,自号竹坡隐者,刘诚意劝之仕,力拒之。	
恽逊庵	清	应诏上备边之策五道,不报,乃挥泪而去,携书三千卷隐天台。	详见《国朝先正事略》。

五、青城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范长生	晋	隐居青城,晋惠帝时李雄攻成都,长生率千余家保青城。	详见《晋书》。
李尧夫	晋	气节之士,游青城不知所终。	详见《青城山记》。
赵 昱	隋	偕弟晃俱隐青城,炀帝征召不起。	详见《青城山记》。
符 载	唐	栖青城山,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	详见《北梦琐言》。
严遵美	唐	建别墅于青城山以居之。	详见《北梦琐言》。
张古道	唐	不事王建,卖卜青城。	详见《灌县志》。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杜飏龟	唐	名画家,隐居青城上清宫。	详见《益州名画录》。
杜光庭	唐	隐居青城山,力事著述。	详见《一统志》。
孙知微	五代	隐居青城不仕。	详见《宋史》。
张 愈	宋	隽伟有大志,隐居青城山。	详见《宋史》。
谯 定	宋	理学名家,慕青城大面之胜,隐居其中。	详见《宋史》。
姚平仲	宋	为西陲大将,隐青城山上清宫,复入大面山。	详见《宋史》、《蜀中广记》。
箍桶翁	宋	青城隐者,授二程以易学。	详见《一统志》。
古臧用	宋	隐青城山,嗜酒,祥符中召见赐诗。	详见《舆地记胜》。
冯 随	宋	居青城山,得魏伯阳之遗书。	详见《灌县志》。
冯怀古	宋	隐居青城山,精通方舆。	详见《茅亭客话》。
安世通	宋	青城山道人。	详见《宋史》。
章 簪	宋	博学善文,往来青城间。	详见《东坡志林》。
宋汝为	宋	为秦桧所忌,入隐青城。	详见《青城山记》。

六、衡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刘麟之	晋	采药衡山,深入不返。	详见《晋书》。
刘凝之	晋	礼辟并不受,慕老莱子之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携妻子隐居衡山。	详见《衡岳志》。
宗 炳	南北朝	武帝辟为荆州主簿,不就入庐山,晚年结庐衡岳。	详见《宋书》。
李 泌	唐	至德一年归衡山,上敕郡县筑室山中,给三品料。	详见《旧唐书》。
廖 凝	五代	隐居南岳,吟咏自适,李璟初聘之不屈,后为彭泽令,未几复归。	详见《衡岳志》。
廖 融	五代	不嗜进取,独耽山水之乐,号曰衡山居士。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狄 煥	五代	狄仁杰之后,隐居南岳,以林泉自适。	
范愚叟	五代	原名刘昌嗣,隐帝遇害即入隐衡山,改姓名躬耕终身。	
胡安国	宋	以宝文阁学士隐居衡山。	详见《宋史》。
廖 倚	宋	始以进士举于有司不中,绝意仕进,遂隐于衡山。	详见《衡岳志》。
刘绍光	明	曾任休宁知县、刑部郎,乐于恬退,归耕衡山之下。	
王夫之	清	避世于方广寺。	
刘 倚	清	以翰林隐衡山。	

七、华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高 恢	汉	与梁鸿善,隐华山,终身不仕。	详见《后汉书》、《陕西通鉴》。
王 猛	晋	隐居华山,闻桓温入关,被褐之,扞虱谈当世之事旁若无人。	详见《前燕录》。
司马郊	晋	隐居华山四十余年,养飞禽甚多。	详见《独异志》。
杨伯丑	隋	好读易,隐华山,征至京师数年复归。	详见《仙传拾遗》。
罗隐之	五代	隐华山,与翟士端、郑邀、郑隐合称华山四高士。	详见《陕西通志》。
郑 邀	五代	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称三高士。	详见《五代史》。
陈 搏	宋	初隐武当,后迁华山云台观。	详见《宋史》。
姜善经	元	隐于王刁洞,师事靳贞。	
王汝霖	明	避迹华山之麓,以诗赋自娱,有司荐不起,台府高其节,赠匾旌庐。	详见《陕西通志》。
魏渊之	明	不言世务,足未出山者三十余年。	
张 雨	明	隐居华山之东峰石洞中。	详见《明史》。

八、太白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挚 恂	汉	以儒术教授,隐于太白,不应应聘,名重关西。	详见《后汉书》。
苏 则	三国	建安初与吉茂共隐太白山。	详见《郿县志》。
吉 茂	三国	隐太白山,好学而不耻恶衣恶食。	详见《郿县志》。
苏 威	隋	入太白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前后所授并辞不就,文帝时始出。	详见《隋书》。
孙思邈	唐	隐于太白,学道炼气,太宗欲官之不受,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称疾还山。	详见《旧唐书》。
杜怀恭	唐	妇翁李勣统兵伐高丽欲其偕行以求勋,恭固辞逃入太白山。	详见《旧唐书》。
韩思复	唐	入隐太白,耽思笃学,未尝一省其家。	
田游岩	唐	为黄冠,居太白山。	详见《旧唐书》。
郭 休	唐	有运气绝粒之术,每于白云亭邀集宾客看玩山中风物。	详见《开元遗事》。
王 休	五代	不亲势利居山中,日与名僧野客往还。	详见《梁书》。
孙一元	明	足迹遍天下,而隐居太白最久,自号太白山人。	详见《明史》。

九、中条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司空图	唐	乾宁中征拜兵部,称足疾不仕,昭宗诏图入朝以失仪放还山,居王官谷之别墅,颇称幽栖之趣。	详见《旧唐书》、《续世说》。
阎采贞	唐	以河东太守致仕,隐中条山。	详见《平阳县志》。
阳 城	唐	远近学者慕其德行皆来从之学。	详见《旧唐书》。
智兴(释)	唐	结庐中条山大通岭,睿宗三召不至。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李 洙	宋	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以来衣冠人事历历可听。	详见《宋史》。
麻 革	宋	有先人业在王官谷乐道不仕,教授生徒,以诗文自娱。	详见《临晋县志》。
何南卿	宋	无意仕进,卜居中条山水谷,创乐全观以终老。	详见《芮城县志》。
房居士	明	仕途不得意,入中条山修道,闭关十一年,后往麻衣山姑射山。	

十、洞庭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角 里	汉	为四皓之一,隐于洞庭西南。	详见《史记正义》。
葛 洪	晋	隐于西洞庭马税城南,里绿石山下,立坛炼丹。	详见《葛洪别传》。
吕 知	唐	造草舍而居,善星纬,识地理,多术数。	详见《于濛闻奇录》。
叶超元	唐	隐居于今西洞庭仙坛观之旧址。	
王 鹏	元	隐于东洞庭山。	
许 昱	元	隐于东洞庭山。	
叶 颙	元	隐于东洞庭山麓。	

十一、苏门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孙 登	晋	为士窟于山中以居之,好读易,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	详见《晋书》。
邵 雍	宋	结庐百泉之山,布裘蔬食,从李之才学易,以易名世。	详见《辉县志》。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姚 枢	元	弃官而入苏门,鸣琴百泉之上,遁世而乐天。	详见《元史》。
许 衡	元	讲道于苏门,一时从游者甚众。	详见《元史》、《新元史》。
王 磐	元	擢进士第,授归德府录事判官不赴,避地苏门,受业者甚众,称名儒。	详见《元史》、《新元史》。
窦 默	元	与姚枢、许衡讲学苏门,倡伊洛理性之道。	
丘处机	元	居苏门,精通玄学。	详见《元史》、《新元史》。

十二、林虑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卢子綦	先秦	隐于栖霞观。	详见《林县志》。
乔 璋	先秦	偕乔瑞并事卢子綦于林虑山。	详见《林县志》。
夏 馥	汉	入林虑山为冶工。	详见《高士传》。
庾 哀	晋	携妻子适林虑耕作自给。	详见《晋书》。
卢大翼	隋	博综群书,初隐白鹿山,后入林虑山茱萸洞。	详见《林县志》。
王庭筠	金	以罪免官职,居林虑,读书于黄华山寺。	详见《金史》。
李志方	金	弃户部令史,隐林虑山坐炼。	详见《林县志》。

十三、终南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普安(释)	晋	隐终南山楞梓谷,朝廷广募遗僧,独普安自守林壑不应。	详见《长安县志》。
储光羲	唐	隐居终南,有终南幽居诗。	
孟浩然	唐	隐终南,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诗。	详见《旧唐书》、《新唐书》。

(续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种 放	宋	与母俱隐于终南山豹林谷。	详见《宋史》、《国老谈苑》、《燕翼贻谋录》。
高 恹	宋	从种放于终南山，寇準荐之不起，后于京兆讲学，席间常满。	详见《宋史》。
范 宽	宋	卜居终南，遍观奇胜，落笔雄传，与李成并为山水画宗师。	详见《图绘宝鉴》。

十四、罗浮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葛 洪	晋	上罗浮山中炼丹。	详见《晋中兴书》。
单道开	晋	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	详见《晋书》。
湛若水	明	致仕后构精舍于朱明洞，建书院于青霞谷。	
黄佐才	明	晚岁隐罗浮，撰《浮图经》一篇。	
张铁桥	清	晚岁隐罗浮。	详见《明末民族艺人传》。

十五、峨嵋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窦 谊	汉	居蜀峨嵋山，武帝三征不起。	详见《峨嵋山志》。
譙 秀	晋	李雄征之不应，逃入峨嵋山中。	详见《晋书》。
胡 份	唐	初隐庐山，李膺弓旌之，逃入峨嵋，隐九老洞。	
陈 搏	宋	太祖即位，召对后远遁峨嵋山。	详见《宋史》。
范文光	明	避乱山中，修净土业。	详见《明史》。

十六、武当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关尹喜	先秦	得老子道德经后,托疾不仕,至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之下隐居。	详见《舆地纪胜》。
陈搏	宋	栖武当山九宝岩,服食辟谷凡二十年。	详见《宋史》。
张士逊	宋	少读书武当山,后官位至宰相,复归隐。	详见《宋史》。
吉志通	元	博学洽闻,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但饵黄精苍术。	
黄明佑	元	抗志烟霞,师事武当张真人。	

十七、四明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孔祐	晋	隐四明山,太守王僧处欲引为主簿,不为屈。	详见《宁波府志》。
徐浩	唐	隐于鄞,自称四明山人,后出为校书郎。	详见《鄞县志》。
许寂	五代	不干时誉,隐于四明,后出为蜀相。	详见《五代史》。
郭维	宋	于四明教授生徒,从者甚众。	详见《鄞县志》。
陈桢	宋	晚居四明山,著《通鉴续编》二百卷。	详见《奉化县志》。

十八、王屋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司马承祯	唐	玄宗诏置坛室于王屋山以居之。	详见《旧唐书》、《济源县志》。
许碯	唐	学道王屋山,辟谷养气十余年,自称高阳酒徒。	详见《武夷纪要》。
李商隐	唐	少时学道王屋山。	
刘易	宋	隐于王屋,韩琦、赵抃、狄青皆厚遇之,不能使其屈志仕进。	详见《宋史》。

十九、鹿门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庞 公	汉	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	详见《后汉书》。
庞 蕴	唐		
孟浩然	唐	隐鹿门,年四十始至京师,有《夜归鹿门歌》。	详见《旧唐书》、《新唐书》。
皮日休	唐	隐鹿门,著有《鹿门隐书》。	

二十、大涤山历代隐士表

姓 名	时代	摘 要	备 注
许 迈	晋	立精舍于山中,有终焉之志,后远游,莫知所终。	详见《杭州府志》。
郭 文	晋	伐木倚林,苦覆为舍,独居十余年,王导及温峤欲其出皆未果。	详见《晋书》、《余杭县志》。
夏侯子云	唐	于山中筑药圃种芝术之属,尝掩户经日寂坐不语。	详见《杭县志》。
王 林	宋	弃家结茅大涤山修真炼养。	详见《临安县志》。

现在再根据上列各表作一统计,藉以见中国历代隐士分布之大势:

时代 地域	先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合计
庐山	1			7	7		5	4	4	1		1	1	31
嵩山	2				3		10	1	6	3	1			26
武夷山					1				16		5			22
天台山					3	1	9		3		1	1	1	19
青城山				2		1	5	1	10					19
衡山				2	1		1	4	2			1	2	13

(续表)

时代 地域	先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合计
华山		1		2		1		2	1		1	3		11
太白山		1	2			1	5	1				1		11
中条山							4		3			1		8
洞庭山		1		1			2				3			7
苏门山				1					1		5			7
林虑山	2	1		1		1				2				7
终南山				1			2		3					6
罗浮山				2								2	1	5
峨嵋山		1		1			1		1			1		5
武当山	1								2		2			5
四明山				1			1	1	2					5
王屋山							3		1					4
鹿门山		1					3							4
大涤山				2			1		1					4
合计	6	6	2	22	15	6	52	14	56	6	15	13	5	218

视诸上列统计,中国隐士的地域分布以庐山最密,嵩山次之,武夷又次之,天台、青城再次之,余则衡山、华山、太白、中条、洞庭、林虑、苏门、终南、罗浮、峨嵋、四明、武当、王屋、鹿门、大涤诸山顺次而降;庐山之所以得居首位,实因庐山之环境极适合隐士之理想,自晋湛方生以下,诗人吟咏庐山之诗章迭见,然未曾邀及历代统治者之重视,故无离宫别馆及寝陵,庐山之真面目得以保存焉。王思任《游庐山记》说:“星渚浔阳之间,人无几,奔走城市不暇给,以故予山游不见发人,亘古无妇尼之足,亦少靓色,僧亦无处得酒肉,赋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于富闹之乡,则辱淫喧袭,万丈之尺短矣。吾所绝恋者:无山不峰,无峰不石,无石不泉也。至于彩霞幻生,白云面起,

朝朝暮暮，其处江湖之界乎，此所谓山泽通气者矣。”由此可知庐山不但清幽绝人，并一无物质之诱惑，是以隐士多乐居焉。庐山隐士事迹较著的凡三十一人，而晋末及南北朝即据十四人，占百分之四五点六六，超过了其他朝代，是因为那时高僧慧远组织了白莲社，招徕无意仕进萧然物外的士人以及学识深奥的僧侣。物以类聚是一定的道理，于是刘程之、周续之、雷次宗、宗炳、张莘民、张诠遂鹜集于此了。嵩山地处大江之北，景物平凡无可观，雄伟或者有之，要说蔚然深秀茂树藏幽那种细致含蓄的风味，自然远不及庐山，且嵩山是五岳之中的中岳，自黄帝迄清代，历朝帝王之巡幸及祭祷，史不绝书，帝王之寝陵则有周昭王陵、五代汉高祖睿陵、宋太祖父昭武皇帝永安陵、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等等，自然风物已多少有些人为了，不是隐士隐居的理想处所无可怀疑，而嵩山事实上竟为仅次于庐山之隐士集中地，实因寺庙宫观之众多，黄冠野客之中自不乏隐逸之士，而一般隐士又乐于方外人结交，这是第一个解释；又因嵩山和唐的都城长安以及北宋的都城开封都离得不十分远，对于那些身居山林之中心存魏阙之下的隐士最适合不过了，朝廷恩命一下，立可轻裘以趋，这是第二个解释。武夷山为闽中最负盛名之胜迹，王守仁有诗纪之云：“肩舆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海上真为苍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曲谙路，精舍十年始及门，稍待还家慰垂白，细探更拟在春分。”读此诗可知其吸引人之魅力，本来有一句俗话，叫做“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山中有水。”山中有水，等于锦上添花，而武夷山中的水又蜿蜒曲折微波荡漾，宜乎隐士入而不返了。武夷隐士事迹较著二十二人，属宋代者十六人，占百分之七二点七二七，良因宋太祖以陈桥兵变有国，武功不彰，北宋之际北方即边警频起，及南渡建都临安，山河仅剩半壁了，人物

自始即汇萃在此东南一隅，故隐武夷者独多。至于天台山，孙绰《游天台山赋序》中说：“……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则其所以与隐士结不解缘，殆亦种因于此山之清静深邃也。其余青城诸山，当然也有它们的特殊之点，使隐士对于它们发生兴趣，再说某一时期隐士集中得多，某一时期隐士集中得少，也不是偶然的现象，是由于时局等种种因素决定的，这是我们对于隐士的地域分布应有的认识。

中国隐士与中国绘画

我们知道艺术家虽然不一定是表现实体的自己，举个例子来说：画家的作品断不会每一幅都是自画像，但一定是表现抽象的自己——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一种看法、解释以及趣味。隐士之所以为隐士，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解释以及趣味当然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则隐士的艺术作品有着特殊的情调自在意中；绘画是中国艺术之中最普遍、最有成就的一个部门，现在请从题材和风格两方面略论中国隐士和中国绘画的关系。

中国画的题材大抵不外山水、人物、释道、鬼神、宫室、舟车、走兽、鱼鸟、林石与花果，释道固然是人物的一种，但画家在习惯上并不把他们列入人物之内。再说也许一幅画有山水也有人物，但其间总有宾主的关系存在着，假使人物作为山水的点缀，则山水是主、人物是宾，假使山水作为人物的衬托，则人物是主、山水是宾，明白了这个道理，下面好展开讨论。

中国画的主流是什么呢？谁也知道是山水画罢！

中国画的萌芽期并无山水画，甘肃所发掘的彩陶上仅有很单纯的人或犬羊马蛇鸟之属的图形，而周末的铜器和漆器上也只有人物图像以至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秦汉亦然，三国时绘画的工具——绢、纸、笔——大备，绘画乃独立地成为艺术的一个部门，那时候传流下来的作品有孙吴曹不兴作《玄女御授黄帝兵符图》和高贵乡公曹髦作《卞庄子刺虎图》，山水画绝未出现。晋顾恺之作《云霓望五老峰图》和《云台山图》才开山水画的先河。

六朝迄隋画家之中间作山水画的亦仅宗炳、王微、梁元帝、萧贲、江志和展子虔这几个人。唐代先有吴道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他“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稍后有李思训，夏文彦《图绘宝鉴》说他“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画著色山水往往宗之”。至于准隐士王维、王墨，隐士卢鸿、项容亦皆以山水画著称，但这不过是说山水画已经成立，那时中国的主流则仍为人物画（这里所谓人物画包括释道在内的）。所以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里面说：“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台屋木次之。”唐代绘画的大本营是寺院，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李冗《独异志》和韦述《两京新记》这几种文献来研究，唐代寺院的壁画取材山水者，远逊释道。近人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记唐代寺院壁画取材释道者凡一百七十一寺、禽兽水族凡十二寺、人物凡七寺、山水树石合计不过二十二寺，这两个事实都可以说明唐代山水画的劣势。

宋代出了不少天才横溢的隐士画家，遂使山水画放一异彩，盖隐士隐居之所大抵重峦叠翠，蔚然深秀，山光水色清幽宜人；隐士生活既与山光水色结不解缘，则其趣味之浓印象之深不难想见，其作品十之八九皆为山水画，事实所必至，理所当然，我们试一读笪重光的《画荃》，中国山水画的题材根本不出隐士的生活与环境。

樵子负薪于危峰，渔父横舟于野渡。临津流以策蹇，憩古道以停车。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关城。幅巾杖策于河梁，被褐拥鞍于栈道。贾客江头夜泊，诗人湖畔春行。楼头柳颭，陌上花飞。散骑秋原，荷锄芝岭。高士幽居，必爱林峦之隐秀；农夫草舍，常依垅亩以栖迟。摊书水槛，须知五月江寒；垂钓沙矶，想见一川风静。寒潭晒网，曲径携琴，放鹤空山，牧牛盘谷。寻泉声而蹊足，恋松色以支颐，濯足清流

中，行吟绝壁之下。登高而远望，临流以送归。卧看沧江，醉题红叶。松根共酒，洞口观棋。凡丹井而逢羽客，望浮图而知隐高僧，看瀑观云，偶成独立。寻幽访友，时见两人。

假使说五代后梁的隐士画家荆浩及其徒关同两个人的山水画是愉快的引人入胜的前奏，那么宋代隐士画家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应该是雅致无比的抑扬顿挫的大乐章。尤其李成，我们说他集山水画之大成、领山水画之正统决不是过甚其辞。《图绘宝鉴》评述李成如下：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营丘，遂家焉；世业儒，善文，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放意诗酒，寓兴于画，师关同，凡烟云变灭，水石幽闲，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议者谓得山之体魄为古今第一。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于“高尚其事以画自娱”项下，首取李成：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宗室，避地营丘因家焉；祖父皆以儒学吏事闻于时，至成志尚冲寂，高谢荣进，博涉经史外，尤善山水寒林，神化精灵，绝人远甚。开宝中都下王公贵戚屡驰书延请，成多不答，学不为人，自娱而已，后游淮阳山，以疾终乾德五年。

范宽为仅次于李成之大家，《图绘宝鉴》称：

范宽，字中立，华原人，性醇厚，嗜酒落魄，有大度，人故以宽名之。画山水始师李成，又师荆浩，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既乃叹曰：“与其师人，不如师诸造化。”化舍旧习，卜居终南太华，遍观奇胜，落笔雄伟老硬，真得山骨，而与关李并驰方驾也。

继李范之踪而起之隐士山水画家则有右北平庞崇穆、长安宋灝、信州僧德正、雍丘邢敦辈，流风所播，凡属画家，无论其为隐士或非隐士，皆有意无意竞为山水画；山水画在技巧和数量两方面既获空前进步，乃取人物画

代之而为中国画的主流。

元代隐士之中有山水大家二人：黄大痴隐于富春山，是经史学术文章游艺的全才，绘画成就最大，论者谓其画“峰峦浑厚，草木华滋”。其笔势雄伟而苍古，自成一格，倪雲林尝与渔父野老，泛扁舟而浪迹五湖、三泖之间，到处作山水，名传文苑，一时画家无出其右。张伯雨曾谓“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断；幽澹两言，则赵吴兴犹逊”颇为得体；明末清初如傅青主、八大山人皆痛国变而遁迹岩穴，寄情于画以自遣，傅青主能极邱壑磊柯云木深邃之致，八大山人则笔情纵恣，逸气横生，皆一代山水画之宗师。我们特别举出上列四人，因为山水画之所以得保持为中国画的主流，多历年所而不衰，多少是受了这四个人的影响。

附带要提到一点：就是隐士本身也往往成为一般画家的题材，画家作人物画总高兴选取他们所崇拜的人物，隐士既被目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免常作画中人了。历代取材隐士之绘画甚为浩繁，兹举最负盛名之八幅如下：

时 代	作 者	图 名	备 注
晋 代	卫 协	高 士 图	上为楚狂接舆，下为伯鸾孟光
六 朝	蓬僧弥	巢由洗耳图	
五 代	童 氏	六 隐 图	画范蠡、张志和等六人
宋 代	李 唐	夷齐采薇图	
宋 代	马 远	四皓弈棋图	
元 代	赵松雪	渊明归田图	
明 代	钱玉潭	竹林七贤图	
清 代	崔青蚓	倪迂淞桐图	

这许多画家之中,有的是颇具苦心的,如李唐即是。宋圯在《夷齐采薇图题跋》中说:“……且意在箴规,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以失败主义的隐士,来箴规世人,我们不能认为满意,消极行动虽比投降稍佳,究竟不如积极行动;不见画家写卧薪尝胆的勾践,中流击楫的祖逖,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郑成功,我们觉得是莫大的遗憾。

中国画的风格也受到隐士很大的影响:中国画涂抹上了一层很浓厚的隐士那种出世的色彩,不但不求形似,甚至反对形似,这很明显的是逃避现实:中国画的鉴赏家——批评家和收藏家——认为淡泊、虚无、缥缈是绘画最理想的境界,因此,全无一点人间烟火气的作品——离现实最远的作品——才会被品评为最上乘。

山水画和隐士的关系最密切,不求形似的作风当然也表现得最露骨。但除开山水,其他树木之类也和山水不相上下,秦祖永《绘事津梁》云:

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学者会得此旨,自然擦落筌蹄,方穷至理。

倪云林之《疏竹图》题跋则更属奇怪:

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如麻如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无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

“画虎不成反类犬”,大家引为笑柄,但对于“画竹不成反类麻芦”,则默无一言,实在是不可理解之事;中国画家用“匠气”两个字抹杀了绘画的形似艺术价值,少数讲形似的画家如高克明、裴文睨辈,竟因此受到非难,这是中国画的一个不幸。因为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西洋画传入中国之初,

曾被批评得一钱不值，邹一桂《小山画谱》说：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甚醒目。惟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再说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极观念化的术语，历来画家所下定义亦不能相同。荆浩的解释是“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不惑不俗的结果必然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淡泊、虚无和缥缈，——全无一点人间烟火气。

《图画见闻志》说：

谢赫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像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妙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尝试论之：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蹟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这里特别提出岩穴上士，则气韵生动和隐士之密切关系可想见，至于“高雅之情，一寄于画”，等于是说明只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绘画可以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含有功利意味的绘画，则缺少可能。

董其昌对于荆浩所说“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复解释为“胸中脱去尘浊”即是不俗，这“胸中脱去尘浊”一定不是指不道德或卑鄙的观念，而是指胸中不存在现实世界，乃至耳不听现实世界的声音，目不睹现实世界的现象，假使不是如此，感情比一般人丰富的画家，断不会有闲情逸致专写山林

平远之趣，他们一定会诉说对于这人间世的爱和憎——歌颂光明的、美丽的、强壮的，咒诅黑暗的、丑恶的、病态的，这样一来，在谢赫、荆浩乃至董其昌辈的心目中，当然是俗不可耐了。

我们当然不能一笔抹煞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但中国绘画内容的成就，远不及技巧上的成就，也是事实，因此除了供给达官贵人作清玩、大公馆作陈设、古董商人作商品、求荣进者作礼物以外，中国绘画丝毫没有完成它的社会任务，老庄和释道的出世思想，固然有以致之，隐士和隐士的崇拜者，更不能辞其咎。

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主张，自古以来就争端屡见，平心而论：艺术家躲在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不去表现人生，改造人生，改造社会，而单纯地仅把艺术看作一种个人的消遣，未免太冷酷而不严肃；现代的中国新绘画已经在建立了，这是值得欣慰的，让那种“全无一点人间烟火气”的绘画，随着隐士的幻灭而变成为陈迹罢！

中国隐士与中国诗歌

中国殷周之际的诗歌，如三百篇之属，差不多都是抒情的，而殷周之际的隐士诗歌，也是抒情的，不过在抒情之中，又以感时为主罢了。魏晋之际的诗歌是由抒情走向写景的，但一般的诗如曹子建等爱写城市，而隐士诗人则爱写山林与田园。隐士既被社会视为至人，一切的一切自然有人来模仿，写山林与田园诗既蔚成风气，遂占有了魏晋以晚中国诗坛的整个领域。

隐士的“士”，有着知识分子的含义，而文学在魏晋以前直至清季，又意味着一切知识的综合的象征，因此中国古代隐士如伯夷、叔齐都能文，都是诗人、文学家。近人姜亮夫在《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中说：“在汉代以前的隐士，是不以文学家为号的。以文学为隐士的是起于魏晋以后，何以呢？因魏晋人喜欢清谈，而谈的事实，正适合于文学的训练与涵养。因此，自魏晋以来的隐士都是文学家。”他的前提、推理和论断都是错误的：说汉代以前的隐士不以文学家为号固然说得通，但不仅是隐士如此，一般人——除孔子曾提出的子游、子夏以外——也绝少以文学家为号的。再说清谈：何晏、王弼之流，是清谈的典型人物，又何尝是隐士。其实汉代以前的隐士希望社会能遗忘他们，有所创作自必藏之名山，所以我们仅发现伯夷、叔齐等有数量极少的抒发胸中不平的诗歌。汉代以后，隐士起了质的变化，企图利用群众崇拜他们的心理，以求富贵利达，希望社会抬举他们，对他们发生兴趣，所以要尽量表现自己，作品就流传日广了。

中国主要的抒情的隐士诗人有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周末的楚狂接舆，汉梁鸿等：

伯夷、叔齐采薇于首阳山，有《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是最早的抒情的隐士的诗歌，诉说他们对周室的怨愤，颇具文学价值，世以之与箕子的《麦秀歌》并论，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称：“两首诗都能表现出殷人的意气，使殷末的遗韵传于后世。”

楚狂接舆当孔子行将适楚，歌而讽谏其不能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殆而。

《中国韵文史》称其“表现出楚狂生的一种飘飘然超越世间的神情。”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与妻孟光共隐霸陵山中，以耕织自给，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这是他讥刺肃宗的，此外他的《适吴诗》，也大半是牢骚，《思友诗》是怀念良友高恢而作，他钦羨不事王侯的高士，曾为四皓以下二十四作颂，可惜已经散失。

晋阮籍是魏丞相阮瑀之子，字嗣宗，性疏懒狂放，好酒，是正始间最负盛名的一个诗人，他的思想可见于《咏怀》诗中，《咏怀》诗凡八十二首，今录其一：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霍，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

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他亲眼看到司马氏之受魏禅，所以不禁要慨叹“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了。消极思想发展到终极，必然地产生了“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诗篇，本来，出仕的人，真心要造福国家人民的原不过少数，大部分是爱荣名和宠禄。阮籍对两者都少兴趣，当然情愿以布衣终其身了。钟嵘评其诗云：“其原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慷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思想与籍略同，诗才则稍逊。

晋之末叶由于农业、工商业之日益发达，政治机构之日益庞大，发生了人口集中都市的现象，隐士才感觉到江上风清与山间明月那种恬静的环境，是如何地值得留恋，于是情不自禁地在抒情的诗歌中，加进了很多描写自然风物的成分。那时代的代表人物是陶潜，他是浔阳柴桑人，初因迫于衣食，于义熙元年出为彭泽令，未几，复因不愿束带折腰以迎督邮，乃挂冠归田。《归田园居》第一首是以平淡见胜的诗篇：

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宁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我们读到这诗，仿佛看到了一个鸡犬相闻，有着读书人隐居的村落，这种写景的倾向和手法，在陶潜以前是很少发现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

十年。”是最真切的隐士的口吻，他对于丘山爱恋之热，对于世俗厌弃之深，于此表现无遗了。陶潜五十六岁时晋室倾覆，缅怀故国，终老丘山之志弥坚，《停云》、《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咏史述》诸诗，均足以见志。隐士往往是内心充满着矛盾的，他亦未能例外，不合理的典章制度，卑污的权贵，喧嚣的市廛，构成了他对世俗的离心力，爱国爱民的天性，则是他对世俗的向心力，一读《杂诗》第二首，又可见其未断然忘情于济世：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予无和，挥杯对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得聘。念此怀悲栖，终晓不能静。

钟嵘《诗品》评云：“陶潜诗原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真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所谓“隐逸诗人之宗”，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说隐逸诗人之中，陶潜最有成就，一是说陶潜以后的隐逸诗人，咸以陶诗为其写作之蓝本。

唐代诗歌逢到空前发达的程度，其题材则不外边塞、战争、宫闱及山林等，山林诗更在量方面占绝对多数，这可以说完全是受了隐士的影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唐时尊重隐士，善于取巧的人便不再辛辛苦苦去考科第，而买山筑屋隐居起来，名气一大，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在这种客观环境之下，必然地产生了隐逸的文学，来歌颂山水田园的清幽，鼓吹陶潜式的人生观。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说得更明白：“隐逸既成为社会的风气，那不想做官成功成名的，也都以隐居为时髦了。八世纪以后的文士诗人，大都在山中隐居一度或数度……他们既多与自然接触，对自然更易欣赏和了解。建安以来的宫庭都市文学，到了这时

变为山林田园文学，其关键在此。”

唐代隐逸诗人，初有王绩、寒山子等，名家则首推孟浩然，他是襄阳人，一个陶诗的崇拜者和模拟者，隐居在鹿门山中，年四十始至京师，应进士试既不第，又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失欢于玄宗，一生遂坎坷不堪了。他的诗一如他的人格和行径，淡泊而清远。《宿来公石房期丁大不至》是隐居生活的实录，并且很能表现出特有的风格：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

我们一读李白的《赠孟浩然》，不难对他有更深切的认识：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储光羲，兖州人，中年后方出仕，初尝亲自耕作，所以吟咏田园能有独到之处，他从朴实着手，竭力学习陶潜，其《田家杂兴》，酷似《归田园居》之风味：

种桑百余树，种麦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其七绝如《送孙山人》等亦皆朴素可爱。

孟储而外之隐逸诗人如吴筠隐于嵩山及剡中，孔巢父隐于徂徕山，顾况隐于茅山，孟郊隐于嵩山，卢仝隐于少宝山，李商隐隐于王屋山，皮日休隐于鹿门山，陆龟蒙隐于松江甫里，张祐隐于丹阳曲阿，均有作品为世所传诵。即以浪漫主义诗人见称的李白，犹曾数度隐居，初从东严子隐于岷山

之阳，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天宝初，与吴筠共隐于剡中，天宝十四载，复入隐庐山，他的《山中答俗人》、《山中与幽人对酌》、《送裴政韩准孔巢父还山》诸诗，当为隐居期间作品。王维虽历太乐丞、右拾遗，但晚年得辋川之蓝田别墅，遂与世绝，五古如《渭川田家》，颇得陶潜之神髓。

宋之隐逸诗人初有林逋，继西昆体诸子之后独步诗坛。逋为杭州钱塘人，初游江淮间，终身不娶，相与者亦仅王禹偁、潘阆、梅尧臣而已，则又较陶潜更为孤僻寡合，诗作几全部为吟咏山水或田园景物者，今举其《湖上隐居》，藉见风格之一斑：

湖水入篱山绕舍，隐居应与世相远；闭门自掩苍苔色，来客时惊白鸟飞。卖药比尝嫌有价，灌园终亦爱无机，如何天竺林间路，犹到秋深梦翠微。

又《山园小梅》，欧阳修、苏东坡均目为古今咏梅绝唱：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与林逋同时之魏野，陕州人，极幽默。隐居不仕，怡然自得，才气似稍逊，诗名则远播北至契丹，有《草堂集》十卷。

宋之末叶，诗坛巨子，几全为隐士，此一时期之诗歌较过去之隐逸诗歌不无变质，因身经国变，较有热情者悲不自胜，不复有专写山月林风之心绪也。陈延杰《宋诗之派别》中云：“及端宗播迁，宋室沦亡，一二英特之士，感宗社邱墟、往往发为凄厉之调，以写其悲愤，使人读之，辄唏嘘感慨不自己。此又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矣。”亦即此谓。

谢翱，号晞发，长溪人，尝于文天祥幕中参赞戎机，宋亡遂不复出，他的

诗远宗屈原、宋玉，近法孟郊、贾岛，忧愤伤感之情充溢其间，《重过》即使人兴故国之思：

隔江风雨动诸陵，无主园池草自春，闻说就中谁最泣，女冠犹有旧宫人。

林景熙与谢翱风格互异，《宋诗钞》云：“大概栖怆故旧之作，与谢翱相表里。翱诗奇崛，熙诗幽婉。”今举其《寄周计院》：

海桑变纷纷，秀色见孤屿。山林华发尊，党逆深衣古。独余钧天梦，傖然在岩户。翳翳桂魄灰，沉沉槐梦雨。江涛岂不深，修鳞挂网罟。不知义并船，秋风系何许。

他如为黄冠而游于匡庐彭蠡间之汪元量，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之吴渭，绝食于武夷山之谢枋得以及许月卿、俞德邻、郑思肖、真山民，皆以隐逸诗人见称。

元之隐逸诗人仅倪瓒，瓒为元山水画四大家之一，诗画相扶，其名益彰。所居有阁曰清閼，故有《清閼阁集》传世焉，其诗素朴而平淡，如《己卯正月十八日与申屠彦德游虎丘得客字》：

余适偶入城，本是山中客。舟经二王宅，吊古览陈迹。松阴始亭午，岚气忽敛夕。欲去仍徘徊，题诗满苔石。

明之隐逸诗人有刘绩，字孟熙，山阴人，不仕，著《嵩阳集》。孙一元则不详里居，或云为安化王之宗人，足迹遍齐鲁江淮吴越，后隐杭州南屏山，诗宗黄庭坚，气魄绝壮。明之末叶，无锡高攀龙，家居三十年，讲学东林书院，昆山归子慕亦以讲学乡里以终身，二人皆法陶潜，前者四言诗有魏晋遗音，今举其《水居》：

薄暮登楼，四望远畴。时雨既降，农人乍休；乳燕来止，鲦鱼出游；

万族有乐，吾心何忧。

后者《对客》静寂寡趣，酷似佛家语：

默然对客坐，竟坐无一语。亦欲通殷勤，寻思了无取。好言不关情，谅非君所与。坦怀两相忘，何害我与汝。

清之隐逸诗人，类皆明之遗民，有查伊璜、吕晚村、归恒轩（普明头陀）、吕半隐、范仲淹、罗饭牛、戴务旃、屈大均（今种），以屈大均最负盛名。

如上所述中国隐士与中国诗歌的关系不可谓不密，中国隐士的大部分是冷酷而无情的人物，并且于变态心理而自视超凡不群，结果有意无意地逃避现实，所以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写出过一篇像《石壕吏》、《新丰折臂翁》和《宿紫阁北山村》那样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他们吟咏田园的作品观点既不正确，观察也欠深切，陶渊明、储光羲虽以田园诗见长，但和聂夷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比较起来，只不过仅有修辞学上的价值罢了。宋末元初及明末清初的隐逸诗人虽写了不少怀故国的诗，但总嫌流露着过多的绝望而消极的气息，远不如陆放翁的诗那样沉痛而悲壮，因之令人唏嘘感慨则有余，激发爱国思想民族意识则不足。中国隐逸诗人的传统作风是使中国诗歌和现实脱离开来，而走上为诗歌而诗歌的歧路上去，使这个恶劣的倾向受到约束的是杜甫、白居易、陆游那一批思想正确生活丰富的大诗人。自唐经五代、宋、元、明以至清末，中国诗歌由于桎梏的形式和贫乏的内容，使它的前途趋向没落。五四前后新诗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对旧诗的形式予以否定，一方面更意味着山林气息过浓的旧诗，已不能适合这个崭新的时代和进步的社会需要。

中国学者怎样批判中国隐士

中国学者对于隐士——这里指一般的隐士，而非某一特定之个人——的赞美诗式的批判本不胜缕述，现在仅选录其中比较正确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比较采否定态度的一部分：

《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认为因天下无道而绝人逃世，与鸟兽同群，绝对不是办法，而使无道蜕变成有道，才是最迫切的任务。

北齐刘昼《惜时论》：

……都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修明之世……生为无闻之人，没成一棺之土，亦何异草木之自生自死者哉……

刘昼视乎“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深感隐居为悖理，而在此短促之人生历程中，须为人群社会立德、立功、立言，扬名于世，方属无憾。

他的理论基础建筑在惜时间和爱荣誉上，惜时间固无可非议，爱荣誉亦人之常情，正如罗家伦先生在《新人生观》一书中所说：“人生是需要有荣誉的，不荣誉的人生，是黑漆漆的，无声无臭的。有荣誉的人生，是高贵向上的；无荣誉的人生，是卑污低下的。禽兽才只要生存，不要荣誉，也无荣誉的观念。人应该是理智感情和品格发展到最高程度的动物；人不只要生存，而且要荣誉。”

清沙张白《市声说》：

鸟之声聚于林，兽之声聚于山，人之声聚于市，是声也盖无在无之，而当其所聚，则尤为庞杂沸腾，令听者难以为聪焉，今人入山林者，闻鸟兽之声以为是天籁适然，鸣其自得之致而已，由市声推之，鸟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哢哢焉炫其所有，急其所无，以求济夫旦夕之欲者乎！……苟谓鸟之呼于林，兽之呼于山者，皆怡然自得，一无所求，而人者独否，是人之恩勤群类，予以自然之乐，反丰于物而靳于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若曰厌苦人声而欲逃之山林，听夫无所求而自然之鸣焉，是与鸟兽同群而薄斯人之谓也。

沙张白认为山林与市朝之间并无优劣可分，而市朝的噪声与山林的鸟兽之声意义亦略同。他之论证鸟兽之声并非天籁适然，而为欲望之冀求，是非常合乎科学，并且合乎逻辑的，固然在我们看来，即便山林是尽善尽美的，隐士也没有理由蜚居其中而不问世事。他的理论的缺陷是忽略了美的主观性；美有主观性是真实不过的，往往某一事物甲认为丑恶不堪，乙认为美好无比，中国俗语云“情人眼里出西施”，正是这个意思，隐士近山林而远市朝，是因为鸟兽之声在他感觉上的反应是愉快，至于鸟兽之声在本质上是否比市声美，他们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

清刘铁云《老残游记》：

“至于出来的原故，并不是肥遁鸣高的意思，因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称揄扬。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当，且亦不屑为。天地生才有数，若下愚蠢的人，高尚点也好借此藏拙，若真有点济世之才，竟自遁世，岂不辜负天地生才之心吗？”

这是老残（即刘铁云）背着庄宫保，从济南府溜到曹州，碰到老朋友申东造所说的话。刘铁云一刀戳破了隐士的“高尚”的纸老虎，真是再痛快不过了。他的人生哲学颇为积极而进步，并且也是主张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后三十年，集中国思想大成的孙逸仙先生在《民权主义》中更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

章铤《中华通史·释民篇》：

汉世人主，非无重士者，顾行之无效，而士贵王不贵之论无自而萌；士之贵贱隆替，遂视夫施治者待遇之如何，而为士者，即不能自伸其势力。彼矫激者，或因是而择一涂以自处，相约不为世用，而世主或反高其矫激，不惜奉以尊重之名，东汉之逸民，两晋之隐逸，南北朝之逸士处士，其人固皆与一代之儒林文学齐声，其名隐而不隐，其事逸而不逸，于是历史上遂多一闲人之位置。中世以降，沿而勿易，斯冒其名誉者日众……

章铤看出隐士之中有虚伪的，这是高明之处，不过他词意之间对隐士所表示的不满之处是非常晦涩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隐士出现——人未

能尽其才，谁应负其咎？是执政当局？是士人本身？他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结果没有成功。

朱光潜《谈修养》：

道家隐士思想起源于周秦社会混乱的时代，是老于世故者逃避世故的一套想法。他们眼见许多建设作为徒滋纷扰，遂怀疑到社会与文化，主张归真返朴，人各独善其身……这种心理分析起来，很有些近代心理学家所说的“卑鄙意识”在内。人人都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觉得社会卑鄙，不屑为伍，所以跳出来站在一边，表示自己不与人同。

道家思想与隐士思想有相同处亦有相异处，未可混为一谈，起源于周秦社会混乱的时代更属武断，壤父之《击壤歌》等，已不无隐士思想之线索可寻，至周秦则更为具体化而已。他对于隐士本身的心理分析尚称精到扼要，是比较可取的。

《人生最大难关——钱与死》：

处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巢父许由隐士的人生观，我们是不赞同的，然而他们能够摆脱物质的欲望，至少比较投机牟利阴险奸诈的人，高尚得多。至于抱入世思想的圣贤豪杰，看轻物质上的一切，精神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那更是我们馨香祷祝的人。

这是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创刊号里一篇短论的一节，原作者未具名。这种论调，严格说来，仍旧是不健全的：我们认为无论国家承平或国家危急的时候，隐士和隐士的人生观都要不得，假使每一个国民都是独善其身的许由、巢父，国家安得不危急！？隐士和投机牟利阴险奸诈的人虽然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表现各有不同，对于国家有害无利这一点则并没有两样，抱入世思想的圣贤豪杰固值得馨香祷祝，又何必要求其看轻物质上的一

切，隐士能够摆脱物质的欲望又有什么足取？盲目地鄙视物质是错误的，人类物质的欲望是由生理条件决定的，人类要保存个体，必须要满足衣、食、住、行的欲望；人类要保存种族，必须要满足性欲和生殖欲。因此，物质的欲望无可非议，奢侈和淫佚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衣、食、住、行的欲望和性欲、生殖欲的过度的满足。隐士摆脱物质的欲望，在我们看来是所谓“贼天之性”，既不高尚，也不道德。

以上各种理论，因为出发点各不相同，而且都是片段的、零星的，所以也无法详细比较其优劣。

一般说来，理想的人生应该乐观、前进、仁爱、谦和、坚忍、强壮、勤勉、敏捷、精细，而隐士刚巧完全相反地是悲观、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懒惰、滞钝、疏忽，隐士既然不是理想的人生，我们当然没有理由逃避现实而去做隐士，更没有理由赞成别人家这样去做。我们要大声疾呼：

勇敢地生活，不做隐士。

补 编

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

一

人类的成长、发展的历程，基本上的共同点颇多，但是由于地域、气候、民族、文化的不同，往往各具某些特征，有的特征还相当突出、相当明显。例如人类摆脱原生态的同时，免不了互相接触，这就开始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日益频繁，免不了发生某种争议或矛盾，必须有共同遵循的规则予以制约或疏导，而且这种制约或疏导又必须有被众人信任的某一个人或群体予以执行，这就开始了政治生活。

应该说，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开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必然逐渐从松散到严密，这一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研读了《史记》等等一批所谓正史以及某些野史、笔记、地方志之后，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而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从唐尧、虞舜那个遥远的年代起，便有人企图远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有其思想根源，但其思想根源却并不一致，所以其表现也各有不同。

中国古籍对这一类人群有过分散的凌乱的记载，也有人为之写过传记，甚至把这一类传记汇编成为专著，但所用的称谓则相当芜杂。当然，因为情况各异，事实上也很难一致。今举其主要者如下。

《易经》：“幽人贞吉。”

《后汉书·逸民列传序》：“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又《李陈庞陈桥传论》：“结瓮牖而辞三命，殆汉阳之幽人乎？”

《续世说》：“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

《唐书·隐逸传叙》：“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

孟浩然《上巳日诗》：“浴蚕逢姹女，采艾值幽人。”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

《汗漫录》：“司空图隐于中条山，芟松枝为笔管，人问之，曰：‘幽人笔正当如是。’”

据《唐书·隐逸传叙》，显然已把幽人与隐士作为同义词了。又《汉书·朱博传》：“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晋书·龚元之传》：“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用幽隐一词泛指散居民间不愿出仕朝廷之文人。《辞海》（1999年版），收了〔幽人〕词目，其解释是“隐居之人，指隐士”。

王勃《赠李十四》：“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

《唐书·李泌传》：“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

倪瓒《〔折桂令〕拟张鸣善》：“山人室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

可见古代也称隐士为山人的。到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自称山人

的隐士尤多，明宗室朱奎，担心被清廷杀害，或隐遁山林，或皈依宗教，佯狂一世，自号八大山人。因为潜心绘画，成了大画家。另有汴京人许澄，曾于乙酉年为淮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之幕友。后为逃避清兵搜捕，隐匿于桑林中得免，遂自号桑山人。必须说明的是到了清末民初，山人的称谓用得很多，如白龙山人王震，乃是上海滩上各方面都有关系的“闻人”，绝对不是离群索居的隐士。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我佛山人吴沃尧，应解读为“我，（广东）佛山人（也）”，当然也不是隐士。

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论》：“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人则天下归心者乎？”这里称为“逸人”的薛方、逢萌等五人都是著名的隐士。稍后《唐书·艺文志》谓“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五卷，又《逸人高士传八卷》”。也用了“逸人”称谓。

杜荀鹤《自叙》：“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他自称为“逸人”。此外唐代另一隐士，名沈千运，高适先后为他吟诗二首，一篇为《赠沈四逸人》，一篇为《赋得〈还山吟〉，赠沈四山人》，可见当时逸人、山人是通用的。又《后汉书·冲帝纪》：“诏举贤良方正、山逸修道之士各一人。”《晋书·嵇康传》：“其神心所感，每遇山逸如此。”则“山逸”似亦为当时流行语言，是否“山林隐逸”之简称，也很难作一结论。

《唐书》设《隐逸传》，自然有其原因。“逸”的涵义应该是不受世俗礼教束缚，追求自在散漫的疏放生活。“隐”与“逸”有某些共通之处，相异之处仍旧存在。应说隐士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偏向“逸”，而追求“逸”的人士则不一定隐居也。

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因为隐士隐遁山林为主，所以“山人”、“逸人”才会被同时采用，但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偶》，这位“闭户

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的吕逸人确是不求闻达的隐士，这新昌里却不在深山老林中，而在京都长安城内。看来，居住城市的山人早就有了，唐代就有了，自然宋元以后就更多了。最早根据其人的言行而称之为山人，至于他住在城市或山林，则并不作为依据。宋元以后称“山人”者，往往既不居山林而居城市，言行也与隐士全然相反。成为风气，也不以为怪了。

苏轼：“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论。”

汪元亨《〔醉太平〕警世》：“叹世人用尽千般计，笑时人倚尽十分势，看高人着尽一枰棋。”

袁易：“抱关恐有高人隐。”

三处高人显然不是指武侠小说中武艺高强之人，苏轼所说“幽居”亦即隐居，汪元亨笔下高人不是用尽千般计的世人，也不是有势可倚的时人，此高人与世无争也。古代有隐于抱关击柝之间的高人，当然也是隐士。

又苏轼《方山子传》：“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称之为“隐人”的例子不多，流传不广。

三

《论语》：“逸民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举逸民而天下之人归心。”

无名氏《〔一枝花〕渔隐》：“本是个虚飘飘天地闲人，乐陶陶江汉逸民。”

从《论语》所列举的伯夷、叔齐等人物来看，逸民确是指的隐士。《论语》何注：“逸民，节行超逸也。”朱注：“逸，遗逸，无位称。”联系起来，可知所

谓节行超逸,即指无位,也就是没有享受俸禄,没有担任官职,也就是绝意仕进,不求权利财富的人。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律历志》时,为逸民也下了定义:“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言下之意,无德而隐居者不配称逸民也。但是,有德或无德,实在很难判断。后世基本上把逸民作为隐士的同义词了。元结《右溪记》:“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也是这样理解的。

情况最复杂的是遗民,《荀子》:“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则“遗”属一般性质的遗漏。《后汉书·儒林传序》:“网罗遗逸,博有众家。”涵义大致相似。实际上存在朝廷招揽人才时的遗忘,抑或人才有意隐居不出的两种性质。

有人为遗民下的定义是:“易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也不能说错,宋亡之后、明亡之后,关于遗民的记载较多,则又有民族矛盾的因素在内。

改朝换代之后,遗民不外下列几种情况:

宋亡,谢翱与汪元量均未出仕元朝廷,而是以诗文自遣,寄寓哀思,汪元量出家做了道士。但是,说他们是隐士,也不十分确切。

元代很多年没有举行科举,走上仕途的文人自然相对少些。很多元曲作家生平事迹是个谜,但是文采斐然,也可能有些人是隐士。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拒绝做官吏,而是做官吏的机会实在很少。

清代的情况与元代不同,不仅科举办得很认真,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揽山林隐逸,明代的遗民的表现各不相同。钱谦益、龚鼎孳等做了清廷的高官。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仍念念不忘朱明王朝,宣传民族思想,清廷因为他们负海内众望有所顾忌,也没有加以杀害。一大群遗民中确实出现了许许多多隐士,如归庄、龚贤、张岱等都是。但是,顺治、康熙朝以晚

仍陆续有隐士出现，而遗民群体中也仅有部分隐居山林的。所以遗民与隐士的概念不同，很难作为同义词使用。

四

《孟子》：“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

《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

《汉书·司马迁传》：“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王绩《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雨满，更值夜萤飞。”

杜甫有《赠卫八处士》一诗，根据诗的内容，可知卫八确为无官职之白丁。

苏轼《书蒲永昇画后》：“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山水之变，号称神逸。”

黄庭坚《水仙花》：“暗香靓色撩诗句，宜去林逋处士家。”

刘因《观梅有感》：“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

杨朝英《〔水仙子〕自足》：“杏花林里旧生涯，瘦竹疏梅处士家。”

对于“处士”的定义，《荀子》说：“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后汉书·刘宽传》注：“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应该说，都不够全面，事实上还有一点，即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前面

所提到的伊尹、毛公、薛公、孙位、林逋五人都属这种情况，至于王处士、卫八处士的生平则不详。

黄庭坚、刘因所云的处士为林逋，则是隐士之中相当特殊的人物，不仅不慕荣利，而且以梅妻鹤子自娱，所以终身也没有娶妻，当然更无子女。既谈不上亲友交往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家庭生活也非常简单了。

《后汉书·严光传》：“难夺匹夫之志，宜叙高士之风。”

《后汉书·徐稚传》：“林宗有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唐书·隐逸传叙》：“高士忘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

《宋史·杜衍传》：“或劝衍为居士服，衍曰：‘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名耶！’”

高启《游无量佛院憩王隐居池上诗》：“已寻名僧庐，复谒高士馆。”

严光自然是著名的隐士，古代称隐士为高士已成风气。皇甫谧《高士传》，载晋以前 96 人；高兆《续高士传》，收晋至明 143 人，共 239 人，都是隐士。

据《南史·阮孝绪传》，他著《高隐传》一书，“上自炎黄，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扰，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下篇所收都是假冒隐士名声以求利禄的人。

“高士”之高，《高隐传》之高，与前面所说“高人”之高是同一涵义，现在再引《易经》以说明之。《易经》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是称隐士为高士的原由。不事王侯，为什么高尚呢？《易经注疏》说：“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其实，也就是说，不想做官，不想俸禄，宁愿过清苦的生活，所以品质很

高尚，于是称为高士。《新唐书·隐逸列传》，说陆龟蒙辞官后隐居松江甫里，“后以高士召，不至”。则高士似有一定的条件。

据《能改斋漫录》，政和八年，御笔昭命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从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从六品，方士正七品，阙士从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从八品，隐士正九品，志士从九品。高士、逸士、隐士固然待遇完全不同，其他元士、大士等等更不知所云了。

《宋史·种放传》：“多作诗歌，自称退士，当作传，以述其志。”

明代遗民黄寅陞祝发隐居于枫亭之程厝乡，自号枫溪退士。

清代编选《唐诗三百首》之孙洙亦自号蘅塘退士。

“退士”之称谓可能起始于元结《右溪记》：“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游处。”根据《左传》“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前引宋代之种放亦曾上书朝廷：“臣读书业文，实自父师之海，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南史·雷次宗传》：“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受征辟。”以上三例均可证明退士实为隐士之同义词。正如古代走上仕途称“仕进”一样，不求仕进或功成身退，或急流勇退，成为隐士，自称或被称为退士，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南史·到洽传》：“筑室岩阿，幽居积岁，时人号曰居士。”《元史·董士选传》：“其尊敬贤士尤至，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高启《赠杨荥阳》：“棧通论夷文，驿走征士传。”则居士、遗士、征士三称谓亦是指隐士了，但不普遍。尤其，“居士”实际上指未出家之佛教徒为主也。

《荀子》：“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南史·朱百年传》：“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伐药采若为业……辄为行

人所取，明旦已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值多少留钱……”

庾信《玉帐山铭》：“隐士弹琴，仙人看博。”

王勃《秋日游莲池序》：“隐士泥清，仙人水绿。”

庾信、王勃不约而同地把隐士与仙人相提并论，可见隐士在众人心目中是十分清高而不平凡的形象。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了以终南山隐居为假象而骗取名利的假隐士。唐代的卢藏用是相当典型的这一类的假隐士，《唐书·卢藏用传》说时人称之随驾隐士。

《唐书·隐逸传叙》：“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看来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做了一些敦促隐士出山从政的工作。从此，“隐士”这一称谓也就日趋普遍，其他高士、逸民等称谓也用得较少了。

乔吉《殿前欢》：“听不厌隐士歌，梦不喜高轩过，聘不起东山卧。”

必须说明的是，后世往往在提法上又进一步简化了。例如孙静庵编著《明遗民录》一书：

《唐复思》：“明唐复思，不知其出处，或言闽人。明亡，托于浮屠以自隐。”

《叶弥广》：“家歿于兵，孑身隐北湖，所作诗多哀吟。”

《胡承诺》：“崇禎末举人。国变后，隐居不仕。”

《林增志》：“乃潜入泰顺峰山门中，辟田造寺，回香林，隐居矣。”

《林迈佳》：“国变后，以学行举，栖隐不出。”

《恽日出》：“携书三千卷，隐天台山中。”

《张夏》：“隐居菰川之上，孝友为学。”

《王方岐》：“国变后，隐居不仕。”

《孙文》：“国变后，隐于杭。”

《罗煜》：“国变后，隐扬州北湖。”

《夏道一》：“两上春官不第，辄隐居自放。”

《孔昭》：“明亡，贞隐不出。”

《张翼星》：“家贫不仕，隐于卜肆。”

.....

以上记载未出现“隐士”字样，但“隐居”云云已四见，又所谓“身隐”，或谓“自隐”，或谓“贞隐”，实际上认为他们都是隐士了。

五

《论语》：“子曰：隐者也。”

《魏氏春秋》：“阮籍赏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籍闻而从之，乃著《苏门先生传》。”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

孟浩然《秋登方山》：“隐者自怡悦。”

丘为《寻西山隐者不遇》：“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千里，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

“者”，按《辞海》（1999年版）释文：“指事之词。”也可用于指人、指时等等，“隐者”和我们常用的“编者”、“作者”、“歌者”都近似，并没有其他任何更多的内容。

《史记·老莱子传》：“老子，隐君子也。”

苏轼《留侯论》：“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不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苏轼《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

朱熹《送郭拱宸序》：“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而归。”

鲍当《题林和靖隐居》：“如何隐君子，长啸掩杜门。”

《论语》：“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所以可以认为“隐君子”是对隐士的最尊重的称呼。

六

以上列举了幽人、山人、逸人、高人、隐人、逸民、遗民、处士、高士、退士、居士、遗士、征士、隐士、隐者、隐君子等称谓，计16种，试作一比较。

幽者，幽雅幽静，如仅指生活环境，高官富翁都可以营造景色绝佳的园林和居室，如指心态、风度，也不一定限于隐士，山人在古代就被炒作，那些自称为山人之流，奔走于权贵之门者比比皆是。逸者，作安逸解、自在解固然可以，但也有好逸恶劳之说，那就作懒惰解了，至于“遗”，主要是时间上前后的概念，而“隐”则是不在朝而在野的空间上的概念。处士仅指从未出仕的，而有人改朝换代前任官员，改朝换代后不受征聘者当然不是处士。征士指被朝廷征辟而始终婉拒不就者，事实上从未被朝廷重视，从未被要求出山担任官职的隐居者更多。高字多义，将隐士称为高人或高士，因有其来历，却并不十分确切。“退”，比较来说，和“隐”是接近的，但始终未任官职的人，说是退士，似乎也有词不达意之处。居士常作未出家之佛教徒

解,前面已有说明。

总之,“隐”字含义很清晰,也不致发生误解。例如《晋书·刘粲传》:“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唐书·韦夏卿传》:“晚岁将罢归,署其居曰:大隐洞。”如果将“隐”字易为“幽”,或“逸”,或“高”,或“退”等等,均不可理解,均不达意也。

阮孝绪著《高隐传》、袁淑著《真隐传》、徐坚著《大隐传》,三书之书名如改“隐”为“幽”,或“逸”,或“高”,或“退”等等,亦均欠通顺。对隐逸之群体,仅“商山四皓”为唯一例外,唐代徂徕山有“竹溪六逸”,将名扬四海的李白也包括在内,其实比在朝的大官更张扬,列为隐士很勉强。此外如“浔阳三隐”、“京口二隐”等均已约定俗成。

根据以上种种理由,“隐”字自属首选。至于“人”、“民”皆泛指性名词,对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是否具有进入官场之条件等等均无任何标识。而“士”则完全不同了。

据《春秋穀梁传》:“古者有四民:由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亦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不约而同地将“士”列为四民之第一位。《宋书·恩倖传》:“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南史·王球传》:“士、庶区别,国之章也。”政府明确地将“士”与“庶”区别为不同的阶层或阶级,以利于统治、管理。“士”当然是社会上既得利益的群体,这既得利益看起来是财富权利,但受教育的权利决定了他们是文化、知识的占有者。

孔子说:“推一合十为士。”《白虎通》以能通古今、辩然否为士。把“士”界定为知识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明了士应该有的素质及其社会责任。《战国策·赵策》:“士为知己者死。”这是歌颂士的感恩精神与崇高人格。

我发现了隐士的言行并非道家思想的作用，而是渊源于儒家。《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隐就是藏而不露也。而且《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明史·王鏊传》径称：“士可杀，不可辱”，则易“儒”为“士”矣！《北史·李谧传》：“志守冲素儒隐之操。”称“冲素儒隐”，实际上认为隐居是儒家的言行，因为释道本来就是出世思想为主导的。

正因为“士”有知识文化，有出仕官的条件，有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在一定情况之下，却只能放弃，成为隐士。如果根本不具备担任官职的必要条件，蛰居乡村或城市，无论从事工、农，或无业，当然谈不上称“隐士”，为此人不属于“士”也。

七

正因为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出现过中国样式的隐士及其群体，当然也有类似“隐士”性质的个人或群体，但其数量小得多，影响也不显著，因此，似乎没有“隐士”专称，一般称之为 A retired scholar，译回中文，应是隐于民间的学者，或不为人所知的学者，似乎都可以。必须是 Scholar，否则他不具备出任官员的资格。

后者如果译作 A private Gentle Man，当然也是可以的，其寓意应该是未任官职的绅士，或者闭门不出的绅士。同样，既是绅士，决不是贫民、流浪者，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在话下，也是有资格担任官职的。

有条件有水平出任官职，结果却谢绝了，甚至坚决拒绝了政府的任命和差遣，称他们为隐士，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可以引用的。

虽然背景应该是在远离中国的另一个国度,但在古代,任何平民,尤其缺乏文化、缺乏知识的平民,即使他热衷于进入官场,要实现,也无异梦想。作为 Scholar,作为 Gentle Man,这才会发生拒绝,或谢绝政府任命,然后成为隐士的。将来,如果发现更确切的“隐士”的同义词或近似词,我仍将继续进行比较、分析,作进一步的研究。

历代隐士对茶文化之贡献

一、弁 言

许由、巢父不愿接受尧的禅让而逃避，伯夷、叔齐认为周之灭商是以暴易暴，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他们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隐士。而中国饮茶的风俗习惯也起源甚早。在上古时代，隐士与茶有何关系，尚未发现有关记载。

到了唐代，发生了十分值得注意的事件，陆羽其人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茶的学术专著《茶经》，奠定了茶文化的学术基础，而陆羽终身是布衣，未任官职，很可能也没有家室，实际上是隐士。应该说自从陆羽开始，历代隐士都和茶结了解之缘，而茶艺的提高和普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在这方面，隐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现在我们从唐代的陆羽开始，依次将宋、元、明末清初对茶文化贡献较大的隐士的具体事迹作如下的论述。

二、陆 羽

陆羽，其生平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陆羽传》：“陆羽，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巫，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

之。”朝廷任命他为太子文学，他未赴任。继而发表了太常寺太祝，曾婉拒之。列入《隐逸传》可谓名副其实。

《全唐文》卷四三三陆羽所作《陆文学自传》，对他自己的极富传奇性的经历有绘声绘影的记录。正因为“不知所生”，所以是由一位被称为积公的高僧收养而长大的，但是积公要他诵读佛经，正式收他为佛门子弟时，他却又坚决不从。于是，后来被派遣在寺庙做杂役，主要是扫地、修理墙壁、清扫厕所，凡是最繁重最脏的劳动都让他去做。有时被认为偷懒因而饱受鞭打。但是，他仍旧保守着他的特殊的思想感情，没有成为一名僧人。当他觉得实在无法忍受时，离开寺院，进入了戏班，居然也能发挥所长，成为班中的主角，并完成关于戏剧艺术的专著《谑谈》。

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竟陵司马，他是不拘行迹的诗人，陆羽写作诗歌，是向崔国辅学习的，相处三年，陆羽的诗已经写得流畅古朴而且颇有韵味了。上元年间，他漫游到了湖州苕溪，便停留了下来。这一停留，使陆羽和中国的茶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陆羽是秉性淡泊、对声色名利都毫无兴趣的奇人，浪迹天涯以四海为家，他何以会在湖州的苕溪停留了下来？说清楚原因，我们便完全能理解了。

按太湖周围的杭、嘉、湖、苏、松、常六州既是历史悠久、文物荟萃之地，又比较富饶，物质生活的水平从六朝开始也逐渐超越中原，士大夫乃至民间，对生活不仅追求温饱，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休闲艺术。在崇山峻岭之隙、在茂林修竹之间，往往丛生着色、香、味各具特色的名茶。而湖州、常州交界处的顾渚，即以出产紫笋茶闻名，早在三国时代，即成了每年例行的贡品。到了唐代，亦即陆羽逗留湖州的前后，文人、高僧、官员吟咏紫笋茶的诗篇就连篇累牍，数量上相当可观了。而与陆羽同时，并对陆羽相当赏识

的湖州太守颜真卿也题咏了一些茶诗。

我们知道佳茗的生长固然要依靠好的雨水、泉水，而煮茶、泡茶又何尝不要依靠好的雨水、泉水呢？所以陆羽的好友高僧皎然《访陆处士羽》说：“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清泉？”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杜牧《题茶山》：“泉嫩黄金涌，牙香紫壁裁。”皮日休《茶灶》：“水煮石发气，薪燃杉脂香。”皮日休《煮茶》：“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以上诸诗，主要的是对饮茶的泉水的欣赏与赞美。当然，在湖州，上选的饮茶用水就是顾渚山畔的金沙泉，唐代贡紫笋茶的同时也要贡金沙泉水的。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沍下金沙水。”便是写现摘现炒紫笋茶，然后用金沙泉沏茶的实况。

齐己，也是唐代的诗僧。他的《过陆鸿渐旧居》：“梦客西来过旧居，读碑寻传见终初。佯狂未必经儒业，高尚何妨诵佛书。种竹岸香连菡萏，煮茶泉影落蟾蜍。如今若更生来此，知有何人赠白驴。”此诗更值得重视，不仅说明煮茶用了清泉，恰恰又把陆羽介于出世与入世的中间状态的神情表达了出来。他有许多高僧级别的师友，自己没有出家。作为儒家吧，他也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追求，也不可能锦衣玉食，只能布袍脱粟。但是，他对怡情养性、清心沉思有一种类乎本能的向往，遇到了紫笋茶、金沙水，其吸引力不言而喻，所以暂时在湖州停居了下来，原因即在此。

那末，陆羽既无一官半职，自然没有俸禄，又未耕作或商贩，也无收益，更未常应邀为人作墓志铭，可得润笔，他又何以为生呢？在这方面材料不多。只知湖州太守颜真卿、高僧皎然都和他交往密切，还在一起唱和吟

咏呢。

大历九年(774),湖州刺史颜真卿在湖州长兴县小浦镇竹山潭的竹山堂与一大群高人雅士聚会,其中只有潘述是长兴县丞,其他都是琴棋书画的行家了。他们研读《易经》,还下了围棋。“昼啜山僧茗,宵传野客觞”。即使此“茗”是皎然提供的,也不能排除陆羽从中有所策划。这首《竹山堂连句》,每人两句,篇幅较长。开头“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为颜真卿作,然后“万卷皆成袞,千竿不作行”,就是陆羽手笔,可知他在这18人之中还是主要成员。或者说,在颜真卿心目中,地位颇不平常。

至于皎然,和陆羽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存皎然有关陆羽的诗有十首之多。皎然是知名度颇高的“江东名僧”,原为南朝名士谢灵运十世孙,早年在湖州吴兴县杼山妙喜寺出家,诗文之名远播。他有《顾渚行寄裴方舟》,虽未直接提到陆羽,但一再吟咏“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能识”,可见他和陆羽一样是顾渚紫笋茶的爱好者。陆羽和皎然这位“江东名僧”如此友好,而且陆羽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又简单之至,有了皎然的依靠,自然不致受饥寒之苦了。

陆羽在湖州期间,在充分享受紫笋茶、金沙泉之余,得到了颜真卿、皎然等人对他生活上的关心。再加上他浪迹天涯之际,已品尝过不少佳茗、清泉,陆羽此刻乃得以定下心来,从事《茶经》的著述。颜真卿诗文俱佳,更是第一流的书法大家,皎然被称为“江东名僧”,并不是指对佛家经典的研究,也是兼指学识的渊博与文学的才华,陆羽当然也会受到熏陶。正是在这样各方面都提供了有利条件的情况之下,《茶经》在学术上达到较高的水平也是必然的。

《茶经》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

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等十章，对茶的历史源流，地域的分布，采集的季节和方法，加工与煮、饮的注意事项与工具等等都作了全面的论述。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第一部论述茶的经典。

鲁彭《刻〈茶经〉序》：“今观《茶经》三篇（卷），固具体用之学者。其曰伊公羹、陆氏茶，取而比之，实以自况。所谓易地皆然者，非欤。厥后茗饮之风，行于中外。而回纥亦以马易茶，由宋迄今，大为边助。则羽之功，固在万世，仕不仕奚足论。”鲁彭认为茶艺之所以风行中外，陆羽提倡茶艺、著作《茶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陆羽没有出山做官，那是由他喜爱闲散、对名利一无所求的人生观决定的。其实，陆羽如果出仕，案牍劳形，倒不一定能完成这部著作了。

三、林 逋

林逋是北宋著名的隐士，他虽未出家，却也未娶妻，诗词俱皆佳妙，迄未就任官吏。一生潇洒，以梅妻鹤子的清幽生活被传为美谈。

他的《点绛唇》：“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似乎是抒发的离愁别恨，“萋萋无数”，当然是连天的芳草也。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为何又萌生“又是离歌”的感慨呢？这是林逋内心的秘密。那么，“王孙去”何所指呢？

《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屈原把隐士与不归的王孙相联系很自然，看到芳草又蓬勃而茂密地苗长，怀念漂泊到异乡的王孙（游子）了。林逋本身是不入城市的游子，或者说，就是词中的“王孙”。

我以为如果换位思考,假定我是作者,的确也有可能是林逋在转弯抹角地倾诉友人或恋人对自己的怀念。这一可能性不必排除。因为他另一词作《长相思》确是吟咏的凄切哀怨的爱情悲剧。

文人的隐居不仕,原因本来就相当复杂,固然绝大部分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个别人和爱情生活的不幸福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从他的《长相思》来看,虽然故事朦胧不具体,所说:“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哀怨、悲戚极深。他何以如此关切,也许是自己的经历和感慨。因为林逋把人世间的相互接触尽可能减少避免,居然又发出“谁知离别情”的疑问,肯定蕴藏着些许隐私在内的。

因此,谢灵运《悲哉行》:“萋萋生春草,王孙游有情”、王维《山中送别》:“明年春草绿,王孙归不归”、白居易《赋得古原草》:“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三诗中的王孙是对方或第三者,而林逋所谓“王孙去”的“王孙”似乎是自喻。

林逋诗词不多,因为是闻名遐迩的隐士,所以传播也广,影响相当深远。其《山园小梅》被认为是写梅的经典,尤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成为难以超越的绝唱。后世画家画梅往往用以为标题或规定情景。

林逋的《点绛唇》引起了宋代词坛的连锁反应,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东府·咏草词》:“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草谁为主’为美者,圣俞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欧阳修可能觉得林、梅二人固然题咏春草之作各有新意,亦非绝对不可企及,于是他又以同一题材写了《少年游》。此三首词被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为“咏春草绝调”。

林逋既然以“梅妻鹤子”称著，没有一般人的家庭生活的乐趣或烦恼。当然，衣食也简朴之至，然而他却酷爱品茶。有《烹北苑茶有怀》：

石碾轻飞瑟瑟尘，乳花烹出建溪春。

人间绝品应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

当时饮茶的方式和现在不同，要把茶叶放在石碾中碾成细末，然后煮或冲泡。这种细末和现在日本的清茶那样十分微细，所以飞到空中就成为尘埃了。但是当茶汁迸发出乳花时，林逋依旧能从中感受到这名茶出产地福建安溪山野间春天的景色之美、空气之清。林逋认为品茶大有学问，真正能识别“人间绝品”的人恐怕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禁觉得《茶经》这部著作的确很有价值。至于“忆古人”，首先应是对《茶经》作者陆羽的深深怀念。其次，是当年关怀陆羽、赏识陆羽的颜真卿和高僧皎然等人。再其次，应该是《茶经》所记载的与茶有关的晏婴、司马相如、左思、谢安、陶弘景诸人。梅妻鹤子的林逋对饮食起居漫不经心，唯独十分重视品茶，并确认《茶经》的学术价值，也是一大贡献。

到了清代，陆廷灿编《续茶经》，就把林逋这首诗收进了《五·茶之煮》。

四、倪 瓒

倪瓒，是元代一位知名度极高的隐士，字云林，能诗、能词、能曲，更是第一流的画家。与唐的陆羽、宋代的林逋不同，他有家室，而且是家道裕如的富翁。他为什么隐居不仕？可能是生活疏懒惯了，不愿批阅公文，不愿和上下级交涉公务，一心只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

他的隐居方式也颇为特殊，居然远离家庭，到十分僻静的角落里躲起

来，时间一长，却又经常怀念自己的田园。他为什么要躲起来，也从未讲清楚，据我推测，他认为一般人都不注意清洁，使他这个有洁癖的人感到讨厌。他又认为一般人比较庸俗，没有兴趣和他们打交道。还有，经常有人登门求画，他忙于应付，不耐烦，觉得还是少接触为妙。好在，他并不是朝廷要捉拿的犯人，所以无论在家或在外，仍旧可以比较自由地生活。来访的客人，可以不接见。随时随地仍可以寻找各种乐趣。他有《北里》律诗：

舍北舍南来往少，自无人觅野夫家。

鸠鸣桑上还催种，人语烟中始焙茶。

池水云笼芳草气，井床露净碧桐花。

练衣挂石生出梦，睡起行吟到日斜。

自称“野夫”，其实也就是承认了没有暴露真实的身份。这一次，他的躲避是成功的，所以再无人来寻访或求画，他颇为得意。这一个整天，“睡起行吟到日斜”，真可以说得其所哉了。当然，春天正是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忙得不亦乐乎，谁有空闲来注意这个“野夫”呢？而倪瓒，除了欣赏“池水云笼芳草气，井床露净碧桐花”之外，他虽不参加任何劳动，却又关注到了“人语烟中始焙茶”。焙茶，香味并不很浓，烟也淡，声息更轻，倪瓒能通过嘈杂的“人语”中而察觉，那说明他是品茶的行家，而且似乎也急于品尝今年的新茶也。他另有《绝句》：

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

敲火煮茶歌《白芷》，怒涛翻雪小停桡。

前面的七律只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倪瓒对茶是爱好的。而《绝句》则相当具体地反映了他对茶爱好到什么程度，在行到什么程度。在唐、宋两代，地方向朝廷进贡名茶时，往往也同时进贡当地上好的泉水，上好的茶一定要用

上好的水煮泡，才能充分显示其独特的色香味也。而苏东坡、黄庭坚等人赠送好茶给友人时，如果条件许可，也是同时送去上好泉水的。当然，陆羽、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平时品茶，也十分注意选择上好的水用来煮泡。

在这一方面，倪瓒已经深得其中三昧。他知道“松陵第四桥前水”有其不平凡的来历，虽然被茶圣陆羽列为天下第十六位，并不是最前，但被张又新《煎茶水记》排名第六位，应该也有一定的根据。那一天，气候不太理想，风急浪高，取水不是太方便，但是倪瓒不肯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还是不顾危险，在怒涛奔腾中取了一瓢。我们可以设想他对品茶认真得几乎无可复加的地步了。有人认为宋代的杨万里有《舟泊吴江》：“江湖便是老生涯，佳处何妨暂泊家，自汲松江桥下水，垂虹桥下试新茶。”倪瓒此诗是受了杨万里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但是，倪瓒在风急浪高时取水，而且取水之后，决定“敲火煮茶歌《白苧》”，其闲情逸致较杨万里有过之无不及也。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荷花的兴趣，许多诗、词、曲都涉及，有时并出现在画面上。他有五言律诗《荒村》，我认为这荒村也是他曾经隐居过的地方。荒村景色免不了荒芜，他却仍旧看到了“竹梧秋雨碧，荷芰晚波明”。就是这位倪瓒，他把品茶的艺术和荷花突发奇想地结合了起来。《云林逸事》载：

莲花茶：就池沼中，于早饮前，日出时择取莲花蕊略绽者，以手指拨开，入茶满其中，用麻丝缚扎，定经一宿。次早，连花摘之，取茶纸包晒。如此三次，锡罐盛贮，扎口收藏。

倪瓒用这一方法，特制了一种花茶。别的花茶都会让花的香味盖过了茶的香味，但是荷花的香很淡泊，不像茉莉等花那样浓烈，所以仍旧能保持茶原来的色、香、味，不过再加上一些荷花淡泊的香味，显得别致高雅，别有风

味。清人沈三白著《浮生六记》，他和爱妻芸娘也品尝过这种莲花茶，也是自己亲手操作的。

周瘦鹃《洞庭碧螺春》：“1955年7月7日的清晨7时，苏州市文物保管会……举行了一个联欢茶会。品茶专家汪星伯兄忽发雅兴，前一晚先将碧螺春用桑皮纸包作十余小包，安放在莲池里已经开放的莲花中间。早起一一取出冲饮，先还不觉得怎样，到得二泡三泡之后，就莲香心脾了。”可见倪瓒的流风余韵到20世纪依然存在。

还有乾隆皇帝，经过多次下江南，不仅开始热爱品茶，而且喜欢用荷叶上的露水烹茶，并有《荷露烹茶诗》多首，是否受了倪瓒的启发，还难以下结论。

倪瓒有关茶的轶事不止莲花茶，还有两处记载，均见《云林遗事》：“光福徐达左，构养贤楼于邓尉山中，一时名士多集于此。元镇为尤数笃；常使童子入山担七宝泉，以前桶煎茶，以后桶涤足。人不解其意，或问之，曰：‘前者无触，故用煎茶，后者或为泄气所秽，故以为涤足之用。’其洁癖如此。”看来他的洁癖已经到了怪异的地步。“倪元镇素好饮茶，在惠山中，用桃核、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状，置于茶中饮之，名曰清泉白石茶。”用果仁之类置于茶中饮之，元代已经流行了，当然不一定用核桃、松子罢了。

五、张 岱

张岱是明末豪门的后裔，明亡以前一直过的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难得的是他在充分满足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并未停留于享受，对于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娱乐都作了别具慧眼的探索，进而尽可能从学术或兴趣的角度，

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明亡以后，他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过着非凡贫困的生活。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用优美的文笔写成两本回忆录：《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录》；第二是修著了一部视角较为独特的明史《石匱书后集》。

《陶庵梦忆》内容异常丰富，牵涉到种植花草、喂养鱼鸟、佳节风尚等等。其中有关戏曲表演的记载已引起戏剧理论界充分重视，张岱所赞赏的彭天锡、朱楚生诸人的表演艺术的记载一再被引用，并加以分析研究。关于茶艺，他也说得较多，人们的重视也仅仅是开始。他的《闵老子茶》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绝伦的奇文。文章前面半篇是闵汶水在试探张岱究竟有没有和他探讨茶艺的决心和耐心，并未涉及茶艺的本身。后面的半篇实际上才是主要内容：

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阊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给余。是阊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芥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

这是第一回合。闵汶水用阊苑制法的罗芥茶给张岱喝，骗他是阊苑茶，被张岱识破了，点明这是罗芥茶。闵汶水心里很佩服，口中称奇。

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给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主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敢复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

这是第二回合。闵汶水骗张岱，说用的是惠山的泉水。又被张岱识破了。

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

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采。”

最后一个回合，张岱把春茶、秋茶的不同味觉讲了出来。于是使闵汶水为之五体投地。“闵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认为他七十年来所遇到的精于茶艺品评的人当推张岱为第一，他人都望尘莫及。闵汶水对茶艺的造诣应该说也是极高，他们二人在伯仲之间。但闵汶水拙于文字，且对其他文学、艺术则所知甚少。十分遗憾的是虽然《闵老子茶》一文曾引起人们的兴趣，却只是停留于文笔的欣赏，而未从茶艺角度深入，从史料方面予以钩沉。其实张岱对闵汶水确实钦仰，除此文之外，《陶庵梦忆》中另有《王月生》，为“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之名妓。而且“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而去。所交有当意者，亦期与老子家会”。看来，这王月生是明末最懂茶艺的名妓了。

那么，是否张岱的鉴赏、品题闵汶水有偏见呢？恐怕没有，因为他是听到周墨农的推荐才去拜访的，而且王月生的那些事情也可以作为旁证也。郎瑛《七修类稿》：“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正如德山担青龙炒，高自矜许而已，不足异也……”郎瑛未多谈与闵汶水的交往，而是比较具体而详细地评介了闵汶水的茶艺，正可以补张岱之不足。

张岱对茶艺造诣之精，《楔泉》、《兰雪茶》有所反映。他说：“辨楔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桥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楔泉。”这本来是极难用文字表达的感觉，他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认为楔泉之佳妙，“会稽陶溪、萧山北干、杭州虎跑，皆非其伍”。应该说，张岱把水的重要性估计得相当高，决不在茶之下，至少是平分秋色。他对自己辨别水的能力颇为自信，所以说：“昔人水辨淄渑，多为异事，诸水到口，实实易辨，何待

易牙?”听起来神乎其神,似乎近乎夸张了。《兰雪茶》主要谈当年他采日铸茶加以精制,其色、香、味一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所以取此名,“四五年后,‘雪兰茶’一哄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止食兰雪”。可见当时张岱曾经使浙江茶客的口味为之转变。

自为墓志铭,应该是本人的盖棺论定,其史料价值不容低估。张岱的《自为墓志铭》说:“兼以茶淫枯虐,书蠹讨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承认了他对茶艺的热爱。而且又再一次强调了“啜茶尝水则能辨混淆”。对此,我感慨万分,在《自为墓志铭》中,他并没有奢谈戏剧表演艺术,我们戏剧史论家对其有关戏剧著述十分重视,详加评论,并没有错。但今日茶文化研究者对张岱有关茶艺论述不够重视,则希有待改进。

六、小 结

隐士采取隐居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争名夺利的矛盾也就不再存在。所以心态基本上比较和平,而饮茶的习惯一旦养成,则能逐渐改变浮躁、激动的性格,而使之趋向心平气和。

儒、释、道是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思想体系,却都和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觉得隐士对茶文化作出了诸多巨大贡献,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我之所以写这个专题,并非忽发奇想。早在明代末年,陈继儒在《茶董小序》中说:“酒类侠,茶类隐。”我印象至深,受到了启发,决定作些发挥。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思想倾向

一、弁 言

从上古时代的许由、巢父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的隐士为数甚多，但是人们在文章中提到的，在口头谈论的，却相对地集中在陶渊明身上，其原因所在一句话讲不清楚。首先，他的隐居可以说是比较有典型性，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出世思想，也许为了生机，也许想做一点事业，所以曾出仕多次，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地赴任，结果事与愿违而归田园。最后一次归田园在四十一岁那年，从此下了归隐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后世的文人都能理解而深为同情。其次，他的出仕都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不是朝廷中枢的尚书、侍郎等要职，也没有介入权贵们的派系纷争，更未直接与皇帝发生矛盾，所以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写了大量诗文，相当一部分都和他的隐居动机、隐居生活有所联系，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都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影响相当深远也。

二、多次出仕，最后坚决隐居

《宋书·陶潜传》说“（潜）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这是陶渊明隐居的一种解释，归结于类似“忠臣不事二

主”的性质，我们可以探讨一番，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任大司马，孟嘉的岳父则是陶侃，陶侃确实是东晋的知名人物，历任广州刺史、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要职，并曾任征西大将军，征讨苏峻、祖约之乱。对陶潜来说，孟嘉和陶侃的辉煌历史可引以自豪，但是对他的进退出仕究竟有何影响，从他的诗文中还找不到任何证据。

一般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元年(405)，那时他就任彭泽令才八十多天，便有一种深切的感受，决定挂冠归田。在此以前，他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都品级较低，如果“耻复屈身后代”，他会拒绝任何一次任命的。再说“自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也有费解之处。因为从义熙元年到刘裕取东晋而代之、国号宋的永初元年(420)，东晋政权完全崩溃，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之间陶渊明之所以隐居不出，很难说是刘裕的原因。因为东晋最后这数十年，政权已经分崩离析，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无论刘裕起什么作用，陶渊明的出仕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猛志逸四海”的志向，只能稍稍改善一下不太宽裕的生活。

东晋被刘裕所灭的420年到陶渊明辞世的427年，共有七年时间，无论他是生于372年或376年，此时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原来所担任的最高官职不过是彭泽令，自然刘裕称帝后也不可能提拔他做高官。而此时此刻，他的诗文已在广泛流传，有了非凡的名声，他的隐居不出的思想更为牢固。即使东晋仍旧存在，再次使用他的话，他也不可能再去接受任何职务也。

历来研究陶渊明的学者都认为改朝换代是陶渊明决定隐居的重要原因，恐怕有认真思考的必要。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就已十分明确地表明心迹：“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就是

说，早在东晋的政权还存在时，他已感觉到从政是入了迷途，也就是所指的“昨非”，认为决心回故乡种田才能称为“今是”。对陶渊明来说，这是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至于改朝换代，即使对他有所影响，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陶渊明主要的诗歌，如《答庞参军》、《赠羊长史》、《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归田园居五首》、《移居二首》、《饮酒二十首》等都写于改朝换代之前，主要的文章《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也都写于改朝换代之前。仅有一篇《自祭文》写于改朝换代之后，亦即他逝世的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如果说改朝换代对陶渊明有重大影响，也可以成立。从此以后，他的诗文创作就开始隐隐约约地述说对刘裕的不满了。

东晋末年，政治局势相当错综复杂，在刘裕称帝之前，还有一个桓玄建立的非常短命的政权——楚。而陶渊明所担任的官职，最早是东晋统治集团任命的，后来则是被桓玄、刘裕使用的。这数十年间战事不断，混乱之极。有天大本领的人去做地方的小官吏不可能一展所长，作出政绩。更何况陶渊明是典型的书生，不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也不屑在一些烦琐的事情上花工夫呢。

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陶渊明不可能感到胜任愉快。野心家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能攫取高官厚禄，他既“不慕荣利”，当然不可能利用这个混乱局面，而只能陷在其中一筹莫展。

颇为令人费解的是他的最后一次辞去彭泽令，而且决定从此归隐而不再从政，却是为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是不愿弯腰曲背地迎来送往上级官员。这种事情并不是和上级串通贪赃枉法，也不是徇私舞弊，只不过对上级表示恭顺罢了。这当然是讨好上级的行为，但也不是大问题，在

封建社会十分普遍，在汉、三国到西晋、东晋，即使被称为“文景之治”的时代，也难以避免。在官场，乃至老百姓眼中，那是司空见惯的了。陶渊明自然不习惯，以致因此辞官，应该说另有隐情，或者说他赴任时就已身处思想剧烈斗争之中，“折腰”一事成了辞官的借口或触媒剂而已。

我发现刘裕固然是取晋而代之的野心家，但南朝宋建国之初，局面比东晋末年，比短命的桓玄的楚国那一年左右，相对地说要稳定得多，也用了一些文人。如果陶渊明有大展宏图的愿望，或飞黄腾达的野心，正是不可错过的机遇来了，肯定会牢牢把握住的，绝不会想到孟嘉，想到陶侃，想到上代显赫的家世，因而萌生退念的。

陶渊明写作了大量诗文，极少涉及古代的英明帝王，极少涉及古代的文臣武将，没有歌颂他们，甚至没有题咏“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可以认为它并不向往这些历史人物开创的局面。他对东晋末年的政局，桓玄、刘裕的皇朝也没有作正面的评论，那时他有所顾忌，无法畅所欲言。他的多次辞官而去，就很能说明他的不满了。

回过头来，我仍要说刘裕还是对陶渊明有一点了解的。有不少帝王自以为对人才很尊重、很爱惜，甚至强迫不愿做官的书生，造成了一些闹剧或悲剧，刘裕却能尊重陶渊明自己的决定，还有其可取的一面。

三、“少无适俗韵”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隐士，关键问题在于他的处世哲学，也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恬淡的人生观。其实，《归田园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已经说得很清楚，“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在青少年时代，这一种“爱丘山”的性格就已经形成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何谓“俗韵”，倒不一定是指庸俗，更多的实指世俗，衣食住行，也是世俗，陶渊明当然也缺少不了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然而，对名、利的追逐，他毫无兴趣参加，我以为封建社会认为天经地义的“学而优则仕”，也很可能被他认为是一种“俗”，他也不想遵循。至于“爱丘山”，不能把“丘山”具体化，这是和“朝廷”相对而言，意在强调无追求官职利禄之心。稍后，南朝陶弘景，名义上隐居茅山，实际上名利双收，所以被称为山中宰相也。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最好的解释，即使在人群众多处居住，有一颗恬淡的心，仍旧可以少与富贵者接触。古人所谓：身居闹市，一尘不染，语言不同，说的道理基本相似也。“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有人以为是“一去十三年”之误，陶渊明心中充满了对当年进入官场的悔恨、遗憾，颇为不平静。而“守拙”，无疑是保持纯朴的本性，反对算尽机关、钩心斗角的风气的一种提法。后面所写的都是农村中最平常的鸡犬之声相闻的场面，人人能温饱而已。此处既无高堂华厦，也无达旦笙歌，更无如云美女，而他已经认为“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而满足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显然把官场看成违反自然的樊笼。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如此憎恨官场生活的

声音可谓绝无仅有。

“复得返自然”是什么情景，我们也可以从《归去来兮辞》获得音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这和“而无车马喧”可以相互联系，既然免去了迎来送往的客套，相互馈赠的礼尚，人就活得轻松了。有兴致时，可以到园子里走走，那扇大门自然关着的时候居多了。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术”，也是与“少无适俗韵”流露的同一种心态。正因为对名、对利一无所求，所以才能够做到不迎合世俗的一举一动。

陶渊明看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就感宇宙间充满了生意而为之欣慰。“善万物之得时”，他也为万物之“复得返自然”而欣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人之一生，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是天命，也是一种自然也。他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富贵可以追求的，他不愿去追求。成仙呢？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这种奢望。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说明他本人根本不求名，因诗文带来了名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古代许多隐士既未留下诗文，也不知其姓氏。隐得非常彻底，陶渊明虽然按捺不住自己那种独特的感情，因而写了不少诗文，但仍仰慕那些清高的隐士，故自称之为五柳先生。再一次强调了“不慕荣利”。在这种情况下，物质生活难免贫乏，他能接受，而且毫不勉强。“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他不以苦，“晏如也”。自认为，“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并不亚于春秋时齐国的高士黔娄。

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自祭文》，心态相当平静，并没有过分激动、悲

哀。“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显得异常冷静，他看得人之将死，像草木黄落一样自然。尽管“箪瓢屡空，絺绤冬陈”。每天的三餐，还有酒浆，往往无以为继，有时就只能挨饿了。冬天寒冷，也不一定有保暖的衣服可穿，只能裹着粗布做的衣裤对付。他仍旧“载耘载耔，乃育乃繁”而感到愉快。至于“欣以素牍，和以七弦”。那是又一次证明他能苦中寻乐，或苦中作乐，正如《归去来兮辞》所说“乐琴书以消忧”是同样的意思。

古人说诗言志，文载道，陶渊明的诗所言的志、所载的道和别的文人不太一样，基本上是宣扬一种淡泊明志、自然即道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四、仰慕古代的隐士

虽然，他也写过慷慨激昂的《咏荆轲》，慨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流露了他对秦王暴政的仇恨。《读山海经十三首》在吟咏那些神话的同时也颇多遐想，但总的说来，他的一生所写诗文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主旋律，依旧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散发着热爱自然的闲适情调。

对于古人，他最仰慕的乃是那些不慕荣利的隐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沮溺，即春秋时代的两位隐士。《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这两位隐士并没有为孔子一行指路，而是回答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于是，“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陶渊明借这个典故说明自己和古代的长沮、桀溺在思想上是

一脉相承的,和急于希望得到诸侯重用的孔子不属于同一类型。

《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这两句话有出处。《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楚狂接舆不赞成孔子这种迫切希望得到诸侯重用的态度,比长沮、桀溺还要直截了当些。劝孔子不要从政,也是“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的意思。

陶渊明如此直接或间接引用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隐士反对孔子从政的话,不言而喻,他很欣赏这些隐士的处世原则与言行。

《五柳先生传》将结束时,有《赞》:“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陶渊明认为黔娄之妻对黔娄所作的评论,也完全适用在自己身上,他觉得自己就是黔娄这一类人。他的《咏贫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可见他以黔娄为古代能“安贫守贱者”的典型。按黔娄为战国时代齐国的隐士。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都对黔娄及其妻的安贫守贱作了记叙和赞颂。此人曾辞谢齐、鲁两国国君请其出山为官的请求,夫妻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仍旧不以为苦。陶渊明之所以特别要引用黔娄之妻所说的话,主要是强调晚年确实已经十分贫困,衣食都成了问题,而以黔娄为榜样,不接受任何官职。

《感士不遇赋》:“故夷、皓有安归之叹。”《桃花源诗》:“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赠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如何?”夷者,商、周交替之际,孤竹君有子伯夷、叔齐二人,认为周之取商而代之,是以暴易暴,为表示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蕨薇而食。后来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蕨薇等野菜也是属于周的,于是绝食而死。陶渊

明之所以提伯夷，显和他本人晚年的经常陷于“饥来驱我去”的困境有关。皓者，商山四皓。事见《汉书》卷四十二：“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据说他们辞谢刘邦任命官职时，有一首《紫芝歌》：

漠漠高山，深谷逶迤。嗒嗒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

四皓表示在深山穷谷中有紫芝充饥，可以生活下去。而做高官，享受富贵，那很可能带来无穷祸患，反而远不如过着贫贱的生活那样安心。这些话自然也很合陶渊明的心意。所以对即将赴秦川的羊松龄叮嘱道，经过商山的话，务必代表他去凭吊一下四皓隐居的遗迹，以示追念。

《咏贫士七首》之五：“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袁安是东汉著名高士，某年冬，洛阳令巡视街市，发现袁安门前积雪甚高，命差役扫雪开门，见袁安饥寒交迫，僵卧不起。对其穷且益坚之高节甚为敬仰，荐举他为孝廉。陶渊明用“邈然不可干”形容袁安，实际上也是表示自己的安贫守节。

陶渊明之所以一再赞扬古代隐士，尤其是生活极度贫困的隐士，既是出乎内心的仰慕，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和肯定。这决不是偶然的无意的流露，而是有必然性的。他有一位好友颜延之，也是著名的文人。颜延之对陶渊明有较深的理解，可以说是位知音。陶渊明逝世，颜延之写了《陶征士诔并序》，《序》说：“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巢为巢父，高为伯成子高，都是尧时的隐士，“夷、皓”则已见于《感士不遇赋》。颜延之把陶渊明和古代的这几位隐士相提并论，应该说是掌握准确的分寸，颇能代表当时的舆论。这篇哀悼文章就一直广为流传了。

五、桃花源是他的理想天地

隐士之所以隐居,当然认为它所处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他感到无法适应,于是杜门不出,或者进入深山老林。那末,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情景呢?他的《桃花源记》有所记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幅承平时代的田园风景画。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源并无道教或佛教的宗教色彩,也没有神仙鬼怪出现。“屋舍俨然”,这些建筑物和陶渊明居住的差不多,不是玉楼琼宇,也不是凌霄宫殿。人人都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少不了“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己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可以看到陶渊明对田园(园田)是何等重视,桃花源中当然不能缺少。

鸡与犬是农家必不可少的家禽、家畜,陶渊明在生活中也离不开它们。《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居然也是使陶渊明之所以能产生“复得反自然”这种良好感觉的条件之一。所以他在《桃花源记》有限篇幅中仍要突出“鸡犬相闻”。《桃花源诗》还要写一笔“鸡犬互鸣吠”。

我们所看到的桃花源乃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社会,既无英明帝王的统治,也无清官循吏的管理,甚至里甲差役都没有。宋代有人评论《桃花源记》说有父子而无君臣,只说对了一半。既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又何来上级下属,当然也不会发生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情了。《桃花源诗》:“春蚕

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赋税也不用缴纳，因为既无税收机构，更无税收人员也。

比官场的贪鄙、繁重的税收更可怕的是战争，直接造成大量的死伤。从桓玄的骤兴骤亡、刘裕的取晋而代之都是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进行的。陶渊明都亲身经历、感受的。他希望有一个远离战争的世界可以让他容身。《桃花源记》说：“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原因即在此。

《桃花源记》、《桃花源诗》所歌颂的这一世外桃源，主要是陶渊明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而这种思想感情当然不无老、庄的学说的影响，也有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影响。《大人先生传》：“盖无君而庶务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桃花源正是这样一种无君无臣的世界也。阮籍为人本来就疏狂放浪，他到苏门山，遇见了隐士孙登，颇多感悟，于是写了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文章里又歌颂了安期生、角里、鲍焦、莱维这些隐士。《与山巨源绝交书》也歌颂了许多位隐士：“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许由是不肯接受尧以天下相让而闻名的隐士，子房即张良，他帮助刘邦战胜项羽之后，也“从黄石公游”而不知所终，隐入深山了。至于接舆，则陶渊明在诗文中都引述过他对孔子的讽喻。“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伯成子高，尧、舜的诸侯，夏禹继舜而有天下，他认为世德已衰，归耕陇亩，禹还想加以挽留，前往拜访，他不接见。嵇康赞扬禹能尊重伯成子高自己的决定，不再强迫他继续从政。这位伯成子高，也是陶渊明甚为敬仰的隐士。嵇康向山巨源所说他之所以不愿做官的原因，有“不堪者，七”，其中如“……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一不堪也”等等，和陶渊明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基本相同，不过各

人的表述,用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桃花源不仅是陶渊明的理想的体现,也是阮籍、嵇康的理想的体现。

阮籍、嵇康在思想上的许多特点,陶渊明也有,但陶渊明和他们仍有不同,阮籍、嵇康和西晋的统治阶级的上层显要人物关系十分密切,为人处世又异常激忿,锋芒毕露,所以阮籍的性命还能保全下来,嵇康被杀了。陶渊明比他们要恬淡得多,不愉快的情绪经常使他苦闷,他能“乐琴书以消忧”,略有发泄,基本上化解成为惆怅和忧伤,很少触犯权势人物,所以后半生虽然穷困之至,却并没有遭受到刘裕的迫害。

尽管《桃花源记》成为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读者爱不释手。然而,此文留下了巨大的空白。陶渊明是一位士人,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社会沿袭多年的制度,酷爱自然的士人便去做隐士,也成了常规。桃花源的士人,便是偶然闯入的作者,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停数日,辞去”。而在桃花源这块土地上,有无士人?士人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生活?陶渊明都无从下笔,只好一概不提。也就是陶渊明无法设想士人在桃花源的处境,并不是他没有想到,因为困难太大、太多,他于是就回避了。

六、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被中国历代文人、现代的文学史论者推为“隐逸诗人之宗”,其原因有二:

他是个“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热爱自然、秉性恬淡的士人,无意追求名利。生命历程中又饱经战乱,所见所闻,使他陷于痛苦,于是想到隐居田园也许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而当时有些隐士并不真正想隐居,不

过知道朝廷很尊重隐士，就想到暂时假冒一下隐士的身份，用这种卑劣的手法，取得朝廷的重视。这办法比考科举更省力、更便捷。《高士传》作者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使用过这种恶劣伎俩，但被朝廷识破，所以反而最后获罪了。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所写的也都是真正的感情。因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隐士了。

其次，他在诗、文两方面成就都很高，有关隐逸思想的流露、隐逸生活的写照也都实事求是，无一丝一毫的炒作。在语言文字这方面有不凡的造诣，任何复杂的思想活动，任何生僻的典故、琐碎的细节，都化作美丽而质朴的诗文，使人永记心间。读他的诗，乃是化解忧愁、烦闷的最好办法。在任何时候，读他的诗，都是精神生活的一次盛宴。

写诗的隐士不少，但也有些人是以退为进，希望朝廷重用，不是真正的隐士。而真正的隐士诗写得像陶渊明这样好、这样多的再无第二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不亦宜乎？

陶渊明与菊花

陶渊明一生和花草树木的关系相当密切,《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际上是他的自传。《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世外桃源此一成语,由此而来。然而,柳树、桃花在后人心目中,都没有成为陶渊明的象征或标识。他的《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歌颂了菊的芬芳。《饮酒二十首》:“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赞美了菊的光彩,可以说,对于菊的欣赏比较全面。《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他在彭泽令任上,对故园菊花仍深深怀念。尤其《饮酒二十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者在不经意之中,如有神助似地反映出了他本人的恬淡的心态和潇洒的风度。在采菊之际,陶渊明与菊、与南山成为浑然而不可分割的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既是即景生情,也是移情入景,从此之后,人们读陶诗就会联想到菊花,见到菊花也会追念陶渊明的高风亮节。

诚然《后汉书》、《西京杂记》以及更早一些的史籍已出现过关于菊花的记载,但是从陶渊明吟咏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后,便被某些文人墨客认定为菊花的主人了。王勃《上明员外启》:“彭泽陶潜之菊,胜气犹存,河阳潘岳之花,芳风遂远”,骆宾王《送尹大序》:“金辉照岸,秀陶菊于寒堤”,刘兼《木芙蓉》:“谢莲色淡争堪种,陶菊香秾亦合羞”等等,可为确证。此外杜甫、司空图诗作中也分别出现过“陶潜菊”、“陶家菊”的词汇。

本来菊的生长种植，不一定在篱边，在水之滨、山之隈、桥之畔、屋之后，均无不可，由于“采菊东篱下”之广泛流传，诗人笔下也往往出现像赵嘏《长安晚秋》：“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这样的语句，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径自把菊花盛开之处定为东篱。他们受了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影响之深自不待言。

苏东坡乃陶渊明的隔代知音，他对陶渊明的处世、诗文都甚为折服，而写了不少“和陶”的诗。其《赠刘静文》七律：“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用“傲霜枝”三字将菊之高洁予以拟人化、形象化，有可能被陶渊明晚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彭泽令的事迹所感动写出的神来之笔。

我特别注意到后世受陶渊明影响最深刻的倒不是诗人、词人、文章家，而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他的《〔南吕〕四块玉·恬退》，共四小节，均以“归去来”结束，显然是根据《归去来兮辞》的篇名而如此措辞的。第二节“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出现了菊花。第三节“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仍是用《归去来兮辞》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典故，五柳云云，则本《五柳先生传》的“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从语气分析，从规定情景考察，即使作为陶渊明的作品，也无破绽。

《〔仙吕〕青哥儿·十二月》之《九月》：“对篷窗丛菊花开”，《〔双调〕新水令·题西湖》：“最好西湖卖酒家，黄菊绽东篱下”，《〔双调〕夜行船·秋思》：“裴公绿野堂，陶公白莲社”、“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都提到了陶渊明或菊花。而且马致远就以“东篱”为号了。在散曲中，一再有“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便北海采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对东篱，思北海，忆南楼”等等，看来，他非常高兴自称为“东篱”也。

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深入人心，菊花逐渐被赋予陶渊明

的人格，正因为这是在较长历史时期之内充分酝酿的结果，所以从何时开始已很难查考了。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的是宋代的周敦颐，其《爱莲说》谓“晋陶渊明独爱菊”可以成立。“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仍旧纯粹是从欣赏者的感受而言，花的本身，似乎并不存在这种风格上的差别。花的成长、开放，和季节气候有密切的关系，菊花一般是在霜降节令前后盛开，苏东坡要歌颂它的高洁拔俗，誉之为“傲霜枝”，称之为“迎霜枝”，也是符合实际的。至于说：“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事实并非如此，唐人诗文涉及菊花者甚多也。

人世间事物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敦颐《爱莲说》固然大大地扩展了莲的影响，与此同时，菊的“花之隐逸者也”一说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周敦颐是经学大师，人们引用他的语言、观点习以为常，从不怀疑他的理论根据也。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元代散曲写隐居的思想、生活时，不仅马致远一再提到陶渊明、菊花、东篱，其他散曲作家也是如此。张养浩《〔中吕〕普天乐》：“折腰惭，迎尘拜。槐松梦觉，苦尽甘来。花也喜欢，山也相爱，万古东篱天留在，做高人轮到吾侪。”看来张养浩的归隐也是艰苦争取来的，所以流露了“复得返自然”的欢欣。他的《〔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往来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篱。”以“把菊向东篱”作为隐居时闲适生活最大的乐处来写，当然也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隐逸诗歌的经典看待了。

我觉得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采菊东篱下”仍有不求甚解之处。陶渊明爱菊，欣赏其色泽与芳香，不在话下。但他为什么要采下来呢？插在花瓶或瓦罐之中吗？恐怕未必，身居田园，而又热爱自然的他，不可能这样

做。我注意到陶渊明的爱酒也非同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不出于《归田园居》，而出之于《饮酒二十首》之五。其次，陶渊明晚年贫困之中，重阳那天断酒成为莫大的苦恼，欣闻江州刺史王宏为他送酒来时，他是在菊花丛中迎候王宏的。再其次，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后世都认为白居易与刘禹锡预约在深秋时节共饮菊花酒。接下来又派生了一个疑问，什么是菊花酒？《神童诗》也有“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之说，菊花酒与黄花酒应该是同义词。可以肯定的是菊花黄时为品酒的最好季节，或者同时赏菊品酒乃是他们的赏心乐事。是否，菊花也可酿酒，恐怕也不能排除，否则的话，陶渊明在东篱赏菊又何必“采”呢？这留下了一个悬念。

唐代以晚，出现过重阳酒、渊明酒、东篱酒等等类别的酒，有何区别，已难以查考，但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而且写了“采菊东篱下”诗篇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则是事实。

我再要补充一下，陶渊明的爱菊对后世文人题名取号的影响，自从元代马致远自号东篱之后，此风依旧不衰。明代中叶，苏州有位隐士，名朱大涇，常周济贫困，却是位不愿为世人称颂的隐士，他自号菊隐。唐寅对他评价颇高，专门为他写了篇《菊隐记》。

而在20世纪，有位民国史专家，名陶菊隐。至于焦菊隐，则是著名的话剧导演、大师级人物。当然，他们都不是隐士，但他们都仰慕陶渊明的人品人格，取菊隐之名以自勉自励也。

林逋与梅花

孟浩然是唐代的隐逸诗人，他在诗歌中也经常对“岩栖者”、“幽人”表示仰慕或向往。对于花卉，《题义公禅房》：“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洛中访袁拾遗不遇》：“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分别对莲花、菊花、梅花流露了浓厚的兴趣。元代马致远、明代朱有燬分别有《冻吟诗踏雪寻梅》、《孟浩然踏雪寻梅》杂剧。但是，自从北宋林逋以隐逸诗人闻名后，梅花才成为隐士清高品格的写照，而林逋也成了梅花的主人。

林逋，宋初著名诗人，结庐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一生写了许多诗篇，流传下来的只是少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作者以视觉、嗅觉为主，兼带他对梅花情有独钟而产生的微妙感觉，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唱。他虽曾有哀艳的曲折爱情，却因此而终身不娶，留下了梅妻鹤子的佳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又用拟人法写白鹤与粉蝶对梅花的近乎痴迷的爱恋，可谓神乎其神。当然，他的《山隐自题》：“鹤闲临水久，蜂

懒采花疏”也用了类似的手法。

后来秦观写了一首吟咏梅花的诗，有“暗香消尽令人老”的感慨，这“暗香”承袭了林逋的语言，苏东坡为赞美秦观的才华，作《和秦太虚梅花》，一开头便是“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实际上过于夸张了，千年以来，秦观此诗早已被人淡忘了，极少有诗歌选集选录此诗，也就是说西湖处士林逋的《山园小梅》从未被压倒过也。

陆游也有吟咏梅花的诗、词，所不同者各人着眼点不尽相同，林逋从冷静、凄清的情景中写其孤高自赏，自然极少人间烟火气，而陆游仍是一般地歌颂梅的品格。他不是隐士，而是渴望“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斗士也。

到了元代，怀念赵宋的群众用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伤，文人的诗词也只能曲折地、隐讳地措辞。刘因的《观梅有感》：“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作者的《白雁行》等诗都是有基本相似的内涵，对元代的统治表示了深深的反感。《观梅行》则把他的故国之思集中到了林逋身上，以林逋的高尚情操而自励。和苏东坡一样，称林逋为西湖处士，不称隐士，那是因为林逋并非从官场急流勇退，而是始终未入官场也。所谓“此心元不为梅花”，实际上是说他不仅仅怀念梅花，而是怀念梅妻鹤子的林逋所处的时代。

较多地吟咏陶渊明采菊的元曲大家马致远，有关隐逸思想的抒发也兼用林逋的事迹，《〔双调〕新水令·题西湖》结束的地方是：“但得孤山寻梅处，苦间草厦，有林和靖是邻家，喝口水西湖上快活煞。”明白无误地表示要和林逋作邻居而杜门不出了。

清代沈德潜《梅花》：

残雪初消欲暝天，无枝冷艳破春妍。

山边村落涧边路，篱外幽香竹外烟。

自我相思近一载，与君偕隐已多年。

惜花兼怕催人老，扶杖更深看不眠。

作者六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在此之前，他叹息命运不佳的同时，又以隐士自居，原是狼狈处境中的自我安慰、自我嘲解也。显然，与君偕隐是与梅花偕隐，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伪装出来的。此诗写于成进士之前，成进士之后飞黄腾达，恐怕也忘记这首《梅花》七律了。

诚然梅花被给予高洁的品格，被认定为隐士的象征，而林逋的梅妻鹤子已成为西湖名胜孤山的佳话，但是后来民间又传颂着“只因误识林和靖，被人话说到如今”的说法，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林逋隐居孤山，宋仁宗赵祯在位年间，要他出山做官，他坚辞不就，宋仁宗也不勉强，赐号“和靖先生”，以示尊重，原不能说不。一个隐士知名度弄得这样大，有人觉得倒是起了反作用，认为反而玷污了林逋的清高了。如果站在梅花的立场，则林逋显然伤害了梅花的高洁品格了。

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

一、弁言

曾经有人说元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关汉卿则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表现十分突出的斗士。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关汉卿诚然是贡献甚大的元代戏剧家、散曲家，但元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仍应作具体分析，不能把某些论点作为定论，更不能把关汉卿无限拔高，不能离开他的作品作想当然的推理。

根据历史文献，元代确实把治下人群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类，也就是说皇帝是蒙古人，主要的武将、文臣也都是蒙古人，所以蒙古人的地位最高。又因为蒙古大军西征欧洲之后才入主中原，所以许多中亚、西亚一带的民族，也随元军到了大都（北京），统治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奖赏或感激，也任命了些武将、文臣，像他们这一批既非蒙古族也非汉族的民族，被称为色目人。北人与南人则均指汉族，为什么又有北、南之分呢？因为黄河以北那一片土地，在蒙古大军南下之前，曾被辽、金分别统治多年，蒙古族进入大都时是与金交战后攻略的，并没有与南宋朝廷发生正面的交锋，他们并未感受到汉族的坚决抵抗。而蒙古大军继续南下时，文天祥、陆秀夫为代表的汉族文臣武将的宁死不屈的战斗，使他们付出了十分重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对南方的汉族人群怀恨在心，决定在各方面予以限

制，使其在政治上更受屈辱，那是事实。

至于说元代政权把人群分成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十个等级，那是宋代遗民著作中说的，不足为据。元代所有法令规章，都没有发现这一条款。元代任何案件的审理和审决也没有引用过类似的文字。当然不能作为确有其事而剖析元代的阶级矛盾。

元代政权凭强大的骑兵攻克一个个敌人，不懂得马上能得天下，而治天下却更复杂、更困难。他们把书生看成百无一用是必然的。虽然耶律楚材识达大体，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朝廷还袭用了一些宋代的施政措施，但是总的说来，无法改变蒙古贵族轻视书生的偏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奉行了千年之久的科考制度停止执行三十年左右。整个中国文化教育大踏步倒退了，造就了大批文盲，原来的知识分子不能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弄一官半职，只能从事商贩或医卜星相等行业了。但是，正因为朝廷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也没有发生灭九族、灭十族等等残酷的、大规模的文字狱。

朝廷并没有下诏征辟任何一位山林隐逸，知识分子居城市或乡村，悉听尊便，与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假冒隐士清高的名声走终南捷径的人也没有了。道教和佛教相当发达，皈依宗教有时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在当时又成了精神的寄托或求温饱的最后的選擇。

我认为皈依宗教和隐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宗教在任何时代背景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隐士的隐居则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反映，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都是儒家的理论也。因此，宁献王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一书中把“隐居乐道”列为十二科之一，是相当勉强的。《陈搏高卧》是在赵匡胤得天下的宋代初年，

大局相对稳定。陈搏是道教中领袖人物，被尊称为陈搏老祖，一睡可千年，更是神话。至于《归去来兮》写晋末陶渊明，确是隐士的一个类型。几次出仕，几次失望而归，他的隐居深为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困扰，更为酒壶常空而苦闷，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充满了矛盾。和陈搏毫无共同之点也。除《陈搏高卧》、《归去来兮》之外，与隐居有关的杂剧就更少了。

二、白 朴

我觉得散曲作者直接写隐居生活或者表达隐居愿望的还是比较多的。终身未任元朝官职的白朴这一类散曲有：

〔仙吕〕寄生草·秋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中吕〕阳春曲·知几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从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

〔中吕〕阳春曲·知几

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

〔双调〕庆东原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白朴这些作品有其共同的主题，“糟腌两个功名字”、“闲袖手，贫煞也风流”、“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劝君闻早冠宜挂”等等，都是表白拟布衣终身，不愿为官，并且也劝人尽早挂冠归田。他把出山为官与挂冠还乡的选择提升为“知几”与否的问题，提升为做人的原则问题。可见他重视的程度非同一般。

从表面上看，都没有涉及民族矛盾、民族情绪的问题，而白朴生活的时代，乃是辽、金、元与宋四个政权相互间展开了许多伤亡惨重的战争始终不断的时代，死伤的不仅是将领和士兵，更多的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众多官员无论是坚持民族气节的英雄，还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也都各有艰苦的经历或受屈辱的经历，这一时期既非常丰富多彩，也不乏令人不忍细看的残酷场面。白朴亲身感受了这一切，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平静。他的散曲流露出这种心态，乃是必然反映。

至于没有正面提出民族矛盾问题，乃是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突出民族矛盾，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引起种种麻烦，甚至引起文字狱。所以，他表面上绝口不提民族矛盾，而实质上，并非如此。白朴之所以写作了大量剧曲和散曲，其主要的动力乃是民族矛盾的心理压力，他欲罢不能，一吐为快。

我们知道白朴的身世比较复杂，1232年，白朴年方7岁，居住在汴京，虽在金的控制之下，但遭到蒙古军与宋军的联合进攻，已成了水泄不通的

孤城，粮尽后，人相食。昔日繁华世界，已成废墟一片，荒凉惨酷，几成人间地狱。1233年，又经过了一次大屠杀。1234年，汴京只剩下千余家。白朴此时失去了母亲，成为孤儿。后得到元好问的关怀，被安排在山东聊城生活了四年。

白朴的父亲白华是一位无行文人，政治上不断反复，或仕于宋，或仕于金，或仕于元，随风而倒，深为士林所不齿，也没有能得到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信任。到了晚年，惭愧与内疚，亦已无补于事，铸就了莫大悲剧。

处于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白朴已经够痛苦的了。但是，白华这样一位父亲，更使白朴的痛苦较任何文人为强烈，几乎难以忍受，精神趋向崩溃。幸而，白朴还能冷静对待。在这种环境之中，他决定以遗民自居，不出任任何政权的任何官职，我完全能够理解。

虽然白华曾在金任高官，但白朴仍旧接受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所以他的满腹郁闷也只好借屈原、陶潜、张良、范蠡等历史人物的经历而发泄出来，真是所谓借题发挥。他不提北宋之初的杨业，也不提南宋之初的岳飞，因为直接介入了民族矛盾，太敏感了，还是以尽可能淡化民族矛盾为妥。

当然，也因为白华在政治上的朝三暮四，遭到物议，白朴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他要斥责抗金抗元不力的南宋将士感到无法下笔，要转弯抹角地抨击金、元两个政权的话更难措词。这种痛苦折磨着他、挤压着他，无论作文、作诗、作词、作曲，都有点隔靴搔痒，说的并不在点子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致引起统治上的密切注意，这样，他才能勉强地极不舒畅地度过了一生。

屈原当年是楚怀王手边举足轻重的人物。张良帮助刘邦定天下之后

就从赤松子游，不知所终了。范蠡献西施破吴国而使越国复兴，也功成身退，成为大商贾陶朱公。这些人物的地位之高，所起作用之大，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至于根本未踏上宦途、最小的官员都不是的白朴，和这三位历史人物没有可比性。他这样发表感慨，给人以一种未免滑稽的感觉。但是，他也只能这样说。说了，也许比不说要舒畅些，要很舒畅地说出的话，当然最好，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像白朴这样，他的隐居不仕固然是民族感情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在作品里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但我们作深层的研究，仍可以发现民族感情因素的存在。这一类隐士，白朴无疑具有典型性。

三、倪 瓒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促的一个皇朝，消灭南宋政权之后，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二三十年，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又蜂拥而起。文人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渠道进入仕途的虽然日渐增加，民族思想较浓烈的仍旧不愿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效劳。原因何在？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因为，凡是生活上衣食可以自足的文人，无论从事音乐、绘画、诗词或其他文学艺术的，选择隐居的仍旧占有一定比例。倪瓒是其中之一，他所作散曲如：

〔黄钟〕人月圆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黄钟〕人月圆

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画屏云嶂，池塘春草，无限销魂。
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篷听雨，灯火江村。

〔双调〕折桂令 拟张鸣善

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是月影圆缺。山人室堆案图书，
当窗松桂，满地薇蕨。侯门深处须刺谒，白云间自可怡悦。到如今世
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倪瓒也就是元代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倪云林，上代积有丰饶的家产，而他自己的画在当时就能卖很大的价钱，所以始终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然而在精神上却不舒畅。元代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不珍重，使他颇为苦闷。不担任任何官职，与官府尽可能保持较远的距离，徜徉山林之间吟风弄月，抚琴作画，以此消磨岁月。然而，心里仍难以平静下来，时时引起感慨、惆怅。

“伤心莫问前朝事”，他虽然出生较晚，并不是南宋遗民，但他仍为南宋的消亡而伤心。我认为并不是狭隘的民族偏见，而是感到瑰丽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无法适应所产生的烦恼。此时此刻，他很可能在凭吊岳飞、韩世忠乃至文天祥的抗金、抗元的历史陈迹，但他又不能这样写，于是只能改成为“重上越王台”了。

他在杭州写过一首《竹枝词》：“阿翁闻说国兴亡，记得钱王与岳王。日暮狂风吹柳折，满湖烟雨绿茫茫。”作者固然直接写出了岳飞，但与钱王一同出现，又有了一定的淡化作用。而且后面两句再也不散发关于“国兴亡”

的感触与悲痛,马上描摹西湖上的烟雨了。作者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也是意到笔不到的手法。“重上越王台”的提法也类似。为什么“怅然”?为什么“孤啸”?自然是为了“前朝事”,也就是“青山故国”。

为了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一个知名画家很可能有达官贵人的骚扰、俗客的纠缠,因此,他不得不离开这家庭而躲避到别人难发现的僻静之处。但是,他却又忘不了“旧家”,忘不了“梧桐覆井,杨柳藏门”的安谧舒畅的环境。应该说,隐居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此时此刻,又慨叹“闲身空老”。前一曲用“怅然孤啸”,这一曲用“孤篷听雨”,这两个“孤”字说明他离开家庭隐居在外是万不得已而为之。他另有一曲《〔双调〕水仙子》,则“独自凭栏独自愁”,也透露了类似的心态。可见隐士要真的忘情于世俗也是不容易的。

和前两曲〔人月圆〕相比,《〔双调〕折桂令 拟张鸣善》表现得比较心平气和一点,大概隐居的时间长了,冷静、寂寞、凄凉等等也容易接受并适应了。他把“世代兴亡”看成“却便似月影圆缺”,那末,秦汉陵阙成了草茫茫一片,南宋的消失不也很正常吗?他自称“山人”,不知不觉进入了“隐士”这一必然王国,当然,不再因孤单、孤独而感慨、叹息,而且能安之若素。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可能再向侯门投刺以求仕进了。至于“白云间自可怡悦”,那典故出自南朝梁陶弘景。此人聪明绝顶,实际上受道教的影响颇深,精通医学星相等方技。一度曾被萧道成重用。后即隐居茅山。梁武帝即位,对之极尊重,国家大事,必派专人前来征询,故有“山中宰相”之称。物质上之供应应有尽有,享受无异公侯。所以他也始终不出山就任官职,因为高官显爵的待遇他都有了,隐居在山,又可以避免礼仪上的朝拜迎送,也不介入复杂的人事纠纷,当然比真的担任宰相轻松愉快。

他有一首五言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朵白

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可以说很流畅自然，也表白了一无所求的高洁心态。实际上陶弘景并不如此高洁，因为他可能得到的一切都已得到，所以故作高洁姿态而已。相比之下，借用陶弘景此典故的倪瓒情况与陶弘景完全不同，他是放弃了一切物质享受而隐居山林的，心怀比陶弘景高洁得多了。

从这一曲子我们可以对倪瓒的心态历程作一番考察，他最初或多或少有些民族观念在起作用，隐居多年之后，心态有了调整，逐步转变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士了。所以才会有惊叹：“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四、张 养 浩

白朴与倪瓒是终身未出仕的隐士，由于身处不同历史时期，感受各不相同。家庭出身亦各异，白朴穷困潦倒，倪瓒家道素封，极为优裕，晚年甚至散财济贫。他们在散曲中表露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明他们隐居的动机也存在着差别。较常见的一种隐士则是功成身退或饱受宦海风波之后终于改变生活态度的文人，当然情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是看透了官场内幕，有人觉得真要经国济民并非一件容易办的事。元代中叶的张养浩，历任各级官员，最后曾进入政权核心，经历丰富之至。晚年隐居甚久，这一时期也创作了大量散曲，较著名者有：

〔中吕〕普天乐

折腰惭，迎尘拜，槐根梦觉，苦尽甘来。花也喜欢，山也相爱，万古

东篱天留在，做高人轮到吾侪。山妻稚子，团栾笑语，其乐无涯。

〔中吕〕普天乐

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明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

〔中吕〕普天乐

好田园，佳山水。闲中真乐，几个人知？自在身，从吟醉。一片闲云无拘系，说神仙恰是真的。任鸡虫失得，夔蚿多寡，鹏鹖高低。

最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是“做高人轮到吾侪”，堪称神来之笔，历代隐士也许有过类似心态，却没有能如此传神地表达出来。可见他打算隐居已经有一定时间，却未有机会，现在得遂所愿，快慰非同一般。“轮到吾侪”，乃是非常渴望之际，终于“轮到”的感受。因此，“其乐无涯”，也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话。

“折腰惭，迎尘拜”，使用了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高适为“迎拜长官心欲碎”两个典故，说明辞官归隐的动机或原因，应该说还丝毫没有接触为官的尖锐矛盾，在种种权力争夺中的为难，在一大堆矛盾中的难以自处，这里一字未提，只提了一个十分表面的问题。而这一点，在官场之外，人人都看得到，并非内幕也。正因为，轮到做高人，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良好感觉之下，花是平时的花，山是平时的山，由于感情的移入，于是他觉得“花也喜欢，山也相爱”，他进入了自作多情的境界。整篇作品告诉读者，作者“久在樊笼里”，已经“复得返自然”了。不禁，也为他高兴。

接着,第二个曲子,作者情不自禁,吐露了些许苦闷。“楚《离骚》,谁能解?”并不是要找一位精通《离骚》的楚辞专家来讲解一番,而是认为《离骚》所倾诉的痛苦,没有人能为之解决的。当然,屈原也好,楚怀王也好,早已化为陈迹。张养浩实际上以自己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困难所产生的困惑比喻之为《离骚》,自己无法解决,只能逃避矛盾,而用不了了之的办法退到矛盾圈之外。当然,矛盾并未解决,仍旧在那里。

屈原的遭谗而行吟津畔,最后自沉于江。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之无限崇敬而同情。张养浩未必不崇敬,未必不同情,他却认为屈原的沉江是“胡来”,我们不能单纯从字面上讲解,这是张养浩的激愤之情的迸发。也就是说,张养浩实际上是说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值得歌颂,但沉江而死,对楚国的昏君奸臣的倒行逆施起不了任何作用,对老百姓,也无任何益处。话说说容易,实际是为自己的归隐原因交了一份文不对题的答案而已。因为归隐,对他个人来说也未尝不是比较聪明的选择。此处的“其乐无涯”,显然言不由衷,因为“狂歌痛饮”时,并不是“苦尽甘来”,而是“恨尚在”。

为什么同是“其乐无涯”,内涵却有差别,因为第一曲仅就个人而言,卸职归隐,当然是解脱。第二曲联系到屈原的忧国忧民,则归隐无异鸵鸟将头伸进树丛,对客观的现实不能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所以很难“乐”起来,更不用说“其乐无涯”了。

第三曲似乎又回到了第一曲的境界,回到了作者个人的小天地。面对“好田园,佳山水”,感到“闲中真乐”。而且认为这种乐趣,别人不一定能领会。所以发出“几个人知”的疑问。

此时,他不再思考“恨尚存,人何在?”而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自我安慰。不再斤斤计较鸡虫的得失,认为夔一足,蛇多足,又怎样?认为鲲鹏一

飞几万里，鸚雀只能蓬蒿中展翅，也无所谓。这一切，从个人看来，当然不必放在心上，不必去多想。张养浩是否真的能够超脱到这种程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从他晚年终于被敦请而再度出山，以过于劳累而死于任上这一点看，他这一曲所反映的超脱并不是太真实，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忘情于现实世界也。

五、余 论

无论就元代隐士而言，或元代散曲创作而言，白朴、倪瓚、张养浩三人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们之所以隐居而不出仕，或一度出仕而后隐居，都各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如果一概用出世思想下结论，也有简单化的欠缺。我试图作初步的剖析，当然，也只是在作尝试。过去，曾经认为散曲的题材太狭窄，除了男女爱情之外，主要就是隐居的所谓“乐趣”，现在想想，主要是自己无知、幼稚，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剧烈动荡的时代里，男女的生离死别、文人的走投无路当然是最现实、最引起心灵震颤的事情。散曲创作的题材或主题往往向这两方面倾斜，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元代隐士之所以归隐与秦汉魏晋以来的隐士之所以归隐原因虽然基本上相似，但仍有一定差异，或多或少有一点“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亦即民族矛盾的因素在内。在唐诗、宋词之中，吟咏隐居的仅是极少数，而在元曲中就占了较大的比例，这是客观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重视，进行认真的研究。

古代有许多隐士都是有职业的，因为他们既不做官，生计生活问题仍要解决，所以有大隐隐于朝之说，韩康隐于药，严遵隐于卜，也都赖以衣食。

那末，元代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以为关汉卿很可能是隐于勾栏的一位隐士。首先在金人、元人的统治之下，他以“汉卿”为名还不算，所著历史剧以三国题材最多，无不竭力歌颂蜀汉的君臣，《关张双赴西蜀梦》则特别歌颂“汉家节”。这两点联系起来看，此人对南宋未能忘情，因此南宋被灭之后，他再不求仕进，于是寄身勾栏厮混了。

本来，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缺乏证据。再看他的《〔南吕〕一枝花 不伏老》，尤其〔梁州〕：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
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搨竹，打马，藏阄。画五音六律涓熟。甚
闲愁到我心头……

还有〔尾〕：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儿歹征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我认为这是一个生活阅历非常丰富多彩的人，到了老年，所作的自我解嘲。凡是真正在烟花路上迷途不返、以醇酒妇人进行慢性自杀的人反而不会这样坚决表态的。

众所周知，铜豌豆是勾栏对老狎客的通称，关汉卿自称铜豌豆，那是文字游戏。那个时代，倡优不分，关汉卿为朱帘秀等人编杂剧，以供演唱，他

也成了勾栏中的一分子，却并非狎客也。曲子里，关汉卿自夸琴、棋、书、画、诗、酒、花无不在行，而且还能分茶、打马、蹴鞠等等，这也决非一般狎客或花花公子的纨绔子弟所能办到。不仅要有文化底蕴，也要有时间去练习、提高，否则，你一样都玩不来。我们知道，明末清初的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也曾自夸精通多种技艺，《陶庵梦忆》那些记载技艺的文字非常到位，证实了张岱确实精通。但张岱在明末是豪门公子，钟鸣鼎食之家长大的。如果关汉卿一直在勾栏中厮混成长，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诸般技艺，更不用说能到精通的地步了。关汉卿虽然没有类乎《陶庵梦忆》这种书流传下来，但是他流传下来的《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玉镜台》等剧，也足以说明他对诸般技艺的精通和见多识广了。

关汉卿写了大量杂剧、散曲，文学修养之高、文字功夫之深，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他投奔朝廷，得一官半职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选择了依靠勾栏糊口这一条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关汉卿的籍贯是个谜，他的生平也是个谜，我想，这是他有意把一生经历隐瞒掉了。他的经历永远不会弄清楚了，内容既有可能比较平淡，也不能排除他本人或其父兄家属有抗金或抗元的行动。

生平事迹不详的元散曲作家，也有涉及归隐田园的题材的。即使关汉卿不是隐于勾栏的散曲作家，隐于药、隐于卜等等行业的总还会有。所以我认为元代隐士大致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当然，有的隐士既没有写过散曲，也没有写过其他文学作品，我们进行研究就比较困难了。

易堂九子的群体隐居剖析

一

曾经有过这样的论点，说明代之亡亡于士大夫之无耻，并且列举洪承畴、钱谦益、龚鼎孳诸人之投靠清代而成为新贵为事例以证明。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如此立论，显然非常偏颇，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合。因为明清易代之际，黄淳耀、侯峒曾、吴日生、孙奇逢、恽日初、钱肃乐、万元吉、杨廷麟、瞿式耜、张同敞等知名官员、学者都曾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清斗争，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身殉国的。

还有一部分士大夫，曾以不同程度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之后，迫于形势，就闭门授徒，或潜心讲学，清廷千方百计想予以拉拢，始终被坚决拒绝。由于他们的道德文章素为海内所钦仰，清廷也没有敢把他们逮捕斩首，而只是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当然没有担任清廷的任何官职，游历、讲学、著述等社会活动则不少，知名度很高，把他们归纳进隐士群体之内，显然是不妥当的。

较多的官员、文人虽未参加抗清斗争，但是为了反对“雍发”，遭到杀害的也不少。也有人勉强忍受了“雍发”，却始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官职，实在无法可想，则逃进深山老林了。也有人为了摆脱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扰，于是皈依了佛教或道教，并不是对佛教或道教的教义有什么独得的

感悟,乃是一种对付政治干扰的策略。像这一类人是否属于隐士的范畴,很难说,应该说在两可之间。

清代入关以前,虽然仍是游牧民族统治,却在历次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与明朝廷有较多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化上的影响。因此,取得政权之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远远超过元代。具体的做法是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很快地恢复了明代的科举制度,让文人有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出路,所任用的汉族官僚极多,有的而且予以高官厚禄。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私下修纂明史者一律处以极刑,而且株连甚众。其目的则是一个,要求文人都为其政权服务。

众所周知,明代的科举制度还是比较严格执行的,在嘉靖之前,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培养出一大批文人。固然考试的形式与内容存在问题,八股文对文人的思想是一种束缚,但后来兼考策论,却是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而且,不管八股文如何公式概念化,其提倡儒学的“夷夏之大防”、“君臣之大义”则始终是其核心,日积月累,其作用不容低估。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隐士之多使统治者为之十分烦恼是必然的。

清代初年有一大批文人坚决不与朝廷合作,任何形式的征召、聘用都不接受,如陕西周至人李容等就属于这一类。李容父名李可从,崇祯年间随军与李自成部交战阵亡,时李容仅十六岁,家境贫困,乃发愤死读经史子集而成名,成为宋代张载以后最负盛名的大学者。他十分强调“(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从他的言论、行动来看,显然把他自己的进退、出处认为是攸关“人心之邪正”、“学术之晦明”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全祖望《二曲先生(李容)窆石文》:“当事慕先生名,踵门求见,力辞不

得，则一见之，终不报谒，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复见。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却，先生得无已甚？’答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当事请主讲关中讲院，先生方谋为冯恭定公设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铁，不足铸此错也。’亟去之。陕抚白君欲荐之，哀吁得免。陕学许君，欲进其所著书，亦不可。”所谓“当事”，既然有决定关中书院讲习的权力，最低亦达到知县的级别。陕西巡抚要向朝廷推荐，他恳求得免。陕西提学使要把他的著作向朝廷推荐，他也不同意，可见他宁死不出山为官的决心十分坚定。

因为他的名声已经传播在外，所以全祖望此文又说：“癸丑，陕督鄂君竟以隐逸荐。”总督比巡抚又高一级，乃是具有钦差大臣身份的级别最高的地方官，而且正式把李容列为隐逸推荐，那比一般的推荐又更隆重。李容仍不接受，而且“辞牋八上”，理由是患病，朝廷的批示是“俟病愈，敦促入京”。后来，情况日趋紧迫，先是“大吏岁岁来问起居，欲具车马送使觐天子”，接着“戊午，部臣以海内真儒荐，复得旨召对”，显然重视的程度超过了一般隐逸。因为朝廷根据“大吏”的汇报，已决定予以重用。李容绝粒以明其心迹，“大吏”仍执意孤行，“先生拔刀自刎”，众官员用“予假治疾”的说法暂时化解了此事。直到康熙南巡至西安，李容再一次被注意，陕西总督传旨召见，仍被李容称病而婉言拒绝。事情成了僵局，康熙皇帝“特赐‘关中大儒’四字以宠之”，勉强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

像李容这样再三再四坚决不出山为官的文人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

大批。山西的傅山(傅青主)坚决拒绝朝廷招揽的事迹也十分令人感动。我现在要加以评介的是相当特殊的魏禧。他是明清易代之际另一代表性人物,魏禧,江西宁都人,早年以文名,他自谓近似夏允彝、陈子龙,可见他实际上以民族思想作为衡量文章的主要标准了。康熙十七年,严沆诸人以博学鸿儒推荐,他称病悬辞,被迫至南昌时,他蒙被而睡,以病危为由被放归。他写给徐叔亨的信中说:“士生斯世,阳气孤微,如败柱、朽楹、榱栋欲下,使非得一二刚确不挠之夫相与枝柱,则大厦瓦解,人无所庇。”可以认为他是对扶植天地正气的社会责任的自我确认。

魏禧自明亡之后,隐居人迹罕至的翠微峰,潜心古文研读,颇得唐宋诸大家精神,又与同辈彭士望、邱维屏等探讨《易经》,思维之深邃往往超越其所处之时代。因为人作碑传甚多,因此人虽处翠微峰中,朝市亦无不知魏禧其人矣!此时此刻,魏禧又不甘长期闭塞于山林,欲结识天下之奇士奇才,于是遨游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通都大邑。高官巨富对之均有结识招揽之心,就魏禧来说,当然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所幸魏禧始终未为任何权贵所动摇,以布衣终老一生而不悔。其坚持不入仕途之经历与李容有相同之处,亦有较多不同之处。其《与门人熊养及》信谓:“古人隐居负高名,一涉仕途,则谈者失望。”正是他的深刻体会,也可以说是他对以往隐士不能确保晚节的一种遗憾。

一般人往往用出世、入世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认识文人的隐居、仕进,总的情况也确是如此,但对魏禧来说,具体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居住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翠微峰中,当然是隐居。但是,他没有纠集民间武装,重新树起抗清大旗,也没有对任何抗清组织提供物质的帮助,甚至,也没有准备私修一部《明史》。他只是如饥似渴地诵读经、史、子、集,并写作

了一大批文章。这一大批文章之中，只有极少数是应人请托的谀墓之作，基本上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或逻辑严密，或详征博引，或形象生动，所以成为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了。

他晚年开始游历生涯时，已经是位古文大家了，但是他仍要出来寻访天下的奇才奇士，增长一番见识。单就这一点，可以看到他的隐居，并不是简单的出世，而是通过著作，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古代英雄的崇高思想，从各方面确认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清廷的统治没有感觉到魏禧的言行产生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也就只能容忍了。魏禧当然是在慎重考虑后，作出这种选择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魏禧的言行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世道人心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三

古代文人经常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则处世，魏禧在隐居、游历的生涯中，虽然没有集结力量，成立什么武装组织，或拥立某一位明室后裔，却仍旧非常关心时局，并且有意无意之间散播他的学术思想、文学观点，寻求意气相投的民间隐逸，相互切磋。更可贵的是他也没有像某些文人那样以醇酒妇人自我麻醉而沉沦，应该说魏禧的处世仍旧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魏禧隐居在翠微峰时，与之同时在翠微峰中研讨学术者，主要有九人，他们对《易经》甚感兴趣，所以被称之为易堂九子，包括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以及魏禧本人及其兄魏祥、其弟魏礼。

彭士望少年时代，就“立义声于天下”，“于是感慨激昂，连类旁及，輟辍

古今，呼天抢地而不能自忍”。像这样一位正义感非常强烈，而文章又写得气势充沛、慷慨激昂的同乡，魏禧刚开始结交，就仰慕之至。最有趣的是这两位隐士彼此都以知音自许，但涉及学术中的某些问题或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又各执一词，而发生剧烈的争辩，甚至彼此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进而说些、写些出格的话，好在因为秉性淳朴，争辩的发生与任何个人利益无关，所以稍过时日，又和好如初了。彭士望一生穷困，却并未动摇过隐居的决心。六十多岁时，“比游楚，阻兵不得归。或以高官达爵饵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可见他是如何坚守气节的，宁可穷困到极点，决不出任官职。魏禧说：“易堂诸子咸谓先生得出处之正。”也就是说他们这一群体的全部成员都钦佩彭士望的做法，认为非常正确。

易堂九子另一主要人物为传奇色彩颇浓的林时益。我们只知道八大山人朱耷是朱明皇朝宗室、宁王朱权的后裔，其实宁王的后裔到了明末已经繁衍得很多。有朱中尉，字議霧其人，从小就聪慧出众，稍长，结交方外异人，颇有壮心宏图，历经甲申、乙酉巨变，经过与彭士望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决定进入宁都翠微峰，也成了易堂的主干人物。就在此时，他可能感到不愿再保留明室后裔的身份，或是感到要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改姓为林，名时益，而号确斋。

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一变而为靠男耕女织糊口，乃是非同寻常的剧烈巨变，其思想也有了非同寻常的感悟。林确斋有一点和张岱相似，张岱在明亡后走入大山，甘于贫困，写了散文杰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录》与明史《石匱书后集》，他虽未从事抗清活动，但迄未投奔新朝，其著作则仍能激发读者对故国之怀念。林时益诗文未能有巨大影响，但能很快地适应“不力耕不得食也”的局面，于是“率妻子徒冠石，种茶”，“使终身无所求于人”。

而且他种的茶，是花工夫作了研究与改进所以甚有特点，稍久，远近皆闻名，称之为“林茶”，这也是很不容易完成这一次生命历程中的急转弯的。

当然林时益的诗也有一定造诣，魏禧则为他吟咏了许多诗篇，如《林确斋四十又一诗以赠之》：“君家初来时，横舟长桥侧。甫闻及晨兴，披衣走沙碛。蓬头面未曠，坐君相盤辟，遂庐翠微峰，八载共晨夕，患难生饥寒，君乃迁冠石。辍锄过水庄，澹然心相得。”可知林时益作为明室后裔，对明代之亡，自然会比一般人更痛苦、更震动，但他还是尽可能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还保持了平静的心态。

邱维屏乃另一类型之奇人，生性好学，不能料理生计。魏禧之父对之极为赏识，花了许多产业的陪嫁，把女儿许配他为妻。他成了魏禧的姐夫，彼此之间的交往就更密切了。而实际上，邱维屏比魏禧长十多岁，魏禧的古文，还是师从邱维屏学的，应该是他的古文开蒙师。所以他有一次给邱维屏的信中说：“近次生平古文，弟初无知识，自丁亥后，皆受教先生。”对这位姐夫十分恭敬，但是，性格都过分直率，有时也发生激动的争辩。

二十三岁那年，邱维屏县试以第一名登科，侯峒曾为督学，对他的文章评价甚高。明亡，他决计中止科举，随即隐居翠微峰。有人认为他唾手可得乡试榜首，魏禧认为他中进士也不成问题。在山中，湫隘的居室、破旧的衣衫，都安之若素，仿佛和从前并无任何不同之处。

邱维屏不仅文章能直追汉唐大家，而且精通《易经》。尤其对西方的数学亦有深的造诣。当时桐城方以智以数学称著，明亡后已出家为僧，到翠微峰与之理论数学，称之为神人。

魏禧写给邱维屏许多信，都表示了钦佩之心。甚至说：“弟尝谓其文是而人非者，不足叙；其人是而文非，不足叙也；文与人是矣，非其中心所乐

道,不足叙也;中心乐道之,而不能知其甘苦曲折之故,亦不足叙。先生于是数者则兼有之,弟不能不以属先生。”可见其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也。

李腾蛟在易堂九子中年龄最长,其他诸人都把他作为兄长那样尊重。改朝换代前后,家庭中曾发生令他悲痛欲绝的惨剧。入清,毅然抛弃诸生学籍,不再参加科考。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不应该穿著的衣服绝对不穿,不应该接见的人绝对不见,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李腾蛟有《咏史诗》多首,内容以吟咏春秋战国时事件与人物为主,但与隐居有关的也有,如“中散好箕踞,委身如蝉蛻。向秀註南华,六经不置喙。刘伶有酒癖,礼法多违背。司徒握牙筹,实为贪鄙最。步兵执母丧,放诞敢沉醉。其流殆阿咸,重腿追姑婢。矫矫山巨源,真足超流辈。”那是对竹林七贤的评价。又如:“韩康曾贩药,梁鸿曾牧豕。西蜀严君平,卖卜成都市。所业岂不卑,免为世所指。陆生入洛阳,栩栩矜名士。作督建高牙,受制于鼠子。”对李腾蛟来说,即使不“受制于鼠子”,他也不可能出仕的,因为他不愿做清朝的任何官吏也。

受了李腾蛟《咏史诗》的影响,魏禧也写了一组《咏史诗》,也有一首是写的竹林七贤,也对山涛评价最高。其他的内容则各有不同之处,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易堂诸人逝世,均引发尚健在者之无限伤感,唯被魏禧等认为“有令节笃行”,应“私为之谥”的则仅李腾蛟一人,而且也真的“私谥曰贞惠先生”了,可见受尊敬之程度非同一般。

易堂九子最核心之人物为魏禧,而彭士望、林时益、邱维屏、李腾蛟四人之言行在此已作了简要的介绍,此外彭任、曾灿、魏祥、魏礼也均各有其独立特行,他们均恪守气节,甘愿“病废山林”,所以情意相投,走到了一起。

四

我们知道，隐士的基本生活是离群索居，唐代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就描绘出了这一情景，因为社会活动一展开，频繁的来客对平静生活造成了干扰，更会动摇隐士隐居的信念。到更进一步，发展到高级官员前来敦请、或皇帝下诏书命令进京等一系列后果，引起种种麻烦。

历史上也发生过有形无形的隐士群体，例如晋代的竹林七贤、浔阳三隐、莲社十八高贤等等。竹林七贤名声极大，究其实际，他们基本上都担任过朝廷官职，而且对当时统治者的态度也各有不同，诸如向秀、王戎、山涛都公开投奔了司马氏，阮籍不满朝廷，也不敢有露骨表示，主要以纵酒佯狂打发日子，嵇康孤高自赏，不肯隐瞒自己的观点，终于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只是偶尔在竹林中聚会，饮酒赋诗，抚琴长啸，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只是一种招摇的作秀也。晋末，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隐居之地均在浔阳一带，故称浔阳三隐，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又此时高僧慧远主持庐山东林寺，掘地种白莲。道行高超，信徒僧、俗达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十八人知名度最高，称十八高贤。但并无组织形式，完全松散自流，并非一个实体，不过这样说说而已。

我们再看易堂九子，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研究《易经》的学术群体，然而却和历史上任何一个隐士群体或学术群体不同，从下列诸方面可以看出来：

魏禧《彭躬庵集序》说：“而躬庵一见予，遂定交，同确斋徒家相就。”《彭躬庵七十序》：“初，先生以福清林退庵言知予，立谈定交，决计与朱用霖携

妻子相就。”我们知道这林确斋与朱用霖实际就是同一人。也就是说，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林确斋二人投奔魏禧时并不是单身一个人，而是两个家庭都搬迁到了翠微峰，从此就在一起生活了。《朱中尉传》称：“及迁宁都，士望尝游四方，中尉以病多家居，并督二家事。”可见彭士望外出多年，家庭中柴米油盐诸事都是朱中尉（林确斋）为之筹措的。

林确斋又一次搬迁到冠石去种茶，以解决山居生活的衣食，这冠石显然还是在翠微峰的范围之内，而且虽是林确斋的决定，经过大家的商量也是不言而喻的。他所种的茶要成为货币，要转换成为其他日用品，买卖这一番过程是免不了的，有时易堂九子的其他成员也出去销售。魏禧有《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辛丑夏卖茶黎川，大兄、二兄所作赠遗，人见者甚众。”可见是魏禧、林确斋一同前往的，而且在卖茶的同时，又与桐城方家兄弟进行了文章的交流。魏禧《同彭躬庵南下，躬庵以卖茶登路怅然成诗》，说明了那一次彭士望的南方之行，还负有卖茶的任务，甚至可能是专门去推销他们在冠石所种的茶叶的。

至于邱维屏，本来就是不会处理家务的人，成为魏禧的姐夫之后，一切都由魏禧的姐姐安排了。当然一直处在穷困之中，但能够生存下来，魏家的照顾、易堂九子其他成员的照顾当然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翠微峰记》：“予同伯兄、季弟大资其修凿费，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渐致远近之贤者，先后附焉。”这翠微峰四面都如刀削一般，无路可上，而且高达百丈以上，所以自古以来无登临者，魏氏三兄弟因为要找与世隔绝的地方才发现了翠微峰，于是又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必要的道路，并在山间开辟了若干平坝，盖了一批房子。这为易堂九子这一隐居群体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花的人力、物力，据说是“二千石”，也很可

观了。

易堂九子的群体隐居基本上是整个家庭都集中到了翠微峰或附近的深山,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为了生计,为了寻访天下的奇才奇士,他们也一再走出翠微峰,如魏禧本人,隐居到三十九岁,开始游历,五十七岁卒于仪征游途中,从未改变不入仕途之初衷。魏禧之弟魏礼,自父母亡故后,游历闽粤、海南、中原诸名山,晚年仍回翠微峰,许多官员请他担任幕宾,坚决谢绝,以六十六岁,病逝于山中。

彭士望曾游楚,高官拟招揽,逃亡而去。七十岁回翠微峰,七十四岁病逝。李腾蛟后从翠微峰移居三献峰,终未出山,六十岁卒于山中。林确斋种茶力耕,晚年好禅,素食念经,六十一岁死于山中。彭任初隐三献峰,后归翠微峰,曾往南峰之程山拜谒友人谢文游、甘凉,始终未离翠微峰。曾灿于旅游途中卒于北京。

像这样一个长时期群体隐居的集体,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无微不至,上及双亲,下及子女,与亲属无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除清初的易堂九子之外,再无他例了。

五

和历史上所有的隐士、隐士群体的另一不同之处是他们在隐居的同时,还经常走出大山去游历,并不是探幽访古,而是寻找奇人奇士。魏禧这方面的经历尤其丰富。到苏州,他访晤了徐枋和金俊明。徐枋,字昭法,崇祯年间举人。其父子在清兵破苏州时自尽,徐枋隐居终身,不入城市,以书画文史自娱,均有卓越成就。汤斌出任江南巡抚,敬慕其为人,两次进山求

见，徐枋始终回避不见。史学著作有《二十一史文汇》、《通鉴纪事类聚》等。因甲申三月十九日为北京被攻陷之时日，于是每年三月十九日必焚香而向北跪拜哭泣。朱彝尊说：“以孝廉而高隐者，吴越间其人不少。而始终裹足不进城市者，惟吾郡李潜夫（孔昭）、巢端明及吴中徐昭法而已，此外未有所见。”一般文人、隐士希望与之见面，都被婉言拒绝了。平时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巢端明）有些来往。对于魏禧的到来，他不仅欣然接待，而且畅谈竟日，依依惜别。金俊明，字孝章，原为复社成员，甲申后不再科考，擅金石书画，贩夫走卒求之，慷慨给予。文武官员则一概回绝。始终未应朝廷征辟、官府招揽。魏禧到杭州，见到名士汪汾很不容易。最初汪曾报之以闭门羹，魏禧修书自我介绍，并表示仰慕心切，行踪莫测之汪汾乃成为他的莫逆之交。汪汾为明崇祯年间举人，明亡，即入山，不复科考。对富贵利禄毫不经心，时人号曰汪冷。魏禧曾为之作《高士汪汾传》，推崇备至。魏祥对此传有点评：“写高士行径，如云中神龙，现没无端，真写生之文也。叔兄尝谓予曰：‘汪先生藉令不遭变革，自是风尘外人，于世之志士高人又进一格。’”这是说，汪汾的隐居固有民族思想的因素，但此人不愿受世俗任何局限，放浪于山野乃是必然的。魏禧于乍浦结识李天植，即海内无不敬仰之李潜夫先生。正如魏禧《与周青士书》所说：“（其人）甲申、乙酉以来，秃顶披缁衣，二十七年不见人。”他们相见，因李天植年迈耳聋，于是彼此用墨笔书写相酬答。魏禧对李天植的清苦甘于贫穷，印象极深，多年之后，还在《与周青士书》跋文中说：“予且痛且愧，真浅之为丈夫也。”在昆山，结识了《万古愁》作者归庄。这几位确是奇才奇士，而且都是民族思想相当强烈的人。

魏禧曾畅游名山大川，冒了极大危险登华山访问高士彭荆，据说比韩

愈痛哭之处还要高出十里。

彭任曾往南丰之程山拜访谢文游、甘凉。谢文游初入广昌香山，读经有感悟。随即攻王阳明著作，久之，似已接近乐地境地。在南丰程山讲学，并有《程山十则》，对讲学要旨作具体规定。时有星子人宋之盛，原为举人，明亡后不入城市，讲学髻山。慕谢文游之道德文章，约易堂之魏禧、彭任往程山会讲，一时之间，程山几乎成了经义学术的研究重心。甘凉，号健斋，谢文游之门生。此人曾评点魏禧《翠微峰记》曰：“写登山处，文中有画。”魏禧曾为甘凉所著《轴园稿》作《叙》，称他：“甘子少而多才，风流跳荡，善歌曲，至不嫌以身试优伶。”可见其为人不拘小节。后来饱经沧桑，“至于学道而后加意于文章。其为人甚奇，其文当必有倜傥超拔不可羁絏之气。”评价也是很高的。

彭士望、邱维屏也多次出山游历，寻访奇才奇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奇才奇士，而是指的坚持民族气节而又有真才实学的文人。看看天下大势，看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经过沧桑巨变是否还存在。他们的接触交流自然也涉及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当然主要还是互相激励、互相安慰，以及在物质上的互相帮助。一个隐居群体，如此热衷于游历，乍听似乎不可理解，知道了他们游历活动的具体内容，那就完全明白活动的性质了。

六

清初康熙年间文字狱多起，株连甚广，有的要灭九族。这些情况，魏禧他们当然知道，所以他们的言论十分谨慎，公开发表的文章涉及民族矛盾的尽量隐晦，而是突出为人处世，或者文章的修辞、结构等方面。在他们这

一群体之中，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而在当时，像魏禧这样的隐士、像易堂九子这样的群体隐居也比较普遍，应该说朝廷始终是在密切注意着的。要一一镇压，那也没有这么多人手。既然没有公开组织武装抗清，也就采取了容忍的办法。当然，也曾经对其中某些成员以高官厚爵招揽过，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就没有再采取其他手段，因为官府也知道这批遗民意志很坚决，动摇不了的。

魏禧以及彭士望、邱维屏诸人的行动和言论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四库全书》不收魏禧的文集，正好说明这部文集的思想光辉。魏禧写了许多史论，十分精辟。彭士望、邱维屏等也不乏佳作。我们现在至多提到魏禧的《大铁椎传》，这篇绘声绘影的短篇速写，当然不可多得，但显然不能代表魏禧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所起的重大影响也。

假隐士与《北山移文》

南北朝时，阮孝绪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梁武帝天监（502—519），分为三篇（编），“言行超越，名氏勿传”者为上篇；“始终不挠，姓名可录”者为中篇；“挂冠入世，栖心尘表”者为下篇。我觉得他的分类标准有一定的道理。真正的隐士对名利一无所求，人们往往不知其姓氏，如古代的巢父、荷蓑丈人，如明末清初的纸衣翁、卖菜佣，人们只能用他们的生活起居方面的某些特点作为称谓了。列入上篇，自然很恰当。还有些人，不管朝廷给予何种高官厚禄，或者大臣亲自登门造访，请求出山，他们始终不为所动，在野终其一生。可见其隐居自有思想上之因素，难以改变。与“挂冠入世，栖心尘表”者当然有不同之处。又据《南史·何尚之传》，袁淑著《真隐传》，所收者皆“有迹无名”者，也就是说，在袁淑心目中，只有那些“有迹无名”者能称作真正的隐士了。

本来，在山野做隐士、在朝廷任官员，是一清二楚的事情，但是隐居既有“高尚其志”的美名，后来就产生了许多称谓上的混乱。《晋书·刘桢传》中有“隐之为道，朝亦可隐”的说法，当然属于诡辩，开了恶劣的先例。《南史·王僧祐传》：“为从元俭所重，不尚繁华，亭然独立。高帝谓王俭曰：‘卿从可谓朝隐。’”答曰：“臣从非敢妄同高人，真是爱闲多病耳。”齐高帝萧道成（427—452）有点文化，自命风雅，也玩起文字游戏来，称王僧祐为“朝隐”了。

到了唐代，浮夸的风气日甚一日，元稹的岳父韦夏卿是一品当朝的显贵，晚年罢归，居然把住所题名“大隐洞”，可谓恬不知耻。既要高官的厚禄，仍想兼得隐士的美名，也太贪婪了。

南唐李后主李煜(937—978)乃是不理政事的写词名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免俗。据沈括《梦溪笔谈》，李煜有不少书画作品，所题下款无姓名，而是“钟隐”二字。而且在背面还题上“钟隐笔”三字。“或云后主自号钟山隐者”，位居一国帝皇之尊而称隐者，倒不是风雅的问题，对国家、社稷、臣民之不负责任于此可见矣。

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末桓玄篡位时，为了造成野无遗贤的假象，命《高士传》作者皇甫谧之六世孙皇甫希之伪装隐士，然后诏召为著作郎。使固辞不就，再下诏旌礼，号称高士。此滑稽剧瞒不过众人耳目，引以为笑柄，称皇甫希之为“充隐”，充者，假以乱真也。

再说，我们已经提到过南北朝梁武帝时的陶弘景(456—536)，他要隐居任何名山，都有选择余地，他却选择句容的茅山。当时梁的京都为建康，今南京，而茅山离南京非常近，骏马很快就能到达。就这样，梁武帝萧衍(464—549)始终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陶弘景可以为军政大计多多出谋献策，同时取得丰厚的物质享受，所以被称为山中宰相。

五代十国时，有冯道(882—954)其人，先后任后唐、后晋之宰相，契丹之太傅，后汉之太师、中书令。历事五姓而恬不知耻，自号长乐老。士人之气节，荡然无存，历来为史学家所不齿。当然，此人对于古代之出版、印刷技术还是有一定贡献的。明代万历年间思想家李贽却认为冯道的行为属于“吏隐”，赞同此说者殊属寥寥。

隐居在京都附近的名山，实际上是欲盖弥彰的拙劣手法。唐代定都长

安，长安南郊的终南山就热闹了起来，许多和大官们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道教徒，后来被称为八仙成员的汉钟离、吕洞宾都住过终南山。唐玄宗（685—762）时，卢藏用就隐居在此，并千方百计通过公卿百官为之造舆论，后来果然被召而重用。隐士司马承祯曾被召进京，他无意久留。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地回答道：“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从此留下了“终南捷径”这一成语，揭示了假隐士的丑陋面目。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草野时，与严光十分友好，他起兵战败王莽后登上了皇位，仍不忘严光的才华，请严光进京，打算给予高官。严光对名利一无所求，仍旧回到故乡，在富春江畔与清风明月作伴，有时则垂钓一番。此人深为故乡父老所敬仰。朝廷官员也不敢怠慢，时问温暖。应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这种敬尊隐逸的风气又滋生了更多的假隐士。从记载看，许由、巢父以后许许多多隐士本来就良莠不齐，假隐居之名博取官爵利禄的不乏其人，自从严光开始，隐士受到朝野一致的重视，假隐士的层出不穷，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忿慨。

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便是揭露、讽刺假隐士周子的一篇奇文，作者以北山（钟山）山灵的口吻，对周子作了如下的数落：“欲将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似乎清高无比。一旦朝廷有意招揽，他立刻原形毕露。“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而且官瘾大发，“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周子走后，北山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云霞风雨对之各有其深沉的叹息或尖锐的批判。周子再回北山时，则遭到嘲弄、讽刺，狼狈而逃。从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世俗对假隐士的鄙视和厌恶。

《北山移文》与孔尚任

《北山移文》的作者孔稚珪是南朝齐武帝萧道成所重用之文人，历任南郡太守、太子詹事等职，生平写了不少诗文，广为流传的则是类乎游戏笔墨的《北山移文》，借用山灵的口吻，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假隐士冷嘲热讽，语言尖锐，也很风趣。他所讥讽的对象是周颙，但据《南齐书·周颙传》，此人并未在钟山隐居也。虽然如此，这篇文章却流传甚广，历经沧桑，始终受到重视。

本来绝大多数隐士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只有宋末元初的谢翱、郑思肖等遗民以及明末清初傅山、魏禧等遗民都以民族气节自励，坚持不出山，绝对不动摇。而大部分隐士或为生计，或为名利，或为保全自身与家庭，都在观望中静候机遇。这一类文人，对《北山移文》最为敏感，往往会作出这样那样的反应。

清初康熙年间的孔尚任(1648—1718)可能是思想上痛苦最多、行为上矛盾最突出的一个文人，身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当然知道“夷夏之大防”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之一，然而，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定，而文人除了“学而优则仕”之外，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所师从的父辈孔贞灿却是入清后不再应考的附生。孔尚任觉得应制诗、八股文是束缚思想、才华的桎梏。他在写给孔贞灿的信中说：“数日桎梏帖括，风流顿尽，西园松桂应作移文矣！”西园乃孔贞灿之号，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他陷入帖括中难以

自拔，老师家松桂也许要写“移文”讥讽他了。

孔稚珪《北山移文》主要嘲弄假作清高的假隐士，倒不是嘲弄单纯的热衷于名利的文人。孔尚任这样提《移文》并不是最确切，但说明了他对《北山移文》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也在无意之间暴露他内心深处既想作清高姿态又难忘名利的秘密，所以他自动和《北山移文》嘲弄的对象周顒对号入座了。

决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的孔尚任于康熙十七年(1678)参加了山东的乡试，结果却未能录取，那年回故乡曲阜，游东北郊的石门山，觉得风景优美，便决定在石门山定居下来，做隐士了。在这种情况下做隐士，当然和谢绝帝王的征聘而归隐性质完全不同，为乡举落第找一个遮羞的下场罢了。也就是说，他的隐居是无可奈何的举动，决不是已经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

孔尚任的参加乡试，本来就有一点委曲求全的心情，这并不是对他妄加猜测，他写《桃花扇》，有意不提侯方域的参加清朝科举中副榜一事，更何况他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呢？考官没有能体会康熙皇帝的怀柔政策，竟让孔尚任名落孙山。孔尚任的隐居也可以说是对清朝不满情绪的流露。不仅隐居，而且在石门山中写起《桃花扇》来，他的不满情绪要作一次尽情的宣泄，这事情非同小可。

他在石门山所写《告山灵文》，今所见者已残缺不全，但内容颇为丰富，隐晦曲折地表白了他的许多想法。首先，绝大多数隐士无论隐居什么名山，基本上都不写这一类诗文，是否真心隐居，一切看今后实际表现，山灵根本不可能为之掩盖什么，因为山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孔尚任始终在动摇中，想借此文表示一下隐居的决心。这种做法属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性质，欲盖弥彰，作用适得其反也。又一次说明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那些讽刺周顒的话使他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

他认为“住五岳者，譬之游朝市；住终南者，又似据津登垄焉”。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五岳或终南山隐居，当然很容易引起朝廷的注意，石门山相当偏僻，离开京城也远，风景又绝佳，既适宜隐居，又不至于很快被朝廷发现。写此文时，他仍旧缺乏自信，仍旧担心会被人视为《北山移文》斥责的对象周顒一类人物，故说：“俾居者安善其体，明哲其心，既不貽讥北山，又不……”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隐居石门山的第二年，清廷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朱彝尊、毛奇龄、尤侗等五十人被录取，分别授以翰林院侍读等职，孔尚任按捺不住了，放下隐居的清高姿态，典卖田地，捐了一名监生名额。出尔反尔，演出了一幕趣剧。

后来在御前讲经，受到康熙赏识，做了国子监博士，当然是一种殊荣。对于当年隐居石门山一事，回忆起来，难免惭愧，所以他的《与李季子》一信说：“大作凌唐轶汉，敕之石门峰头，山灵生色。但住山之人已出，捧读汗下，竟似移文矣！”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愧疚，坦率地说了出来。

但是，在他一生之中，这个复杂的经历，成了既无法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的症候。他仍想尽可能作些解释。《答端木庵》信中说：“盖极冷中自有热者，勿谓其终南山也；既热中自有冷者，勿谓其长安市也。”似乎在混淆出仕与隐居的界限，无非为自己辩解也。《北山移文》对所有意志不坚决的隐士与假隐士都起了一定的刺激、震动作用，孔尚任所受的刺激、震动比任何人都强烈、明显，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在诗、文、书信中了。

二 版 后 记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对我来说,也就是欢欣鼓舞的三十年。作为一个作者,六十六年前的旧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六十一年前的旧著《颜鲁公之书学》能在海峡两岸一而再、再而三四地重印出版,乃是无比的慰藉。当然我对开创这一全新局面的邓小平同志也怀着无限感激之情。《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的出版、流传经过如何?我做了一次回忆。

一

1941年1月,作为孤岛的上海,环境日趋恶劣,租界固然要稍稍自由一些,报章杂志仍旧能发表一些抗日的报道、言论,但日寇与汪伪的魔手时时伸进来,爱国人士的被绑架、被暗杀时有所闻。因此,青年们开始大批大批离开。目的地各有不同,有的去了解放区,有的去了大后方。

当时和我一直保持密切接触的是曾在左翼剧联工作的旅冈,即卢豫冬。他决定取道香港,先回广西贵县,这是他的故乡。我有堂兄蒋星德在重庆,具体工作单位不详。经过早些时的通信,他表示介绍工作没问题,于是我在旅冈离沪后半个月,也取道香港,去重庆了。我本来对国民党的统治并未抱多大幻想,但是所看到、听到的景象仍旧使我颇为失望。但是,既然来了,当然也只能先找个饭碗再说。在充分考虑了利弊得失之后,我觉

得进图书馆工作,多读些书,是唯一的选择。

蒋星德住、工作都在重庆近郊的南温泉附近的小温泉,那里只有两个单位,一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三处;一是中央政治学校,学校有规模相当大的图书馆,不知道能否进得去。图书馆归学校的教导处管,拜访了教导主任之后,却发生了意外的麻烦,那位主任听我谈起上海的话剧活动十分熟悉,希望我改变主意。学校正缺少一个导演,学生正在等导演到任,准备排戏呢。我说我的普通话不行,无法完成导演的重任。再三推托,总算到了图书馆,作分类编目的工作。工余之暇,我便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些线装书了。

回忆在孤岛上海时,我参加过好几个读书会,经常听讲座,经常和朋友在一起热烈讨论,而如今人到了万山丛中,潜心读古书,几乎成为一个隐士了。这样想着,自己感到既悲哀,也滑稽。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对古代的隐士产生了好奇心,把读书的重心放到了皇甫谧的《高士传》和《二十四史》的《隐逸传》这一方面。持续读了半年,发现隐士很值得研究,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我把读书摘记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先后整理出《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中国隐士类型的区分》、《中国隐士与中国绘画》、《中国隐士与中国诗歌》等篇,准备投寄杂志。当时中央政治学校兼设本科与专科,政治系本科三年级的周策纵中文、英文都很好,比我大两岁,平时经常在一起谈古诗、新诗。学校出版的杂志有四五种,唯一一本纯学术性的月刊《新认识》,名义上是郭博宣主编,他从旁协助。实际上郭不管,完全由他一手编发。他觉得我论隐士的几篇文章颇有见解,而且“五四”以来学术界都忽视了这个问题,所以连续刊发了几篇,我当然很高兴,考虑到

《新认识》的读者面比较狭小，于是又分别投寄给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苏寄庐主编）、中华书局的《新中华》（金兆梓主编），结果《东方杂志》既不退还也不发表，《新中华》不仅很快发表，而且和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等到我把这一系列文章写完，看看篇幅，已经可以出一本单行本时，征询了中华书局的意见，承蒙编辑部一口应允，并专门派一位编辑到小温泉来，当面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同时签订合同。还闹了一个笑话，起初编辑以为我是此书作者的儿子或弟弟，到最后才弄明白，我这个二十一岁的小青年就是作者本人。他觉得二十一岁的人写小说、写诗歌的不少，写关于中国文化史论的几乎没有，更何况写史学家也不太注意的古代隐士呢？

中华书局的工作效率很高，重庆当时经常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交付稿件之后，1943年出书了。此书的出版，使我与学校内外的学术界人士有经常的交流，但在图书馆内，反而受到某些人妒忌和排挤。

完成《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之后，自己觉得谈得不深不透，由于在哲学方面基础相当差，要深入探索存在困难，因此决定另行写作以资料的钩稽为主的著作，我从童年时代就临摹颜真卿的书法，编写一本《颜鲁公之书学》，介绍颜真卿书法的特点以及所有颜真卿碑帖流传至今的经过，成为我努力的方向，就没有再对中国隐士这个专题作任何工作了。1948年，我在《观察》杂志上看到梁漱溟先生的连载的论文《中国文化要义》，居然把我这本习作与柳诒徵、潘光旦诸大师的论著相提并论，而且确认中国隐士作为中国文化第十四个特点，我备受鼓舞。那时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进行，我也定不下心来，仔细研究这位前辈对我的批评，当然也不可能对此书作什么修改。中华书局迁回上海，又印了一次，纸张好多了，

印刷条件好了,书也美观了些。至于内容,丝毫没有改动或增补。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事先文艺处派同志和我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我交了一份自传,其主要内容是我的经历,当然也附带介绍了我1943年出版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以及1948年出版的《颜鲁公之书学》的内容。却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料到的事情,和我联系的同志本来是地下党党员,在写作方面也有所建树。他在我报到之时,十分严肃地叮嘱我,要认真地检查这两本书中所反映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却只能表示虚心接受。好就好在他没有具体指出书的何处有问题,也没有规定我检查的方式和时间。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在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工作期间,每天工作远远不止八小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了,我是重点之一,但仍旧没有联系到这两本书。

到了华东文化部,在吴强、伊兵两位具体领导之下,上下班都比较正常一些了。但是,评级定薪的事情他们两位都不过问,具体操作的同志找我谈话了:“评级定薪,主要是评干部的德、才。你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不能算学术著作,例如社文处一位郭同志,他写的书篇幅比你的书大,而且是郭沫若为他题写的书名,当然是学术著作。”我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两本书,而且是否学术著作竟看篇幅大小而定,看封面上书名是何人题写而定,这道理完全站不住。如果我提出不同意见,那我就是为自己的级别、工资闹情绪了,我只能一声不响。没有再叫我检

查这两本书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已经深自庆幸了。

“文革”十年，“四人帮”爪牙揪住《南包公海瑞》、《李世民与魏征》不放，仍旧没有提《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与《颜鲁公之书学》，估计他们也看不懂。

三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界的新鲜空气。极“左”思潮虽然不甘心退让，毕竟已经不能主宰一切了。

1988年，三联书店选取梁启超、钱穆等前辈专著八种，定为《近代名籍重刊》影印，我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也是其中之一，使我备受鼓舞。当时我手边已无1943年重庆的初版，只有一本1947年的上海版，是金性尧先生所赠，交给三联书店一位姓王的编辑，希望他影印之后能归还给我，后来却一直追索而无结果，据说已散失了。这事情使我留下了遗憾，也对不起金性尧先生。

因为从上海解放以后，我一直以写戏曲史论为主，很多人以为我是戏迷，别的不太喜欢，或者所知甚少。有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钱谷融先生、蒋孔阳先生同时问我：“《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你写的吗？”我说：“是啊！”他们似乎有些意外，我也无从解释起。解放后，我本来希望到考古工作岗位上去发掘、考证一番，没有想到在戏曲方面一呆就是大半辈子，再也没有能转业。即使退休后到大学里做兼职教授，也是讲戏曲史或《西厢记》、《桃花扇》为主了。

三联书店的出版《近代名籍重刊》引起了出版界、新闻界的密切关注和

浓厚兴趣，他们决定做些宣传、推荐工作，而梁启超、钱穆等前辈早已作古，八种著作的作者仅我一人尚健在。于是《解放日报》的《读书》副刊主编查志华约我为其专栏“著译者自白”写了一篇《隐士之谜的初步探索》。不久，《社会科学报》副刊主编盛巽昌约我写了一篇《生命历程中的遐想》。2001年，《新民晚报·读书乐》主编曹正文组织100位作家写“我的第一本书”，我又为《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写了一篇《研究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应该说要想说的话都说了。三篇文章中，仍以发在《解放日报》的较为详细、较为全面。

当年曾为我发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若干篇目的周策纵也和我恢复了联系，一别五十年，大家都不胜感慨。原来，他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即去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一处。1949年，他远离政界，转向学术，去了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已任教授多年，也写了很多书，大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谈起《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他记忆犹新，并说这本小册子美国华裔学者与美国汉学家现在都知道，但他们看到的是台湾龙田出版社的影印本。现在美国没有人从事中国隐士的研究，但研究“士”的著作、论文不少，其中有一部分谈到或引用了这一本书的若干篇章。

1992年，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此书又被入选，与其他二书合编成为厚厚的一册精装书，同时又出了单行本。书的封底上有《出版说明》如下：“复旦大学、上海书店为保存史料、抢救文献，决定从民国时期出版的约10万种图书中，选择数千种辑为《民国丛书》。为便利读者选购，又从中选择若干种为单行本发行。”这样一本小册子，又一次受到复旦大学、上海书店的青睐，我作为作者，当然很高兴。但也为此书的质量不够过硬而内疚。

1993年，应《联合报》与台湾大学之邀，去参加多项学术活动，原想购买

一本龙田出版社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作为纪念,可能的话,就书的版税、稿费问题进行一次交涉。没有料到的是各大学图书馆虽藏有此书,但书店均无货供应,而且龙田出版社早已倒闭了。但在失望中又得到意外的安慰。前来台北参加关汉卿国际研讨会的韩国汉阳大学副教授吴秀卿女士,我们原是多年的知交,这次她送我1984年《中国文学》第12辑的抽印本吴秀卿《元剧中仕隐故事的类型》,论述“隐居”之语汇时,列举了“隐逸、隐居、隐遁、遁世、幽居、栖遁”等等一大串,下注“参看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龙田出版社,页五”。我知道韩国学术界也用此书为参考书,竟情不自禁而颇为激动。

到了21世纪的2004年,我身边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只有三联书店版、上海书店版的单行本各一册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情,曾任《文汇月刊》副主编的谢蔚明来了电话,说黄宗江知道我二十一岁时写了一本谈隐士的书,他很难设想究竟谈了些什么。“黄宗江想问你讨一本,同时他刚出版了一本《读人笔记》,也准备送你一本。你同意否?”说起黄宗江,在会议桌上也见过,只是交谈不多罢了,是个才子、能人。考虑到他如此关注这书,实属难得,就把较早的三联书店影印本寄了去。也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手里仅有一本后出的上海书店版单行本了。

四

2007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我所写《海瑞》、《〈桃花扇〉研究与欣赏》发稿之后,准备把《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重印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再三,觉得此书已出版了六十五年之久,内容很单薄,而且梁漱溟先生

在肯定这一选题之后也提出了批评,我并没有作修改和补充,现在影印或照原书排印,好像对读者说不过去。因此,要求改出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了,于是整个2008年我主要作此书的修订工作。

一开始,打算按原来篇目重写。把原来的《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改写成《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果然头绪清楚多了,比原来的资料也丰富,自己基本上也满意。但是,对后面的篇目如何改写,如何充实,则成了大问题。首先是牵涉的面非常广,当时浏览的古籍在千种以上,我才二十一岁,每天弄到午夜,没有问题。再说人在图书馆工作,要查、要借,都方便之至。而现在,我已八十八岁,自己藏书虽多,基本是戏曲书,《高士传》、《二十四史》我都没有,野史、方志我收藏极少。我已七年未去上海图书馆,现在要我天天去,事实上不可能。再说,要根据梁漱溟先生的批评去改写,困难更大。这六十多年来,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我并未进行过探索。因此,对于中国隐士和中国文化内在的互动关系,我无法作出进一步的透辟的分析。因此我放弃了按原来篇目修改补充的计划。

我觉得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仍照原书排印。再加上一个补编。所补者,并不是把原来的内容作进一步的充实,而是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篇目。除了那篇《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之外,还包括以下诸篇:

近二十年来,我对茶文化有所涉猎,发现自从陆羽著《茶经》以后,历代隐士基本上都以品茶为乐,有的还对茶颇有研究,写了一批关于茶的诗文,于是我写了一篇《历代隐士对茶文化之贡献》。

原书实际上主要谈的是从汉代开始到宋代这一历史时期,宋代以后的隐士很少接触,所以又写了《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至于《易堂九子的群体隐居剖析》,则是对明末清初那一大批隐士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

的介绍。这两篇都属于填补空白性质。

自古迄清代,隐士为数之多难以作精确统计,知名度最高则推陶潜(陶渊明),其所做诗文甚多,思想感情之流露亦较其他隐士更少保留。所以专门为之作了梳理归纳,《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思想倾向》提供了一个典型。

再就是关于隐士喜爱的花卉以及假隐士的众生相的短文各两篇。原来改写、补充修改的雄心壮志未能完成,附加“补编”聊胜于无,仍感到愧对梁漱溟先生的关注,愧对读者诸君的厚爱。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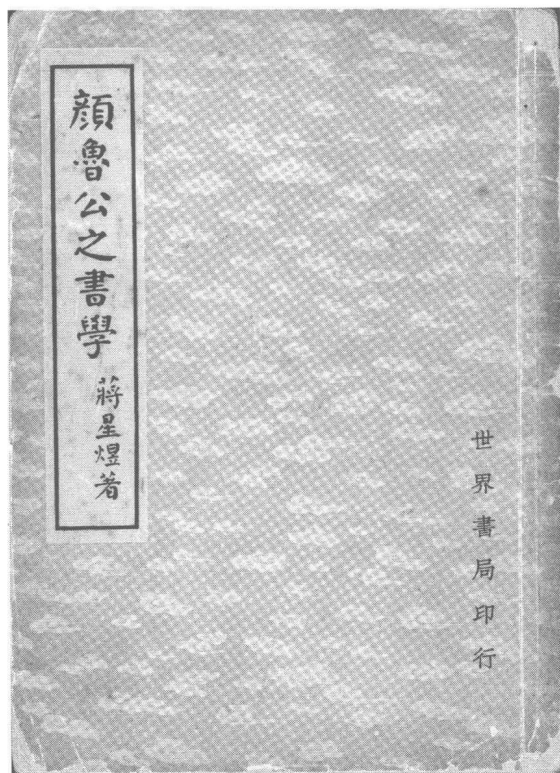
我所增补的一些章节,大部分已经在报刊发表。《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刊发于《河北师大学报》、《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思想倾向》刊发于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刊发于《宿州学院学报》,其他章节刊发于《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国学专刊》、《文汇报读书用报》、《时代报》、《上海文艺界》、《茶博览》等报刊。对于报刊主编或推荐者傅丽英、熊月之、鄢化志、刘绪源、祝鸣华、沈琦华、张大成、陆林森、朱自奋、赵相如等诸位先生、女士深表谢意。

这些文章写成之后都是请张小霖女士打字,并用伊妹儿发给报刊的,这种及时的帮助,更使我感激。而她却说通过打字,学到不少东西。如此谦虚,更为难得。这一份盛情,我会铭记在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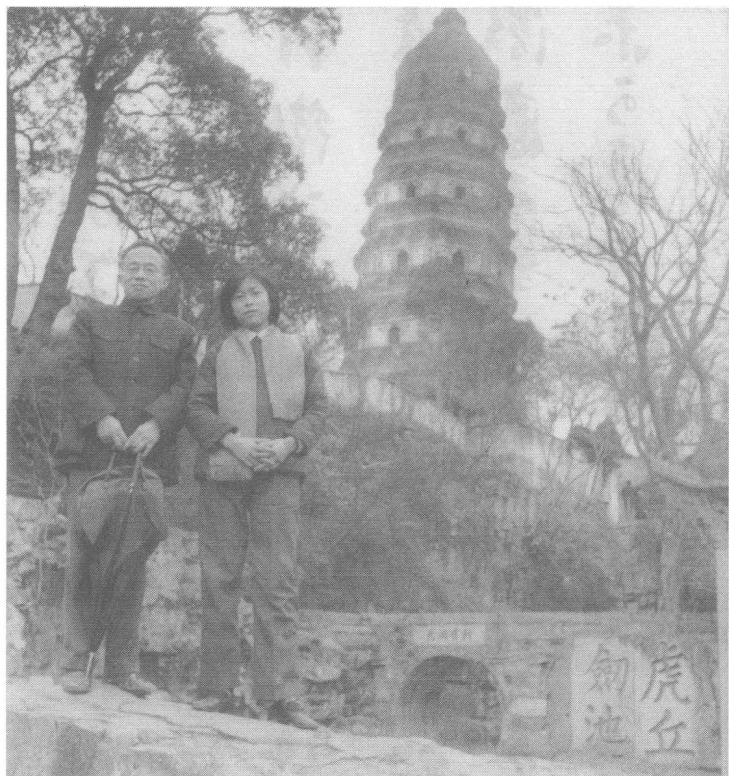
蒋星煜

2009. 3. 15

颜鲁公之书学



世界书局 1948 年版《颜鲁公之书学》初版本封面



1980年，蒋星煜在苏州考察颜真卿书《虎丘剑池》石刻，
左为女儿金云

代序——沈尹默先生致李石曾先生书——

蔣君大著相讀一遍略多義注
以備參考而已全書條貫明晰
引徵詳贗其用力可謂深矣
唯於前賢評斷處過於勇敢
激感不安然此自因於筆事之
未可厚非也竊以石公為四女尹默

鲁公大字在 笔势欲倾摧

——黄山谷

颜公变化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

——苏东坡

正书篆玉藏李斯 出笔存锋兼汉隶

古硬陵轹瘞鹤铭 韵胜韬挾兰亭记

离堆雄骏仅能亚 画赞深远还栢比

书法至此为绝尘 顿觉诸家异端异

——郝伯常

序

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若专就书、数两者而言，我国千百年来士人所好，一般言之，似乎是书重于数，因此书法也就精于数学。这种倾向固然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因为工商业社会必提倡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必重视计算之术；这种倾向，也足以说明中国民族的生活兴趣，凡诗书传家，书香门第者，恒负社会清望，所谓学而优则仕，退而以诗书自娱，这种悠闲洒潇的工作情趣，实支配我国千百年来文化社会。

但晚近数十年，书法一道，却渐渐被人遗弃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无异是一种好现象，例如中国士人过去必一生致力于蝇头小楷，以冀试场得售，实为精力时间的浪费。因为今日是科学的时代，科学的基础在数学，如果以“六艺”中的书数相比，当然数学是重于书法的。而且，因为科学机械的进步，实用工具的发达，我们今日在日常工作中，处处有利用机械工具法机会。例如打字的技术，在实用上就可以超越工笔楷书，虽然打字的工具在我国今日远不如欧美的流行，但将来在实用文字上有以工具代替人力的趋势，却是很显明的。

机械的艺术能代替人力的艺术吗？永远不能的。我们知道无论照相术怎样发达，究竟不能和绘画的艺术相比，——因为根本是两途。同样的道理，自然我们在实用文字上以后不会讲究书学，但在艺术的观点上，中国

书学是有其历史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决不因进入科学时代而湮没的。谁能否认中国书学是艺术呢?

对于中国历史上一切艺术的研究,我们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这部书,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书家的尝试。像这一类尝试,在国内好像还是破天荒的。我希望时间能证明这种努力不是白费,而被证明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蒋星德序于古渝州之南泉

自序

余幼时得旧拓《东方朔画像赞并碑阴记》于外祖父家，观其字画刚劲，气象雄伟，爱之甚深，每日清晨悉心临摹，无时或懈。先外祖父孙公，讳汾卿，书学兼宗欧颜，文采风流，一时之选，对余期望至切，督促亦严。东北事变发生，余父自哈尔滨飘然南归，复携回颜碑名迹数种，乃一并临摹之，终因天分拙劣，迄未能入其堂奥。及就读浦滨，日课遂荒，其后国家益复多难，人事倥偬，更无心于书学矣。庚辰之冬，间关入蜀，羁客山馆，倏忽数年，朝雾夜雨，倍增离愁，幸得明窗净几，乃寄情于文史哲，非敢言研究学术，聊以自遣耳。从南温泉迁居北温泉之后，环境大为改观。心境舒畅，难以言表。窗前梧桐枝繁叶满，湛绿如海，骄阳不炙，凉风习至；听松涛澎湃，流泉琮琤，蝉声断续，樵歌依稀，令人意快欲书，遂重温临池日课，并搜录考订有关颜鲁公之书学史料，成《颜鲁公之书学》六万言，意在表彰潜德幽光，亦以纪念先外祖父之教诲诱导也。《文化先锋》主编李辰冬博士予一部分初稿发表之便利，衷心铭感。星德大哥挥汗写序，尤为本书生色不少也。

癸未仲夏蒋星煜序于北温泉松涛书屋

目录

序	188
自序	190
第一章 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	193
第二章 颜鲁公之家世与书学	198
第三章 颜鲁公书学之源流	203
第四章 颜鲁公书学总论	208
第五章 颜鲁公书学各论	212
第一节 篆书	212
第二节 分书	212
第三节 草书	213
第四节 行书	213
第五节 正书	216
第六章 颜鲁公之书学理论	219
第一节 永字八法颂	219
第二节 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	222
第七章 颜鲁公在书学史上之地位	225
第八章 关于颜鲁公书学四点辨正	228
第一节 墨猪辨	228

第二节 屋漏痕辨	229
第三节 蚕头鼠尾辨	230
第四节 擘窠大书辨	232
第九章 颜鲁公碑帖表	235
第十章 颜鲁公碑帖之流传	242
第一节 摹刻	242
第二节 修葺	245
第三节 收藏	246
第十一章 颜鲁公碑帖考证	251
第一节 《张仁蕴德政碑》	251
第二节 《郭家庙碑阴》	252
第三节 《杜济墓志铭》	252
第四节 小字《麻姑仙坛记》	253
第五节 《江淮帖》及其他	254
第十二章 颜鲁公系书学家之成就	255
第一节 柳公权	255
第二节 杨景度	256
第三节 宋代诸家	256
第四节 宋代以晚诸家	259
本书参考书目	262
附录 《颜鲁公之书学》的出版、盗版	265
二版后记	278

第一章

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

在中国，人物鉴识是一门源流颇为深长的学问，因之当批评家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品底内容，往往会把批评基准的重心建立在作家的人格与情操上，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文学作品和艺术品完全是由于各不相同的人格情操和技巧，而造成各不相同的内容与形式。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也就等于一面镜子，必然地会反映出作家底人格：我们读《易水歌》的时候，仿佛面对着荆轲这位怒发冲冠的悲剧英雄，我们能透视到他慷慨激昂的内心。我们读《致史阁部书》，也就看到了新兴帝国主义者多尔衮踌躇满志的神情。

书学艺术有着它的特殊性，在反映作家的人格与情操这一点上，和文学作品与绘画比较起来，是更为潜藏的、内在的。中国艺术界始终在强调书学艺术与书学家之人格情操的密切底连系性：唐太宗李世民尝论笔法，以为“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同，书必颠仆”。唐穆宗问柳公权用笔方法，柳公权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以为柳公权在借此机会讽谏他。这是穆宗的多疑。苏轼在《题唐代六家书后》短文中曾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睚眦侧媚之态。”

书学史上有一佳话：朱熹幼时与刘共父在一起研习书学，朱熹取法曹孟德而刘共父则攻颜鲁公。朱熹的心理认为曹孟德是后汉人，而颜鲁公仅

不过是唐代人，其间相距数百年，当然是自己比较更接近古人了，因此自己颇为得意，刘共父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朱熹便由此改变了他的书法作风。相类似的情形还很多，陆游因蔡京之人格卑污，而对于蔡京的书学攻击得非常厉害，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直到现代，这一种风气仍旧隐然支配着书学界，沈士远《跋陈伯稼颜鲁公碑帖目》曰：“儿时，塾师授余兄弟赵孟頫书谓习是可以工书法，博时名。仲弟临抚，辄肖，书以日进，余则手拙如僵，而于轻倩绰约之姿，尤非所宜，屡作而屡辍。既而知孟頫之为人，则忿然曰：侧媚乃如其书，虽工亦奚以为，遂弃之不复省。稍长，得颜鲁公^①书，观其大气盘旋，精彩郁勃，与贤豪长者相揖于一堂，心焉好之。”

颜鲁公终其一生人格之卓越，我们随便举出几件史实便可推想而知：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节度使任上叛变，声势有如破竹，不旋踵而河朔尽陷其手，只有颜鲁公固守平原，以孤军与安禄山部众苦战，稍遏其锋，战局乃由此转捩。后来安史之乱得以扑灭，颜鲁公与贺兰进明、郭子仪、李光弼成绩最高。后建中四年正月淮西都统李希烈叛变，宰相卢杞挟旧嫌必欲置鲁公于死地而甘心，乃向朝廷建议派德高望重如颜鲁公者前往做说客，时鲁公已届七十五岁高龄，不胜奔波之苦，且明知此为卢杞之阴谋，然仍旧以国事为重，毅然登程，李希烈沉迷猖獗，不惟不受鲁公苦口婆心之劝告，反把鲁公幽囚起来，甚至用尽威胁利诱之方法，欲鲁公为其帮凶，而藉此以号召天下，鲁公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不为所动，贞元元年被迫而自缢死。从这两处，可以看到鲁公对国家的忠忱。宝应元年十二月代

① 鲁公 安史之乱既救平，颜真卿迁刑部尚书封鲁国公，故后人称之曰颜鲁公。

宗车驾自陕州返京畿，鲁公请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不以为然，鲁公与元载力争之，元载由是深恨鲁公。宝应二年十一月因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郭代公指麾座次，先鱼朝恩于尚书，鲁公引据历代及唐开国以来之成规力争之。从这两件事，我可以看出鲁公的刚直，绝不是仰权贵鼻息以邀利禄或因循敷衍的人。他与李太保的《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为官半生，衣食犹不能自给，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清白与廉洁。

颜鲁公何以在书学上有了非凡的成就？书学批评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无法趋于一致，但大多数均认为颜鲁公之卓越之人格与高尚之情操有以致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曰：“鲁公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晁补之《鸡肋编》曰：“鲁公笔法奇伟，虽天姿独得，亦忠义秀发能然。”

有些批评家曾过分地强调了颜鲁公的人格情操在书学上所起的副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如《金薤琳琅》：“世人重公名节，故并重其书，故草草之笔亦篆刻之，人其可以不立德耶！”这不啻把颜鲁公书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完全抹杀了。究其实际，颜鲁公假使单恃名节决不能拥有在书学史上不朽的地位。以名节而论，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瞿式耜固皆与鲁公先后辉映于史册，然文陆史瞿之书学则未闻有若鲁公之见重文苑风传海内也。虽然欧阳修曾说：“鲁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其本意在推重政治家颜鲁公之人格，固未否认颜鲁公书学方面之成就也。

沈作喆《寓简》曰：“昔贤谓见佞人书迹，入眼便有睚眦侧媚之态，惟恐

其污人不可近也。予观颜平原^①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能屈，至于行草，虽纵横超逸绝尘，犹不失正体。未必翰墨全类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贱，油然而生自然见异耳。”他的看法是面面俱到的，一方面肯定颜鲁公书学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从心理学的立场来分析出一般人对艺术品的爱好或厌恶，可能是出于“爱屋及乌”式的潜在的意识。在《画禅室随笔》里，这个问题又展开了讨论。“颜清臣^②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世人以其书传，蔡元长书法似米南宫，以其人掩书，两美双伤，在人自择耳。”事实上也的确有这一种微妙的关系存在着的。

关于上述“翰墨未必全类其人”一节，我们愿再加以申论：这一种看法当然也有事实上的根据，但是这是变态的，而非常态的，是特殊的，而非一般的。徐文长曾云：“苏长公书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潇洒的人写出来的字却是老朴的，遂引起了徐文长的诧异和感慨。俗语云少见多怪，则这种情形之不经于书学史殆无疑义。至于王逸少书之闲适，虞世南书之华丽，欧阳询书之清腴，贺知章书之狂放，颜鲁公书之刚劲，朱元璋书之端庄，郑板桥书之落拓及翁同龢书之凝重，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家的人格情操和作品的风格有着极度的共通性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解说清楚，否则的话，我们把颜公的人格和书法来作对比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假使颜鲁公对书学无所成就，则其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相当于文天祥、陆秀夫一流人物，虽然一死于内乱，一死于外患，其为国事鞠躬尽瘁则无二致。假使颜鲁公之人格情操近于蔡京或赵孟頫，则无论天姿如何深

① 平原 天宝十二载杨国忠谬称精择，出颜鲁公为平原太守，十五载加户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故人多以颜平原称之。

② 清臣 为鲁公之字。

厚,功力如何到家,决难有如此之成就,人格与书学两不足取,其书学流传后世之永久性与广泛性均将遭受限制。颜鲁公之书学之所以能雄视艺坛历千余年而倍增辉煌,端在其人格之卓越与情操之高尚,与夫书学本身不可磨灭之艺术价值,而其书学之所以具备不可磨灭之艺术价值,天姿与功力为技巧上之因素,内容上之因素则又为以上所述之人格与情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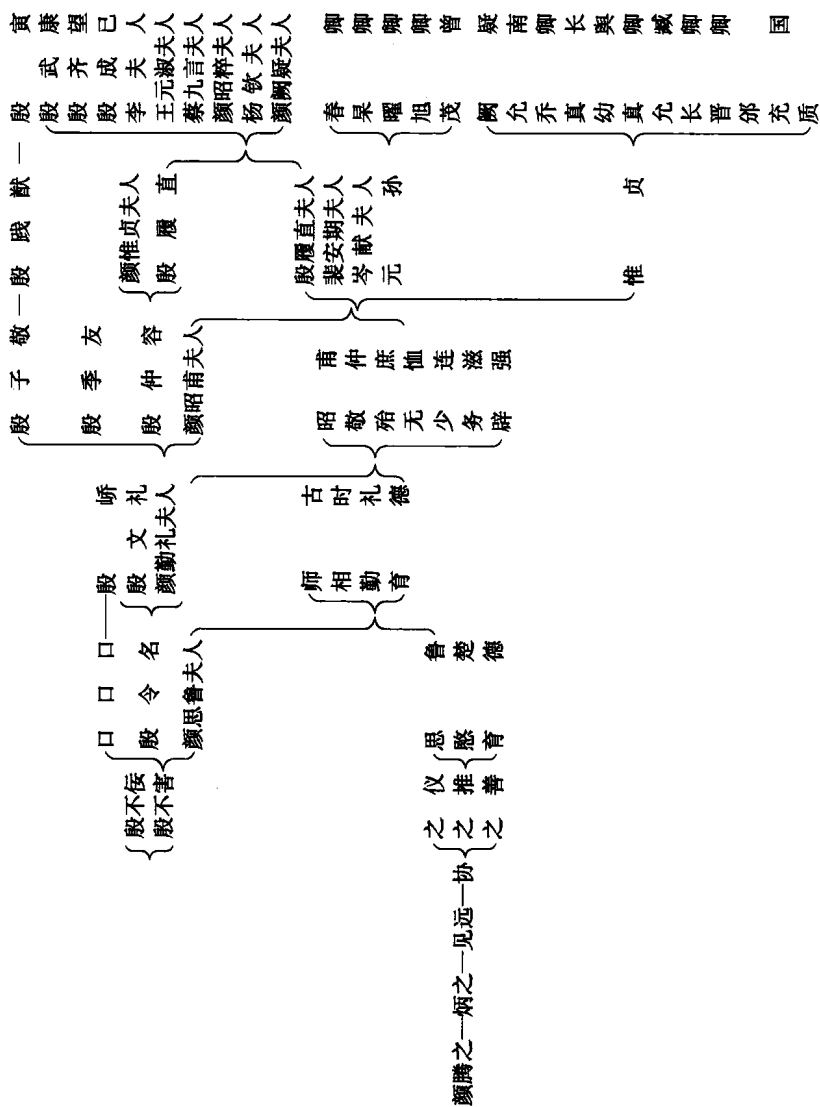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颜鲁公之家世与书学

冯钝吟曰：“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此语固不免夸张，惟吾人可置信下列之事实：假定同时有资力相若者研习书学，其一幸运而出于书学有渊源之家，另一则出于世代务农或经商之家，则前者之成就定可超越后者。其理有二：一曰先天遗传之影响，历史为一大绵延，人类无时不在逐代或隔代遗传身心两方面之特征与本能，对于书学艺术之创造与摹拟之本能，亦无法不受遗传法则支配。其二曰：后天环境之影响，家藏既丰，观摩之机会亦多，如有尊长不时指导，得免暗中索摸之苦，有此两处方便，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汉代蔡邕得史籀李斯笔意，所书熹平石经，当时日有车乘千余辆，前往观光摹写，其女蔡琰亦擅长书学。三国魏钟繇精思学书三十年，为一代宗匠，其子钟会亦负盛名。他如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欧阳询、欧阳通父子，陆探微、陆柬之、陆彦远叔祖三代，宋之米芾、米友仁父子，元之赵孟頫、管道升夫妇，明之宋濂、宋克、宋璩父子，清之王士鵠、王士禛兄弟均在中国书学史上先后辉映，此种事实已显示出家世在书学上影响之重大。

颜鲁公曰：“真卿自南朝来，祖上多以草隶篆楷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曾见张旭长史，颇示糟粕，自恨无分，遂不能佳耳。”其实非唯鲁公父系以能书称，母系亦然，兹根据残存史料编成颜殷两姓混合之世系表如下：



先叙述鲁公父系书学方面的成就：

颜腾之，字宏道，官至晋巴陵太守，善草隶书。羊欣叙古来能书人名，自秦至晋凡七十三，称：“谢综、颜腾之、贺道力、陆机并便尺牍。”^①

颜炳之，字叔豹，官至晋江夏王参军，以能书称。

颜见远，字见远，官至梁中丞，博学而独立特行，不合于俗。

颜协，字子和，官至梁湘东王记室，工草隶飞白^②时谢善勋及韦仲皆供职湘东王府，亦以善书称，府中以协适居谢之下韦之上，荆楚碑碣，^③皆协所书。

颜之推，字介，官至北齐平原太守，著《家训》二十篇，《冤魂志》三卷，《证俗字音》五卷，《文集》三十卷。

颜思鲁，字孔归，官至隋东宫学士，博学善属文，尤工训诂。

颜师古，字籀，官至秘书监崇弘文馆学士，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校籀楷书，当代流传，称之谓颜氏字样。

颜勤礼，字敬幼，官至唐崇贤宏文馆学士，工于篆籀，尤精训诂。

颜昭甫，字周卿，工篆籀草隶，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书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

① 尺牍 《汉书·陈遵传》曰：“略涉传记，贍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弃以为荣。”牍为木简，古代木简，长约尺许，故曰尺牍。

② 飞白 张怀瓘《十体》略节：“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曰：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按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上时修饰鸿都门，伯喈侍诏门下，见役人以埴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其体有二，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设妙，岂能诣此，可谓胜寄冥通缥缈神仙之事。”王僧虔曰：“飞白，八分之轻者，张芝草，得简易流远之极，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梁武帝谓萧子云曰：“献之书白而不飞，卿书飞而不白。”

③ 碑碣 汉以后，有镌刻文字于石，立于宫室庙屋墓隧之间，方者为碑，圆者为碣。

颜元孙，字聿修，善草隶，养于舅殷仲容家，仲容以能书闻于世，造请者甚众，令元孙代笔，人莫能辨。玄宗尝出诸家书迹数十卷曰：闻公能书，可定其真伪，元孙分别以进，玄宗赐笺藤笔墨衣服等物，又有和游苑诗，御札八分批答称：“孔门入室，鲁国称贤，翰墨之妙，莫与之先。”有《干禄字书》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蟲、𪔐圖、商商、凍凍，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兕古貌正兕通，韭之作韭，芻之作芻，直是俗字，而以为通用，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

颜惟贞，字叔坚，赠太子少保，有德行词学，尤善草隶，深得舅氏笔法，有《武承规墓志》传世，又今所传《萧思亮墓志》，可能即惟贞撰，楷法秀逸，而无书人名，故叶昌炽疑为惟贞所书。

颜曜卿，以文学直崇文馆、淄川司马，工草隶五言。

颜旭卿，允山令，善草书。

颜茂曾，犍为司马，讷言敏行，颇工篆籀。

颜允南，工诗，人多诵其佳句，善草隶。

次述鲁公母系书学方面之成就：

殷不害，陈郡人，工书画。

殷令名，书法不减欧虞，亦工画。

殷文礼，武德初为中书舍人，书画妙过于父。

殷峤，字开山，官至吏部尚书，爵郛国公，博涉书史，工为尺牍。

殷仲容，则天时任秘书丞，书法为天下宗，亦善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直逼边鸾。陆长源贞元中为汝州刺史，以殷仲容书《流杯亭侍宴诗》绝代之

宝，乃为之造亭立碑，自记其事于碑阴。

殷季友，善写貌。

颜鲁公《曹州司法参军秘书有丽正殿二学士殷君墓碣铭》称：“君讳猷，字伯起，陈郡长平人，五代祖不害，以孝见梁书。高祖英童，周御正大夫麟趾学士。曾祖闻礼，唐太子侍读，中书舍人，宏文馆学士。祖令言，校书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吴令。”与上表所列殷氏世系不无出入，疑有舛误。

第三章

颜鲁公书学之源流

颜鲁公之书学除家庭传授之外，张长史之指导最为重要，天宝二年鲁公罢醴泉尉诣洛阳访张长史于裴微宅，请授草书笔法。天宝五载罢长安尉复诣洛阳再访张长史于裴微宅，以张长史之对话录编成《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一卷。鲁公曰：“但曾见张旭长史，颇示少糟粕，恨无分，遂不能佳耳。”又序怀素《草书歌》曰：“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法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尝接游居，屡蒙激劝，告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用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初裴微曾请长史论笔法，惟言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云云；及鲁公请益，始与详论古今各家之短长，用笔布置之方法，由此可见长史对鲁公期望之切矣。《张仁蕴德政碑》书成未及师事张旭时，平凡无可观，与以后诸碑帖比较，相悬不啻天壤，是鲁公得成为书学大家，受长史之赐莫大焉。论书者咸以颜鲁公为长史之嫡传：《新唐书·张旭传》曰：“传其法者，惟崔邈、颜真卿。”李肇《国史补》曰：“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董道《广川书跋》曰：“书法相传至张颠后，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解缙曰：“张颠善草书，至其小楷，极端谨有法，传其学者，惟颜真卿得之。”

鲁公对古人碑帖之研习极见功夫，临摹^①之间，心领神会，既得佳胜处，

① 临摹 米芾曰：“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法书之旁，观其（转下页）”

则消化之、吸收之，皆为己有矣。长史以前之书法大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辈，鲁公无不取法之。

鲁公用笔，每透纸背，古奥不测而祛尽虞褚娟媚之习，实深得蔡邕石经遗意，《朱巨川告》此种特色表现得最为明显。

鲁公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处所继承者为《兰亭》用笔意，故曲折求其笔法，无不与二王吻合。黄山谷以文学量书学，推羲之为左氏，献之为庄周，并推鲁公与杨景度为晋以晚仅有之足以媲美献之者。鲁公之《东方朔画像赞》鳞次栉比而不失清远，实系临摹羲之之《东方朔画像赞》，东坡亦深然此说。羲之为王修书此赞，相传王修母死时以此纳于棺中，王澐即据此断定羲之所书者已失传，鲁公不及亲见之，王澐可谓拘泥者矣，昔钟繇发韦诞墓方得笔法，安知无人发王修母之墓乎？更何况是否曾用以殉葬，尚无切实证据，迄乎唐代，欧阳询犹曾补葺王羲之所书之《东方朔画像赞》，是鲁公得亲见此书殊无疑问。鲁公之《鲜于离堆记》有墙壁拆^①之妙，殆集羲之《东方朔画像赞》、《兰亭》、《乐毅论》于一手矣。杨宾《铁函斋书跋》曰：“余谓鲁公指实悬腕，实得右军笔法。”朱杰勤《王羲之评传》亦曰：“唐代善学右军者惟颜鲁公耳，欧阳询、褚遂良次之。”

（接上页）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油纸覆古帖法书之上，随其大小轻重而模之，若模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姜尧章曰：“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退，经意与不经意也。”王世贞曰：“临书易得意，难得体，摹书易得得，难得意。临进易，摹进难。离之而近者，临也。合之而远者，摹也。”岳珂曰：“摹临两帖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枅榱桷，虽具准绳，而缔造既成，气象自有工拙。临帖如双鹤并翔，青天浮云，浩荡万里，各随所至而息。”竹懒曰：“临者，置纸法书之旁，睥睨纤浓点画，而仿为之。摹者，笮纸法书之上，映照而笔取之。”

① 墙壁拆 姜尧章《续书谱》曰：“壁拆者，欲其无布置之巧。”董内直曰：“用笔端正，写字有丝牵处，断头起笔，其丝当中，如新泥壁拆缝，尖处在中间，欲其无布置之巧。”

鲁公之学褚遂良，有鲁男子学柳下惠之目，盖能恰到好处也，《麻姑仙坛记》、《靖居寺题名》均酷似遂良之用笔与结体，而《宋广平碑》清瘦圆润，尤得褚法之神髓。何义门曰：“颜出于褚，而仍还匀整，不可谓之不善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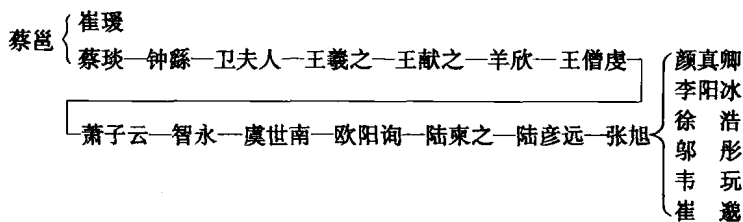
蔡邕、王羲之、王献之及褚遂良予鲁公之影响既如上述，最值得注意的是，即鲁公并非无条件无保留接受书学遗产，而以最审慎态度出之者，不足取法之处，乃断然舍弃之，故能无一点褚家习气，褚家习气者，轻佻媚媚也，鲁公书中则无之。或曰：鲁公师法古人，果能去芜存华乎？书学家无有不肯定此答案者；惟李后主煜独持异议，曰：“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李煜乃南唐亡国之君，一典型之变态心理之唯美主义者，所咏词曲，则销沉哀艳，全无男子气概，又尝使官娘裹足为新月形，以为绝妙风姿，裹足之恶习由是流行矣！吾人即由其审美观念之不正确，可推断其书学批评观点之错误。鲁公之书端庄凝重，李煜之兴趣则在矫揉造作，宜乎不得其好评也。

荟萃诸大家于一手为鲁公书学特色，亦即鲁公成功之关键，然鲁公并非生吞活剥诸大家之一肢一节而已，若仅如此，则不足称书学大家，而仅为集书者。鲁公熔诸大家于一炉，其书学已洗炼成为精神一贯之艺术矣，及其晚岁，已达艺术之最高峰，就精神言固无一笔不似蔡、王、褚，就形似^①言，则无一笔为蔡、王、褚。董其昌论书学，以为其初须与古人合，其后须与古人离，吾人遍观历代书学家，深得此法唯有鲁公，其后须与古人离者，意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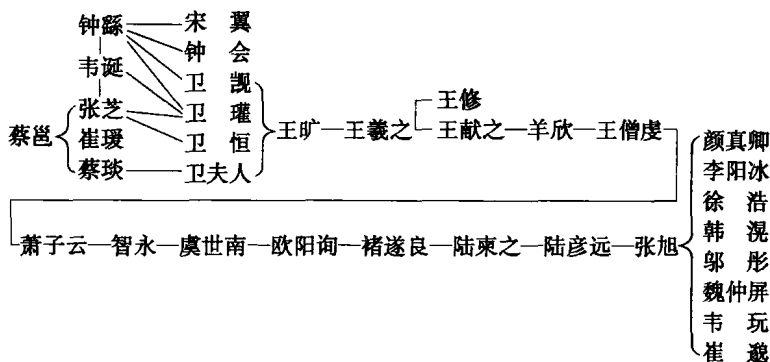
① 形似 夏文彦《图绘宝鉴》曰：“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亦即谢赫所谓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

个性之适度底表现与发展,所谓“变”亦无非指此。释亚栖曰:“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虞世南、李邕、陆柬之等并得书中之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于世,俱得垂名,若执笔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自立之体,此书家之大要也。”亚栖所举之例固有未当,所持理论则甚中肯。

吾人谓鲁公接受蔡王褚之书学遗产,犹抽象之论,具体而言,则以笔法为主:书有七字法,谓之拨钤,自卫夫人钟王二家,传于欧虞褚颜,所谓七法即撮、压、钩、揭、抵、导与送,以笔管著名指,名指得力而俯仰进退收往垂缩之间,无不尽如人意矣。笔法传授之史底发展可用下表说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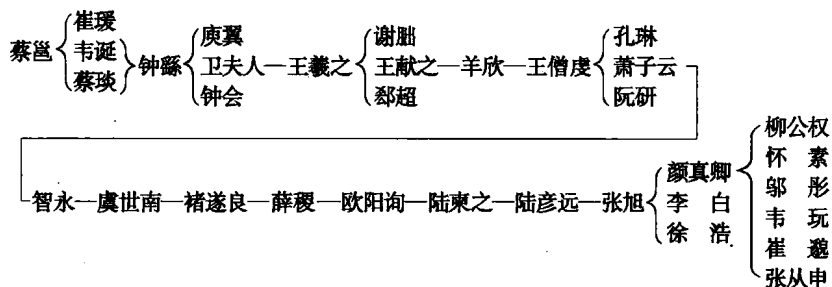
元代郑杓在《衍极》一书中,将此问题曾作更透彻之研究,兹用下表说明之: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提出之系统如下，失之过简，张长史与崔邈之间，安能无鲁公以为桥梁乎？

崔瑗——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陆柬之——陆彦远——张长史——崔邈——韩方明

解缙《书学传授谱》更强调鲁公之地位，彼之见法可归纳如下：



阅乎以上诸表，当可明了鲁公为中国书学优秀传统之继承者与发扬者。

第四章

颜鲁公书学总论

中国文字之雏型为古文，乃系苍颉仰观星云天象，俯察龟文鸟迹所合成，其后逐渐进步，象形之成分日益淡化，然其间蜕变之轨迹无不历历可寻；由于此种文字起源之特殊性，中国书学家咸以大自然为法，故或学锥画沙①、或学屋漏痕②、或学古钗脚③。中国书学亦以此种特殊性，与绘画并峙于艺术之园地。中国书学批评家往往以宇宙万物之动态，对书学作品作比喻性及象征性之批评：是以用龙跳虎卧，扬雄逸之风。秋水芙蓉，状出尘之姿。上林春花，极争放之盛。崩山绝崖，尽惊险之势；袁昂、米芾、包世臣辈莫不皆然也。

鲁公之书如何？米芾《海岳名言》曰：“颜真卿书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弓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米芾攻行草而不能正楷，故推鲁公之行草为极致，学《争坐位》略得糟粕，遂以《争坐位》为鲁公书之第一，而所谓项羽挂甲、樊哙排突，固足以强调不可犯之色，然不能表现其学力之深厚、法度之完备、修养之醇粹于万一，反近于彼本人书学之写照矣！

① 锥画沙 张长史曰：“后闻于褚河南曰：‘用笔当须如印泥画沙。’思所以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地平整，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沈著，其用锋常欲其透过纸背，此成巧之极矣。”简缘曰：“锥画沙，笔锋正中而墨浮两边也。”

② 屋漏痕 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③ 古钗脚 《谈苑》：“或问邬兵曹笔法，怀素以古钗脚对。”韦续《书品优劣》：“李阳冰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喻其有力也。

吴宽固尝谓“颜鲁公平日运笔清活圆润，能兼古人之长，米海岳则猛厉奇伟，终堕一偏之失，以孔门方之，真有回路两子之别。”米芾之书直子路、项羽、樊哙之气派耳，所表现者为一无修养之匹夫之勇，若以将略喻鲁公书，余以为舍诸葛孔明莫属。沈作喆《寓简》曰：“予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能屈。”此一比喻固甚适合，然亦无价值可言，在廊庙直言鲠论，鲁公出仕后，未尝一日不如此也，以此解释鲁公之人格与书学之一致性颇佳，作比喻 A' 如 A''，是等于未比喻也。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之认识亦殊浅薄，所获印象不能正确深刻，是喻鲁公书之朴素无华乎？抑喻其通俗易学乎？不可知也。夫耕牛之为物，虽稳实而不免呆笨，鞭策之下，徐行于泥浆中，以此木然之物喻鲁公之书，其不当固不待言。又彼于《国朝书品》中，亦显露出鉴赏能力之不足，盖鲁公系书学家傅山、翁方纲、王澐、钱澧之各体书，未有列入神品妙品^①者。

项穆曰：“唐贤之资，褚柳标识，论乎学力，陆颜蜚声。”其意谓褚柳之书学基础为先天之禀赋，陆颜之书学基础为后天之功力。鲁公早年所书之《多宝塔感应碑》不及晚年所书之《颜家庙碑》远甚，此非功力有以致之乎，项穆之言，诚不谬也。

① 神品妙品 张怀瓘《书断三品》，自史籀至唐初取神品十二人，妙品三十九人，能品三十五人。朱长文《续书断》品级一承其旧。包世臣《国朝书品》复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除神品外，每品又分上下，计取神品一人，妙品上一人，妙品下二人，能品上八人，能品下二十六人，逸品上十五人，逸品下十六人，佳品上二十六人，佳品下十人。其所下定义如下：“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

王世贞《艺苑评》曰：“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书，以取天下之才习书学，而不能脱人主面目，智永不能脱僧气，欧阳率更不能脱酸馅气，旭、素、颜、柳、赵吴兴不能脱俗气，南晋宋齐之间，可以脱矣。”此不折不扣之盲目唯古论调，艺术作品固不能不显示艺术家之人格与性型，然溯宋齐而上，亦无可例外也。即令鲁公之书不能免俗气，然决不能抑之与赵吴兴并列，鲁公书不求巧媚，依规循矩，若谓之俗，是通俗也；吴兴之书涂脂抹粉，捧心作态，是庸俗也。又曰：“智永伯施，有书学而无书才，颠旭狂素，有书才而无书学，河南海，有书姿而无书礼，平原诚悬，有学力而无书度。”是语亦未见公正：夫度者，具体言之为法度，抽象言之为风度，鲁公书严肃而不失厚道，潜心研习者无不能各随其分得其所应得，天禀高学力深则得心应手，入其堂奥。安得谓之法度不备乎？安得谓之风度不佳乎？

鲁公之书，不偏不倚，其基本之精神乃为端正，端正即无飘逸之气，怀有出世思想之唯美主义者以方法为桎梏，视端正为丑恶，以疏放为理想，视飘逸为至美；此李后主煜所以讥之为田舍翁，米芾所以讥之为蒸饼也。鲁公之为人在朝廷则不屈权贵，在战阵则不避羽矢，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义之所趋万死莫辞，一实干苦干之大政治家、大艺术家也，非中年致仕优游林下之绅士也，非放浪形骸长啸杜门之隐士也，求飘逸之气于鲁公，不亦滑稽乎？端正果不足法乎？端正果与艺术价值背道而驰乎？虚舟曰：“自秦造分隶，以至东汉增减后，任意讹舛相错，篆籀古法遂以大坏。钟王继起，风会虽于是而开，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丧乱之余，讹以滋讹，递相传染，日以鄙倍。唐兴，太宗、高宗相继右文，书学渐归于正，虞褚诸公出虽未能尽加刊削，然六朝谬体盖十去七八矣，延百余年，颜元孙作《干禄字书》，鲁公极力扬挖之，于是书体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与篆籀吻合，无敢或

有出入，匪唯字体，用笔亦纯以之，虽其作草，亦无不与篆籀相准，盖自斯喜来，得篆籀正法者，鲁公一人而已。评者议鲁公书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严为鲁公病，岂知宁朴无华，宁拙毋巧，故是篆籀正法。”是鲁公不但为大书学艺术家，亦且文字学上之大功臣也。

东坡以书于鲁公、文于昌黎、诗于工部为观止，原就地位而言，实则就本质言亦复如是，鲁公之书所表现者为一种男性底刚强底健康底美之高峰，此一美之高峰使人所发生之感觉为严肃，为雄伟，使人所呈显之反应为崇拜，为振奋，为无可言喻之激昂。吁！余谓鲁公之书固酷似昌黎之文、工部之诗，亦相当于司马长卿之赋、辛弃疾之词、梁任公之评论，皆中国文化遗产之至宝。

第五章

颜鲁公书学各论

第一节 篆 书

太史籀作籀篆十五篇，整理笔画，一变古文曰大篆或籀文，李斯增损大篆成小篆，通常所称篆书则指小篆。鲁公篆书见于《东方朔画像赞》之碑额，安世凤《墨林快事》曰：“且其篆题兼存，尤古雅峻峭，全无钝质俗态，此时阳冰称高手，乃其文采风流，不及此十二字也。”王澐不以为然，曰：“安氏称十二字古雅峻拔阳冰高手不及，未免誉过其实，此书方整实不及阳冰。”又吴兴《永兴寺额》亦为篆书，夫鲁公之正书、长史之草书、阳冰之篆书三者并列入唐人书之神品，初鲁公固未尝以篆书擅名也，惟仅以方整论篆书，亦近皮相之论，不免有所偏失。

第二节 分 书

王次仲割程邈隶书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书二分，取八分，是曰：八分书，亦简称分书。大历二年十月鲁公至吉州，于靖居寺题分书“禪關”（祖关二字古写），翁方纲以为至宝，有诗云：“八分岌业更雄峙，劲势独出无古今”，“区区岁月那足较，两字已重于珠琳”。又《东方朔画像赞碑阴记》题额亦八分书，惟远不如祖关二字之大。

第三节 草 书

张伯英学章草于崔瑗、杜度，温故知新，因而变之，是曰草书。鲁公草书未有传世者，《柳冕帖》为草书，惜已散佚，评者谓笔势屈折如盘钢刻玉，劲峭之气不少变，想必亦甚可观。《新唐书·颜真卿传》曰：“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李肇《国史补》曰：“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岂鲁之草书独少，以致不传欤？抑世人不察，以行为草欤？不可知也。赵宦光《寒山帚谈》曰：“藁草书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疏密随宜如颜平原《坐位》、《祭侄》二帖也。”是二帖中固不乏放纵为草体者，若即以此二帖为草书，是但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姜尧章《续书谱》曰：“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真与草，形殊而理同，以真法作草，非独率更与鲁公，王羲之亦复如是。王世贞曰：“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似楷似草非楷非草者，行也；是以颇疑世人误以颜行为草焉。

第四节 行 书

姜尧章《续书谱》曰：“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五代诸贤，亦各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杨、苏、米亦后世可观者。”按行出于隶，为刘德昇造，姜尧章以为出于楷，非也。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举范阳兵反，势甚猖獗，鲁公为平原太守以孤军与之苦战，杲卿守常山用计杀贼将李钦凑，并生擒贼将高邈、何千年。翌年史思明围攻常山，太原尹王承业不救，城遂陷，杲卿子季明先遇难，未几杲卿亦为所害。至德三年鲁公遣从子泉明往购其父杲卿尸与弟季明尸，

杲卿失一脚，季明仅得首，还蒲州之日，鲁公乃撰书《祭侄季明文》。碑碣之书无有不刻意求工者，至若帖，初未计及流传后世也，然反多自然风趣之流露，如《祭侄季明文》即是。董道《广川书跋》曰：“峻拔一角^①，潜虚半股^②，此于书法，体裁当如此。至于分若抵背^③，合如并目^④，以侧映斜^⑤，以锋附曲^⑥，然后成书，而古人如此，盖尽之也。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持，望之为盛德君子。尝问怀素：折钗股^⑦何如屋漏痕？曰：老贼尽之矣！前人于其隐处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后得之。此二体又在八法^⑧六体^⑨外，乃知书一技而其法之众如此公祭兄子文殆兼存此体者也。”文徵明《停云馆帖》曰：“详玩此帖，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尔既事字右一转，至言字左转而上复侵恐字，右旁绕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适与褙纸缝合，自尔既至天泽逾五行殊郁怒，直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飨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漫，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

-
- ① 峻拔一角 语见智果《心成颂》，谓字方者抬右角，国、用、周字是。
- ② 潜虚半股 语见智果《心成颂》，谓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远近均匀递相掩盖，故令右虚，用、见、冈、月字是。
- ③ 分若抵背 语见智果《心成颂》，谓州册卅瓜之类，皆须自立其抵背。
- ④ 合如并目 语见智果《心成颂》，谓八字卅字之类，皆须潜相瞩视。
- ⑤ 以侧映斜 语见智果《心成颂》，谓撇为斜，磔为侧，交、欠、以、人之类是。
- ⑥ 以锋附曲 谓乚为曲，女、安、必、是之类。
- ⑦ 折钗股 姜尧章《续书谱》曰：“折钗股者欲其曲折圆而有力。”郝经《读新秦碑诗》云：“拳如钗股直如筋。”陆游《作行草诗》云：“气压唐人折钗股”。
- ⑧ 八法 永字八法也，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 ⑨ 六体 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中书是为六体。卫夫人《笔阵图》则曰：“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颻洒落如草书，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又作六书解。

容之妙，与楔叙稿哀乐虽异，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间，嗟字右足上抢^①处隐然见转折势，摧字如泰山压而砥柱，郭末哉字如轻云之卷日，殄字蹙衄^②如惊龙之人蛰，吁！神矣。”王澐《竹云题跋》曰：“鲁公三稿皆奇，而《祭侄稿》尤为奇绝。”“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紫紵郁怒和血迹泪，不自意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

乾元元年鲁公于蒲州刺史任内为御史唐明所诬劾，被贬饶州刺史，鲁公眷怀朝廷之恩，乃有《祭伯父濠州刺史文》之作，告以一门之生死哀荣也。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曰：“此则小行书也，刚劲而圆熟，与《争坐位》帖大略相似，予未敢以伯仲评之也，争坐石刻，此则墨迹，尤为可宾，自乾元迄今近千年，楮墨完美，笔画爽朗，而其精神英发，虽在草草之间正气凜然，史称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虚语也。”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曰：“此帖与祭季明侄稿法同而顿挫郁勃似少逊之，然风神奕奕，则祭季明侄稿似不及也。”

宝应二年十一月因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郭代公指麾坐次，先鱼朝恩于尚书，鲁公引据历代及唐开国以来之成规力争之，是曰《争坐位》。米芾《海岳名言》曰：“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宝章待访录》曰：“字字意相联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世之颜行书第一书也。”

鲁公行书可考者凡三十八种，右列三者是为代表作。

① 抢 运笔之法，意与折同，折之分数多，抢之分数少，折之分数实，抢之分数半虚半实，圆蹲直抢，偏蹲侧抢，出锋空抢，空抢取折之空势也。笔燥则折，笔湿则抢，笔燥实抢，笔湿空抢。

② 衄 运笔之法，笔既下行又往上也，与回锋不同，回锋用转，衄锋用逆。

第五节 正 书

正书者或曰楷书，或曰真书，或曰今隶，咸以《贺捷表》为创始之作，然其法至唐代方大备。真草一理，不失篆分遗意者，乃为佳作，以此标准衡量唐代各家之正书，而作一缜密之分析，可得答案如下：颜柳篆七而分三，欧褚分八而篆二。鲁公之于正书实为一改革家，其意义略同韩愈之于古文，晋人作字于清谈之余，所求者唯为飘逸之气，非斜拂用法，即挑剔^①作势，终难登大雅之堂，固然字画刚劲之颜书出现以后，无一笔不出于正锋^②，魏晋风气已不可多得，要知魏晋风气本不得其正者也。米芾对鲁公正书颇多微辞，世人无不称怪，真金不畏火，米芾贬抑鲁公正书之企图，白费精神而矣！孙退谷论鲁公正书，发人之所未发，最为得体：“鲁公学书于张长史，言长史楷法精详，特为真正，此见书终以楷为重，鲁公楷书带汉人石经遗意，故法尽虞褚娟媚之习，此或长史口授法乎！宋人谓鲁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意，此非深知鲁公者也，宋人无真楷，坐是故耳，鲁公书道辉映千古，终以楷为极则也。”

天宝十一载千福寺僧楚金造多宝塔，并写《法华经》千部真塔中，碑文极言塔光怪梦寐云物感不可致诘之事，以及人主崇信之笃，为岑勋所撰。此碑为鲁公流行诸书中之最下乘者，然杨宾《铁函斋书跋》曰：“鲁公书前辈多推《宋广平碑》与《争坐位帖》，而《楚金感应碑》则在所痛贬，余谓《广平》、

① 挑剔 姜尧章《续书谱》曰：“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

② 正锋 即中锋也，昔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不倒侧，故锋一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姜尧章《续书谱》曰：“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

《争坐》未尝不佳，然其始终一贯，无一懈笔，则莫有过《楚金》者，以鲁公全力所在故也。”虚舟曰：“此碑书法腴劲，最有态度，鲁公书多以骨力健古为工，独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其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王世贞与赵崡亦以此碑为佳作，然亦承认未尽善尽美，较杨宾之论调略为正确：《弇州四部稿》曰：“此碑结法尤整密，但贵在藏锋，小远大雅，不无佐史^①之恨耳。”《石墨精华》曰：“鲁公正书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而结法视东方赞、家庙碑似觉稍逊。”此碑拘束困窘，点画之间全无自然风趣，竟类油漆匠之描画，而杨宾辈交誉不已，此非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者欤？

天宝十三载，即鲁公拜平原太守之翌年，与兄曜卿、萧晋用、李伯鱼等谒东方朔祠庙，见开元八年韩思复所刻之像赞文字纤靡，骏鲜生金，不可复识，乃重书刻石。东坡曰：“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曰：“余所得乃旧本，虽小摩泐，然其峭骨遒气滟郁奋张，亦足辟易余子。”孙退谷《庚子销夏记》曰：“此赞在山东陵县，书法较他刻更严整。”王澐《竹云题跋》曰：“此碑书于天宝十三载，距贞元元年七十有七，为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则此为四十五岁时所作，乃其盛年书，故神明焕发而时出姿态，不失清远耳。”

江西南城县西南二十三里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鲁公乃依据葛稚川《神仙传》撰《麻姑仙坛记》，备详其事。孙退谷曰：“抚州有鲁公仙坛记，字形大如指顶，笔笔带有隶意，鲁公最得意书也。”

玄宗以安史之乱奔蜀，太子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上玄宗为太上皇，

^① 佐史 主文书之吏。

及安禄山为子庆绪所杀，郭子仪、李光弼等会回纥、大食诸国兵收复两京，太上皇亦自蜀返，唐室呈中兴之象，元结乃于上元二年撰《中兴颂》，大历六年六月鲁公罢抚州刺史后书而刻石。郝经《陵川集》曰：“书至于颜鲁公，鲁公之书又至于《中兴颂》，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河朔尝见三数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剑戟有不可犯之色。”钱邦芭《语溪记》曰：“字大四寸七分，为平原生平第一得意书，亦次山之文以助其笔力，故与山水相映发耳。”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曰：“《中兴颂》方正平稳，不露筋骨，为鲁公书法第一。”王恽《玉堂嘉话》曰：“《中兴颂》之雄伟，如驱千金骏马，倚邱山而立。”王澐《竹云题跋》曰：“有唐一代碑版，颜鲁公最多，率以雄厚胜，独《中兴颂》及《宋广平》二碑浏漓顿挫，态出字外。”

建中元年七月鲁公书自撰《家庙碑》，所以发扬祖德敷演家声也。王世贞曰：“结法与《东方朔画像》相类，而石独完善少残缺者，览之风棱秀出，精彩注射，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吁可重也。”“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①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虚舟曰：“此《家庙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当是时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难不过五年，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岩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丽端恣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视。”

鲁公正书可考者凡七十一种，以上五种最见流行，此外《宋广平碑》亦为可观者。

① 玉筋体 指李斯所创小篆也。齐己《谢昙域大师玉筋篆书诗》：“玉筋真文久不兴，李斯传到李阳冰。”郝经《题磨崖碑》：“正书篆玉藏李斯，出笔存锋兼汉隶。”

第六章

颜鲁公之书学理论

第一节 永字八法颂

永字八法为智永所发明，后世书家皆奉为圭臬，兹以鲁公之八法颂为纲，其他各家理论足以互相发挥者为目，排列于下：

侧蹲踞而坠石

王羲之曰：“夫 着点皆须磊落，似大石之当衢，或如蹲踞。”

智永曰：“点为侧，如飞鸟翻然侧下。”

张怀瓘曰：“侧不得平其笔。”

柳宗元曰：“侧不贵卧。”

包世臣曰：“夫作点势在篆皆圆笔，在分皆平笔，既变为隶，圆平之笔，势不相入，故示其法曰：侧也。”

郑岳曰：“如高山堕石，落地犹有跳跃之姿，以喻用笔如空中掷下，沉着爽快，不可浮黏纸面，所谓力透纸背是也。”

勒缓纵以藏机

智永曰：“横为勒，如勒马之用缰。”



张怀瓘曰：“勒不得卧其笔。”

柳宗元曰：“勒常患平。”

包世臣曰：“平横为勒者，言作平横，必勒其笔逆锋落纸，卷毫右行，缓去急回，盖勒字之义强抑力制愈收愈紧，又分书横画多不收锋，云勒者，示画之必收也。”

郑岳曰：“如悬崖勒马，临险堑而归平稳，以喻用笔不可平铺，要有斩截之势。”

努弯环而势曲

智永曰：“竖为努，用力也。”

张怀瓘曰：“努不得直，直则无力。”

柳宗元曰：“努过直而力败。”

包世臣曰：“直为努者，谓作真画必笔管逆向上，平锋着纸，尽力下行，有引弩两端皆逆之势，故名努也。”

郑岳曰：“如弩之怒发，而使全力透达于锋芒，正欲笔锋射到之处，而蓄有无穷之力。”

趯峻快以如锥

智永曰：“挑为趯，跳貌，与趯同。”

张怀瓘曰：“趯须蹲其锋，得势而出。”

柳宗元曰：“趯宜峻而势生。”

包世臣曰：“钩为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注脚尖，故钩末断不可飘势挫锋^①，有失趯之义也。”

① 挫锋 挫有分寸，过则脱节，不及则气促，顿后以笔略提，使笔锋转动，离于顿处。凡转角及趯用之。

郑岳曰：“如善斗者剔足而疾收，稍一散漫，必致覆败。”

策依稀而似勒

智永曰：“左上为策，如策马之用鞭。”

张怀瓘曰：“策须背笔仰而策之。”

柳宗元曰：“策仰收而暗揭。”

掠仿佛以宜肥

智永曰：“右下为掠，如篦之掠发。”

张怀瓘曰：“掠须笔锋左出而利。”

柳宗元曰：“掠左出而锋轻。”

啄腾凌而速进

智永曰：“右下为啄，如鸟之啄物。”

张怀瓘曰：“啄须卧笔疾翫。”

柳宗元曰：“啄仓皇而疾翫。”

李雪庵曰：“啄者如禽之啄物，其笔下翫，以疾为胜。”

包世臣曰：“短撇为啄者，如鸟之啄物锐而且速，亦言其画行以渐而削如鸟啄也。”

郑岳曰：“如鸟之啄食，甫张口而急合，以喻笔锋之乍开而急敛，所敛之处，犹若鸟啄之坚且锐也。”

磔抑惜以迟移

智永曰：“右下为磔，裂牲谓之磔，笔锋张开也。”

张怀瓘曰：“磔须趯笔战行而出。”

柳宗元曰：“磔趯趯以开撑。”

李雪庵曰：“磔者不徐不疾，战行欲卷，复驻而走之。”

第二节 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

梁武帝观钟繇书得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法，此处以长史之问与鲁公之答为纲，其他各家理论足以互相发挥者为目，排列于下：

曰：夫平谓横，子知之乎？

曰：尝闻长史示令每为一平画皆须纵有象，此岂非其谓乎？

王羲之曰：“横则正如长舟之截江渚。”

曰：直为纵，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直者从不合邪曲之谓乎？

王羲之曰：“竖则如冬笋之抽寒谷。”

曰：均谓间，子知之乎？

曰：尝蒙以间不容光之谓乎？

王羲之曰：“不宜密，密则似疴瘵缠身，不能展舒。”

曰：密谓际，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以筑峰下笔皆令宛成，不令其疏之谓乎？

王羲之曰：“不宜疏，疏则似翔禽溺水，诸处皆慢。”

曰：锋为末，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以末成画使其锋健之谓乎？

曰：力为骨，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趯笔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谓乎？

曰：转^①轻为曲折^②，子知之乎？

① 转 围法也，有圆转回旋之意。

② 折 笔欲左先右，往右回左也。直画上下亦然。

曰：岂不谓钩笔^①转角，折锋轻过，亦谓转角为暗阔之谓乎？

王羲之曰：“角不用峻，又不宜棱角。”

姜尧章曰：“转折者，方圆之法，直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②，驻则有力，转欲不滞，滞则不遒，真以转而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

张敬玄曰：“但有转笔，一切贵其圆润。”

曰：决为牵制，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牵掣为撇，锐意挫锋，使不怯滞，令险峻而成以谓之决乎？

唐太宗曰：“为撇必掠，贵险而劲。”

曰：补谓不足，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结点画或有失趣者，则以别点画旁救之谓乎？

智果曰：“疏当补续。”

欧阳询曰：“凡作字一笔才落，便当思第二三笔如何救应。”

曰：损为有余，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趣长笔短，常使气势有余，点画若不足之谓乎？

欧阳询曰：“字有形断而意连者，如之以心必水求之类也。”

唐人论书曰：“真则字终意不终，草则行尽势不尽。”

曰：巧为布置，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字体，令其异势，是

① 钩笔 钩里须圆角而撇锋，冈、田等字用之。钩努须圆角而趯锋，旬、勿等字用之。

② 驻 不可顿，不可蹲，而引笔又疾，不得住，不得迟滞审顾则为驻。凡勒画起止用之，又平捺曲处用之。力聚于指，流于管，注于锋，力透纸背者为顿，力减于顿者为蹲，力到底节即行笔为驻。

谓巧乎？

萧何曰：“如安营下寨，稳思审之，方可用笔。”

王羲之曰：“先想字成，意在笔先。”

李华曰：“意在笔前，笔居心后。”

欧阳询曰：“如蘇之为蕪，秋之为𦎑，鵝之为鵞为𪘇之类，为其字难结体，故互换如此，所谓东西映带是也。”

曰：称谓大小，子知之乎？

曰：岂不谓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为大，兼令茂密所以为称乎？

王羲之曰：“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纵之令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

智果曰：“孤单必大，一点一画成其独立者是也。”

欧阳询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宽猛得宜，譬如日字之小，难与国字同大，如一二字之疏，亦欲字画与密者相同，必当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带得宜，然后为上。”

米芾曰：“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为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

冯钝吟曰：“张长史云：‘小字展令大’，尽笔势为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锋藏势，使间架有余也，今广平府有颜鲁公‘仪门’字，门字小，仪字大，却相称，殊不见有异，奇迹也。”

第七章

颜鲁公在书学史上之地位

苏东坡曰：“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魏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措手。”朱长文《墨池编》曰：“钟张羲献之徒以奇笔唱士林，天下独知有体势，岂知有原本，惟颜鲁公作字得其正为多，虽与说文未尽合，盖不欲大异时俗耳。”苏东坡与朱长文均以鲁公为书学史上最有成就者；工部称诗中之圣，老病孤舟之篇，万世传诵，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词表，太白、东野、摩诘、飞卿辈虽欲与之一争短长，亦不能不北面，因其或习于浪漫，或近于艰涩，或失于虚无，或伤于艳丽，终不得其正。颜鲁公作字得其正为多，一如杜工部吟诗得其正为多也。或曰：以颜鲁公为杜工部，置王羲之于何处？王羲之书殊飘逸，以诗而论，相当于陶靖节。

黄山谷曰：“奇伟秀拔，奄有魏晋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以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王肯堂《郁冈斋笔尘》曰：“凡作楷书，须笔笔依法书之，钟繇、王羲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余不过真书耳，唐人所谓经生字^①耳。”两者均以鲁公与王羲之之并列之，前者书学之修养既深，持论亦较正确；王肯堂复以智永辈杂然

① 经生字 竹垞曰：“古人不贵小楷，谓之隶书，为胥隶所书耳，梁武帝敕臣下书疏皆用行押书，自书唯署名稍谨耳，唐文皇令三馆诸生，写道释诸经，以其楷正，名经生体，士大夫不为也。”

并陈,似未尽善,上视羲献,下启鲁公,张长史固无愧也,长史草书咸认为千古绝调,然鲁公亦尝其楷法精详,长史之于书学诚多才多艺,王肯堂竟致见遗。固然以鲁公与王羲之的并列,爱之深者已不免为鲁公抱不平,惟仁智各有不同,所见亦不能尽同,似未可厚非之。

郝伯常曰:“二王颜坡之中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况于工乎?二王,书之经也,颜坡,书之传也,其余则诸子百家耳。”是置鲁公于二王之下诸家之上,传为经之释,经为传之本,此说实已没煞鲁公书学之独立性与创造性。若以鲁公书为经,则景度东坡为传,东坡不能平视鲁公也。又其《书磨崖碑后》中有“只字片楮尤当奇,矧其超出二王上”、“古硬陵辄瘞鹤铭,韵胜韬挾兰亭记”之句,与以上论调实自相矛盾。

叶昌炽《语石》曰:“开天以后李北海、颜平原、徐季海父子、柳诚悬昆季,宋之苏米黄蔡,元之赵文敏,皆书林中百世师也。”叶氏之于书学,见闻广博而迄无一系统完整之认识,一部书学辞典而已,闲或有所发挥,大抵人云亦云,抉择能力实不够,以鲁公书为百世师诚不谬,然赵文敏安可尊之为百世师,以鲁公与赵并列,似扬而实抑。

吴宽曰:“颜鲁公平日运笔清活圆润,能兼古人之长,米海岳则猛厉奇伟,终堕一偏之失,以孔门方之,真有回路二子之别。”米不及颜,自属定论;张即之张于湖为颜书之辱家风者,原系正书而言,若论行草当为米芾,学《争坐位》得貌遗神,学《蔡明远帖》神貌两失,而犹自以为诣造极峰,此非辱家风者乎?《海岳名言》又谓:“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①也,安排费工,

① 一笔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相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王献之能为一笔书。”

岂能垂世。”此又数典忘祖之论也。

以上诸家之中，吾人深然苏东坡、朱长文之说，就艺术价值之高，影响后世之大，两方面观察，鲁公实为中国最伟大之书学家，俗儒每以之屈居二王钟张之下，究其原委，无非蔽于唯古论之成见，而未能平心静气作一缜密而深切之研究也。

第八章

关于颜鲁公书学四点辨正

第一节 墨猪辨

王羲之曰：“凡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丰道生《笔诀》曰：“鲜浓者，古所谓无筋无力者，谓之墨猪也。”有以墨猪一词加诸鲁公书者，识者笑之；颜鲁公书骨露筋藏，柳公权书筋骨尽露，研习书学者类能道之，何得谓之墨猪乎？字之骨为大指下节骨，提之则骨健，纵之则骨活。字之肉为笔毫，捺之则肥，提飞则瘦。肉瘦者未必多骨，肉薄者亦未必多骨，肉肥者更未必不多骨，黄山谷且以多骨为鲁公病，曰：“唐自欧虞后，能备八法者，独会稽与颜太师耳，然会稽多肉，太师多骨。”至于筋，范仲淹有颜筋柳骨之说，李后主煜亦坦然承认鲁公最得王羲之之筋。

讥鲁公书为墨猪，大略不出下列二种情形：

专务侧媚极意纤巧之徒，见颜鲁公书之凝重端庄，而不能及其万一，乃出此下策，以精神胜利自我安慰，此为有意之曲解。

叶昌炽《语石》曰：“颜柳诸碑，拓工先砉之使平，又从而挖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朗，久之，浮面一层尽揭，而字逐渐移向下，遂至恶俗之态，不可向迒，圭峰禅师碑前三十年拓本尚清劲有力，今则精神面目迥非本来，此又一病也。鲁公《东方朔画像赞》，余曾见一南宋拓，虬筋槃结，波磔飞动，与今颜书绝异，以明拓本校之，字固未损也。而苍秀之气不逮矣！以新拓本

校之，字仍未损也，而痴肥之状难堪矣，同此一碑，并未重刻，先后工拙霄壤悬绝，使三本并陈于几，谓即从一碑出，其谁信之？家庙、玄秘诸碑皆可类推。”研习书学者或因家藏贫乏，或少鉴赏能力，真迹旧拓，迄未寓目，偶见一二传摹失真之断碑残简，即妄论鲁公书，以致是非莫辨，此无心之误会。

中唐以晚，天下学鲁公书者何可胜计，其中固不能无得貌遗神，多肉微骨近墨猪者，然不能强之鲁公接收此种讥评也。

第二节 屋漏痕辨

屋漏痕者，欲其起止无迹流行自在，正行草法之最上乘也。洎于明清，复有屋漏雨一词替而代之。无雨屋不漏，无漏则无痕，屋漏痕与屋漏雨实二者一也。

陆羽《怀素传》曰：“晚岁颜太师真卿以怀素为同学，邬兵曹弟子问之曰：‘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张长史旭睹孤蓬惊沙之外，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状，未知邬兵曹有之乎？’怀素对曰：‘似古钗脚，为草书竖牵之极。’颜公于是徜徉而笑，经数月不言其书。怀素又辞之去，颜公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颜公脚喟叹久之。”此法系鲁公凝神沉思所自澈悟者也，都穆与田衍皆以为此法系鲁公从张长史处学得，实无根据，鲁公于天宝二年罢醴泉尉，诣洛阳访张长史于裴徽宅师事之，天宝五载罢长安尉后，再访张长史于裴徽宅，有《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之作，迄未有一语涉及屋漏痕也。

具体言之：起止无迹流行自在，即所谓不失篆意耳；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笔亦无挫锋，篆意尽于此矣，盖驻痕病蚕头，缺笔病鼠尾，此为屋漏痕与蚕头鼠尾间之相互关系。

董道以为《祭侄季明文》最得此法，陈绎曾亦深然其说。此外《蔡明远

帖》、《送刘太冲序》、《刘中使帖》、《裴将军诗》亦皆以此法为世所称。

《画禅室随笔》曰：“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以墨猪当之，皆为偃笔，痴人前不得说梦，欲知屋漏痕折钗股于圆熟求之，未可朝执笔而暮合辙也。”如董其昌，可谓深知鲁公者矣。

第三节 蚕头鼠尾辨

米芾曰：“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之差，乃知颜书出于褚也，夫真迹皆无蚕头鼠尾之笔。”吾人初不知蚕头鼠尾之为状何如，惟知米芾以此为病耳。玩味其字义，殆以动物之器官象征笔触之体势而已。

李雪庵著《永字八法》，以牛头、鼠尾、蜂腰、鹤膝、竹节、棱角、折木、柴担为字体八病^①，有牛头而无蚕头，颇疑蚕头为牛头之滥觞。欧阳询以为

① 八病



“努”当如万岁之枯藤，须立笔左偃而下。如水墨滞塞，则呈蚕头状矣。为悬针^①须尽缀地长锥之势，为垂露^②须呈寒谷春笋之坚，如笔弛气疲，回藏失度，不为鼠尾者几希矣。

有味于蚕头鼠尾之本义，而引以为鲁公书之佳胜处，得王世贞一人焉。《弇州山人稿》评《八关斋功德记》曰：“右颜鲁公书，字径可二寸许，方整遒劲中别具姿态，真蚕头鼠尾得意时笔也。”《弇州续稿》评《竹山潘氏堂联句》曰：“公此书遒劲雄逸，而时时吐姿媚，蚕头鼠尾，得意笔，大较与《家庙碑》颀颀。”若使鲁公及米芾地下有知，能不啼笑皆非乎？

《卞山志》称《竹山潘氏堂联句》为“蚕头鼠尾碑”，不知有何出典？郑元庆《湖州石柱记笺释》亦曰：“非孙莘老力为收贮，几乎不与蚕头鼠尾碑胥归销灭也。”又书学批评家称清周青士善蚕头细书，此蚕头细书犹俗语蝇头小楷也，与蚕头鼠尾之不相涉。李石《续博物志》、米芾《鲁公仙迹记》及陈仁锡《书颜鲁公逸事》诸文中有所谓蚕头燕尾与蚕头马尾，均为蚕头鼠尾一词辗转误会所致无疑。

① 悬针 自上而下直而且锐。

② 垂露 如露之欲垂而复缩。



第四节 擘窠大书辨

唐乾元三年七月颜鲁公上表肃宗，乞书《天下放生池碑额》，其中有云：“盖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获广昔贤善颂之义，遂绢写一本，附史元琮奉进，兼乞御书题额，以光扬不朽，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诚。”擘窠大书，世人咸不解其真义，朱文长、杨升庵辈曾加以论列，然迄未获得一明确之概念也。

擘者，大拇指也，《尔雅》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窠者，空也，穴中曰窠。是则擘窠为大拇指中之窠穴，虎口是矣。盖执笔之法原有虎口凤眼之别：大拇指节骨外凸，而与食指环成一圆形是谓虎口。大拇指节骨内凹，与食指吻合而成为一狭缝，是谓凤眼。凤眼势促节短，笔锋自难转旋自如，缺憾在不能自然豪放，天真烂漫，以之作小楷固无不可，作大书则惟有用虎口。《石门文字禅》曰：“鲁公作字多擘窠大书，端劲而秀伟。”王恽《玉堂佳话》曰：“东坡《洗玉池铭》，擘窠大字极佳。”叶昌炽《语石》曰：“李曾伯纪功碑在襄阳，字大径尺，笔笔中锋，衡平竖直，如背嵬阵之不可撼，擘窠第一。”宋之张即之，金之王汤臣，清之吴三桂、冀应熊、梁诗正皆以擘窠大书名世，清汪德容谪居塞上时，欲作擘窠书苦无巨笔，以此推断，擘窠书殆无有不大者矣；大书用虎口，擘窠之本义为把笔于虎口，不亦昭昭乎？

《书学捷要》曰：“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大书用擘窠，然把握提斗大笔，用擘窠仍须双钩，用指揭笔，不可五指齐握。”是以擘窠与拨镫对立矣。或曰：“笔管直，则虎口间空圆如马镫矣。”是以擘窠与拨镫统一矣。按拨镫之

法始自卫夫人，并钟王家传于欧虞褚陆，至陆希声，法大备而名确立，其内容端在以撮、押、钩、抵、格五字运用五指；陈思曰：“镫，马镫也，盖以笔管著名指，中指尖，令圆活易转动也”；观乎此，可知擘窠较为静态，为握笔之法，拨镫较为动态，为运笔之法，不必对立或统一也。

又擘者，分也、裂也、区划也，擘窠似亦可作纵横界格解，纵横界格，分布排列之法也，叶昌炽《语石》曰：“唐以前，碑至精者无不画方罫。端正条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损者，有驳裂者，裂处虽裂，完处仍完，若磨损之极，不惟平漫，甚至无一丝痕迹，《醴泉》、《圣教》诸碑，其初何尝无方格，今则字画之外，但有空地，此无他，椎拓过多，匪朝伊夕，泰山之溜穿石，单极之绳断干，渐靡使之然也，行书大小疏密，各随笔势，固不宜于画格，亦间有通行直格者，但长而细则易裂，且不无挠曲，亦其势然也。”碑碣之上作方格，以使字整齐美观，由来久矣，至字画之外，但有空地，亦未必磨损使然，盖书既成，界格可有可无，或并刻之，或任其湮没；鲁公所书碑碣之无方格者，固可作以上二种解释，然则擘窠果系指纵横界格乎？

宋赵希鹄《洞天清禄》曰：“汉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谓字之配置或左二右三，或左三右二，盖无法于正方形之中划成五边长相等之矩形也，似此，擘窠仍可作方格解；惟昔人题黄山谷正书《法语真迹》曰：“山谷行书，当三钱大，计五百五十余字，皆禅翁澹虑任真翛然自得之语，书法清遒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尘外，后擘窠大书一段。”汪砢玉跋曰：“右鲁直所书法语，大如薤卜华，后年月字，至每行一字，字儿并头菡萏，在宋白楮上，楮高尺余，长二丈，绝无接缝，想公欲毕此纸，故大挥足之耶。”其字大小不一，亦称擘窠，则殊无理由坚持擘窠作方格解，又清张国梁以能擘窠大书虎字称，每纸一字，试问舍侧、勒、努、趯、策、掠、啄、磔之结构而外，更以何者与之配置也。

或曰擘窠本系指某一单字之结构。陈绎曾《翰林要诀》论方法之四“均方”曰：“长者两减阔，短者两减长，小者四减，字形虽有长短阔狭小大，行中须写空中势，须偏著右，或亦各一分。”冯钝吟注曰：“此分窠法，不可不知。”分犹擘也，若此擘窠近于书学习用之九宫格矣！九宫格随字之点画多少疏密，作九九八十一界画均布之，唐时书学家固已奉之为圭臬，然字无论大小，其结构之理皆相类同，世人频称擘窠大书，独不称擘窠小书，吾人否定擘窠为方格或九宫格，此处即有一强有力之明证。

自颜鲁公始，书有以擘窠名者，后世书学家既未加以研究，复滥为引用，多历年所，益发使人莫明其妙，好奇之徒更以擘窠作劈窠，擘与劈，音虽谐而义全异，是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实为名本，名由实生，安能不辨明乎？

第九章

颜鲁公碑帖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张仁蕴德政碑	天宝元年	齐处仲	正书	陕西西安	
工部尚书郭虚己碑	天宝十一载三月		正书		
郭揆碑	天宝十一载三月		正书		
多宝塔感应碑	天宝十一载四月	岑勋	正书	陕西西安	
扶风夫子庙残碑	天宝十一载四月	程浩	正书	陕西华县	
东方朔画像赞	天宝十三载十二月	夏侯湛	正书	山东平原	
东方朔画像赞碑 阴记	天宝十三载十二月		正书	山东平原	
咸宁县孔子庙碑					疑即扶风夫子庙残碑
让宪部尚书表	至德二年四月		行书		
谢兼御史大夫表	至德二年六月		行书		
颜昭甫告身	乾元元年四月				
谢赠官表	乾元元年		行书		
祭侄季明文	乾元元年九月		行书		
金天王庙题名	乾元元年十月十二日		正书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乾元元年十月廿一日		行书		
逍遥楼诗刻石 请 御书碑额表	乾元元年		行书	山西永济	
蔡明远鄱阳帖	乾元二年		行书		
传意帖	乾元二年		行书		
送刘太冲序	乾元二年		行书		
题卢梭伽画壁	乾元初年			大圣慈寺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注
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批答碑	上元元年七月		正书	浙江吴兴	
磨灭记	宝应元年			四川阆中	
鲜于氏离堆记	宝应元年五月		正书	四川蓬安	
颜惟贞赠秘书少监告身	宝应元年七月		正书		
颜氏赠兰陵夫人告身	宝应元年七月		正书		
颜允南碑	宝应元年十一月				
韦缜碑	宝应二年	独孤及			
与郭仆射争坐位书	广德二年十一月		行书		
与郭仆射书			正书		
郭公庙碑铭	广德二年十一月		正书	陕西西安	
郭公庙碑阴记			行书	陕西西安	
郭敬之墓碑				咸宁郭庄	
张淑帖	广德二年		行书		
马病帖			行书		
马纳帖					疑即马病帖
乞米帖			行书		
鹿脯帖			行书		
谢脯帖			行书		
奉事帖	永泰元年闰十月		行书		
峡州别驾帖	永泰二年二月		正书		
东林寺题名	永泰二年六月		正书	江西吉安	
西林寺题名	永泰二年六月		正书	江西吉安	
颜显甫碑	永泰二年				
注尊铭	永泰二年	元结		道州报恩寺	
左伯桃墓诗			正书	江苏溧水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祖关二字	大历二年十月		分书	江西吉安	
靖居寺题名	大历二年十月		正书	江西吉安	
马伏波帖	大历三年四月			浙江绍兴	
颜乔卿碑	大历四年四月		正书	陕西西安	
颜幼舆碑	大历四年四月		正书		
颜允臧碑	大历四年四月				
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	大历四年四月			江西临川	
魏夫人仙坛记	大历四年四月			江西临川	
华盖山王郭二真君碑记				江西崇仁	
逍遥楼三字	大历五年正月		正书	广西临桂	
殷践猷碑	大历五年五月		正书	新安龙洞原	
殷摄碑			正书		
清远道士游虎邱诗及和作	大历五年十二月			江苏吴县	
张景倩碑	大历五年			江西临川	
元子哲遗爱碑	大历五年			江西崇仁	
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	大历六年三月			江西临川	
麻姑山仙坛记	大历六年四月		正书	江西南城	
小字麻姑山仙坛记	大历六年四月		正书	江西南城	
大唐中兴颂	大历六年六月		正书	湖南祁阳	
颜含大宗碑	大历六年十一月		正书	江苏江宁	
臧怀恪碑			正书	陕西三原	
重建颜含碑	大历七年四月		正书	江苏江宁	
八关斋功德记	大历七年		正书	河南商丘	
虎邱剑池四大字			正书	江苏吴县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宋广平碑	大历七年九月		正书	河北沙河	或谓系大历十三年书
宋广平碑侧记	大历七年九月		正书	河北沙河	
与夫人帖	大历七年九月		行书		
故县镇碑铭					
沈氏述祖德碑阴记	大历八年十二月			浙江德清	
谢太傅塘碑阴记	大历八年			浙江安吉	
放生池碑铭	大历九年正月		正书	浙江吴兴	
干禄字书	大历九年正月	颜元孙	正书	浙江吴兴	
竹山潘氏堂联句	大历九年三月	陆羽等	正书		
乞御书题额恩敕 批答碑阴记	大历九年		正书	浙江吴兴	
颜杲卿碑	大历九年		正书	陕西西安	
妙喜寺碑	大历九年			浙江吴兴	
欧阳珣碑	大历十年		正书	河南郑县	
元结墓碑	大历十年十一月		正书	河南鲁山	
柳浑西亭记	大历十二年四月			浙江吴兴	
项王碑阴述	大历十二年五月		正书	浙江吴兴	
射堂记	大历十二年五月	不详	正书	浙江吴兴	
湖州石柱记	大历十二年			浙江吴兴	
浮玉二大字			正书	浙江吴兴	
骆驼桥三字				浙江吴兴	
永兴寺额			篆书	浙江吴兴	
李元靖先生碑	大历十二年五月		正书	江苏句容	
李抱玉碑	大历十二年五月	杨珣	正书	陕西西安	
自书刑部尚书告	大历十二年八月				
杜济墓碑	大历十一年十一月		正书	陕西西安	
杜济墓志	大历十二年十一月		正书	陕西西安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张敬因碑	大历十二年		正书	河南临颍	
康希铎碑	大历十二年		正书	浙江绍兴	
殷君夫人颜君碑			正书	河南洛阳	
湖州帖			行书		
湖州石记				浙江吴兴	
怀圆寂上人诗	大历十三年二月		正书		
马磷新庙碑	大历十四年四月	程浩	正书	陕西西安	
马承光残碑		不详		甘肃涇州	
颜勤礼碑	大历十四年		正书	陕西西安	
宣州残碑	大历十四年	不详		安徽宣阳	
新政县碑				四川阆中	
颜默残碑			正书	安徽阜阳	
颜家庙碑	建中元年七月		正书	陕西西安	
自书太子太师告	建中元年八月		正书		
王密碑	建中二年十月	李舟	正书	浙江金华	
朱巨川告	建中三年六月		正书		
元鲁山墓碣	建中四年秋	李华	正书	河南伊阳	
唐兴寺主碑		不详	正书		
张府君碑					
守政帖					
与柳冕帖			草书		
奉命帖	兴元元年		行书	陕西大荔	
移蔡帖	贞元元年		行书		
颜元孙墓志残碑					
颜母陈夫人墓碑				河南邓县	
颜氏残碑					集古录指为 颜允南碑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唐处士颜君碣	不详		正书	江西星子	
颜府君碑	不详			江苏江宁	
横山庙碑	不详			安徽广德	
鲜于仲通碑				四川阆中	
祖亭碑				江西九江	
兴唐寺元偁法师碑		不详			
开元寺僧残碑			正书		
臧氏纠宗碑			正书	陕西三原	
臧氏故宅碑	不详			陕西三原	
北岳庙碑	不详				
鲜于氏里门记	不详			四川蓬安	
宝盖山记	不详			江西临川	
送辛晃序			行书		
祭颜杲卿并十三 侄文			行书		
旌节敕			正书		
颜允南父惟正赠告			正书		
颜允南母商氏赠告			正书		
颜元孙告身					
岭南刺史绫告			正书		
寒食帖			行书		
二十二字帖			行书		
与卢仓曹帖			行书		
刘中使帖			行书		
送文殊碑文帖			行书		
开府帖			行书		
卢侯帖			行书		疑即与卢仓 曹帖

(续表)

碑帖名称	书写年代	撰文者	字体	所在地	备 注
瑶台帖			行书		疑即怀圆寂上人诗
篆籀帖			行书		
中夏帖			行书		
送书帖			行书		
缣缃帖			行书		
与澄师帖					
汝越帖					
江淮帖					
登平望桥下诗					
裴将军诗					
全卞公墓题字			正书	江苏江宁	
志公像赞				江苏江宁	
临诸家法帖					
华严经					
小字华严经					
摩利支天经			正书		
皋陶碑				山西临汾	
旌儒庙碑				陕西临潼	
霄汉阁石刻				四川广安	
天中山三字			正书		
真卿二字					
龙溪二大字					
韵海二字					
顿首二字					
					共二〇六种

第十章

颜鲁公碑帖之流传

第一节 摹 刻

唐开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杨汉公以《干禄字书》旧本伪缺，乃重摹刻石，并为记附于碑后。

唐大中间宋州刺史崔倬于前刺史唐家得《八关斋功德记》模石本，遂摹刻之，盖鲁公之石幢于会昌中为刺史邑宰鋸凿，大中间已瘢痍满目，不可复识矣。

宋太平兴国七年释梦英写《夫子庙堂记》刻于西安学府。

宋王子野摹《乞米帖》刻石，分赠亲友。

宋庆历中吴中复守永兴，谓安氏石本《争坐位》未尽笔法，因再摹刻之。

宋熙宁五年孙莘老筑墨妙亭，收鲁公碑残迹三十二种。

宋苏轼手拓安师文所藏《争坐位》数十本。

宋靖康元年七月秘阁修撰知同州唐重刻《奉使帖》并摹鲁公之像。

宋绍兴三年府尹宇文时中刺湖州，参校鲁公《干禄字书》及杨汉公之摹本，令通颜书之士摹勒刻石于潼川学宫。

宋绍兴中吴玠摹刻《中兴颂碑》费少南跋。

宋淳熙十三年覆刻修内史帖及同年南渡后所得内府真迹而摹刻之曰：《淳熙秘阁续帖》。内有鲁公之《送刘太冲序》。

宋庆元间李兼出《送刘太冲序》真迹，刻石置于县斋。

宋嘉定八年丞相留正子元刚刻《忠义堂帖》置宋人祭祀鲁公之忠义堂中其细目如下：

第一卷 《移蔡帖》、《争坐位帖》、《奉命帖》、《与蔡明远帖》、《寒食帖》、《邹游帖》、《朝回帖》、《乍奉辞帖》、《鹿脯帖》、《乞米帖》、《捧袂帖》、《峡州帖》

第二卷 《修书帖》、《守政帖》、《广平帖》、《中夏帖》、《与夫人帖》、《华严帖》、《文殊帖》、《一行帖》、《鹿脯后帖》、《书马伏波语》、《讯后帖》、《送刘太冲序》、《送辛晃序》

第三卷 《裴将军诗》、《书清远道士诗及和作》、《麻姑山仙坛记》

第四卷 《东方朔画像赞及碑阴记》

第五卷 《郭公庙碑铭上》

第六卷 《郭公庙碑铭下》

另卷一 《颜昭甫赠华州刺史制》、《颜元孙制》、《颜惟贞赠秘书少监制》、《兰陵郡太君殷氏赠兰陵》、《郡太夫人制》、《颜真卿刑部尚书告身》、《颜真卿太子少师告身》

宋嘉定十年东平巩嵘续刻《忠义堂帖》于另卷一内补入《御史帖》、《南来帖》、《草篆帖》、《江外帖》、《送书帖》五种，又以《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并御书批答》为另卷二。

宋宝祐五年衡阳陈兰孙以湖州本《干禄字书》侵木。

宋庐江李氏摹颜鲁公临王羲之二帖，刻入《甲秀堂帖》。

宋时《中兴颂》再刻于资州东岩北岩及剑州鹤鸣山。

宋时集颜书者有宝祐元年之《胜因院记》。

元皇庆二年《扶风夫子庙残碑》重刊于广州。

元至元四年集颜书《默庵记》。

元至正元年太平路总管贾度重摹《夫子庙堂碑》。

明宪宗子益王祐檃广访宋拓《麻姑仙坛记》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

明长洲文氏刻《停云馆帖》十卷，第一卷为晋唐小楷，摹入《小字麻姑仙坛记》，第三卷摹入《祭侄文》及《朱巨川告》。

明华亭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摹入《争坐位》、《澄师帖》、《送刘太冲序》、《刘中使帖》、《湖州帖》、《朱巨川告》、《自书太师告》。

明万历间季膺重刻从姑山房所藏《麻姑仙坛记》。

明万历锡山安国刻《送裴将军诗》于石。

明崇祯十一年孙退谷亲至河南拓《宋广平碑》。

明崇祯间嘉善魏学濂校正《争坐位》刻石行世，摹者为钱旂。

明吴用卿摹《祭侄季明文》刻入《余清帖》。

清康熙间清标梁蕉林刻《秋碧堂法帖》内有《竹山潘氏堂联句》。

清马曰璐得宋槧《干禄字书》因翻刻之。

清乾隆中御刻墨妙轩本、孔继涑玉虹鉴真本、谢希曾契兰堂本《争坐位》，又命大学士彭元瑞撰《争坐位考证》。

清乾隆中命合刻《朱巨川两告》为一卷，御笔批其端曰：“其人乃因书以传。”

清乾隆中摹《湖州帖》刻入《三希堂法帖》。

清翁方纲摹写《祖关》二大字。

清道光四年丹徒包祥高得《谢赠祖官表》、《谢兼御史表》、《让宪部尚书表》草稿刻于汉上。

清道光二十一年浮梁黄瑜命工摹刻《浮玉》二大字于黔阳芙蓉楼，款系从放生池碑阴记移置。

第二节 修 葺

唐贞元十八年《颜杲卿碑》石折，元和元年孙男证重建立。

唐大中间郑薰作镇到溧水，召工匠移《左伯桃墓诗》坎窞于北望楼西隅。

宋太平兴国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都院孔目李延袭移置《颜家庙碑》于府城孔庙中。

宋绍兴七年五月十四日大风折《李元靖碑》，云间沈作舟扶起之。

明永乐十一年民家掘地，复得北京本《争坐位》二石，与原存二石合成完物。

明正德十二年方思道知沙河县出《宋广平碑》于土中，重树于墓，有《断碑集》一书以纪其事。

明崇祯十一年《八关斋功德记》为水浸及，郡人张翻迁之。

清康熙中郑元庆搜得《湖州石柱记》真本，补亡订讹，笺释详尽。

清齐怀瑜言于当事，将《殷君夫人颜君碑》由河南旧府治门内移置关将军庙中。

清乾隆五十七年钱大昕至玉晨观访《李元靖碑》得残片二十三，详加考订，得七百六十六字，于玉晨观筑石台两行，一残碑，一补石，又以文字颠倒，故另缩小字勒碑于旁。

第三节 收 藏

宋开宝七年四月三十日钱俶入藏《书清远道士诗及和作》。

宋欧阳修《集古录》所收鲁公碑帖目：《东方朔画像赞》及《碑阴记》一种、《靖居寺题名》二种、《麻姑仙坛记》一种、《小字麻姑仙坛记》一种、《中兴颂》二种、《干禄字书》三种、《欧阳瑱碑》、《射堂记》、《张敬因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颜允南残碑》、《湖州石记》、《蔡明远帖》、《寒食帖》、《二十二字帖》、《乞米帖》各一种。《宋史》本传曰：“好学嗜古，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则似《集古录》所收者均为欧阳文忠所家藏者；《射堂记》得于某仆射家、《中兴颂》得于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张敬因碑》得于滁州太守任内、《干禄字书》系其家藏，凡此均有文献可稽。

宋宣教郎永与安师文家藏《争坐位》、《鹿脯帖》、《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祭侄季明文》真迹。

宋王子野家藏《乞米帖》真迹。

宋驸马都尉王晋卿家藏《顿首夫人帖》真迹。

宋朝请郎苏舜家藏《乞米帖》、《鹿脯帖》。

宋朝奉郎临江许廉先家藏《书岭南刺史绶告》。

宋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家藏《送辛晃序》真迹。

宋张直清藏《捧袂帖》。

宋张汝钦藏《奉事帖》、《张淑帖》。

宋哲宗时中书钱總家藏《寒食帖》。

宋元祐中德清太守林希藏摧裂之《沈氏祖德碑》十六段于县府。

宋米芾得《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宋刘泾在宿州，收藏白麻纸临颜书《送刘太冲序》。

宋观察李士衡家藏《鹿脯帖》、《祭侄季明文》、《马病帖》。

宋润州苏氏家藏《文殊碑》。

宋宣和内府藏颜鲁公碑帖二十八种：正书有《颜允南碑》、《父惟贞赠告》、《颜允南母商氏赠告》、《竹山潘氏堂联句》、《朱巨川告》、《疏拙帖》、《争坐前帖》。行书有《争坐后帖》、《送文殊碑》、《顿首夫人帖》、《与李光颜太保帖》、《蔡明远鄱阳帖》、《送刘太冲帖》、《刘中使帖》、《开府帖》、《卢候帖》、《篆籀帖》、《中夏帖》、《湖州帖》、《送书帖》、《乞米帖》、《鹿脯帖》、《缣缃帖》、《马病帖》、《送辛晃序》、《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祭侄季明文》。此见于《宣和书谱》，又《铁围山丛谈》称宣和御府藏颜鲁公碑帖八百种，不知何据。

宋赵明诚以所藏碑帖编成《金石录》，颜鲁公部分计有第七百七十二《醴泉县令张仁蕴德政碑》、第一千三百《工部尚书郭虚己碑》、第一千三百一《河南参军郭揆碑》、第一千三百三《多宝塔感应碑》、第一千三百二十六、一千三百二十七《东方朔画像赞》、第一千三百五十七《祭侄季明文》、第一千三百五十八《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第一千三百五十九《金天王庙题名》、第一千三百八十一至一千三百八十三《离堆记》、第一千三百八十四《颜惟贞并殷夫人赠告》、第一千三百八十六《赠太保郭敬之庙碑》、第一千三百九十六《东林寺题名》、第一千三百九十七《西林寺题名》、第一千四百五、一千四百六《鲜于仲通碑》、第一千四百二十八《富平尉颜乔卿碑》、第一千四百四十、一千四百四十一《丽正学士殷践猷碑》、第一千四百五十《麻姑仙坛记》、第一千四百五十一《小字麻姑仙坛记》、第一千四百五十五至一千四百五十七《中兴颂》、第一千四百六十至一千四百六十二《颜含大宗碑》、第一

千四百六十三、一千四百六十四《重建颜含碑》、第一千四百六十六《项王碑述阴》、第一千四百六十九至一千四百七十二《宋广平碑》、第一千四百七十三《宋广平碑侧记》、第一千四百七十七至一千四百八十二《关斋功德记》、第一千四百九十六《干禄字书》、第一千四百九十七、一千四百九十八《放生池碑》、第一千四百九十九《乞题放生池碑阴记》、第一千五百《放生池碑阴记》、第一千五百四《颜杲卿残碑》、第一千五百八、一千五百九《商州刺史欧阳珣碑》、第一千五百十九《湖州射堂记》、第一千五百二十《李抱玉碑》、第一千五百二十一、一千五百二十二《李元靖碑》、第一千五百二十八、一千五百二十九《杜济碑》、第一千五百三十《杜济墓志铭》、第一千五百三十一、一千五百三十二《康希铕碑》、第一千五百三十三《怀圆寂上人诗》、第一千五百四十《马璘新庙碑》、第一千五百四十四《开元寺僧残碑》、第一千五百四十四、一千五百四十五《张敬因碑》、第一千五百四十六、一千五百四十七《颜勤礼碑》、第一千五百四十八、一千五百四十九《臧怀恪碑》、第一千五百五十《唐兴寺主碑》、第一千五百五十一《颜处士残碑》、第一千五百五十三《颜默残碑》、第一千五百五十五、一千五百五十六《元结碑》、第一千五百五十七《与郭仆射书》、第一千五百五十九《马病帖》、第一千五百七十二《王密碑》、第一千五百七十七《元鲁山墓碑》、第一千五百八十《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第一千六百五十《与蔡明远帖》。

宋南渡后《刘中使帖》入绍兴内府。

宋天台谢弈修养浩斋藏《鹿脯帖》、《乞米帖》。

宋徐容斋藏《自书刑部尚书告》。

宋乔达之藏《马病帖》。

宋嘉熙间临安知府宗室赵与勳藏《湖州帖》。

宋末仙都观圯吴道士携玉版《麻姑仙坛记》置云崖山。

元初张可与家藏《刘中使帖》。

元至元二十三年大梁王芝从张嘯江处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询《卜商帖》易得《刘中使帖》。

元至元二十四年丹徒郭天锡得《书清远道士诗及和作》，藏之快雪斋。

元至大间史处厚家藏《刘中使帖》。

元赵子昂入藏《乞米帖》真迹。

元袁桷入藏《争坐位》米芾临本。

明永乐中雷豫入藏玉版《麻姑仙坛记》。

明永乐十五年杨士奇得《八关斋功德记》拓本。

明新都吴氏藏《祭侄季明文》真迹。

明马抑之藏《争坐位》米芾临本。

明长安赵士桢售出《送刘太冲序》真迹。

明韩存良家藏白麻纸书《自书太师告》真迹。

明弘治间史明古家藏《刘中使帖》。

明嘉靖间无锡华中甫真赏斋藏《刘中使帖》与《朱巨川告》。

明范质得罗邛王府藏《华严经》。

明张丑藏《祭侄季明文》真迹。

明太仓王世贞尔雅楼藏鲁公碑帖甚多：《中兴颂》、《李抱玉碑》、《颜家庙碑》、《东方朔画像赞及碑阴记》、《祭侄季明文》、《祭伯父豪州刺史文》、《多宝塔感应碑》、《八关斋功德记》、《元次山墓铭》、《争坐位》、《干禄字书》、《汝越帖》、《茅山碑》、《臧怀恪碑》、《金天王庙题名》、《送裴将军诗》、《竹山潘氏堂联句》、《宋广平碑及碑侧记》。

明松江项氏天籁阁藏《刘中使帖》。

明陈继儒藏《朱巨川告》。

明万历间式古堂得《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明王长安家藏《鹿脯帖》。

明合肥王纳言家藏《送刘太冲序》。

清梁清标藏《自书太师告》为年双峰购去，又所藏《竹山潘氏堂联句》后人翁宛平家。

清康熙初钱陆灿藏宋拓《争坐位》。

清康熙间刘清藜藏《中兴颂》、《殷君夫人颜君碑》、《元结碑》。

清杨宾铁函斋得谭书两函：万楼藏西安府学拓本《争坐位》及福州故家本《争坐位》，又于京师及福建各得《颜家庙碑》旧拓一本，后又得《中兴颂》及旧拓《东方朔画像赞并碑阴记》。

清姜学在藏宋拓《争坐位》。

清金见素家藏宋拓宋装《多宝塔感应碑》。

清陈对初藏旧拓《东方朔画像赞并碑阴记》。

清钱大昕藏旧拓《多宝塔感应碑》。

清末保定王璧臣藏《刘中使帖》真迹。

民国成立后李石曾家藏《刘中使帖》真迹。

故宫博物院藏《祭侄季明文》真迹。

第十一章

颜鲁公碑帖考证

第一节 《张仁蕴德政碑》

此碑赵明诚初疑为与鲁公姓名相同者所书，既而又曰：“或云碑虽建于长寿中，至鲁公为尉重书而刻之，未可知也。”缘鲁公景龙三年始生，长寿中当无其人也，是以疑端生焉。实则此碑为旧碑，由鲁公重书，当可置信，鲁公于天宝元年十月曾任醴泉尉，张仁蕴即六朝周时之醴泉县令也，如《东方朔画像赞》即鲁公在平原太守任内重书旧碑刻石者，《东方朔画像赞》撰者夏侯湛为魏晋间人，上距鲁公凡四百余年，亦已远矣，幸有碑阴记以为佐证，而此碑则无。或谓此碑笔法与鲁公他书不类，要知书学创作非机器之生产，安可求其绝对之整齐划一乎？《宣和书谱》曰：“颜鲁公忠贯白日，识高天下，其书千变万化，各具一体。”《墨池编》曰：“观《中兴颂》则阔伟发扬状其功德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可知鲁公其他碑帖，亦各有其不同之风格与笔法。黄本骥曰：“若谓笔法与鲁公他书不类，公罢醴泉后始与张长史旭讲求笔法，至天宝五载作《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书学始大进，此书作于未师长史之前，宜其笔法与他书不类也。”亦颇有独到之看法。至于疑为与鲁公同姓名者所书一节，实神经过敏之谈，梁元帝撰，唐陆善经、元叶森增补之《古今同姓名录》即未刊载，隋唐之稗官野史中亦始终未发现另有另一颜真卿。

第二节 《郭家庙碑阴》

此碑究系何人所书？金石学家纷争久矣！王澐谓鲁公所书，然所持之理由为“公既已大书其前，谁更敢续貂其后”。亦极脆弱，不堪一击，鲁公所书之《多宝塔感应碑》碑阴非即吴通微所书之《楚金禅师碑》乎？王澐特未知之，何也？赵崧曰：“观其笔力，似非鲁公不能也。”是模棱两可之辞。杨宾否定为鲁公书，未有充分之证据提出。黄本骥以张少悌之《长安崇圣寺经幢》笔迹与此相类，又曾书鲁公所撰之《临淮王李光弼神道碑》，故即认为此碑阴亦张少悌书，此种推测仍未能令人满意，此处碑阴为附属性而非独立性，不可能为他人之笔。世人惟恐己书之不传，附骥续貂于大家碑碣之阴固已屡见不鲜，然无有不另具姓名，此碑阴则无之。鲁公所书碑碣之附属性碑阴如《东方朔画像赞碑阴记》、《放生池碑阴记》皆为鲁公本人书，此碑何能例外。审其笔迹固近张少悌之《长安崇圣寺经幢》，然更近鲁公之《祭侄季明文》。根据以上三点，当可确信为鲁公所书无疑。

第三节 《杜济墓志铭》

此铭仅知为鲁公所撰，而不见书者姓名，欧阳修认为其笔法非鲁公不能为，然不敢下断语，犹欲俟识者辨之，赵明诚则肯定为鲁公之手笔，此铭之书者舍鲁公外，他人之可能性不多，固然鲁公撰而非鲁公书者有广德二年十一月张少悌之《临淮王李光弼神道碑》然与此墓铭不能同日而语，因杜济与鲁公之关系殊密切，鲁公与杜济皆娶于京兆韦氏，同为房州刺史韦景骏之孙婿、太子中舍韦迪之女婿，杜济之夫人行三，与鲁公夫人孰长孰幼？

则不可考矣。另有《杜济碑铭》书者撰者皆为鲁公，其文与《杜济墓志铭》大同而小异，吾人以鲁公为《杜济墓志铭》之书者，不亦合理乎？

第四节 小字《麻姑仙坛记》

此帖欧阳修跋曰：“右小字《麻姑仙坛记》，颜真卿撰并书，或疑非鲁公书，鲁公喜书大字，余家所藏颜氏碑最多，未尝有小字者，惟干禄字书法最为小字，而其结体与此记不同，盖干禄之清舒和而不局蹙，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颇以为惑，及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故聊志之以释疑者。”

赵明诚曰：“验其笔法殊不类，故正字陈无己谓尝见黄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鲁直犹能道其姓名，无己不能记也。”孙退谷曰：“至行世蝇头小书，乃庆历中人伪书，载《金石录》，而今举世奉为楷模误矣！”叶昌炽曰：“小字《麻姑仙坛记》，疑为缩临之本。”此三人为怀疑最深者，孙退谷根据赵明诚，赵明诚根据陈无己，陈无己根据黄鲁直，至于黄鲁直是否曾作此语实为疑问，无文献可征也。叶昌炽疑为缩临之本，试问缩临于何代何年？为何人缩临？不能置答也。

陆放翁曰：“颜鲁公《麻姑仙坛记》、东坡先生《经藏记》皆有大字小字两本，盖用羊叔子岘山故事，千载之后陵谷变迁，尚冀其一存耳。”《通志金石略》载鲁公书亦有小字《麻姑仙坛记》、《铁函斋书跋》与《金石萃编》均从笔力方面判断为鲁公所书，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于《麻姑仙坛记》之下注明：并正书小字本，此皆肯定为鲁公书者。鲁公之书《麻姑仙坛记》与羊叔子岘山故事殊不类羊叔子登岘山，念及由来登临此山者皆湮没无闻，

乃怆然伤怀，及叔子卒襄阳人方建碑立庙祀之，叔子本人并未留任何纪念于岷山也。鲁公深恐后世有陵谷之变，每游名山，必刻姓名一置高山，一置深谷，此孙退谷亦尝言之，墓铭碑记之类则均仅一本，何以此帖独另有小字本。其笔力风格，不逮《干禄字书》远甚，故亦难断定为鲁公书，尚希书学家详加考证焉。

第五节 《江淮帖》及其他

今鲁公文集中之《江淮帖》系自《汝州帖》中录出，《汝州帖》一名《汝帖》，计十二卷，每卷有汝州印，其石不佳，刻工亦拙，予世人之印象至为恶劣，咸认为诸帖中之最下乘者，虽获流传，终遭社樗之讥，宜乎世人怀疑《江淮帖》之真实性矣。王澐曰：“下令之少司寇收鲁公《江淮帖》，仆以刘太冲、蔡明远、寒食等帖细意对校，字字皆同，则知此为好事集鲁公字双钩^①所成。”此项见解当可成立。《江淮帖》文曰：“真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趋百里，本期奉见，以慰远别，疲于道路，且止数昔，但深攀仰耳。”其中真、卿、行、江、淮、日、道、路诸字见《刘太冲帖》，真、卿、一、行、昨、江、淮、趋、百、里、期、见、以、远、疲、于、路、数、耳诸字见《蔡明远帖》，行、曰、耳诸字见《寒食帖》，未见者仅本、奉、别、且、止、但、深、攀、仰等九字而已，于其他帖中均可集出，则此帖由好事者双钩而成之可能性亦绝大。

《湖州石记》及《湖州石柱记》欧阳修均定为鲁公所书。

① 双钩 以法书摹刻石上，沿其笔画墨痕迹，两边用细线钩出，秣纤肥瘦，不失其真曰双钩。

第十二章

颜鲁公系书学家之成就

第一节 柳公权

柳公权(唐大历一三年(778)——咸通五年(864)),字诚悬,京兆华原人,穆宗时以夏州书记入奏,穆宗赏识其书学,留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官至太子太保,当时公卿权贵之碑志大多为其手笔。公权自谓深得钟王欧虞褚陆诸家笔法,独未强调所受鲁公之影响,柳出于颜,苏东坡、宋仲温主之最力,解缙之《书学传授谱》以柳为颜鲁公书学之嫡传者。《逊志斋集》曰:“颜柳之书余一见即知其美,今始识其用意之妙。”《画禅室随笔》曰:“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则方孝孺与董其昌似亦默认柳为颜之一脉矣。

颜与柳共通之点在乎力,世人以刚劲形容颜书,以劲媚形容柳书,劲者,力量充沛而精神饱满也,柳化刚为媚,略变颜书朴素无华之本来面目。王世贞曰:“颜书贵端,骨露筋藏,柳书贵遒,筋骨尽露。”米芾《海岳名言》曰:“颜真卿书如项羽按剑,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柳公权书如深山得道之士,修炼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凡此均以说明颜柳有共通性,亦各有其个性色彩底发展。柳书之摹仿性与创造性平分秋色,后世取法者亦众,故已成为一自立门户之书学家矣。然究其源本,受颜之影响实最深,《多宝塔感应碑》及《宋广平碑》为颜书之较清瘦

者，均可能为柳氏之蓝本。

第二节 杨 景 度

杨景度(唐咸通一四年(873)——后周显德元年(954))，华阴人，登唐进士第，为秘书郎，历梁、后唐、晋、汉至周，迁太子少保，性放逸，自称希维居士或关西老农，居洛下十九年，足迹所至，纵笔而书，时人均以杨风子呼之。颜柳与颜杨之关系颇异趣，柳宗正楷，杨攻行草，柳尤不时频出新意，杨则刻意求古，用笔结体，在在以鲁公为法，亦曾一度爱好王羲之与欧阳询，但其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品中，全无王羲之之飘逸情调与欧阳询之清腴风度，宛然鲁公之笔。欧阳修以为景度之与鲁公当在伯仲之间，董其昌曰：“独杨凝式笔势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可称书之豪杰，不为时代所汨没者。”王钦若曰：“公字与颜公一等，俱称绝异。”其为人推重如此。代表作有《夏热帖》与《韭花帖》，前者出于《刘中使帖》，后者出于《争坐位》，皆极见流行，后世宗颜者多兼宗杨，如米芾、苏东坡是。

第三节 宋 代 诸 家

《墨池璫录》曰：“若夫宋之苏黄米蔡，群公交作，极一代书家之盛，其搆势虽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颜柳他求者也。”《钝吟书要》曰：“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

石延年(宋淳化五年(994)——康定二年(1041))，字曼卿，正书自然雄逸入妙品，尝舣舟于泗州之龟山寺，僧请题壁，乃剧醉卷毡而书，一挥而成，

使善书者虽累月构思以为之，亦不能及也。范仲淹《祭石曼卿文》曰：“曼卿之笔，颜筋柳骨。”

蔡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治平四年(1067))，字君谟，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大学士，知杭州，工书，积学深至，心手相应，真行草皆入妙品，为仁宗所深爱，制《元舅陇西王碑》，命书之，又与欧阳修善，尝为其书《集古录》自序刻石，其行书、草书脱胎于鲁公，而旁及张芝、张旭，真书纯然鲁公家法。论其作品：《寒蝉赋》近褚河南，“二帖”及“十帖”近王羲之，《桥柱题记》最逼似鲁公。宋徽宗目蔡襄为宋代之鲁公，王世贞曰：“万安天下第一桥，君谟此书雄伟道丽，当与桥争胜，结法全自颜平原来，惟策法用虞永兴耳。”苏轼谓蔡襄最初学《周越书》，然亦承认其变体出于鲁公，至于谓《万安桥柱题记》与鲁公相较，有青胜于蓝之妙，则又未免近于夸饰矣。蔡襄之于书，颇为珍秘，轻易不肯动笔，自晋王献之以来，自重如此者，一人而已，与鲁公之斯泰哈洛夫式之创作热情成鲜明之对照，当其书《昼锦堂记》，每一字书数字，择其最佳者存之，名曰百衲碑，此种严肃之创作态度，虽可以钦佩而不足取法，盖艺术之为艺术，灵感一至，不能自休，若此逐字摘集，全无笔意相属一气呵成之妙矣。苏黄米蔡，此之谓宋代四大书家，东坡推崇蔡襄为宋朝第一，鲜于枢亦然此说，倪瓒以为米不如蔡，陈文东为蔡屈居三公之后而抱不平。

苏轼(宋景祐三年(1036)——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人，嘉祐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兵部尚书。文章、诗词、书学、绘画无所不精，少时手抄经史皆一过，心得殊多、而书学亦工矣，不择纸笔而但求适意为其特色，每以作品持赠亲友，及蔡京、蔡卞父子用事，坐东坡党籍，文辞墨稿焚毁略尽，政和间弛禁然已不可多得，至宣和间，内府不惜以一纸万金之巨值四出采访。黄山谷与东坡俱学鲁公，山谷自以为不如东坡，东坡曾

悉心临摹《与蔡明远序》、《祭侄季明文》、《祭豪州刺史文》、《鹿脯帖》、《天气殊未佳帖》，复于安师文处见及《争坐位》真迹，遂获飞跃之进步，行草、正楷均能近似，故东坡常以鲁公自况。王世贞曰：“苏文忠正行人徐浩、李邕，肇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①王世贞犹非深知东坡者，东坡行书篆籀意味至浓，纯取法于《争坐位》也。李善长亦称东坡晚年喜李北海，实则东坡早年攻《兰亭》，中年改学鲁公，迨乎晚年，颜王交杂，有似李北海，《养老篇》与《书陶靖节〈清晨闻叩门诗〉》，此种特色表现无遗。东坡大书之行世者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袁州学记》皆甚端庄凝重。黄山谷曰：“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又曰：“兼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本朝善书，自当推公第一。”

黄庭坚（宋庆历五年（1045）——崇宁四年（1105）），号山谷，仕于哲宗、徽宗二朝，又曾为神宗实录检讨官，称为太史，诗名闻海内，工行草、正楷，古今碑帖之中予山谷印象最深者为《瘞鹤铭》，此碑在镇江焦山，为正楷，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此逸少是否王羲之实为问题，汪士铎、顾元庆均有专著《瘞鹤铭考》问世。山谷曰：“按《瘞鹤铭》，《润州图经》以为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鲁公笔法，不知何人所书也。”又曰：“《瘞鹤铭》惟颜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故山谷虽力追《瘞鹤铭》，犹以鲁公之后继者自命也。至于行草，自谓学《蔡明远帖》不能得其仿佛，是谦虚语，亦是本心语，仅略存《争坐位》之笔意耳，实混王羲之、张长史为一体矣。文徵明以为山谷书学得屋漏痕、折钗股之法，祝允明以为神爽冥会，得晋人之韵，独王世贞抑之颇力，谓笔法轻弱，书势倾侧，不足流传。

^① 碑侧记 《宋广平碑侧记》。

米芾(宋皇祐三年<1051>——大观元年<1107>),字元章,襄阳人,累官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书画并工,家有宝晋斋,所藏古帖汗牛充栋,又尝入宣和殿遍观禁藏奇珍,徽宗破格优遇之,谓其人不可拘以礼法。吕企中曰:“襄阳米礼部,生平无他嗜好,独游神心画,好学颜书,已而厌其俗,闻有李邕法,又恶之,遂学沈传师,其后数改,遂成名家。”董其昌谓其学《蔡明远帖》一无成就,殆因此而厌,亦未可知也。彼之作品,舍《天马赋》而外,类多行草,自以为“一洗二王之恶札,而照耀皇宋于万古”,狂言也。“画山水歌并绝句”尚有《争坐位》余韵,文徵明曰:“今观此卷,出入颜平原,无一笔李北海。”一语道破米芾之病者为倪瓒,《题蔡君谟〈十帖〉》曰:“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珠玉,米老虽追踪晋人绝轨,其气象怒张,如子路未见夫子时,难与伦比也。”

张即之(宋淳熙一三年<1186>——景定四年<1263>),字樗寮,和州历阳人,以能书闻天下,喜作擘窠大书,不一诗辄尽一幅,好作杜工部《古柏行》,《一统志》亦称其善大书,今所传《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正楷,大不过指,亦俊健可观。书学批评家中,以王世贞对张即之批评最苛,曰:“张即之非不遒劲,而粗丑俗恶,种种可恨,是颜柳之疏裔,辱家风者。”又曰:“米氏父子最盛行,世学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独盛,遂有张于湖之险涩,张即之之恶谬极矣。”实则末流所趋,精神尽失,书学史上比比皆是,又非独张即之为然也。

第四节 宋代以晚诸家

董其昌(明嘉靖三四年<1555>——崇祯九年<1636>),松江人,字玄宰,万历进士,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至忘寝食,官至礼部尚书,以书名一代,其

飘逸处似米芾，侧媚处近赵吴兴，惟十七岁时即写《多宝塔》，其后临写并校订汪太学孺仲所藏之宋拓《争坐位》，又于赵士桢处临写《送刘太冲序》。昔颜鲁公学王羲之而未见形似，陆羽以为已得羲之之筋骨心肺，欧阳永叔学李邕书而绝不相类，自嘲为得其意而忘其形，或曰：董其昌之学鲁公，亦犹鲁公之学羲之，永叔之学李邕也。

傅山(明万历三三年(1605)——清康熙十九年(1680))，山西阳曲人，字青主，工篆隶狂草，亦能画，初学晋唐人不能肖，得赵吴兴墨迹，稍习之，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学正人君子辄苦其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日亲。”于是复学鲁公，《太原段帖》为其得意之笔。其书学理论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反唯美之主张较鲁公更为明显而具体矣。赵秋谷品傅山书为清朝第一，包世臣以其草书列入能品。

蔡启傅(明万历四七年(1619)——清康熙一八年(1679))，德清人，字石公，号岷阳，康熙进士第一，累官右春坊右赞善，有诗集《游燕草》与《存园集》，工书法，得颜鲁公笔意。

梅瞿山(明天启三年(1623)——清康熙三六年(1697))，工书，仿颜鲁公、杨景度，时人谓之“断纨零素，不减苏黄”。

陈鹏年(清康熙二年(1663)——雍正元年(1723))，湘潭人，号北溟，别字沧州，工书法，宗颜鲁公，行草书最神似，尝游焦山，时《瘞鹤铭》陷落江中，乃出之置山麓，覆以亭，并有《瘞鹤铭考》之作，包世臣以其行书入佳品。

王澐(清康熙七年(1668)——乾隆八年(1743))，江苏金坛人，字若林，号虚舟，康熙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曾临摹《竹山潘氏堂联句》、《朱巨川告》、《自书太师告》诸碑帖，家藏尤丰，工行书，正书稍逊之，包世臣以其行书入能品。

庄有恭(清康熙五二年<1713>——乾隆三二年<1767>),号滋圃,书法圆劲,出入颜鲁公、赵吴兴之间,高宗幸嘉兴烟雨楼,召至行所,给札联句,诗成书以勒石。

翁方纲(清雍正一一年<1733>——嘉庆二三年<1818>),大兴人,字覃溪,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金石、谱录、书画、辞章,无所不精,书初学鲁公,继学欧阳询,隶仿《史晨碑》、《韩敕碑》,及至晚年,益见苍古凝重,包世臣以其行书入能品,小真书入佳品。其目力尤为人所道,能于一粒胡麻上书一片冰心在玉壶七字,艺至于此,可谓神矣。

钱澧(清乾隆五年<1740>——乾隆六〇年<1795>),昆明人,号南园,乾隆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时和珅用事,澧疏摘其奸,不畏权贵之声震天下,诗文苍郁劲厚得古意书法逼似鲁公,得力于《争座位》。

谭延闿(清光绪二年<1876>——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茶陵人,字组庵,参加革命贡献甚大,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书法之精近世书学家无出其右。谭瓶庵跋其《麻姑仙坛记》最后临本曰:“先三兄临《麻姑仙坛记》,乃始于甲寅余兄弟奉母居青岛时,其后乙卯在沪,书课尤勤,至辛酉买宅唐山,颇有宾从文燕之乐,偶朝起临写数十通……自壬戌于役海南,还都白下政事日繁遂无复日课,惟最后为乃翁书屏八幅第二百二十通,生平临此碑殆止于是矣。”

宋代以晚之颜鲁公系书学家尚有金之赵沨、元之李雪庵、明之陆文裕、清之龙启瑞等,未有惊人之成就,故从略。

本书参考书目

- | | |
|---------------|-----------------|
| 卞永誉 《式古堂书画汇考》 | 张鹿樵 《自怡悦斋书画录》 |
| 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 张 丑 《清河书画舫》 |
| 文 嘉 《黔山堂书画记》 | 《真迹目录》 |
| 谢佩禾 《书画所见录》 | 张怀瓘 《玉堂禁经》 |
| 王象之 《舆地碑记目》 | 孔少唐 《岳雪楼书画录》 |
| 王 澐 《竹云题跋》 | 孙退谷 《庚子消夏记》 |
| 王 宏 《砥斋题跋》 | 孙星衍 《平津馆鉴藏书画记》 |
| 王森文 《石门碑辞》 | 孙星衍 邢 澐 《寰宇访碑录》 |
| 王麓台 《佩文斋书画谱》 | 邵松年 《澄兰室古缘萃录》 |
|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 | 何良俊 《四友斋书论》 |
| 《弇州续稿》 | 《铭心录》 |
| 夏文彦 《图绘宝鉴》 | 何 焯 《庚子消夏记校文》 |
| 张彦远 《书法要录》 | 《义门题跋》 |
| 乐 史 《太平寰宇记》 | 汪砢玉 《珊瑚网》 |
| 朱和羹 《临池心解》 | 汪 挺 《书法粹言》 |
| 朱履贞 《书学捷要》 | 冯 武 《书法正传》 |
| 朱长文 《墨池编》 | 顾文彬 《过云楼书画记》 |
| 朱存理 《珊瑚木难》 | 顾炎武 《金石文字记》 |

- | | |
|-------------|---------------|
| 《铁网珊瑚》 | 潘之淙 《书法离钩》 |
| 魏了翁 《鹤山题跋》 | 李调元 《诸家藏书簿》 |
| 魏锡曾 《书学绪闻》 | 李竹朋 《书画鉴影》 |
| 号子敏 《大观录》 | 袁 桢 《清容居士集》 |
| 吴荣光 《辛丑销夏记》 | 姚 晏 《中州金石目》 |
| 程祖庆 《吴郡金石目》 | 姚际恒 《好古堂书画记》 |
| 解 缙 《春雨杂述》 | 董 道 《广川题跋》 |
| 包世臣 《艺舟双楫》 | 董 史 《书录》 |
| 安麓邨 《墨缘汇观》 |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
| 安世凤 《墨池琐录》 | 苏 轼 《东坡题跋》 |
| 黄庭坚 《山谷题跋》 | 赵 岫 《石墨镌华》 |
| 黄伯思 《东观余论》 | 赵宦光 《寒山帚谈》 |
| 黄本骥 《颜鲁公年谱》 | 赵希鹄 《洞天清禄》 |
| 叶弈苞 《金石录补》 | 曹明仲 《格古要论》 |
| 叶 盛 《棗竹堂稿》 | 晁补之 《鸡肋编》 |
| 叶昌炽 《语石》 | 毕 沅 《中州金石记》 |
| 林 侗 《来斋金石考》 | 《关州金石记》 |
| 杨 宾 《铁函斋书跋》 | 刘青藜 《金石续录》 |
| 杨士奇 《东里集》 | 刘体仁 《七颂堂识小录》 |
| 杨 慎 《法帖神品目》 | 刘惟志 《字学新书》 |
| 《书品》 | 岳 珂 《赏真堂法帖赞》 |
| 《墨池琐录》 | 陆 游 《放翁题跋》 |
| 《丹铅录》 | 陆时化 《吴越所见书画录》 |

- | | |
|-------------|---------------|
| 都 穆 《寓意编》 | 陈伯稼 《颜鲁公碑帖目》 |
| 《金薤琳琅》 | 陈继儒 《书画史》 |
| 《妮古录》 | 翁方纲 《苏斋唐碑选》 |
| 陈绎曾 《翰林院要诀》 | 《苏斋题跋》 |
| 陈 樵 《负喧野录》 | 姜 夔 《继书谱》 |
| 陈 思 《宝刻丛编》 | 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跋》 |
| 《书苑精华》 | 郑 杓 《衍极》 |
| 《书小史》 | 笪重光 《书筏》 |
| 周 密 《过眼烟云录》 | 米·芾 《海岳名言》 |
| 周星莲 《临池管见》 | 《宝章待访录》 |
| 陶宗仪 《书史会要》 | 《宝晋英光集》 |
| 留元刚 《颜鲁公年谱》 | 撰者不详 《宣和书谱》 |
| 欧阳修 《集古录》 | |

附录

《颜鲁公之书学》的出版、盗版

朋友的报信

工作之余常与朋友谈谈书法艺术。

谈到书法艺术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时,我认为书法艺术虽然在文学艺术界中也有一席之地,但是,显然各种风格流派相互辉映的局面还未出现。例如颜体书法,就是不太流行,这里面可能不完全是欣赏习惯问题。最近这七八年来,形势有了转变,有一点百花齐放的味道了。

在谈到颜真卿时,《新民晚报》记者丹长江忽然插话了:“你是不是还写过一本《颜鲁公之书学》的书,专谈真卿的书法理论的。”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感到奇怪。因为这本书是1948年出版的,而且1949年以后,根本没有重版过。当时由世界书局出版,印数也比较少,所以后来在旧书店里也极少发现。

我自己只是在偶然中知道后来我国台湾的世界书局重印过。那是1978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随便翻阅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藏书目录,他们收藏了我所著的《颜鲁公之书学》,即注明是台湾世界书局版。

因此,我就问是在何时何地见过此书,他已记忆不清,但确实见过。

再问他:“是否解放前上海世界书局印的?还是解放后台北世界书局印的?”

他摇摇头,说:“都不是。好像是武汉古籍书店印的。”听了这话,我将信将疑。这似乎不可能吧!书店印书怎能不先和作者联系呢?我愈想愈困惑,想把这谜底解开的愿望也逐渐高涨了起来。

沈子善选刊

想到这一本《颜鲁公之书学》写作时的艰辛、写成后的寂寞、出书的困难、谋求重印所受的冷遇以及“文革”中为之挨斗的经过,我是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那些往事一幕一幕在我眼前再现了。

在童年时代,由于外祖父孙汾卿老先生的影响,我对书法有了非凡浓厚的兴趣。后来父亲为我购置了《多宝塔》的一个好的拓本,我便集中注意力写颜真卿了。

年岁渐大,感到如果不对颜真卿的书法理论加以探讨,不仅颜体的提高和发展会失去方向,对整个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和保存都是莫大的损失。当初天真地以为总会有人重视这个大问题的,却始终音讯杳然。只是偶有几块颜体的金字招牌挂在店门口,聊以点缀而已。这也难怪,写招牌有一笔为数不小的润笔,写书法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发表和出版都有困难,这是事实。

我从小就固执,对什么发生了兴趣,任何人都难以干扰。不管书法界有什么舆论,也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完全放弃这个课题的探索,我一直在积累资料,一直在思考许多问题:例如《永字八法》是不是把书法艺术的要领都包括了进去呢?为什么许多大家对之又有不同的解释呢?例如颜体的原来面貌就臃肿不堪么?为什么有人讥笑颜体是“墨猪”呢?

又如近亲结婚的结果会使后裔退化,或者生出孩子成了白痴。我也相信这是科学的论证。但是,有没有例外呢?恐怕也不能绝对排除。因为我检索了颜真卿的谱系,颜、殷两家是北方望族,相互通婚一直维持达八代之久,第九代却生了聪明绝顶的颜真卿,书法、文学都甚有成就,而且也是军事家、政治家。因此,我把这颜、殷两家的错综复杂的世系表也整理出来了。

还有,历代学颜体书法的人有哪些人?成就如何?颜真卿一生究竟写了多少碑帖?流传情况如何?哪些已失传了?我也都一一考证,各自写成篇章。

我自己认为这一本小书是空前的创举,当然有点敝帚自珍的感情,但前人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整理工作,也是事实。我的高兴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陷入苦闷之中。那时候,在大后方本来就没有一书法的期刊,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了贵州境内,本来极有限的几本期刊也延期出版或停刊,写成的章节没有一篇能发表。要想出单行本,那更是梦想了。

当日本侵略军的攻势受到牵制以后,重庆稍趋稳定,但到抗战胜利前后,这书始终没有被人重视。我把这部《颜鲁公之书学》看成是命根子,怕遗失,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即使有,我也付不起复印的费用,因此又用墨笔誊写了一遍。有了两本,我才放心下来。我写的是十分端正的颜体蝇头小楷,那时候年轻,才25岁,半个月就誊写完毕,比第一本还清楚干净得多。

我住在北温泉的缙云山里,与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相距只有10里左右。在复旦大学教育系有一位沈子善先生,他组织了一个中国书学会,就在他出的《书学》丛刊上,发表了 my 的《颜鲁公之书学》的第八章《颜鲁公书学四点辨证》。内分《墨猪辨》、《屋漏痕辨》、《蚕头鼠尾辨》和《擘窠大书

辨》四节，共4500字。那个《书学》丛刊印数很少，当然没有稿费，赠书也只是一本，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后来沈先生还写了五六张草书送给我，由于我生活不安定，竟把那一本《书学》和沈先生的墨宝都遗失了。

李石曾推荐

抗战胜利，我千方百计寻找学术界人士，希望能设法使书出版，哪知他们自己的书稿也都寻找不到出路呢。听到书名，觉得过于冷僻，向书店、出版社推荐不一定有用。

那时候，温泉寺铁瓦殿里住着一位专编辞典的杨家骆，我们也常在一起漫谈经史子集，他看完这部原稿，给了很高的评价。至于出版，也觉得够棘手，没有把握。再说，他自己也没有书店或出版社。

杨家骆非找一个靠山不可，他找的靠山是国民党一位很不得势的留法派元老，名李石曾。据说中国在法国巴黎开的第一家豆腐店就是李石曾开的。当然，中国派大批留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也是李石曾当初做的一件大好事。

杨家骆在替李石曾编《世界学典》，他们经常见面。李石曾离重庆东下时，杨家骆在偶然之间和他谈起这部《颜鲁公之书学》，还说到书里面第十章《颜鲁公帖之流传》有“民国成立后，李石曾家藏《刘中使帖》真迹”这一句话。问李石曾，他家里真的收藏了《刘中使帖》没有？

原来确有此事。李石曾觉得非常惊奇。我和李石曾在北温泉见面多次。抗战胜利后，他的世界社在南京、上海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很多次。也没有进一步追究我何以知道这个秘密。他并不是书法家，也没有时间翻阅这样一部考证的论著。完全出乎杨家骆和我的意料，李石曾

就此愿意为此书出版而一口答应了下来。

李石曾先生愿意推荐出版，我心中当然感激。我住在缙云山中，基本上不去重庆市。这部原稿就请杨家骆先生带交给他。时间仓促，我也没有写什么感谢的信。

我对杨家骆和李石曾先生是信任的，比较放心。更何况还有同样一部毛笔工楷誊清稿在我自己身边呢？以后就没有紧盯着他们询问或催促出版的事情。

沈尹默审查

1946年，我也从重庆绕道宝鸡、西安而回到了上海，世界书局编辑部的编辑来和我联系。告诉我，李石曾先生现在是世界书局的董事长，他以董事长的身份将《颜鲁公之书学》交世界书局出版。事情就这样定了。

这位编辑和我商量书的封面上的书名题签问题，我主张请一位书法家题写，他不同意。他认为既是研究颜体书法理论的书，用其他书体的书法题书名不妥当。他说：“原稿封面题签是道地的颜字，不必另外请人了。就用这六个颜字吧！”我说：“那是我自己写的，不好吧！”他说：“有什么不好呢？讲颜真卿书学理论的人自己颜体字也能写写，那就不是讲空头理论，很好。”他坚持这样办，我不好反对，表示尊重他的意见。

临分手，他告诉我，当今书法界最权威的人士是沈尹默先生，李石曾先生已经请沈尹默在审查，估计通过没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沈尹默先生是书法界最权威的人士，我完全承认。他的书法艺术确实高超，我当然很景仰。他的艺术风格和颜体距离

很远,也是事实。再说,我在此书的第一章《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中,引述了这样一段话:

沈士远《跋陈伯稼颜鲁公碑帖目》曰:“儿时塾师授余兄弟赵孟頫书,谓习是书可以工书法,博时名。仲弟临抚,辄肖,书以日进。余则手拙如僵,而于轻倩绰约之姿,尤非所宜,屡作而屡辍。既而知孟頫之为人,则忿然曰:‘侧媚乃如其书,虽工亦奚以为。’遂弃之不复省。稍长,得颜鲁公书,观其大气盘旋,精彩郁勃,与贤豪长者相揖于一堂,心焉好之。”

沈士远老先生所说的“仲弟”是谁呢?就是沈尹默先生。我感到李石曾有一点马大哈,他把这部稿子请沈尹默审查,使沈尹默、使此书的作者我本人都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沈尹默对这段话肯定有意见,肯定很不满意。因为他自己也不承认师法赵孟頫,而只承认师法王羲之。如今引用沈士远的原文,他又很难进行反驳。

我自己冷静地思考了一番,书的缺点也是存在的。提倡颜体,景仰颜真卿,在艺术上和学术上当然是允许的,但对其他流派过于贬低没有必要。评价书法作品几乎完全以作者的人格和民族气节为标准,也显得过于偏颇了。这下子要闯祸了,我甚为忧心忡忡。

沈尹默写了一封信给李石曾,说我这本书“条贯详明”、“用力可谓深矣!”他自己宗王抑宗赵的事情,没有提。而是说“评断前贤,过于勇敢”,“微感不安”,“此自关于年事,未可厚非也!”

意思是说写得比较有条理,是花了一番功夫的。这“勇敢”两字,原是一种幽默的口吻,实际上是粗暴之意,出于炉火纯青的长者之口,在提法上

不再带火气而已。他“微感不安”，恐怕也是“颇感不安”或“甚感不安”了。最后他认为这本稿子出于小青年之手，也就不多计较，表示了宽容、原谅的态度。

这封信既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颜鲁公之书学》，书自然照出。要不要让这位书法大家的意见有所反映呢？作者对这封信能否接受呢？世界书局编辑部很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他们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

我的看法十分简单。沈尹默的审查意见公之于众很好，用别人的话转述，也许和他的原意有距离。倒还不如就用原信作为代序弁于卷首。是耶非耶，让读者将来去评断最公平。编辑部接受了这意见。后来书籍出版，一打开来，扉页之后就是《代序——沈尹默致李石曾先生书》。可惜原信我未取回，大概他们还交还了李石曾也未可知。

书画社“垂青”

1948年，《颜鲁公之书学》终于由世界书局出版问世。不知道印数多少，我收到了一笔接近象征性的版税，都买了书，分赠给至亲好友。

在解放战争年代里，大家都没有时间或兴趣关心书法，更不用说《颜鲁公之书学》那种相当冷僻的书籍了。在上世纪50年代，碑帖都印得不多，关于书法的期刊或专著极少见。

1959年冬或1960年春，那时我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人物《海瑞》的传记。因此，被邀参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一次鉴定会，在座的有徐森玉先生等等，都是国内最权威的书画鉴赏家。鉴别一个书法长卷——明初方孝孺临摹的颜真卿《争坐位》，后面的许多题跋之中，也有海

瑞的题跋。我们各抒己见,对真伪问题从各个角度去考察。

参加了那次鉴定会一回家,我觉得话没有说完,便写了一篇《海瑞书法之流传与鉴别》的文章,却没有寄出去,和一大堆原稿捆扎在一起了。1979年,我整理旧稿,将此文检出来,交给了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编辑部,很快就发表了。我到编辑部去过四五次,从《争坐位》很自然地谈到了《颜鲁公之书学》那本书。

我想起了两件往事,很不舒畅。谈一下经过情况:

1960年我曾经和出版社联系,希望《颜鲁公之书学》能够重新出版,很不顺利。那时已有上海书法研究会的组织,我想如果得到他们一句美言,事情便好办得多。我在市文化局工作,局和那个会有联系,我恳求一位领导同志带给了研究会驻会的书法专家。原希望不能出版的话,也给我指出错误缺点,以便改正。后来给了回音,只有两行字,大意说如果是指导写颜体书法的书,可以介绍出版,考证著作不行。我想你们不是办的辅导班,是研究会,为什么对研究如此不重视呢?

再就是1967年,那是十年动乱的“打、砸、抢”高峰时期。我已在被隔离中,天天挨斗挨揍,无非是为了“歌颂”魏徵、海瑞、武训等等。有一天却是为《颜鲁公之书学》而挨斗,因为我在书的序言中提到了国民党的官员。但书的本文却一丝一毫和政治无关,是纯学术性的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如今我保存的一本几乎成了孤本,重印无望,却仍在为此而挨斗挨揍,使我十分伤心。

我和编辑部同志谈起了这些往事,编辑部有位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再重印问题。对我所谈的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要我把书送去。

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工作,离上海书画出版社很近,不久去探询有无

重印可能，如无可能，想把书拿回来。

那位编辑同志说，重印也许有困难，但是出版社还将出版《书法研究》丛刊，选发若干章节，则无问题，要我耐心等待。书仍旧不肯还给我。

《书法研究》第一辑出版了，没有选发《颜鲁公之书学》中任何章节。我再去上海书画出版社查问，大家都不清楚这件事。原来那位编辑已去了香港，我的这本书，也一起带走了。

我身边仅存的一本《颜鲁公之书学》也失去了，心里不是滋味，既懊恼，也有点忿慨。那时上海书店二楼还有一小间专凭介绍信供应旧书的地方，我在那里跑了二三十次，结果终于找到了一本。略有破损，无关宏旨。

我还是写信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去问，去讨还书，都没有下文。无可奈何，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一切可以找得到的关系，继续不断地去查问。

彭清江认错

如以上所说的情况，《颜鲁公之书学》一书我为争取重印而吃了不少苦，争取了三十多年，没有能达到目的。现在朋友告诉我，他看到了此书的重印本，我既激动，也很困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朋友手头没有此书，也讲不清楚书的装帧款式，但他能肯定是武汉古籍书店印的，决没有错。

看来只能直接写信给武汉古籍书店去查询了。我写了一封挂号信，问他们有无此事？信中表示如果印数、销量都很少，我不一定要他们在经济上赔偿多少损失，但要给我一定数量的书。

很快，接到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蒋老师：

首先让我给您老拜年，并致新春祝贺，祝您健康长寿！合家欢乐！
万事如意！

大作《颜鲁公之书学》确已由我店影印出书。去年初，我店在清理原存版本中，发现《书学》旧本，根据部分读者的提示，为了和我店所出几种颜体字帖配套，以满足一些书法爱好者的要求，决定影印。当初虽找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了解，可能所找对象均系中青年之故，终未打听到先生现住上海，这是我们工作的粗心和很不严谨所致，特先去函并致歉。

本月中旬我店业务主任詹望生同志将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参加《四库全书》发行座谈会，届时将前往先生府上拜访和请教，还请先生多加指点为谢。《书学》影印本将一并送去。并面述详情。

谨致

敬礼

武汉古籍书店彭清江敬上

87.2.2

收到了这封信，事情总算有了着落。对于彭清江所作的说明，我很不满意。无论如何，他们总应该先和我打一个招呼，至少在出书之后，也应该再积极设法和原作者我进行联系的。而他们在事先事后都不和作者联系，一直要等到原作者去信查问，才被动地不得不承认这私自盗印的事实。对于作者的权益完全不考虑，对政府公布的有关法令也不遵守，真可谓无法无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书法》杂志一直在上海出版，我不仅在《书

法》上发表过文章，而且还和谢稚柳、施蛰存等诸位前辈一起参加了上海市文联、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和上海书画出版社联合召开的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发言、记录和签名都在《书法》1979年第五期上发表的。武汉古籍书店写封信一问《书法》编辑部，我的地址就知道了。要打听很方便，并没有什么困难。

此书出版于1948年，当时我28岁。因为是考证著作，文笔也比较古奥，读者实以中老年为主。当年有人估计作者也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

武汉古籍书店十之八九也是这样估计的，如果初版出书时我为56岁，则1986年将是九十八九岁的老人了。还健在人世间的可能不是最多。所以他们才这样毫无顾忌地任意盗印我的著作。

詹望生来访

詹望生不久到田林十村来访问，带来了40本书，包扎得很整齐，我没有立刻打开。

彭清江的信说要“面述详情”，结果詹望生并没有补充什么情况。只是强调曾经在武汉打听过蒋某人的下落或现状，结果并无收获。此外，又一次代表武汉古籍书店及有关人员表示了歉意和不安。

詹望生告别之后，我打开了那一大捆书。先看到书的封皮已经面目全非，再翻开里面，扉页没有了，“代序——沈尹默致李石曾先生书”没有了，书的后面，封四的版权页也没有了。我才逐渐认识事情比我预料的糟糕得多，如果不是有计划地窃取版权，为什么要这样在三处地方同时将作者的姓名抹掉呢？

世界书局初版本封面上的题签字样如下：

颜鲁公之书学 蒋星煜著

书的扉页上有三行仿宋字，其内容为：

蒋星煜著 颜鲁公之书学 世界书局印行

书的版权页上，除了书名、作者姓名之外，还有一行：

发行人 李煜瀛

当然也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些话。如今武汉古籍书店把封面换掉，把扉页、版权页抽掉，没有见过世界书局初版本的读者根本无法知道这是改头换面的东西，还以为是武汉古籍书店自己组织稿件编印的书籍。至于此书何人所作，也不是容易查考的，只有十分细心而耐心的读者，在那一篇自序结束处可以找到全书中仅存的一个作者姓名。

事情做到这般地步，武汉古籍书店及其负责人的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学术修养可以说荡然无存了。为了赚这一笔钱，简直不择手段了。

尤其使我不满意的，是那封回复我的信，除了被迫承认确实印了此书之外，做了这一些手脚，把书弄得面目全非，却一句也不提。这决不是什么没有通过原作者而重印了书的问题，武汉古籍书店负责人是内行，应该比我懂得多。

我写信给武汉古籍书店，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事先估计的相距甚远，我认为事态是严重的，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并且赔偿损失。

对我再次去信质问，武汉古籍书店根本不理睬。

考虑到我教学的任务、写作任务较多，不可能为此事去武汉办交涉，所以决定委托武汉的熟朋友去办理。

然而几经联系，没有下文。这件事情，诚如武汉的熟朋友所说，我恐怕

不一定能得多少实际利益。但是,我还是想追查一下,让这种歪风邪气稍稍有点顾忌,让那些人知道唯利是图终究是不光彩的。

使我最困惑的是一部学术专著循正当途径出版却处处碰壁。而私自偷印的却可以印1.5万本,全国的新华书店也为他们销售。尤其使我不解的是他们公然不理睬作者,理直气壮地干违法勾当,他们究竟凭了什么,敢于如此有恃无恐呢?

话说回来,当时大家对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我精力有限,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二 版 后 记

对于书法艺术，我感情难以言表，儿童时代的苦练颜鲁公书法，就是喜爱其字字刚劲，凛然正气。年龄稍长，知道了颜鲁公（真卿）一生可歌可泣的事迹，知道了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理论之后，更把“颜筋柳骨”看成是中国书法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作用，我二十三岁那年，也就是《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出版之后，用全力开始著作《颜鲁公之书学》，我认为留元刚、黄本骥等人虽然编辑了一些颜鲁公的文章，或后人的有关评论，虽然不能说一无贡献，但是缺乏系统性，挂一漏十，在所难免。我决心参考他们的成果，编一部比较完整的，为颜鲁公书学的发扬光大，创造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至于写成之后，在物质条件异常艰难的重庆、甚至将来，有无出版可能，我根本没有考虑。事实证明，这一种考虑不周全，也有好处，果真作反复的万无一失的考虑，我根本不可能去写这本《颜鲁公之书学》、更不必说完成了。

1944年，寓居在北温泉铁瓦殿（相传即想思寺）中的中国现代辞典学先驱杨家骆在百忙中肯耐心研读我的原稿。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沈子善教授主办的《书学》杂志，是国内惟一的书学艺术杂志，门槛极高，我也无勇气投稿，他主动向我约稿，并赠送给我多幅他临写的行草，于是《颜鲁

公之书学》的第七章《颜氏书学辨正》便在《书学》公开发表了。后来，杨家骆询问来北温泉了解《世界学典》进展情况的李石曾是否家藏颜鲁公手书《刘中使帖》真迹？李石曾大为惊奇？杨家骆告知系从我的《颜鲁公之书学》书稿中得知，于是李石曾约我见面，并当面允诺，一旦条件具备，他负责将《颜鲁公之书学》公开出版，以供同好研究、欣赏。这一些事情，都是我当初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胜利之后，李石曾出任世界书局董事长，布置编辑部与我联系，将《颜鲁公之书学》之出版排上日程。责任编辑认为我在原稿封面上的书名题签完全可以用在初版的封面上，他认为研究颜鲁公书学的人本身应该颜体写得很好，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他坚持不再另外请人题写封面的书名，我没有反对，因为一时也难找合适的人选。

至于李石曾又请沈尹默再审查一下原稿，事情颇为复杂。沈是书学权威，为慎重计，李石曾做事可以说很周到。但，李本人未细看原稿，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书中引沈士远的原话，把仲弟（即沈尹默）的书法不无贬低。因为沈尹默自称学的是王羲之，而沈士远认为沈尹默学大节有方的赵孟頫颇为“神似也”。因此，我十分担心沈尹默的审查可能通不过。

事实证明，我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沈尹默审查之后复了一信。基本的评语是“全书条贯明晰，引征详瞻，其用力可谓深矣！”缺点是“唯于前贤评断处过于勇敢，微感不安”。在这里，“勇敢”云云其实就是“粗暴”也。经他这样一说，我觉得对李煜、米芾、赵孟頫、沈尹默本人的评断的确是粗暴了一点。

李石曾真也不愧是相当宽容的一位前辈，看了沈尹默的回信，既然也认为写得不错，于是不再要求我作任何修改，就付印出书了。

1948年,此书出版,解放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谁都不会注意、关心《颜鲁公之书学》,销数也很难上去。

改革开放之后,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日本某些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有台湾世界书局新出版的《颜鲁公之书学》,接着香港、澳门的友人也告诉了我这一讯息。

1990年汪辜会谈之后,台湾戏剧专科学校教授魏子云与新闻传播大学教授郑向恒为团长、副团长的一批专家、学者来石家庄参加“海峡两岸研讨会”。我和他们两位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位后来分别来上海访问,也曾在我家中长谈。

魏子云教授也工书法,我最初想请他了解一下世界书局历年来印行《颜鲁公之书学》的情况。考虑到此书写成到出版,杨家骆先生向李石曾的推荐起了主要的作用,还是先与旅居台湾的杨先生联系为妥,于是写了一封信,托魏面交。杨写了回信给我,已是他离台去美定居的前夕,谓年事已高,生活诸多不便,所以子女要求他去美国,生活在一起,可以有所照顾,他就同意了。至于《颜鲁公之书学》,确是他安排多次重印的。有关作者权益问题,他一字未提。

1993年,我应邀赴台参加一系列会议,并到各大学作学术交流。各书店中均未见此书,方知世界书局最近已多年未印。我觉得此书篇幅不大,印数也不可能多,稿费版税恐怕为数甚微,所以就没有再和世界书局进行任何交涉。当然,1949年到1993年之间,无论《颜鲁公之书学》在台湾印了多少次、多少本,我都不知道,都没有看到过,根本谈不上什么修改、补充的

问题了。

至于武汉古籍书店影印本，经过情况均已在《附录》中详细作了说明，原书被改头换面，序文均已无存。影印之前我毫不知情，自然更不可能作任何修改、补充。

这一次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事先杨柏伟和我进行充分的协商，应该说正好可以作一番修改、补充。然而，又发生了困难。因为我年已八十九岁，视力、精力已经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补充已经花去2008年整整一年时间，结果仍不理想。如果再补充此书，恐怕非两年、三年不成，是否能完成，缺乏信心。就只好按原书原文不作修改了，唯一的变动，仅是直排改成横排，繁体字改成简体字而已。

如果补充的话，我原来想把颜真卿一生的事迹作较详细的评述，和碑、帖有关的事件则作为重点而予以突出。此外，对《永字八法颂》和《张长史十二笔法记》这两篇书学理论的经典则用比较浅近的语体文进行串讲、解析，使中学程度的读者能够看得懂。这个愿望现在不能实现。将来如何，也很难说。

至于说到修改，确也真有需要修改之处。颜真卿为人刚正坚韧，字如其人，雄伟挺拔，固然甚佳，但其他大家亦各有可取之处，而且也各有其传承源流，绵延至今不绝。应该承认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是必然的，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指出颜书之壮美，再强调一下颜书之字如其人，这才比较稳妥，而不致犯偏差。我现在没有修改，在《后记》中作如上的交代。希望读者知道我已经有所反思，能对我有所谅解。更重要的是不致为我所误导。

话说回来，我仍要强调一下书法艺术的基础应该是正楷，尤其颜筋柳骨这一类正楷。古人说得好：“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颜真卿、柳公权的正

楷字便是书法艺术最理想的规矩,写好颜体或柳体正楷,再写行书、草书,更显得笔笔有依据、字字有功架,而不是倾斜支离,单看一字已难入目,更成不了行。而2009年之春,我接连看了多次书法展览会,居然有的展品多达百种以上,正楷仅有一两件,甚至是空白。少年儿童的书法展亦如此。对此,我有一种隐忧。这无疑是整个社会浮躁心态的折光反映,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不是一种好现象,弊多利少。

本书有《颜鲁公碑帖表》专章,表所列书法作品正楷70种,行书33种,草书、篆书、八分书各1种,碑帖已失传字体不详者49种,正楷居第一位,而行书之所以较多,实以日常生活中之通信或便条之类为主也。可知颜真卿书法成名甚早,直到晚年,凡受人请求写碑铭之类,他总是全力以赴用正楷书写,以昭郑重。现在的少年儿童果真想学习书法又何必如此急躁,不耐心写正楷呢?

另外两件事情,使我既很高兴,也颇为惭愧。第一件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编选《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从100年来的大量出版物中精选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分别编入《历史文脉》、《审美语境》、《考识辨异》等七个分册,于2000年12月出齐。《考识辨异》分册以马叙伦发表于《国粹学报》(1907年第5期)的《书体考始》开端,我的《颜氏书学辨正》列为第七篇,而郭沫若等大家反而排在后面,经过了解,原来文章的排列以发表前后为顺序也。我这篇《颜氏书学辨正》原是《颜鲁公之书学》一书的第八章,曾于1945年由复旦大学沈子善教授刊发于他在大后方主编的《书学》(第4期)上。我想这也好,建国以来,书法界基本上没有能看到《颜鲁公之书学》,但他们可以通过这篇论文,知道我研究颜鲁公书学的方法和收获。第二是故乡溧阳,最近十年来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并成立了溧阳市书画院,2008年9

月，编辑了《溧阳书画作品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收集了清乾隆年间曾任溧阳县知县的陈鸿寿诸名家的作品。陈鸿寿，字曼生，亦即价值极高的曼生紫砂壶的创始人，传世书画不多了。他们也收了我上世纪为浙江的李渔研究会的一幅题字，真使我受宠若惊了。用以自勉吧！

建国以来，关心我对书法艺术研习的领导伊兵、吴强两位，对我的鼓励真一言难尽。伊兵喜欢我的书法，周信芳演剧生活五十年，华东文化部题赠他的大幅屏条，都是伊兵布置我书写的。改革开放之初，《书法》杂志召开文化界大型研讨会，主持上海市文联的吴强开的名单，我也在内，得以有机会和谢稚柳、施蛰存等权威人士交流。现在，《颜鲁公之书学》重新出版，我首先对他们两位领导感恩，同时也为不能再听到两位的指教、鼓励而深表遗憾。

本书附录《〈颜鲁公之书学〉的出版、盗版》一文，系改革开放之初，由项文忠先生主编之《法苑》月刊发表，给予如此多的篇幅，对原稿未作删节，也很不容易，这种友谊很不一般。

蒋星煜

2009. 3. 15

況 鍾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沉钟》初版本封面



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的况鍾像



经维修的况公祠内花园



经维修的况公祠内戏台

目录

第一章 “仁宣之治”及其人事行政	291
一、朱高炽和朱瞻基	291
二、江西人的政治集团	295
三、三途并用的人事制度	299
第二章 况鍾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303
一、家世与复姓的经过	303
二、年轻书吏到朝廷命官	305
第三章 初任苏州府知府	310
一、领敕书赴任	310
二、整饬吏治,自己也被控告	315
三、减削田赋,以苏解民困	320
四、废止苛捐杂税	325
五、清理军籍,释放平民	327
六、与成均发生矛盾后丁忧回乡	331
第四章 复任、三任苏州府知府	335
一、夺情复任	335
二、缉拿抢劫官军	337
三、兴修太湖一带水利	339
四、设济农仓,防备饥荒	341

五、修建儒学,培养人才	344
六、纠劾不法的监察御史	347
七、提拔和培养属官	349
八、任满离苏	350
九、去而复来,三任苏州府知府	352
第五章 周忱与况鍾	355
一、理财名臣周忱	355
二、周忱操守上的缺陷	358
三、周忱与况鍾的合作	360
第六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说明	364
一、况鍾家庭成员的生卒	364
二、和宦官们的关系	365
三、十五贯事件的可能性	368
第七章 关于况鍾的文物与文艺作品	372
一、肖像的流传	372
二、况公祠	375
三、《况鍾复任唱和诗卷》和《秋江送别诗叙》	377
四、朱素臣的《十五贯》	379
第八章 历史人物况鍾评价	383
一、况鍾在历史上的作用	383
二、古典文献论况鍾	390
三、当代史学家论况鍾	391
初版后记	394
二版后记	396

第一章

“仁宣之治”及其人事行政

一、朱高炽和朱瞻基

明代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个雄才大略的君主经营以后,不仅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使人民能够在比较安定的生活中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并且在北方和东南亚一带显示了军事方面的声威,基本上保障了边境的安全。先后继承皇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是在这样一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得到暂时和缓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小心谨慎的守成者。所以《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作者谷应泰把这两个人比作周代的成王、康王和汉代的文帝、景帝,并且在书中列入《仁宣致治》的专章,以叙述他们的守成事业^①。

朱高炽即位以后,替朱棣的残酷镇压做了不少善后工作,例如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吴中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反对朱棣的向北方用兵,因而被下狱治罪,朱高炽均予开释复职。同时被释放出狱的前朝官员很多,较知名的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官金问等,分别被任为通政使、翰林院学士、翰林院修撰之职。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因始终效忠建文帝朱允炆,拒绝向朱棣俯首称臣,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灭门灭

^① “仁宣之治”是一般的提法。谷应泰《明中纪事本末》卷二十八称作“仁宣致治”。

族的大屠杀，未死的家族被押送到教坊等处为奴为娼，朱高炽也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朱高炽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是比较关心的，当他听闻山东、徐、淮一带发生了灾荒，而地方官员仍在向灾民们催缴税、粮的情况时，便把吏部尚书蹇义找来，问他是否确有此事，证实后，便命令阁臣杨士奇立即起草减免税、粮的诏书。杨士奇说：“减免税粮的事情应该先让工部和户部知道。”朱高炽说：“以后再通知他们就是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就像救人于深水之中一样，稍一迟缓就会死人的。如果让大家商量，可能有些官员担心朝廷开支很大，一定不会干脆地同意削减农民负担的。”说着就唤太监把文具搬来，让杨士奇把减免税、粮的诏书拟好，朱高炽看了一遍，立即颁发了出去。这时候朱高炽对杨士奇说：“你现在可以对别的大臣们去说，我已经把山东、徐、淮今年的税、粮全免了。”有一次工部奏请向民间征布和漆以修缮兵器，朱高炽认为这种方式、方法最容易滋生流弊，批令改用官钞在市上购买。像这类事例是比较多的。

关于贪污扰民的官员和宦官，朱高炽都加以处理，有太监在外面以采办金珠为名荼毒军民，朱高炽即予召回。

朱高炽很重视御史的作用和人选，尤其重视负责领导御史们进行监察工作的都御史的作用和人选，希望都御史能在廉洁清正方面做御史们的表率，这样文武百官对于都御史和御史就有所敬畏、有所顾忌。因此他要求吏部审慎而严格地多方面物色都御史和御史的人选，以收维护风纪的实效。

对于阁臣们的进言进谏，朱高炽心胸也比较宽广，颇有容人之量，大理寺少卿弋谦谈论事情往往过于偏激，有时使朱高炽下不了台，朱高炽一方面让杨士奇草拟诏书，对弋谦的态度作了指责，另一方面对弋谦信任不衰，

不仅不加惩处，而且提升为副都御史。有宦官在四川采办木材，对民间滋扰得很厉害，朱高炽就派弋谦去彻查，对弋谦说：“我知道你素来廉洁清正，你替我认真严肃地查办就是，不要有任何畏惧和顾虑。”

虽然朱高炽执政的时间很短，他的年号洪熙元年（1425年）就没有再延续下去了，但《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说他“在位仅十月，而政具举”，作了相当高的评价。

朱瞻基年号宣德，在位有十年（1426—1435年）之久。他有某些比较开明的帝王的清醒头脑，对于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对于一些粉饰太平的无聊事情很厌恶。礼部尚书胡濙有多次上表祝贺所谓“祥瑞”，朱瞻基觉得献白鸟、献骆虞这些事情实在毫无意义，对胡濙说：“现在天下还有许多人没有安居乐业，没有什么‘祥瑞’可言。”因此，不准上表。这和后来明世宗朱厚熜的喜欢阿谀，对献白鹿、献仙桃的奸佞大加赏封，成为鲜明的对比。

山东青州的地方官员请求动用官仓存粮赈济饥荒，户部主张派员查明灾情以后再决定是否批准，朱瞻基说：“等到户部派人去查清楚灾情，人早饿死了。”于是立刻同意了青州地方官员这一项紧急措施。当时山西有一部分灾民逃荒到了河南南阳，被当地官府逮捕，因而致死的也不少，朱瞻基听到这方面的反映以后，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老百姓因灾荒而逃奔他乡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从前宋代的名臣富弼做青州知府时，对老百姓的饮食起居和病痛医药无不关心，安排老百姓在山林采伐，在河湖渔捞，五十万人虽遇灾荒，都能度过。现在居然对灾民逮捕或驱逐，岂不是太不仁了吗？”于是命令禁止这样做，并由朝廷直接派人到山西、河南赈济灾民。

在惩办贪官污吏方面，朱瞻基做得比朱高炽更为严厉而坚决，左都御史刘观职位相当高了，贪污确凿有据，即予撤职，代之以原任通政使的顾

佐。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和陕西按察司金事韩善贪污，均被削职为民。这些被撤职被惩办的官员的重新起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吏部作了布置，朱瞻基也很少批准。工部尚书吴中为讨好宦官杨庆，送给他大量官木官瓦，盖了一座宏伟华丽的宅第，朱瞻基查明属实后，将吴中逮捕，下狱治罪。

官员与官员之间发生了矛盾，朱瞻基决不做无原则的和事佬，一定要查明真相，弄清楚是非曲直。宦官裴可烈^①监事浙江，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按察司林硕却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人物，裴可烈感到行动多少受到拘束，要拔去这一颗眼中钉，便诬告林硕“沮格诏令”，朱瞻基让林硕自己来北京申诉辩冤，并且亲自处理这一件事。对林硕说：“你不要害怕，一切照实际情况说就是。”于是林硕照实际情况作了详细陈述，朱瞻基知道林硕并无错处，给予驰驿复任的荣誉。因为裴可烈诬告，朱瞻基罢斥了他的官职，后来又把裴可烈处死了。

正是由于朱高炽和朱瞻基不是那种偏听偏信、喜欢阿谀奉承的皇帝，并且做了不少符合人民愿望或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多的积极作用。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小康局面。人才的发掘、培养和提拔在当时是有显著成绩的。况鍾的出现正好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况鍾所以能从一个书吏做到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知府，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这和朱高炽、朱瞻基的政治风度和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一《中官考》：“裴可烈亦以贪暴下锦衣卫狱拷死。”又《明史》卷一百六十一《林硕传》：“其后宁波知府郑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罢去。”《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列传》：“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也有书作裴可立的，但大部分史籍是用裴可烈之名。

施政方针是不可分的。

我们说“仁宣之治”是一个小康局面，也只是从基本情况而立论，决不是说朱高炽和朱瞻基就很尊重所有的大臣了，他们也有专横残暴的一面，例如侍读李时勉抗疏言事，庭对不屈，引起朱高炽的恼怒，命金瓜力士当场把李时勉打断肋骨三条。

附带要谈一谈，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之初，人事行政和财政经济基本上仍是按照朱瞻基的旧规章做的，变动不大。所以朱瞻基所慎重选派的九个知府之中，就有况鍾、陈本深、莫愚、赵豫四人是经过朱祁镇批准九年任满后继续连任，并给三品俸，以为奖励。对于减轻人民负担问题，朱祁镇也很重视。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他即位不久，户部要求重新审核苏州府、松江府要求减免的荒田税粮，朱祁镇“以核实必增额，为民患，不许”。正统五年（1440年），又“免苏、松、常、镇、嘉、湖水灾税粮”。因此也可以说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

二、江西人的政治集团

封建时代政治上经常出现集团宗派，而某些集团往往是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的，在明代的永乐、洪熙、宣德、正统（1403—1449年）这一个时期，朝廷中是存在着一个江西人的政治集团的，解缙是这一个集团的旗帜，解缙死后，成为旗帜的是杨士奇^①。

^① 这一种宗派集团的情况，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了，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第三卷中有《内阁同乡》条，说到：“永乐初元选翰林臣入内阁，而江西居其五。”

江西籍的解缙、金幼孜、杨士奇、胡俨本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以迎附朱棣而被留用。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开文渊阁，以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值，参与机密大事，称之为内阁，这七个人之中，除黄淮和杨荣外都是江西人。

永乐二年(1404年)春三月甲申科是解缙、黄淮任主考，会试第一的杨相是江西泰和人，廷试第一的曾荣是江西永丰人，廷试第二、第三周述、周孟简兄弟是江西吉水人。朱棣又命解缙选曾荣等二十八名进士就学文渊阁，除上述的杨相、曾荣、周述、周孟简之外，还有王直、罗汝敬、李时勉等都是江西人，自愿就学的周忱提出请求后，被朱棣允许了，又多了一个江西人。这些人都是以后二三十年之间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有的成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人的智囊。

现在我们把永乐到正统的内阁首辅、翰林院的主要成员、十六次中央考试的考官和中式为首名次总数以及属于江西籍的人数列成下列三表：

一、内阁首辅	永乐	洪熙	宣德	正统	共计
总 数	4	1	1	2	8
江 西 人	3	1	1	1	6

二、翰林院	学士	侍读学士	侍讲学士	祭酒	共计
总 数	14	9	10	9	42
江 西 人	8	8	1	3	20

三、中央考试	考官	会试第一	廷试第一	廷试第二、第三	共计
总 数	32	16	16	32	96
江 西 人	14	4	6	8	3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江西人在政治上的雄厚势力。其中最起决定作用的是杨士奇，在这一时期他做了四十二年内阁阁员，二十一年内阁

首辅。其次是曾榮，他曾多次任中央考试的考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曾任《永乐大典》副总裁、《三朝实录》的撰修者，朱高炽把他作为身旁最可亲信的一个学者，曾故意找些冷僻的古书中的典故来问他，他竟能立刻对答出来，要他写《天马海青歌》，他也援笔立就，他的言谈，对朱棣、朱高炽等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些江西籍的政治人物，连居住也是集中在一起的，王直说：“永乐二十一年三月予以内艰服阙，至京师主于东城予姻家欧阳君允和，而杨先生士奇则居城西之金城坊，所与邻者同邑余君学夔、翔君朝宗，临川王君时彦，吉水钱君习礼、张君宗琯，周君恂如、周君功叙，皆余旧也。先生重乡谊，笃世好，不欲弃予于远，思求近宅以处之。”^①后来王直居然搬到杨士奇对门去住了。“重乡谊，笃世好”这六个字是对于这个政治集团的旗帜杨士奇的比较含蓄的性格或政治倾向的刻画。王直又说：“数十人者旦则各出营职，迨暮而归则从容相过，焚香淪茗，谈笑移时而后去”^②，说出了他们活动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们之间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从“酒酣忽起舞，四座意尽倾，高歌杂雄辩，泠泠金石声”^③的描写中看出他们的融洽欢欣以及那种不可一世的自负气概。

以杨士奇为首，他们的具体政治活动是通过科举保荐广泛树植势力，像王直、曾榮、张宗琯、周忱等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杨士奇直接或间接的提携。作为一个集团，他们的主张和行动一定是一致性的，例如最初颇为赏识况鍾的礼部尚书吕震，便经常和这一些人意见相左，而被非议的。

①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十六《移居唱和诗序》。

②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十九《送李通判复任序》。

③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二《曾侍讲宅燕集》，曾侍讲就是侍讲学士曾榮。

用诗文相互酬唱,以鼓吹彼此的才华和政绩,以影响社会舆论和统治者的视听,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也许有人以为这一种诗文相酬唱不一定是从“重乡谊,笃世好”的宗派观念出发的,那末我们不妨听一听这些显要人物的自白:周述曾说:“余与况侯同朝,兼有桑梓之谊,其素重为人,乃今政成而能有惠爱于苏人若此,宁不为之深喜欤,于是书以识于后,使欲知侯者有所考焉。”^①胡俨也说:“况侯余乡人也,其善政既已诵于吴人,而斯举尤为知务,故乐为之书。”^②这不是偶然的。

一般认为江西政治集团早期领袖人物解缙之死,吕震要负较多的责任。至于李能和尹昌隆两案,也有吕震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则还不是与江西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吕震和江西政治集团领袖杨士奇的公开争执有多次,大理寺少卿弋谦向朱高炽进谏,吕震为了讨好皇帝,说弋谦诚心沽名钓誉,弋谦险遭不测。但杨士奇却强调“主圣臣直”^③,力保弋谦,结果朱瞻基没有把弋谦治罪,反而更重用了。另外一件事是国丧除服的问题,杨士奇不同意“丧服已逾二十七日,请即吉”,而“震勃然变色,诋其异己”^④。也就是说吕震直接指责杨士奇是搞宗派集团而排斥异己。

这一个政治集团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这一个政治集团基本上能够向皇帝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一方面也是事实。除了在树植势力这一件事上很露骨以外,这一政治集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况鍾在政治上的一帆风顺,和这一个集团的提携和鼓吹是分不

① 道光重刻《况太守集》卷四周述《张太史赠太守况公前传读后》。

② 《四库全书》本钱谷《吴郡文粹续集》卷三胡俨《苏州府重修儒学记》。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仁宣致治》。

④ 陈鹤:《明纪》卷十。

开的。

在杨士奇死去以后，集团开始解体，但是江西人在朝廷中的声势还是维持了一个时期，景泰年间有陈循、萧镃，成化年间有陈文、彭时、刘定、彭华、尹直等。当然，和杨士奇任首辅的时候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三、三途并用的人事制度

明代初叶，对于吏员的人选很审慎，而吏员也很自尊。据《续通典》卷二十二记载，据说曾有一个高级官员有病，扶着拐棍而行。当他把拐棍交给身旁的书吏时，书吏拱手而立，不把拐棍接过去。事后书吏对这个高级官员说：“我是你的属吏，不是你的家僮。多做一点琐事无所谓，我是担心由此把规矩都破坏了。”^①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件事是赞赏的，曾经说给群臣听。这是因为当时的书吏都是文理通达、书法谨严的书生所充任，而由各级地方官员亲自选拔招聘的。

当时人事制度的显著特点是三途并用，所谓三途是指进士、科贡和吏员，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进士出身的人才能身居高位。因此，从书吏逐步升迁到尚书的有滕懋德、张度、胡禎、徐辉、李友直、李信、徐晞、李质、郎本中、万祺。从书吏逐步升迁到侍郎的有王鍾、刘本道、李亨、陈宁、汪河、叶春、王春、刘敏、王诏、吴复。此外，从书吏升迁为祭酒、太常卿、大理卿、光禄卿、金都御史的还有。

再说，任首辅达二十一年之久的杨士奇是儒生起家，黄福是岁贡出身，

^① 《续通典》卷二十二。

胡俨是举人出身，都不是进士。

三途并用是一种良好的人事制度，但是用之既久则又往往偏重于进士，限制科贡而排斥吏员了。这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后来吏员不是招聘的了，而是自行输纳以求差缺了。所以归有光在《三途并用议》中说：“自提控以下，至乎吏典，但以所输之资，劳其出身之差等，此吏员之源未清也。”也认为吏员的选用采取“自行输纳”的办法是不妥当的。虽然如此，每当朝廷打算刷新一下人事的时候，总要再一次强调三途并用的精神，但实际上从吏员中选拔出来的官员并不多。

在“仁宣之治”前后，从书吏做到知府，而且获有声誉的，有苏州知府况鍾和松江知府黄子威^①，后者声誉略逊于况鍾。

明代初叶对考绩制度是认真执行的，而且对官员、吏员完全同样适用，每三年一次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以决定提升或降级，这对于三途并用的制度起了保证和促进的作用。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考绩制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严格的，并没有把九年考满的吏员都一律升迁。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曾对吏部说：“往时选用严谨，吏员授官尚少，比年吏典，考满以千计，不分贤否，一概录用，廉能几何？贪墨塞路，其精择之”。像况鍾等人就是从考满吏员中“精择”出来的。和考绩制度同样重要的是荐举制度，明代初叶曾一再发动官员们荐举人才，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就曾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包括给事中、御史以及各地的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

^① 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十七，系黄子威，此人因亲丧回乡守制，大理寺正卿胡概巡抚苏松时，松江一府千余人因其“莅事公勤，治民有方，税粮无亏，诉讼不作”，请求朝廷予以夺情复职，胡概奏明朝廷准予复职。《续通典》亦作黄子威。道光刻《况太守集》转引陈建《皇明从信录》，作王子成，有误。

州、知县分别荐举屈居下僚的或军民中的公正廉洁之士。宣德年间，凡是布政使、按察使、知府有缺，都是令三品以上京官保荐，被保荐的大部分是郎中、员外郎、御史等，偶尔也有职位很低的司务等官员被保荐的。这一些制度虽然也有不完善之处，但在初期却起了积极作用，到后来则流弊丛生了。

总的来说，推荐的制度还是好的，正如《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所说：“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令会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洞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而况鍾之所以能从书吏逐步升迁，并被保荐为苏州知府则是三途并用的制度所促成的。当然，他的江西同乡又充分利用了这种制度来提拔他。

在天顺(1457—1464年)以前，经常有官员丁忧，经朝廷夺情起复，或经老百姓向朝廷提出请求以后，夺情起复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员丁忧服满以后，仍还原任的。洪熙元年(1425年)长清县老百姓请求将丁忧服满的原任知县薛慎复任，蹇义因为长清县知县一职早已另外派人担任，不同意长清县老百姓的请求。朱高炽说：“国家所以设置知府、知县等官员，就是要他们能得民心，如果不能得民心，再换回来又有什么不好！”^①结果仍旧令薛慎复任。不久，山东博野知县陈哲、泰安知县畅宣、碭山知县刘伯吉、曹县知县范希正都以同样情形回任了原职。还有一种久任的风气，本来规定官员任职九年，通考认为称职的话，一般要调升较高职位的，但老百姓可以请求连任，例如使用况鍾做书吏的俞益便做了十七年的江西靖安知县，还

^① 陈鹤：《明纪》卷十一。

有卢秉安做了十九年的广东东莞知县，周忱做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江南巡抚。

有一种变通办法，使连任原职的官员不致因连任而影响提升的级别和增加的俸禄，即以原职升级或改衔，周忱原以侍郎衔而出任巡抚，后来虽仍任巡抚，但已由侍郎而改为尚书衔。陕西巩昌知府韩福因连任由正四品升为从三品，直隶高阳知县王弼因连任由正七品升为从六品，等等。

当况鍾的苏州知府九年任满而被连任的前后，江西吉安知府陈本深、江南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也都是连任的。

久任风气对于官员和老百姓都有好处，官员因为情况熟悉，政事容易处理，有些事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成效的也可以实施。丘浚很赞许这种做法，认为久任的好处是能使“官员安心于他的职守，老百姓安心地生活，官员可以免去舟车奔忙，老百姓也可免于送旧迎新而花许多钱钞”^①。

当然，这样一种安定的局面并没有能一直保持下去，买官鬻爵的风气一开，官员的人选就不一定理想，更谈不上什么久任、连任等问题了。

^① 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八。

第二章

况鍾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与复姓的经过

况鍾字伯律^①，号如愚，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生于江西靖安县的龙冈洲。靖安县当时属于南昌府，在江西的西北部，位于流入鄱阳湖的潦水中游沿岸，龙冈洲为靖安县的名胜，有龙冈烟树、鹰岛春云、屏风叠翠等胜迹，合称龙冈八景。况鍾后来也自号龙冈。

关于家世源流，况鍾自己在《示诸子诗》^②中提到：

吾家诗书胄，况坊名阀阅，奈何遭元末，群盗肆猖獗。

阖门殒锋鏑，惟父脱虎穴，赖彼黄氏泽，鞠养不令绝。

靖安况氏的第一个祖先是唐代的况鼎，曾封水南伯，从他乡迁居到新建西山之麓，以后氏族繁衍，便形成了况坊这样一个村庄。到了宋代，有名况升的从况坊搬到靖安城内的甘家巷，这是况鍾一支的远祖。在宋代，靖安最显赫的况家的人物是况淳，曾任观文殿大学士，封为惠国公。

况鍾的高祖名况亮，曾任元代的常州路同知。曾祖名懋建。祖父况渊，对《易经》很有研究，当时已是元代末年，元兵和农民起义军在这一带

① 清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中《苏州济农仓记》：“况侯名鍾字子律。”又王凝斋《掾曹名臣录》谓况鍾“字伯乐”。“子律”与“伯乐”均误。

② 清道光重刻《况太守集》卷十五。

曾展开激战，况渊全家在战乱中均遭杀害。据况鍾《请复姓奏》：“元季兵变，合家遇害”，和《况氏文献跋》：“值元季兵变，阖室被祸”的记载，好像是被参加起义的元兵所杀。况鍾《示诸子诗》的“群盗”则是指农民武装。张显恭《逊斋先生行实》：“值元纲解组，兵戈四起，靖遭土寇，举家俱殒焉”；张洪《太守况公前传》：“元末兵乱，家殁于寇”；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至渊，遭元末红巾寇乱，举家十余，悉为所害”，则均指农民武装，或当以指农民武装可能较多。因为明代是从农民武装取得政权而建立的皇朝，所以况鍾在提到这一历史事件时，措词就比较隐晦，显得不完全一致。

况渊全家被杀，留下一个孤儿，名况仲谦，就是况鍾的父亲。那时况仲谦才六岁，邻居黄胜祖没有儿子，便把况仲谦作为自己的儿子而收养，况仲谦从此改姓黄，名黄仲谦。

黄仲谦在比较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对学术研究饶有兴趣，对功名科举则比较淡薄，他所继承的黄胜祖的遗产相当丰厚，就构筑了不少山亭水榭，逐日以游宴吟啸为乐。娶妻廖氏，生子黄鍾，即后来的况鍾。续娶罗氏，生子黄鏞。黄仲谦本人曾经考虑恢复原姓，又觉得是黄家抚养大的，否则早死于战乱中了，如今黄家又没有后嗣，如果恢复原姓，黄家也就绝了后，所以始终难下决心。直到病危临终时，才对两个儿子留下遗嘱，要黄鍾恢复原姓，要黄鏞延续黄家后代，以报抚养之恩。

黄鍾对于父亲遗嘱铭记在心，从未稍忘。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有次回乡省亲，遇见宁都生员宋惟亮，谈到了自己的苦闷，宋惟亮也竭力劝说黄鍾上奏疏请求准予恢复原姓。

数年以后，黄鍾升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向朱瞻基上了《请复姓奏》^①，说：“臣思立性命氏，各有源流，叨仕圣明之朝，孝治天下，若不请复姓，有失本源之义。”^②朱瞻基不仅准予所请，而且颁发《赐复姓制词》，说：“今不忘所本，用复旧姓，是宜嘉奖，特赐训词，以励民俗。”

黄鍾奏准复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从此才称况鍾。

朱瞻基颁发《赐复姓制词》的同时，还颁发了《追赠父复姓制》，把黄仲谦复姓为况仲谦。

况鍾自己编撰过《仪曹复姓谱》^③一书，把有关复姓的文献都搜集在内，但此书现已散佚了。

二、年轻书吏到朝廷命官

况鍾童年时很聪明，对书法曾下苦功练习，正楷、隶书、行书都写得比较好。

永乐四年(1406年)，况鍾二十三岁。这时，靖安县来了一个新的知县，姓俞名益，仁和人，进士出身，为官清正，想选用一个能干练达的书吏，再三物色，没有合式的人。有人谈起况鍾，他找来一试，果然合乎他的理想，于是就正式用为书吏。况鍾的父母希望况鍾继续攻读，在功名上求上进，不愿意让他做书吏。俞益劝况鍾的父亲道：“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后来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大家很熟悉的汉代的萧何、曹参，唐代就有孙伏伽

① 清道光重刻《况太守集》卷七。

② 清道光重刻《况太守集》卷六。

③ 清同治刻许应铤修《南昌府志》卷六十二《艺文志》。

和张元素,前者做到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又有什么不好呢?”况鍾的父亲没有办法违抗知县的决定,只好让况鍾做了书吏。

况鍾在故乡靖安做了九年书吏,到永乐十二年(1414年),已是通考之期,被送到南京,由吏部考绩。知县俞益^①和礼部尚书吕震是旧交,就写了一封信让况鍾带去见吕震。晤谈之下,吕震也觉得况鍾颇有才干,于是吕震又在明成祖朱棣面前加以推荐;朱棣原有在各方面招揽人才的设想,当时虽然在出巡北京期中,仍特予召见。况鍾给朱棣的印象是良好的,于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九月,发表他为正六品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必须说明的是朱棣虽然很注意提拔人才,但对书吏则是非常鄙视的,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因此,他任命况鍾为正六品的官员,的确是很不平常的一件事。

关于况鍾受吕震赏识经过,据徐开仕《明名臣言行录》卷四十记载:当时吕震兼摄工部事^②,工部储藏物料的神木厂发生了火灾,朱棣要负责官员报告起火原因,吕震草拟了奏疏,说火灾是“烧毁木植”而引起的。况鍾看过以后,觉得不妥,对吕震说:“把这奏疏递上去,难免获罪。”吕震说:“依你之见如何?”况鍾说:“用‘烧毁拣退木植’的字样就好得多了。”吕震觉得有道理,就照办了。朱棣看了奏疏,知道烧毁的是拣退木植,也就没有再加追

① 清同治刻许应铎修《南昌府志》卷二十三《职官志》,俞益于永乐四年任,其后任孙宗广接替年份为“永乐中”。而永乐共二十二年,则俞益于永乐十二年推荐况鍾之后,没有再做很长时间,就离任了。但也有记载说俞益任职到十七年间。则“永乐中”三字应作为“永乐年间”解。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一百十三,俞益离任是因为“亲丧服阙,改知潜山”。宣德九年,俞益卒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任上“室如悬磬,至无以为敛”。

② 当时吕震是否兼摄工部事,记载不一,一般记载,此时由宋礼、吴中先后任工部尚书。

究。从此，吕震对况鍾就更加赏识了。

仪制司是礼部四个司中最主要的一个司，主要官员有正五品的郎中一人、从五品的员外郎一人和正六品的主事一人。仪制司的工作是制订和布置一切重大典礼的仪式，诸如皇帝即位、皇帝大婚、皇帝加冠、册立皇太子、朝贺、朝见、大飧、宴飧、大射、宴射、皇太子监国、封宗室王、封郡王、巡狩、亲征、献俘、奏捷、进历、进春、经筵、日讲、耕藉、视学、策士、传胪等等都包括在内，极其繁琐复杂，稍一疏失，就要被指责，甚至被处分，碰着朱棣这样烈性的皇帝，尤其难应付。况鍾十分小心谨慎，从未出什么差错。

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再次北巡北京，礼部就选派况鍾随行。那时北京还不是京都，而是所谓“行在”，但是已经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北京进行了。当时邻国到“行在”来朝贺的就有南真腊、渤泥、占城、暹罗、撒马儿罕等国，又举行了两次会试，况鍾都参与了具体工作。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反对迁都的主事萧仪被杀，侍读学士李时勉下狱，替朱棣热烈地奔走，筹备朝贺、祭告等典礼的况鍾又一次受到了朱棣的赏识和重视。永乐二十年(1422年)，朱棣命太子监国，亲自率兵往阿鲁台，凡祭告、庆贺、封策等文件大部分是况鍾参与草拟的。况鍾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期间，先后受到朱棣三十一次嘉奖。

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藏书阁^①发生了火灾，朱棣雷厉风行命令彻查，看样子，可能引起大狱。朱棣和况鍾谈起这件事，况鍾说：“卷帙内蠹鱼年久每能生火，恐非人所为也。”朱棣听了他的话，没有再深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死于榆木川，朱高炽于八月即

^① 藏书阁，一作册局。

位。朱高炽做了不少赦免的工作,减轻老百姓负担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更突出的是从各方面选拔人才,况鍾就在这时候正好任主事九年了,也到了考绩的期限了,被越级提升为正四品的仪制司郎中。所以《况太守集》的《年谱·卷首》也说:“考九载满,例升员外郎,奉旨超升仪制司郎中。”

朱高炽又令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人才,况鍾推荐了同乡人进士出身的左中允张宗琯^①,朱高炽便去问杨士奇:“别人都推荐地方官,为什么况鍾反而推荐京官?”杨士奇也是江西人,和况鍾、张宗琯两个人都是熟悉的,就回答朱高炽道:“张宗琯很贤能,我和侍读学士王直正要推荐他,没有想到被况鍾抢了先。”朱高炽说:“况鍾能够了解张宗琯,也是贤能之士啊!”一方面把张宗琯提升为南京大理寺丞,对况鍾的印象也更好了。

张宗琯确实没有辜负况鍾的推荐,宣德二年(1427年)因为触犯了朱瞻基被降为常州府同知,他并没有因此而敷衍塞责,奉命协助清军御史李立整理江南军籍时,李立滥捕老百姓以充军伍名额,张宗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李立要杖老百姓,张宗琯跪在地上,请求代老百姓受杖。最后张宗琯因受种种压制,忧愤而死。

明代自从将京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对于南方,为了补救鞭长莫及的缺憾,在南京同时也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等衙门,并且也常派皇太子或亲王到明太祖朱元璋墓园孝陵去祭祀。洪熙元年(1425年),南京地震多次,明仁宗朱高炽担心要出什么事故,于夏初派皇太子朱瞻基去祭孝陵,实际上是要他坐镇南京。朱瞻基的随行人员都是朱高炽亲自挑选的,被认为“识达大体”的况鍾是其中之一。朱瞻基带着况鍾等抵达南京

^① 张宗琯政绩,详见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四《君山庙碑》和卷十七《张重器墓碣铭》。

才两个月，便得到了朱高炽病危的凶讯，全班人马从南京立刻赶回北京去，况鍾戴着纱帽，穿着礼服，扶着朱瞻基的轿子而行，后来朱瞻基看见他千里跋涉太辛苦，特别批准他骑马随行。每到一个地方，朱瞻基停下来休息时，况鍾都是先在迎候了，因此朱瞻基对况鍾格外有好感。

另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和尹守衡《明史窃》卷七十八，都说朱高炽逝世后，是礼部派况鍾到南京去迎接朱瞻基的，况鍾连续驰骋了七昼夜就达了，然后随同朱瞻基一同回北京的。

朱瞻基即位以后，况鍾又曾被派陪同亲王赴南京祭孝陵。

况鍾虽然仅是一个中级官员，但和朱棣、朱高炽、朱瞻基这三个皇帝都比较接近，和其他高级官员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当时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人在朝廷中颇有势力，况鍾是江西人，和杨士奇等经常往还。此外，和况鍾常接触的还有王直、曾荣等。王直当时曾写了两首七绝诗《五马图为况郎中题》：

凤臆龙髻不受羈， 长林丰草日斜时；
超然自得随天性， 比乐奚官未必知。

汗马名驹出月支， 贡来长得被恩私；
彤幡皂盖行春日， 还忆金门立仗时。

况鍾的交友也不限于江西同乡，和三杨之一的杨溥、副都御史吴讷都很接近。况鍾因为对书法颇有造诣，兴趣也很浓，所以又常向正字官金问请教。还有一个同是书吏出身，而历任吏部司务、礼部主客司主事^①、礼部主客司郎中的平思忠，对书法、尤其是草书很有研究，和况鍾也成了好朋友。

① 史鉴：《松陵文献》，谓况鍾系继平思忠为礼部主事。

第三章

初任苏州府知府

一、领敕书赴任

如前两章所述,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比较肯听取臣僚们的意见,因此即位以后,在政治、经济,尤其人事行政方面采取了不
少积极的措施。

朱瞻基感到有许多官员都是凭年资逐级迁升的,其中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也有,就想到在吏治上有所改革。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府等九个府^①的知府有缺,他便命令大臣们在五、六品的京官中选拔一批干练的去充任。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说吏部尚书蹇义推荐了况鍾。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说礼部尚书胡濙推荐了况鍾,可能是根据张洪《太守况公前传》和徐有贞《送太守况侯述职诗叙》。

《明史·况鍾传》、《吴郡名贤图传赞》、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作胡濙、蹇义所共荐。

① 王凝斋:《掾曹名臣录》说是十个府,但并没有列举府名。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附注九府名称为苏州、松江、常州、吉安、嘉兴、温州、湖州、琼州、开封。与一般记载不同。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八记载况鍾事迹时,说户部郎中徐鉴出任琼州府知府,与一般记载不同。

杨循吉《吴中故语》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说内阁首辅杨士奇推荐了况鍾。祝允明《九朝野记》和杨穆《西墅杂记》说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所合荐。

我认为这些记载并不矛盾，况鍾和上述五个大臣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分别推荐或共同推荐况鍾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也说明了况鍾到任以后，所以能放手做一番事业，不仅有朱瞻基的一贯信任，而且有杨士奇、蹇义等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们的支持。

至于况鍾在《辟疆馆记》^①中说：“予初以吕、蹇两尚书荐，备官礼部，出守雄剧。”有人认为可能吕震也是推荐者之一，这问题不存在。因为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吕震已在礼部尚书任上病死，况鍾出任苏州知府时，已经时隔四年，吕震怎么能向朱瞻基推荐呢？况鍾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指“备官礼部”是吕震所推荐。

主要的推荐者仍应该是礼部尚书胡濙，身为仪制司郎中的况鍾是他的属僚，胡濙是况鍾的直属上司。

在发表况鍾为苏州府知府的同时，同时被任命的有下列诸人：兵部郎中赵豫任松江府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任常州府知府、户部郎中罗以礼任西安府知府、刑部员外郎陈本深任吉安府知府、户部员外郎邵旻任武昌府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任杭州府知府、御史何文渊任温州府知府、御史陈鼎任建昌府知府，连况鍾在内，一共是九个人。

朱瞻基亲自举行了一次宴会，送这九个知府赴任，同时还分别给了敕

^① 《辟疆馆记》碑文为清代嘉庆年间所发现。据叶廷琯《吹网录》记载，据说经黄丕烈考证，此碑系伪造。

书，原文如下：

敕苏州府知府况鍾：国家之政，首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择守令。朕临御以来，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而比岁田里之民，鲜得其所，究其所自，盖守令匪人。或恣肆贪刻，剥削无厌，或闾冗庸懦，坐视民患，相为蒙蔽，默不以闻。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泽不得下施。

今慎简尔等，付以郡寄，夫千里之民，安危皆系于尔，宜体朕心，以保养为务。必使其衣食有资，礼义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徭役，兴利除弊，一顺民情。

毋徒玩愒，毋事苟简，毋为权势所胁，毋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尔亦宜奉法循理，始终不渝，庶副朕之委任，钦哉故谕。

这一份敕书指出了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人选的是否得当牵涉到经济能否发展，社会能否安定等各方面的问題。并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员有很多是不能恪尽职守的，所以才派一批新的人去担任。到任以后，应该如何做，也提得比较具体。最后告诫他们，一定要认真而坚决地贯彻朝廷的意图。并给予权力，如有干扰或破坏他们贯彻政策的权势、奸吏和官员，可以上报或解京法办。

本来知府一级官员和朝廷并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在知府之上，还有每一行省的行政长官，即布政司的一级。而朱瞻基要这九个知府直接和朝廷建立某些联系，实际上是想多了解一些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这一批官员的选择是审慎的，朱瞻基在敕书中允许给他们的支持也是兑现的。况鍾以及赵豫、陈本深、

何文渊后来都有显著的政绩，何文渊则曾被再次提升重用。

朱瞻基让九个知府领敕书赴任，已经是破例的恩典，尤其对于况鍾，应该说是最受朱瞻基的信任和重用的，因为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任何一个府治，所以朱瞻基早在宣德三年（1428年）春，知道苏州府知府缺人时就关照吏部：“苏州大郡，公务繁剧，急选廉公有才能者任之，贪暴厉民者不可用。”^①看来，朱瞻基自己确实认为况鍾是苏州府知府理想的人选，所以才作了这样的安排。

宣德年间，对明代可以说是全盛时代，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虽然各地免不了常有水旱等灾情，官仓存粮还是充足的。而朱瞻基则是颇为向往汉武帝、唐太宗的一个皇帝，因此想在保守祖宗成业的基础上对经济和吏治都作一番整顿和清理。他特别注意到了全国经济的命脉所在，也即是全国税粮最集中的苏、松、常、杭、嘉、湖等府，而其中尤以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朱瞻基所最关心的，因为如果苏州府的税粮收不起，朝廷的财政经济就将立刻陷入困境。

朱瞻基先派广西布政使周干、大理寺卿胡概巡抚江南，后来派刑部侍郎成均巡抚江南，又再加派工部侍郎周忱，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苏州府、松江府的税粮已经发生严重的问题了。因为朝廷对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苏州府与松江府居然收效甚微。诚如周忱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②中所说：“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盖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三十四。

② 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二。

而遁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周忱所发现的农民户口锐减、税粮积欠日多的情况，自己归纳为“一曰大户苞荫、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荡、四曰军囚牵引、五曰屯营隐占、六曰邻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诱”这七弊所造成。因此苏州府知府要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决不仅仅是减削税粮，也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七弊”。

况鍾于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到任^①。当时户口无确切统计，仅知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六县，外加太仓州与崇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四十九万一千五百十四户，人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口。弘治四年(1491年)为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户，人二百四十万八千九十七人。

至于吏治，则很腐败，各方面的剥削名目繁多，而规定上缴的赋税则又拖欠数百万石之多，本来很富庶的鱼米之乡反而日趋贫困。其原因所在，正如方献忱在《致仕乡宦方献忱致太守书》^②中所说：“苏人不幸以富饶闻，凡官斯土者，辎车过传于斯者，京僚采办来斯者，日踵弗绝，人人思饱其囊橐而去。”就是说凡是到苏州府来做官的，或仅仅出差来此或路过的，都要搜刮一饱才走。因此造成了国贫民困的局面。

况鍾离京时，首辅杨士奇赠诗一首，内有“六月云霓人望切，好为霖雨向姑苏”等语，把况鍾比作救大旱的甘霖，期望也是很大的。

① 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年代，诸书错误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记载：《明史》卷七十二《选举志》：“宣德三年况鍾、赵豫等以荐擢守苏、松诸府，赐敕行事。”《续通典》卷十九亦作宣德三年。《四库全书》本《吴郡文粹续集》卷十王直《济农仓记》：“宣德三年太守况侯始至。”但其他刻本的《济农仓记》都是“宣德五年”。清康熙四十七年修《苏州府志》误将况鍾到任年代作宣德七年。这是误将况鍾“夺情”复任年代作为初任年代了。其他有关苏州的地方志也有因此以讹传讹的。

② 《吴郡文粹续集》卷五十。

曾任越府长史的周忱，是江西吉水人。也是况鍾的江西同乡，为况鍾写了一首七律《送况郎中任苏州太守》，原诗如下：

擢自仪曹领郡符， 朱幡熊轼向姑苏；
身驰驿传声华重， 手捧天书宠渥殊。
政洽九江重渡处， 时清合浦还尽珠；
故人尊酒遥相送， 努力期君展壮图。

这诗也强调了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非同寻常，而是“手捧天书”的钦差知府。此外，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情谊也有所流露。对于况鍾，周忱是以“故人”自居的。

况鍾到任后，仅仅两个月左右，他的“故人”周忱便以工部侍郎衔，被“钦差”而巡抚江南。从此，他们融洽无间地合作了十多年。

二、整饬吏治，自己也被控告

因为朱瞻基在敕书中特别强调整饬吏治的问题，况鍾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上任之初，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后来况廷秀编著《太守列传编年》^①，曾予以引用，原文如下：

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迹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

这一篇以整饬吏治为主要施政方针的《座右铭》，论述了官员、吏员与老百姓

^①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二。

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了“植德”与“用刑”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说明官员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要坚决执行法律就比较困难;不能坚决执行法律,就无法纠正吏员的不正之风;不能纠正吏员的不正之风,就不能使老百姓得到安定。

况鍾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发现不称职的官员、吏员很多,于是请求朝廷准予苏州府添设同知、通判各一员,催部秋粮军需推官二员,长洲、吴县、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六县各派知县、县丞、主簿一员,这并不是增加官员,而是要在撤换大批不称职官员时,职务马上有人接替,工作不致停顿。但是吏部认为不久之前大理寺卿熊概巡抚苏、松,请求苏州府暨所属各县均添设佐理人员一名,以专督税粮,已经准予所请而增添,因此没有批准况鍾的请求。朱瞻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看到况鍾的深谋远虑,不批准。他说:“苏、松洪武、永乐年间官不增设,何尝不办,盖官在得人,苟不得人,反为民蠹,不可增色。”^①况鍾虽然没有能达到目的,并不因此而消极。

况鍾对于属官、属吏的考察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的。一开始,书吏们拿什么文件要他批准的话,他通常都是照批的,有人误以为况鍾愚庸无能,加以欺瞒。苏州府通判赵忱对况鍾态度尤为轻侮。其实况鍾已把他们的种种表现记录在案,较重大的并上报了朝廷。

到任一个月以后^②,况鍾已将基本情况掌握,便开始采取措施,把属下官员、吏员全部集中,宣读了朱瞻基所颁的敕书。因为里面有“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的话,凡是有劣迹的官员、吏员都感到

① 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六十九。况鍾的要求未能批准。但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七《请添设官员十六缺奏》有附注“准奏”。现以《明实录》为准。

② 况鍾到任,究竟隔了多少时间才宣读诏书,各书记载不一。我是根据一般的记载。祝允明《九朝野记》和李贽《续藏书》亦均如此。郑晓《吾学编》作“三日后”,甚难置信。

惶恐了。

况鍾又对地方里长老人谈话,对他们说:“我早知道苏州地方上为非作歹的人不少,我自然有办法加以分辨,但不准备像包拯那样亲自来一个一个辨认。现在你们可以把比较突出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报告我,我一定记录在案。好人我以礼相待,请来参加乡礼饮酒。坏人我依法惩处,为民除害。”

况鍾当众把官员、吏员、皂隶们贪赃枉法、欺上压下的罪行一一宣布,情节特别严重的,当时处死了六个。这样,官员、吏员和皂隶知道况鍾办事非常坚决,而观察得很仔细,他们再也不敢要花枪了。有的主动承招了自己的罪行。

经过这一番清查,况鍾又撤换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他们是苏州府经历司知事孙福,长洲县知县汪仕铭、主簿林皋,吴县主簿王勉,常熟县知县刘正言、典史郭良,吴江县知县张肃、县丞赵浚、主簿鞏端,昆山县县丞刘志、主簿赵荣等十一人。后来又向朝廷报告了长洲县知县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诘问其故,但云年老无能,今事皆废弛,吏胥肆奸,民失所望”。朱瞻基“谕行在吏部臣曰,长洲剧县,须廉干吏乃能治,何以不能量才授任,即选贤能者驰驿代之”。^①于是把徐亮也撤换了。

对于较大的贪污案件,况鍾审理清楚后,就分别差遣典史等官员,将人犯与赃款押解进京,听候发落。先后被押解进京的有:苏州府经历傅德及其赃款五百七十三两,是长洲等县的粮长、皂隶们检举揭发的。昆山縣知县任豫及其赃款八百六十两和昆山縣县丞吴仲郢及其赃款四百二十两,是昆山縣的老人、粮长们检举揭发的。长洲縣典史薛孟真及其赃款九十七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七十六。

两，是长洲县县丞徐景贤检举揭发的。这些人都曾用酷刑拷打粮长里老，迫取银两。

当况鍾把犯贪污罪的苏州府经历傅德及其赃款五百多两解京时，朱瞻基甚为重视，亲自命令行在都察院审理治罪，而且对众朝臣说：“知府一郡之表率，而行之自廉始，鍾必能持廉，持廉而后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之贪者必自敛矣！”^①事实证明朱瞻基的推断是正确的，经过况鍾以身作则地奉公守法，严惩贪污，就把坏风气逐步扭转了。

在这一些贪官污吏之中，薛孟真最为气焰嚣张。他借催粮为名，带了第三个小老婆，坐着船，遍历各乡各镇，遇着殷实富户，就住下来，百般需索衣食，榨取银两。和苏州府推官高鹏争执，竟将高鹏殴打下水。

薛孟真被押解进京后，也对况鍾告了一状，进行报复。他告了四件事，据他说：

一、长洲县县丞樊敏打死人命，托苏州府通判姜志向况鍾说情，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办法办。

二、库子徐升童等假借常熟县买办军需之名盗窃了官钞三千余两，事后未加追问。

三、况鍾不骑官马，私自接受钦差内官来福的黑漆坐轿，用夫扛抬。

四、况鍾科派长洲、吴县两县的银两办了糖果猪羊在承天寺设宴，招待钦差内官。

薛孟真所说的这个钦差内官来福，杨循吉《吴中故语》有所记载：

宣宗时承平岁久，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七十二。

多，如苏州一处，恒有六、七人居焉。日来内官罗太监尤久，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鸣禽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厌。

不知况鍾何以和来福相处得这样亲近。《吴中故语》记载了况鍾和别的太监的斗争，但没有记载和来福的关系。当然，事实真相有的并非如此，有的都是照旧章办的。当朱瞻基看到薛孟真的状子以后，责令况鍾逐一答复。况鍾写了《陈明贪官反噬诬奏》^①，辩明了真相，主要内容如下：

一、樊敏打死人命案全系捏造。

二、库子徐升童并未盗窃官钞。曾有顾斌、王琮二人冒支常熟县颜料价钞五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贯，况鍾即将官钞入库，人犯问杖一百，充军三千里。

三、况鍾因官马过于羸瘦，曾向内官来福借坐过轿子。

四、旧例对下西洋的钦差太监都设宴接待，因此也接待了下西洋的钦差太监洪保。

经过况鍾的解释，朱瞻基并没有加罪于况鍾，而且对况鍾信用不衰。

况鍾在整饬吏治的工作中也曾经上当受骗，主要问题发生在苏州府经历傅德身上，他的贪赃枉法是后来才发现的，一开始况鍾还很信任他。此人在况鍾面前说了吴江县丞赵浚许多坏话，况鍾信以为真，将赵浚列入了第一批罢斥官员的名单。在查办傅德贪赃枉法一案的同时，赵浚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官复原职。都察院认为况鍾有“妄奏之罪”^②，要求处分。朱瞻基说，这是傅德欺骗况鍾，况鍾没有仔细核对罢了。主张替况鍾记上

①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卷十一。

②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九十。

这次过错就是,不再做什么具体的处分。但是都察院这份奏疏,朱瞻基还是让况鍾看了一下,使况鍾以后处理这一类事情可以更慎重一点。

三、减削田赋,以苏解民困

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因为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当初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张士诚曾以苏州为他的统治中心,顽抗过朱元璋。朱元璋对这一带的老百姓采取了一些措施,把一部分殷实富户迁到凤阳,又把苏州府的田赋酌量增加,总的是要削弱大地主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而司农卿杨宪^①认为苏州府土地确较其他地区肥沃,也有意识地把国家的财政开支的较大部分要苏州府承担。

根据统计,当时全国夏税秋粮总数为三千万石左右,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夏税秋粮却要缴纳二百八十一万石,占全国总数百分之九点五。

周忱就任苏松等府的巡抚以后,把太仓直隶州的人口和税粮作了一次统计:洪武年间每丁授田十六亩,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造的黄册,共有六十七个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不过相距四十年,所造黄册只有十个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了。人口锐减得很多,并不是由于死亡,而主要是逃亡。再仔细核对一下,这里面居然还有一半是虚报的,实际已经没有那么多户口人口了。所以周忱写了《与行在户部诸公书》^②,

① 明代苏州府田赋与杨宪的关系,见徐开仕《明名臣言行录》卷二十三《尚书周公忱传》。

② 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二。

反映愈来愈严重的逃亡情况，并且叹息道：“户虽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当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粮，欲望其输纳足备，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忧恐数岁之后，见户皆去，而渐至于无征矣！”正因为朝廷派周忱来巡抚，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税粮的收入，周忱看到有“渐至于无征”的危险，所以就发出了呼吁。周忱希望户部的负责官员不要过分主观地以为苏松两府是富庶的，而实际上“天下之农民固劳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因此，他要求户部诸公重视这个逃亡问题，并且采取一些措施，以扭转这个局面。

苏州府的耕地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其所缴纳的田赋的比率也不同；官田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之分，古额官田指宋、元以来籍没入官的田，抄没官田指明初抄没的张士诚及其僚属所有田产，两者合计数量是很大的。顾亭林据况鍾宣德七年（1432年）所奏之数发现，在长洲等七县秋粮总数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中，官田之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余石，民田之粮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因此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大部分则为官田。顾亭林又指出，官田之粮当时虽奉诏减削十分之三，一石犹为七斗，而民田仅以五升起科，因此“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为十四亩矣”，即有的官田之粮几乎为民田的十四倍。^①

官田不仅科征率高，而且有一大部分要运到外地交纳，其中运北京者五万七千九百石，运山东临清者一百零六万一千一百石，运徐州者十五万石，运淮安等地十五万石，运南京者七十四万五千六百石，这些外运的粮需

^① 《日知录》卷十。

要大量的船只和劳动力，路途遥远的，运费超过粮款四倍左右。因此官田的负担比民田的负担要重得多。这运费既要加征，蚀耗也要加征，就够老百姓负担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大地主和官府、粮官、税吏进行互相勾结，把官田的沉重负担转嫁一部分到民田，民田所有者的经济负担比实际应负担的更重，于是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和抛荒等现象。

况鍾发觉苏州府的税粮过重，上奏疏请求核减：官田原收每亩一斗至四斗者核减十分之二，官田原收每亩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核减十分之三。巡抚周忱也支持况鍾的请求，亲自和况鍾在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工作，提出了请求核减古额官田税粮三十四万五千八百石、抄没官田税粮三十七万五千三百石，共计七十二万一千一百石^①的方案。户部因为数字过大，怕影响朝廷收支，就说：“洪武初年古额官田起科已定，不在开除之例”，批驳了况鍾的《核减浮粮实数覆奏》。

况鍾因为减轻税粮是根据朱瞻基的敕谕行事的，被户部驳回，心中不服，于是又上《再请减秋粮及抛荒粮抽取船奏》^②，说到：

查洪武年间抄没官田起科多者，每亩不过三、四斗，农民可胜。其所不胜者，正在古额。伏睹敕谕明开旧额官田。今本部驳。查不准古额官田，前后不一。人民惊恐，莫知适从。若不遵依，不减，仍照旧额征粮，不惟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

① 这个数字根据况鍾的奏疏。《明书》、《今献备遗》、《名臣志钞》俱作八十余万石，有误。

② 杜琼《况太守挽诗》：“十年威令能移俗，百道封章不顾身”，主要是指这一次的奏疏。

况鍾在奏疏中指出要减轻税粮的主要是宋元以来的古额官田，而皇帝在敕谕中也明确了是减轻古额官田的税粮。如今如果不减，就是违抗皇帝的命令，而且对老百姓也失去了信用。道理讲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决，而且比较激动。但是户部仍旧不批准。

关于核减抛荒浮粮，况鍾也作了艰巨的斗争。昆山县有全家死亡或外逃的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户，占整个苏州府总户口的百分之二点五左右，遗下来无人耕种而抛荒的官田、官地以及滩、荡等共二千九百八十二顷十一亩。况鍾根据洪熙元年（1425年）所颁诏书说的“官民田地旧佃种人户或全家死亡，或丁力消耗，以致抛荒，有司即与召人耕种，官田照民田起科。如果无人耕种者，该纳税粮从实取勘开除，毋得洒派抛荒，重为民患”，请求豁免这部分秋粮。又昆山县若沿河滨海田地已经崩塌，无从种植，况鍾也请豁免。两者合计为十四万九千五百十石，但户部也批驳不准。

另一笔请求减免的税粮是请求将宣德元年（1426年）至宣德四年（1429年）这四年的欠赋折收钞贯的一件事。这四年中，逃亡户和死绝头上共欠七百万石税粮^①。况鍾上《清军及旧欠折钞奏》，要求根据洪熙元年以前旧例，打折扣而收钞贯。户部说“苏州自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钞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有奇。宣德四年九月，蒙恩宽恤，今折钞及布绢，至今未足；若又准所言该粮七百六十万石，国家用度不足。遣人同侍郎周忱严限催征，并逮问其官吏”^②，朱瞻基认为苏州府税粮数量大，所以也比较难办，严限催

① 这个数字根据况鍾的奏疏。《明书·况鍾传》与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均作“七百六十余万石”，有误。《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也说是“七百六十余万石”。

②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七十四。

缴就可以了，如果将官吏问罪，这事情就更加没有人敢承担了。

请求核减古额官田税粮与抛荒浮粮两事，都成了悬案。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有一天在文华殿召集大臣们谈论国事，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再核减一次税粮，才知道前次下诏书核减官田税粮一事，因户部批驳，并未实施，颇为震动。于是命杨士奇立刻拟就诏书，颁发全国。

这样，况鍾的请求终于在户部通过而实现了。减免了官田税粮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抛荒官田税粮十五万石。运南京的税粮七十四万五千六百石改由官军来苏自运，运临清的税粮一百零六万一千一百石减去六十万石。这使苏州府的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不少。况鍾曾代表七县士绅、在籍副御史吴讷、粮里老人陈昭贤等上奏谢恩。

况鍾对于税粮交纳的手续，也对朝廷提了切实可行的建议^①。他认为无论各都司、布政司以及府、州、县或卫所所属的仓库收到税粮之后，出给通关为凭证，由纳户送交户部所属各衙门以清手续，本来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后来发生了流弊，管仓库的官员、吏员、差役接受贿赂，就弄虚作假，甚至没有收到税粮，也开发通关出去。另外私自伪造印信、通关的事情也有。这些事情到后来即使查清楚了，犯罪的人也法办了，但是被侵吞的税粮往往无法追回，而原已交纳税粮的农民则被迫要重新交纳，更加重了负担。况鍾提出这种作为税粮收据的通关要有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不仅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好字号，而且填明发给的日期，并不许加以涂改。这样一式三份，户部与各府、州、县各存一份，既可以杜绝弊端，又便于查核。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九十一。

四、废止苛捐杂税

除了税粮之外，苏州府人民负担着许多种类苛捐杂税，其中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最为严重。

苏州离海岸和长江口都很近，受到倭寇骚扰的机会比较多，做些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在当时却成为一种巧立名目的严重剥削。苏州卫、太仓卫、镇江卫、吴江守御千户所、崇明守御千户所共有备倭船只四十二只，这些船只被官军们故意弄破弄沉，或谎报破损，连年借修造为名进行勒索。有个百户李让经常到长洲县催索木材，长洲县当地不出木材，要凑钱到别处买了木材再运来，运到以后，李让却又不要木材，而要银两布绢了。这样故意刁难，使老百姓很难应付。假使银两布绢缴迟了几天，老百姓便要被抓捕殴打，有时把农具、牲口、锅子变卖了银两送去，仍不免被责骂虐待。

况鍾计算了一下卫所收取的银两，已经远远超出造船需用经费的数目，而且事实上所谓备倭船只已经多年不修缮不添造了。况鍾上了《备倭船及开浚河道奏》^①，说明了以上情况，对李让等人的敲诈勒索作了揭发。至于修造备倭船只的材料解决方法，他也作了具体建议，说：“乞照邻近浙江海宁等卫及嘉兴等府造捕倭船只事例，合用木植着军卫自行采办，其棕、麻、油、铁、石灰有司支給官钱买办。”况鍾的奏疏上达而被朝廷采纳以后，这李让就由巡按御史法办了。因为彻底废止了这一种科派的做法，苏州府的老百姓又免去一项沉重的负担。

“粮运船只”是平江伯陈瑄奏准朝廷而定下的规矩，其具体办法是由苏

^①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七。

州府七个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抽调的数目也有一个计算的方法：原来苏州府运粮至淮安缴纳者每二千石抽船一只，至徐州缴纳者每二千六百石抽船一只，至临清缴纳者每三千石抽船一只，共计要抽调船只五百零六艘之多。事实上抽调不出这许多船只，于是便折缴造船费用，每只三百石粮，共计十五万一千八百石粮。

况鍾对于陈瑄当初定下这个规矩的经过作了调查，原来说明是“不为常例”的。于是他就上奏本，指出“不为常例”的事情不应该每年科派。朝廷批准了况鍾的奏本。

至于“借马”，则是建文四年（1402年）^①的事情，当燕王朱棣大兵南下时，要经过江北，而当地老百姓流亡走散的很多，找马匹很困难。而朱棣认为江北的老百姓受战乱创伤较重，特予免税三年，以苏解民困。至于驿递须用的马匹则暂向苏州府借用二百四十匹，也以三年为期，三年以后，则由江北地方自行筹款买马，以供驿运，原借马匹则归还苏州。对于苏州府来说，这是额外负担，于是又因此而另立了一套摊派的办法，有粮五百石以上的富户出上马一匹、四百石以上的富户出中马一匹、三百石以上富户出下马一匹^②，因为当初说明以三年为期，所以苏州府也没有认为是沉重的负担。但是，三年、六年、九年……过去了，马根本没有还，而且马匹有死亡，还要原出借者购买补足，弄得家破人亡的也不少。

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时，这一批马匹已经借了二十八年了，因此况鍾就上奏请求将马匹归还苏州府，这事情又在朝廷里拖延了两年，到宣德七

① 朱棣不用建文年号，因此建文四年都被改成洪武三十五年，余类推。

② 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小户多户合成大户税粮数再摊派下去的。

年(1432年)才被批准。江北把向苏州府借的二百四十匹马还给了苏州府。这一沉重的苛捐杂税终于被免除了。

在这二十八年之间,事实上苏州府又陆续补了二百多匹,这一笔账当然是不可能再追回来了。

宣德七年六月,工部征派三梭阔布八百匹,分配的标准不知如何定的,整个浙江省包括十一个府,每年民粮要交二百六十余万石,但只派了一百匹,单独一个苏州府要负担七百匹。况鍾上奏疏力争,指出许多苛捐杂税科派都和三梭布的情况相近似,很不均匀。希望朝廷规定一个标准,或依税粮,或依户口,人民不致负担过重,所需要的物品也比较容易征齐。皇帝也批交有关部门处置了。

五、清理军籍,释放平民

明代在军事设施方面的具体布置之一便是在水陆要冲地带设立卫所,当时在苏州府范围之内便有苏州卫、太仓卫等,每一卫所辖士兵五千六百人。卫所下面设千户所、百户所等等。士兵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情况:明代开国之初跟从诸将东征西讨而仍留在卫所的官兵,称“从征”。元代以及张士诚、陈友谅部下战败后投降过来的,称“归附”。官员与老百姓犯罪流放充军的,叫“谪发”。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父死子补。这一办法,很不得人心。洪武三年(1370年)便发生了士兵陆续逃亡的严重问题。于是朝廷只好四出追捕,同时颁布了一条规定,所有千户、百户等武职人员的职位升降或奖惩是以士兵是否足额、有无逃亡为主要标准之一。这样一来,本来相当混乱的军籍就更加混乱了。

对于清理军籍，朝廷相当重视。宣德三年（1428年）就要给事中、御史等官拟订了十一条清军的条例，予以公布；宣德四年，扩充为二十二条。这一文件被称为《清军条例》或《军政条例》^①。宣德三年，朝廷就派御史和给事中到各地清理军籍，到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府来的是御史李立和给事中孙确，而以李立为主。按理说，李立应该依照条例办事的，但李立一心一意在军籍清理方面向朝廷表功，只顾追求名额，军籍越多越好，因此所作所为，完全违反了条例。凡是丁尽户绝的，本应该把军籍注销，却不予注销，而是找这些丁尽户绝的远房亲戚、义子、女婿或佃户来抵充，甚至找同名同姓的人抵充。凡是里老不赞同，就把里老施以酷刑，勒迫里老把这些与丁尽户绝者略有关系的人都报作应继人丁，解赴卫所，充当士兵。

苏州府同知张徽^②，能写点诗文，曾有吟咏苏州府儒学内景物诸诗，如《南园》、《道山》、《泮池》、《杏坛》等等，今保存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三。但其为人却是一无可取，对上谄媚讨好，对下百般勒索。对于李立这一套残暴的做法，他配合得很好。对李立所作所为，他还觉得不足，因此他异想天开，把士兵死后寡妇改嫁他人所生的儿子也拘捕到案，说是什么“军籍民胎”，也一定要去顶替，充当士兵。总之，凡是被张徽发现可以充当士兵的人，无一幸免。在县里，也有类乎张徽这种酷吏，例如吴江县的张主簿就是，他虽然已经退任，却利用旧的关系，从中勒索敲诈。

张徽清理军籍，只问一句话：“你情愿做士兵呢？还是情愿做鬼呢？”被

①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宣德）三年，敕给事、御史清军，定十一条例。”况鍾称《军政条例》。

② 明、清《苏州府志》均无张徽传。钱止庵《吴门补乘》卷四有张徽小传。无籍贯与到任离任年月，但谈到清理军籍之事。况鍾《催补属员奏》说起张徽丁忧，看来未受惩处。

审问的人只能回答“情愿做士兵”，没有解释、说明的余地。有人当堂这样回答了，下堂以后就自杀了。受苦受罪的不仅止这些被曲断为军籍的人，甚至凡是被认为军籍的人逃了，邻居、解差就都要连坐，或被办别的罪，因此一家人家甚至有数十人被充军或杖死的。张徽在吴江县这样审理军籍，自然尽可能避开其他官员们的耳目，而吴江县地处交通要道，往来的官员太多，对张徽很不利，于是他就搬到同里镇审理，把知县、仵作等人也都带到同里去了，并且公然贴出“敢有违者，罪在必死”的布告。因此被枉断为军籍的人很多，受冤而死的人也不少。

关于李立枉断军籍，激起民怨的事，况鍾在京时就有些知道，因为李立到江南不久，就和常州府同知张宗琯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张宗琯也是江西人，在大理寺丞任上，宣德元年（1426年）曾被况鍾向朝廷大力推荐。张宗琯被派往福建清理军籍时，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回京复命后才调任常州府同知。李立也知道他名声甚好，预先就向兵部提出要求，指定要张宗琯协助他办理常州府的清军工作，兵部同意了。张宗琯看到李立“锐意得军为功，不念民枉”^①，很不以为然，就根据条例的规定和李立力争，但李立十分嚣张，认为张宗琯成了他李立升官的障碍，动不动就对张宗琯进行谩骂呵责，张宗琯虽然没有屈服，但受了许多冤枉气，胸中郁闷，于宣德四年冬背生疽而死。

况鍾到任以后，就在苏州府的清理军籍工作上，也遇到许多拦路告状的人。此外又有朱阿狗等一千二百零一名、陈阿多等四百五十六名、严佛保等二百二十六名也都为了被冤断军籍而请求况鍾申冤。况鍾作了复查，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五十九。

发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民户,于是上奏,请求另派公正的御史、给事中等官员会同地方上的府、县两级官员,依据颁布的条例,重新清理军籍。就在这同时,松江府知府赵豫也上奏揭发了李立的残暴行为,常州府又有七百多人作为军籍问题诉冤。

况鍾把李立和张徽在清军问题上的罪行都上报了朝廷,朱瞻基也不无震动,对兵部尚书张本等大臣说:“朝廷爱恤军民,本同一体,刻薄之辈徇私妄作,以致纷纷如此”^①,于是用敕书命刑部右侍郎成均^②复查。在苏州府范围之内,总算免除了一百六十人的军籍。另外明确了一千二百四十人^③的军籍仅限于他们本人,不得株连追捕。

况鍾并贴出《钦奉清军榜示》、告诫粮里老人,如果原来确属军籍,而粮里、老人又作保具结改为民籍者,则发往边远之地充军,负责作保具结者发附近卫所充军,如有官吏、粮里、老人等仍旧以民作军讹诈财物者一律查办。这样使清理军籍一事走上了正轨。但是,被曲断为军籍的情况太普遍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冤案全部平反。后来又经过巡按御史曹习占、苏州府同知王贵等再次清查,才把被冤为军籍的平民全部恢复为民籍。

除了清军御史李立和同知张徽所造成的关于军籍问题上的冤案以外,还有一些冒充军籍的案子,也需要清理。原来昆山县有部分农民,为了逃避徭役等负担,就向太仓卫等卫所的官员行贿,送礼物,攀亲戚,甚至拜卫

①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七十三。

② 为况鍾复查军籍的巡抚,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八十九为成均。据《明纪》卷十二为周忱,今从《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

③ 这两个人数统计各书记载不一。《明纪》前者为一百五十九人,后者为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今从《明史》。

所官员为干老子,要求列名为官军,实际上并不真的去当差。原来应该负担的税粮和徭役不再负担,结果摊派给了左右邻居。正如周忱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①所说那样:“其所谓屯营隐占者,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转相依附,或入屯堡,而为之布种,或入军营,而给其使令,或冒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遗下粮差,负累乡里。为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书数数行移,卫所坚然不答。为里甲者,常欲根寻矣,足迹稍稍及门,已遭官旗之毒手。”到再一次编造黄册时,又把家中老老小小报到别一家,弄得户口也混乱不堪。况鍾把情况奏明朱瞻基以后,朱瞻基要求行在兵部查办。兵部宣布以《军政条例》再查核,冒充军籍的可以自行改正,但以一月为期,过期就要法办。分管苏州府的巡抚侍郎、巡按御史也对这类事件作了清理,并且告诫了卫所官员,如果知道情况而不举发也要办罪。

六、与成均发生矛盾后丁忧回乡

苏州府以及整个江南是全国税粮最主要的来源地,因此朝廷派到江南来的大官员也特别多,派在江南的巡抚,除侍郎衔的周忱之外,还有侍郎衔的成均。

在清理军籍的问题上,成均和况鍾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其他的问题就发生过不少矛盾。

^① 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二。

况鍾因为各县的分工治农的县丞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而催运粮米又没有人去负责，于是派治农县丞樊敏去催运粮米，而身为治农巡抚的成均认为不能调借，加以阻止，况鍾把情况奏明朝廷，请朝廷裁决，朱瞻基同意了况鍾的做法。另外一件事是大理寺卿熊概巡抚江南时，在苏州府设立了总圩长、圩老、小圩长等一千六百七十二名，原来是要求他们协助粮长、里老关心农务和催办税粮，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这一身份接受状词、放债、盖房子、造船、买马、包揽小户粮草等等，成了老百姓的大患，而成均对这些人是支持的。况鍾经过调查，毅然决然把总圩长、圩老、小圩长全部裁革。这两件事使得成均丢了面子，对况鍾的矛盾就日趋尖锐了。

另外，况鍾自己的确也做了一些不够清白的事情，例如况鍾请江西同乡谌孟礼办的买船事就是。他看到没收入官的私盐船很不错，自己想买下来，又觉得不妥，就把钱交给谌孟礼，算是谌孟礼买的。又向姚枢其人买了三十根木料，修理了一下，叫苏州府的皂隶朱阿佛等撑船，把他的亡妻的棺木运回故乡去。这些事情，成均也都记在心里。

就在况鍾到任未满一年之际，刚才把苏州府千头万绪的事情大致弄清楚，正预备全力整顿一下的时候，况鍾的第二个继母何氏^①又在故乡靖安逝世了。由此又引起了一场风波。

原来况鍾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永乐十四年（1416年）父亲逝世了，按照封建礼教，况鍾应该离任回家守孝。但当时朝廷流行一种叫做“夺情”的

① 按其继母应为罗氏。据道光刻《况太守集》中《况太守年谱》，洪武二十六年，其父续娶罗氏。但罗氏已卒于永乐十五年。而永乐十六年其父即病逝。则宣德五年十二月所病故者实非继母，而系庶母。年谱中庶母无姓氏，或曰姓何。

风气，就是下令不让回家守孝而继续任职。况鍾就是被“夺情”的。永乐十五年，况鍾的继母罗氏在故乡病故，况鍾又再次被“夺情”而继续任职。况鍾本来也可以请求朝廷取消“夺情”的决定的，但况鍾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请求，这当然难免引起人们对他有某种看法。

这何氏是宣德五年十二月(1431年1月)逝世的，据说一直到宣德六年三月初八日(1431年4月19日)才传到苏州，江西靖安离苏州府水陆路程至多一个月可以到了，何以三个月之久才得到讣告，也引起人们的议论。

况鍾于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启程回江西靖安原籍去了。这样，苏州府很快又回复到以前那种贪污盛行、苛捐杂税增添不已的局面。因此，老百姓对况鍾无限怀念。民间流行着一些怀念况鍾的歌谣：

况太守，民父母。

众怀思，因去后。

愿复来，养田叟。

士大夫们也写了一些歌颂况鍾的诗歌，例如：

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

兵仗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

老百姓向当时在苏州的钦差抚民刑部右侍郎成均请求，希望转向朝廷反映，将况鍾“夺情”，让他尽快回苏州府知府原任。对于老百姓的请求，成均并不支持，而且对他们说：“我已在想办法另外调一个好的知府来。”

成均把上次替况鍾撑船回靖安的皂隶朱阿佛找来，让他控诉况鍾，在状词中，说况鍾向姚枢买三十根木料根本没有付钱。

此外，成均还发动了下列诸人控告况鍾：

顾忠告发：市面上红曲每石六钱银子，而况鍾的家丁范某和苏州府皂

隶顾信去找店主金震，把二十多石红曲强卖给他，索价每石二两银子，一共拿去四十五两银子。

医户张琳告发：市面上建独活这种药材每百斤是七钱半银子。况鍾家丁姚某和苏州府皂隶顾信把建独活六百斤卖给张琳，本来只应该付四两半银子，结果付了六两。

粮长沈恒吉告发：况鍾丁忧回故乡时，曾送给况鍾白罗两匹、蓝青纱四匹、画两轴、花席三十条、白米六石。

成均自己也出面控告了况鍾，说况鍾之母于宣德五年十二月内在家病故，“次年二月闻讣，一向不举，至三月初九日方才关府”。又说况鍾“不辨是非，禁死囚人”。

后来况鍾分别作了辩解和说明。对于托同乡湛孟礼出面买船问题，承认确有其事，承认确实很不妥当，请求朝廷给予处分。别的事情，况鍾没有承认。

成均和况鍾的矛盾也是成均和周忱之间的矛盾，而周忱和况鍾是完全一致的，充分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均的工作当然很难开展，于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被朝廷调任为浙江巡抚了。

第四章

复任、三任苏州府知府

一、夺情复任

况鍾丁忧以后，老百姓广泛地要求朝廷准予起复，几乎成了群众性的运动，长洲县的顾荣等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人向朝廷上了本章，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苏州府同知杨粟、嘉定县知县祖述等也联名上奏请求起复况鍾。另一直隶巡按御史金濂^①到苏州府公干，又有二千多人向他称道况鍾的贤能，请求起复况鍾，金濂也把这情况反映到了朝廷里。朱瞻基一方面接到巡抚侍郎成均以及朱阿佛、张琳等人控告况鍾的本章，一方面接到张文昌、杨粟、金濂和众百姓请求起复况鍾的本章，觉得有些矛盾，也有些困惑。由于他对况鍾过去有较多的接触，可以相信他不致于像成均、朱阿佛等所控告的那样糟。既然老百姓要求起复回任，朱瞻基也就决定对况鍾夺情，让他起复回任。他吩咐吏部的官员道：“民之所欲，与之，其令鍾复任，不必赴阙。”就是说，况鍾也不必从故乡靖安再到北京来朝见了，可以直接回到苏州府知府任上。不久，吏部就正式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本来况鍾从苏州回靖安原籍丁忧时，心情比较复杂，因为要办的事情

① 今从《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一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作湖广巡按御史周兼、《况太守集》卷十六《起复民情部案全文》作湖广巡按御史金兼，均有误。

刚才开了一个头，如今中途放手，等于白辛苦了一阵子。而丁忧又是封建礼教最重视的一项制度，又不能不遵守，因此内心深感苦闷。奉旨起复时，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写了一首诗：

闻讣家居秋始阑，牵情有诏又加鞍；

别帷只为君恩重，抚印重看士庶欢。

报国一心何日尽，哭亲双泪几时干；

作忠移孝纳常重，业业兢兢殚寸丹。

这诗主要表示了移孝作忠做好苏州府知府的决心，“业业兢兢殚寸丹”则颇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

朱瞻基固然对况鍾有基本的了解，但是成均等人所控告的这些事情的确也有弄清楚的必要，便令都御史负责清查，命况鍾对所控各事逐一作出解释。况鍾于宣德七年（1432年）上《遵旨辨明诬陷奏》，说明和成均发生矛盾的经过，认为成均是在进行报复。

至于被控告的几件事，况鍾的解释如下：

托谏孟礼出面购买入官私盐船确有其事，这事情办得很不妥当，承认自己有过错。但姚枢的三十根本料则是付钱的，不是白用他的。

继母逝世的消息是三月初八日才知道的，不是二月间知道的，并没有闻讣不举。

至于所谓“不辨是非，禁死囚人”，况鍾声明上次在任八个多月，审问罪犯一千五百十八名，自己觉得清查得比较仔细，不致于有冤案，并无“禁死囚人”之事。在未到任之前的一年之中，苏州府曾禁死囚人二百零九名，他当然不能负责。

另外，顾忠、张琳、沈恒吉三人所控告的则全是捏造，并无其事。

根据调查,成均等人所控告的有的并不确实,况鍾的所作作为也有不够检点之处,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朱瞻基知道了大致情况以后,并没有对成均和况鍾进行处分^①。而成均和况鍾之间后来也没有发生新的矛盾或磨擦。

二、缉拿抢劫官军

况鍾曾贴出《通禁苏民积弊榜示》,其中有一条是专门针对卫所官军的:

卫所官军及巡司兵牌驾使四艘八跳,伴当多人,满装军器、枪丫、锣鼓、炮石,于偏道河港停泊,盘诘验引巡捕,或假以寄顿贼赃及强盗指攀等项为由,遇有商民,辄便擒拏,或连家小,于寺庵观院非法拷打,百般凌辱,诬认贼情,恣肆搬抢家资,指要财物,将妻女奸骗者,许令被害之家,指实来告,以凭拿问。

这一份告示把卫所官军为“匪”作歹的坏事大体上分门别类地罗列了一下,而且允许所有被害人前来揭发控告。因此苏州府范围内的苏州卫、太仓卫及其所属千户所、百户所的官军都有所顾忌,开始收敛,军纪比从前有所改进。到况鍾起复以后,在况鍾的督促之下,卫所官军也做了一些维护治安的工作。对于闯入苏州府范围内的浙江等地的卫所官军,也采取了措施,

^① 某些史书说成均因与况鍾相互纠劾而去职,由周忱继任,不确。成均为宣德五年二月任,为治农巡抚。周忱为宣德五年九月任。为抚民巡抚。况鍾复职后,成均继续任职多年,后仍以刑部侍郎巡抚浙江,并未降黜。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五十七,成均于正统四年(1439年)逝世时,说他“持身清谨,明于大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发现他们行凶抢劫，就逮捕法办。

宣德七年(1432年)松江府华亭县人韩、傅二公差运粮赴徐州，回程途中，九月十三日那天，路过吴江县白蚬江，忽然有一伙人，自称为镇海卫巡捕官军，抢去棉布和食米，韩、傅二公差到就近的同里巡检司去报告，同里巡检司派人来查办时，这一伙行凶抢劫的人还没有散，强盗船看见有人来捕拿，就进行顽抗，结果打死了一人，凫水逃走二人，活捉了十一人，原赃物也搜查到了。况鍾亲自问案，里面有一个林保，是浙江海宁卫的百户。因为既是军籍，又是属于浙江的，况鍾觉得事情不好办，便差巡检张义将犯人、赃物、供词一齐解京，请朝廷法办。

浙江海宁卫乍浦千户所百户叶俊、陶义、士兵陈胜童等经常乘坐大船，在吴江县境内兜销私盐。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三日，经过吴江县平望巡检司时，自称是雷内官大人，不肯接受查询。这船只刚过了关口时，船上就有人涉水逃走。叶俊和陶义这两个百户也逃走了，但是捉住了陈胜童等十二名。况鍾因为浙江不在他管辖范围之内，觉得最好还是押解到浙江巡检司去，请他们审。哪知事情办得不够仔细，被在逃的叶俊等人探听到了，便伏兵于嘉兴县、崇德县交界的松老桥附近，八月初十，苏州府所押解的陈胜童等人犯经过这里，被他们把人犯抢去了，皂隶、弓兵等身受重伤。况鍾十分愤怒，上奏请求朝廷将叶俊等人拘捕解京严办。

浙江镇海卫的指挥陈璘自己就是一个道地的强盗，他经常借打捞木材为名，沿江盘诘客船，乘机抢劫。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三日陈璘乘坐了两只黑楼船，自称是南京捕盗指挥大人，在江阴县地界三山石堰港口拦劫泰州人徐官、昔保到苏州府来收买麻料的船只，抢去银二两、猪七口、鹅十二只、米五斗。初七那天，徐官、昔保他们在苏州府的大街上认出了两个

上船抢劫的人，便扭送到苏州府来了。陈璘的船又在初四那天开到深港焦店地方，自称为锦衣卫捕盗大人，拦劫了扬州卫军给引用船十三只，抢去乾鱼三百五十八包，计三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扬州卫军给引用船上的杨谧心有不甘，便私下查访，知道这些乾鱼都到了苏州阊门外下塘邓英家里，杨谧就到苏州府来告发。

这个陈璘官居镇海卫指挥，品级属于正四品，和况鍾一般高低，但况鍾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顾虑，派人到邓英家里抄出了原赃，并上奏朝廷，请求朝廷法办^①。

况鍾因为自己的职权所限，没有能对那些为害老百姓的官军采取更直接的制裁，但也已尽最大可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和老百姓的安全。

宣德五年(1430年)冬，驻在苏州府范围内的太仓卫，有个千户，名叫卞瑾^②，以捕盗为名，带了二百多兵痞无赖流窜到上海县抢劫财物，而且放火烧村，则是由管辖上海的松江府直接奏明朝廷而查办的。

三、兴修太湖一带水利

江南是水乡，苏州府范围内河港湖泊密布，而太湖之水入海的通道也有一大部分在苏州府地区之内。所以后来著名古文家归有光也写了《三吴

① 道光刻《况太守集》所收况鍾奏疏，后面大部分附有“奏准”、“未准奏”等字样。但卷十《题参殃民指挥奏》、《拿解军官贩卖私盐奏》和卷十一《拏解劫夺军官奏》均无附注。因此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公前后奏拿海宁卫百户林保、镇海卫指挥陈璘、乍浦千户陈胜童等，又榜禁军卫不得径行州县，而武职始知戢敛矣”不完全确切。林保确已拿解，而陈璘、陈胜童是否已逮捕归案，并无确证。

② 《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七十二。

水利录》，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杭州、湖州、宣城、歙县、镇江、常州等各府各县的河流注入太湖的很多，这些地区发大水，就要引起太湖的泛滥。除太湖之外，还有苏州府以东二十里的沙湖，和松江府的河道都相贯通，也很容易引起相互间的影响。苏州府东北二十里的阳城湖上接吴淞江，东通巴城湖，北通施泽湖，周长有七十里，是一个可以调剂太湖储水量的大湖。湖南二十里的傍山湖是太湖的流水经过鲇鱼口及长桥之后重新合流之地，也就在这里形成了吴淞江的上游。常熟东南五里的昆承湖，有白茆浦可通长江。这四个湖再加上常熟县西南四里的尚湖，一共五个湖，对苏州府的水利来说，都是有重要调节作用的。

朱棣在位时，他看到江南是全国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恰恰又发了几次大水，粮食减产很多，他就命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把白茆浦等处加以疏浚，连续进行了三年，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和湖州府水道畅通，不怕旱涝，一再获得粮食的大丰收。但这以后，当地官员和朝廷对水利都不够重视，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时，已是夏原吉治水江南以后三十年之久了，夏原吉本来所疏浚的太湖入海诸水道又因年久失修而淤塞了。每遇大雨，苏州府便由于太湖泛滥而成灾。

况鍾起复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四日到四月二十六日(5月3日—5月25日)连续下了二十几天雨，长洲县淹没了二千二百七十三顷九十亩，吴江县淹没了二千五百六十八顷四十亩，昆山县淹没了二千二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常熟县淹没了四百六十六顷三十六亩。整个苏州府共计淹没了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五十亩。五月十三、十四日(6月10日、11日)又发大风，吴江、长洲两县吹倒了不少房屋、塘岸。况鍾差各县官员督促抢救，且于六月初二(6月29日)上《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除报

告灾情外，并“乞遣大臣董督各官于农隙发民疏浚”，具体的要求是要这位大臣会同府、县官员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查研究，决定疏浚的方案。朝廷同意况鍾的要求，但也没有另外派人，就派原在江南的以工部右侍郎衔任抚民巡抚的周忱负总责，而以况鍾为辅，大举开发苏州府一带的水利。周忱对于这一工作，和况鍾同样认真负责，时常亲自到工地来查看督察。《增修补注历代通鉴辑览》卷一〇三说他“督浚昆山、嘉定诸浦，时以匹马往来江上，见者不知为巡抚也”。

对于农田水利，况鍾作了调查研究，有所整理。他发现苏州府滨湖滨海的田不仅十分低洼，而且圩太大，差不多每一个圩有六七千亩田，少的也有三四千亩田，又因为经常取河泥壅田，河床日深，离圩身就日高，排水救涝还好一些，车水灌田就十分困难了。圩里各分岸埭，车水还要再转车，人力和时间都不经济。况鍾的布置是将圩改小，平均每圩五百亩左右。圩旁开凿一条泾河，使之与外面河道相通，这样无论发生水灾、旱灾，进行抗旱排涝就比较方便了。

《续文献通考》说“宣宗一从唐敏之言，再纳况鍾之策，苏松水利靡弗修举”。清代的文学家石韞玉说他“守我三吴，克成厥勋，筑堤利涉，折狱明冤。惇史标其清节，稗官摭其轶闻”。王嘉禄有诗，说他“堤成追白傅，塘筑拟新丰”。可见况鍾对兴修水利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四、设济农仓，防备饥荒

积谷防饥是当时可能采取的救灾办法之一，宣德七年（1432年），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秋粮都获得了大丰收，巡抚周忱本来就有积储粮食的打

算，正好朝廷有旨，准许以官钞平糴，并向殷实大户劝借粮食，以备饥荒时赈救之用。这样，况鍾便在周忱支持之下，建立了济农仓。这个仓库所存储的粮食不是准备北运或供官府取用的。正如王直在《济农仓记》中所说那样：“名其仓曰济农，盖曰：农者，天下之本，是仓专为赈农设也。”

济农仓的存粮来源主要有原来库储籼米三万石，向富户劝借九万石，漕运浮粮五万石，没收归公而为豪绅所侵占的死绝户田粮十二万石，共计二十九万石，就分储在长洲、昆山、常熟等六县。当时崇明县也属苏州府，因为既有大海之隔，储运都比较困难一些，就存储在长洲县的仓库里，一有灾情，再运往救济。

关于当时济农仓存粮的总数，《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九十四说：“忱奏请军官月俸就苏州给之，而征其加费四十万石，悉储于官，通前所籼六十九万石有奇。”所以《明史·周忱传》作七十万石。《增补补注历代通鉴辑览》作七十五万石，这也许是把宣德八年（1433年）的储存量误作宣德七年的储存量了。

宣德八年，苏州府范围之内发生了旱灾，粮食产量很受影响，计有四十万户的一百三十万人粮食都成问题，都是依靠济农仓的救济而解决的。

但济农仓的存储总量则反而有所增加，主要是况鍾看到济农仓发生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决定把济农仓加以扩充，增加其储存量，同时又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当初明成祖把国都从南京移到北京以后，江南老百姓的税粮虽然并未增加，但是增加了十分繁重的运输任务，因为有的运到南京、有的运到临清等地交付，运费的代价往往超过粮食的价格，长途运输，损耗也大，因此苏州府每年税粮名义上虽然只征二百七十万石，实际征收额则达八百十万石之多。

这八百十万石究竟如何处理呢？除了二百七十万石所谓“正粮”以外，运费和蚀耗当然也要从中扣除，但余下的就被经手的官员、士绅们分掉了。

况鍾在周忱支持之下，废除了这种旧规章，而是规定加七成交纳，从八百十万石一下子减为四百五十九万石。第二年再递减为加六成交纳，又从四百五十九万石减为四百三十二万石，第三年再递减为加五成交纳，再从四百三十二万石减为四百零五万石。这里所附加的七成、六成、五成，充作运费和损耗，实际上还绰绰有余，于是就把这多余的粮食拨给了济农仓。本来运往南京交拨给官军的七十万石，也经过周忱的交涉，由军事部门直接来苏州提取，苏州府只负担每石米附加一半的运费。这样又积余了较多粮仓，也用以充实了济农仓。况鍾再以官钞平籴殷实富户和民间的余粮，结果苏州济农仓存粮达到六百九十万石。

张洪《太守况公前传》：“收粮时得免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为挽运费，一以入济农仓。”有人认为这是以一征二。而宣德五年况鍾已奏明户部税粮每石无过加二加三，多者以贪赃论罪，则宣德八年不应再以一征二。由于当时加征确数、运费与蚀耗确数均缺乏详细记载，当然很难作精确的核算。但是根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九十四：“各县水次置场，别择人总收发运，细民径自输米赴场，粮里长不得预，遂革多取之弊，民所费视旧减三分之一。”则很明显是说不经过粮长、里长之手，就减轻三分之一的负担。而张洪所说的实际上是指附加七成至五成作为运费的粮有多余，运费用半数就够了，还有半数就存储在济农仓了，并不是什么“一征二”。

宣德九年（1434年），苏州府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普遍得到了救济。所以王直在《济农仓记》中说：“往者岁丰，民犹有窘于衣食，迫于债负，不能保其妻子，今遇凶歉，乃得安生业，完骨肉，此天子

之仁，巡抚大臣之惠，我公赞襄之力也。”歌颂了荒年老百姓不受饥馑的奇迹，歌颂了明宣宗朱瞻基、巡抚周忱和知府况鍾。

关于济农仓的管理与仓粮的支拨，况鍾都作了明文规定。凡是运粮遇到风漂、盗劫等意外，都可以向济农仓暂借，但秋后要如数归还。用于修圩、筑岸、开河、浚湖的粮食，向济农仓领用之后可以不必归纳。一般老百姓请求借贷，则根据劳动力和种田的多少而决定借贷的数目，也要在秋收后如数归还。如有故意破坏、纠缠，以后则不准再借。而实际上生活确实十分困难而无力偿还的话，准予不追索。

由于况鍾的大力倡导，不仅苏州府的济农仓办得有声有色，而府属六县，也有办起县级的济农仓的。如常熟县就是。这个县的济农仓也一度储藏了五万石之多。

况鍾任苏州府知府达十二年，苏州府也不断发生过一些灾情，但都没有饿死人，这除了况鍾曾多次请求减免税粮之外，济农仓也起了较多的作用。

五、修建儒学，培养人才

况鍾虽然自己读书不多，对教育却很重视。

府、县的儒学一般都比较湫隘，假使要容纳较多的生员在这里研读也是有困难的。因此儒学往往徒有其名。况鍾在正统初年曾定下计划，决定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儒学，先后三年之间完成了大成殿、至善堂、后堂、明伦堂、斋舍和射圃，共数百间之多。据胡俨《苏州府重修儒学记》^①的记载，

^① 钱谷：《吴郡文粹续集》卷三。

是颇为宏伟壮观的。

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儒学地势很低洼，春夏之交经常积水，使墙壁也浸透而倒塌了。而且地段往往不好，紧靠着军营，整日喧嚣，也无法使生员们静心研读。宣德七年（1432年），况鍾请巡抚周忱一起去查看吴县县衙门西南的一块空地，发现比旧的儒学面积有四倍之大，而且光线好，于是决定就在此地另行兴建。经费方面，为了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况鍾就把苏州府济农仓历年积存的苇席收集起来，共有五十余万条，折合的钱钞可以购米五千石，所有砖瓦等材料及泥木工的费用就都用这笔钱支付。宣德九年（1434年）冬开工，半年时间就竣工了。新建儒学规模相当大，正如杨荣在《吴县儒学重建记》^①中所说：“享礼有殿，讲论有堂，藏书有阁，宴休有亭”，连门庑斋舍在内，一共二百三十多间。这样为吴县生员们的研读经史、讲求学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关于苏州府儒学的教材，况鍾也是很关心的，他曾命人刻了一部《四书详说》，这就是后来有一定影响的明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书的前面有袁铉所写序文，对刻书情况与内容都作了介绍。长洲县儒学教谕韩阳书写了一部汉代马融著的《忠经》，况鍾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同意刻书。有人认为马融的节操上有问题，反对刻印。况鍾不赞成以人废言的做法，觉得《忠经》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应该刻印，就刻印了。

苏州府儒学有经常的讲诵典籍的活动，况鍾只是了解情况，没有以苏州府高级官员的身份去瞎指挥。府考评选考卷，况鍾也没有利用职权去多

^① 钱谷：《吴郡文粹续集》卷四。

管,即使去,也都是听听教谕等人的议论。况鍾对待这些事情,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是刀笔吏^①出身,读书不多,懂得很少,所以总是抱着讨教的态度。

府、县儒学中的生员有的和粮里、老人等相互勾结起来,包揽讼词,或者抗租抗粮,况鍾初到任时,便出《各儒学榜示》^②,要求教谕和士绅们合作,给以支持,制止这一类活动。后来他又在这方面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儒生之中凡是品德和才能有突出表现的,况鍾就大力向朝廷推荐,邹亮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邹亮字克明,号藻庵居士,从小就喜爱读书,凡是天文、医学、卜筮、兵法各书能得到的,就亲手抄录,甚至废寝忘食。有时也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送几篇给周忱看看,周忱也给以好评,而且也同北京、南京的官员们谈起过邹亮这个人。和邹亮有宿怨的人便写匿名信向况鍾诬陷邹亮。而邹亮也写了《庠生邹亮上守求荐达书》,说汉代的贾谊和唐代的马周都是从一个里巷布衣而得到朝廷的重用,希望也能得到况鍾的提拔和推荐。

况鍾认为如果邹亮果然有许多错误,那末写匿名信的人尽可以公开署名的,现在既然不敢署名,那末所指控的就未必有根据,所以他“愤然曰:‘荐贤为国,非私也。’特以名闻”^③,就写了《保荐儒生奏》向朝廷正式推荐了。最初,邹亮做的是吏部司务,又调都察院司务,都是九品的低级官员,后来则做到监察御史的位置。他著有诗文集《鸣珂集》、《漱芳集》等,并编了《诗宗韵海》一书。关于邹亮的事迹,《姑苏志》曾为立传。

① 祝允明:《九朝野记》和杨穆:《西墅杂记》。

② 道光刻《况太守集》卷十二。

③ 《藻庵居士自志铭》。另外有刘昌的《悬笥琐探》,记载不确。

此外受到况鍾的推荐、关怀的儒生还有下列诸人：

陶继、蒲嗣宗等四人，也和上述的邹亮一样，受到况鍾的推荐。

刘敷流寓在苏州，要回原籍，而经济困难，况鍾出钱让他回到了原籍。

俞嗣请求旌表他母亲的守节，况鍾调查属实，给予旌表。

苏州府衙门贴邻，住着一个穷书生，已经四十多岁，双亲年迈，自己又没有力量娶亲。况鍾把自己的月俸拿出一部分，让他作为结婚的费用。

像这一类事情，是很多的。

六、纠劾不法的监察御史

朝廷设立都察院这样一个部门，分别派遣巡按御史到各地区进行调查工作，看各级官员是否恪尽职守，民间有无冤狱灾情等等，对于维护封建社会法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日长月久之后，也难免发生某些流弊。虽然朝廷制定了《宪纲》，对于巡按御史的职责和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巡按御史与布政司、提刑司、知府、知县等官员之间相见的礼节和工作关系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宪纲》居然成了一纸具文，基本上极少人遵守这些规定了。

首先是由于一大部分地方行政官员确实自己手脚不干净，心里怀着鬼胎，所以见了巡按御史不敢按规定相接待，而是在态度上卑躬屈膝，千方百计博取巡按御史欢心。这样就养成了有些巡按御史一种过分自尊自大的坏作风，听不到地方官阿谀奉承的话便不开心。而作风清廉正直的官员，因为自己并无劣迹怕巡按御史告发，也不想拉拢关系，所以接待得并不特殊隆重，巡按御史却反而感到受了怠慢，因此对这些清廉正直的官吏进行

打击报复的也有。

对此，况鍾于宣德七年（1432年）上《请申明御史知府相见礼奏》^①，指出“近年以来，各处巡按刷卷公差御史多有违越礼分，其各处知府有等鬬茸贪赃，畏惧纠劾，不顾名分，献谏进谄，有出郭迎接，下马路跪，候其过者；有照知州知县丁立揖拜者；有跪听发放回答者；有被秽骂凌辱者；各失体统，无敢言论。”对于贪官们向巡按御史卑躬屈膝的丑态作了揭露。同时也说起在这种情况下，巡按御史们无法无天，对于有骨气的清廉正直的官吏反而进行打击：“间有执法奉公、不肯阿谀，却乃吹毛求疵，故将首领官吏借端凌辱，擅作威福，以为得体。”况鍾认为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只是分工不同，并无尊卑高下之分，主张御史与知府见面的礼节应该按明初制订的《宪纲》上的规定办理，彼此平等相待。这个问题当然提得很正确，也很及时。因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一制度发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一个官员施政的好坏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主要看巡按御史如何上报朝廷了。

朝廷对况鍾的奏疏十分重视，指定礼部和翰林院等部门共同研究，再拟文发到各部门遵照执行。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在况鍾本身，这个问题还不大，巡按御史张文昌等人和他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再说有巡按侍郎周忱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来苏州坐镇，任何巡按御史要对况鍾造谣中伤也办不到。所以况鍾也没有再向朝廷提什么要求。

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王珪从任上回京时，经过苏州府所辖的州县，居然“越驿乘舟，所至多索隶卒”^②，仍旧作威作

① 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九。

②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二十三。

福,完全违反了《宪纲》的规定,况鍾就上奏疏纠劾。与此同时,浙江按察司金事商贤也上疏纠劾王珪“言轻行薄,骋小才而害良善”^①,并且把王珪为非作歹的事一一列举。朝廷认为负责维护法纪的监察御史王珪自己倚仗权势而肆无忌惮地破坏法纪不能不予以重视,就命令刑部将王珪逮捕法办。

王珪的逮捕法办,伸张了正气。一些清廉正直没有向王珪阿谀行贿而受到迫害的官吏也先后得到了处理和平反昭雪。

正统二年四月,本来被王珪以“庸懦无为”^②的罪状纠劾撤职的处州府知府武全提出了申诉,指出王珪完全是进行报复。朝廷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在巡抚侍郎王淪主持之下,由王珪与武全进行了对质。

正统三年十月,余姚县的老百姓数百人到浙江布政司、按察司控诉王珪的罪行,要求让被王珪以“事体生疏”^③为由罢斥的知县黄维^④复职。这件事也牵涉到浙江布政司参政俞士悦,他和王珪是一起行动的。吏部查核了黄维的政绩,确实如老百姓所说“政治公平,抚字不怠”,于是将黄维官复原职。

七、提拔和培养属官

在况鍾再任苏州知府这一时期之内,苏州府的官员被提拔重用的也不

①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二十三。

②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二十九。

③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七。

④ 清光绪刻周炳麟修《余姚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志》有黄维传。

少,主要有下列三起:

宣德十年(1435年)十二月,长洲县知县韩瑄被任为湖广武昌府知府^①,从正七品提升为正四品。

正统元年(1436年)吴县主簿吴复九年任满,按政绩的考核,将调升他职,但有一千八百余人出来,要求吴复仍在原地任职,结果升任为吴县知县^②。虽然是周忱出面处理的,况鍾的推荐也是必不可少的。

正统二年九月苏州府通判邵堪九年任满,也将他调,老百姓都向巡按御史曹习占提出请求,希望邵堪仍在苏州府任职,朝廷交巡抚侍郎查核邵堪政绩后,任命为苏州府同知^③。

从这三起提拔属官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况鍾坚决执行了朝廷提倡久任的政策,那些官员对公务既认真负责,又因为对情况都熟悉,所以就很容易做出成绩来。

同时也可以知道,他们在况鍾手下做事,无论在办事能力上或掌握治理百姓的道理上都是成长较快的,所以能得到提拔的机会,去负担更繁重的职务。

八、任满离苏

正统四年(1439年)冬,况鍾任苏州府知府九年,已到了考绩的时候,要到京中听候吏部的调迁。因为他在苏州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当地的山川风

①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十二。

②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十三。

③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三十四。

物和老百姓都有些感情，所以一旦离去，也很有些依依不舍。另一方面，他也因为深受苏州老百姓爱戴而颇为欣慰。他和七县百姓告别时，就写了诗四首：

十年鞅掌抚名邦，如水襟怀对大江；

无德及民殊自愧，君恩有负每神忼。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密如泉。

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穡艰。

况鍾两任苏州府知府，苏州府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秩序较为安定，缴纳税粮减免了一部分以后，已清偿积欠。看来以后也会继续安定一个时期的，因此受到老百姓的拥戴，朝廷也给予较高的评价。而这四首诗当然说明他当时的愉快心情；至于“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从他自己的口中说出，可见，他也完全以清官自居了。

长洲等县老百姓为况鍾造了一个生祠，并请况鍾留一帧肖像，以便悬挂在生祠里，况鍾也照办了。同时又题了几句话：

无能抚育，空费俸钱，敢劳父老，称曰青天。焦劳者百千种，荏苒

兮八九年。何当留此碌碌形貌，有玷彼胥山之高耸，吴水之清涟。

这几句话和前面的诗一样，好像比较谦虚，实际上也自认为是廉洁的清官。

况鍾当时留下来的肖像经摹刻以后，流传甚广，甚至有远方的人出重价前来搜购。

九、去而复来，三任苏州府知府

况鍾九年任满去京以后，地方上某些知名人物和老百姓都表示惋惜，因为如果换了一个对情况很不熟悉的新的知府来，很多做法难免要改变，如果来的是贪鄙的操守成问题的，那末就更加不堪设想了，于是就有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提出请求，希望张文昌奏明朝廷，由况鍾连任。

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朝廷已经发表了杨衡为苏州府知府。当张文昌转达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请求让况鍾连任的奏章到达时，江南巡抚周忱也来了一道奏章，因为当年和况鍾同时发表的松江府知府赵豫、常州府知府莫愚、吉安府知府陈本深等三人也已九年任满了，而这三个府的老百姓也要求他们连任。明英宗朱祁镇同时批准了张文昌和周忱的奏章，况鍾和其他三个知府都继续担任原职。

关于况鍾留任后的品级和职衔，在吏部有过一些争议。因为况鍾既然九年任满，而且政绩很显著，按理可以提升，但明代知府的品级那时却没有什伸缩性。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曾把府分成三等，税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为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为正四品。税粮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为从四品。后来就全部改为正四品了。所以争议的结果是改为正三品，但并未给以新的职称。至于知府九年考满，可以给三品俸，并改职衔为观察使一节，《明史·职官志》未有记载。

当时直隶保定知府朱德是九年任满连任的，但给了观察使的职衔。此外如果尚未离任而由老百姓请准朝廷而连任的往往加俸不提升职别，已经离任又发表继任的任命的，则俸禄与职衔都加以提升。

根据以上的情况，况鍾向朝廷进行了论争，而且认为三品俸的知府是名不正言不顺，做起事来有困难，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后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发表为观察使，给三品俸，实际上则仍做苏州府的知府。不过，据另一些资料，朝廷是不是给了况鍾观察使的职衔，还是不能完全肯定下来，因为《明史·况鍾传》也只谈了加为三品俸。至于周忱请求朝廷准予连任吉安府知府的陈本深，《明史·陈本深传》说“正统六年，满九载当迁，郡人乞留，诏予正三品俸”。同时请求朝廷准予连任的常州府知府莫愚，《明史·莫愚传》说：“正统六年秩满，郡民乞留，巡抚周忱以闻，诏进二阶复任。”都没有提到给予观察使的职衔的问题。但是根据《况太守集》所收记载是给予况鍾观察使的职衔的。朝廷是否可能对况鍾、陈本深、莫愚三人九年考满连任的待遇、奖掖等方面有不同的处理呢？看来不一定。

明英宗朱祁镇因为况鍾是三朝老臣，名声又很好，特地送了路费钞二千贯。首辅杨士奇赠之以诗，说：“十载不愧赵清献，七邑重迎张益州。”把况鍾比拟为宋代名臣张方平和赵汴^①，这两个人地位都比况鍾高，而且宋代

① 张方平《宋史》卷三百十八有传。关于他在益州的事迹。说他在赴任途中，正风传有边民起衅，朝野都很紧张，但他认为是谣言，所以“道遇戍卒，皆遣归，他役尽罢”。到任后，“适上元张灯，城门三夕不闭”，并抓住了谣言制造者，办了罪，“蜀人遂安”。后来又“奏免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千余万缗”。赵汴《宋史》卷三百十六有传。说他任殿中侍御史时，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称他为铁面御史。又说“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汴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宋神宗经常要地方官学赵汴的榜样。

以来一直负有盛誉，这又出之于杨士奇之口，对况鍾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荣誉。

况鍾为了酬答京中官员的赞扬，也写诗一首：

万里苍生荷相君，微材深沐拂披勤；

奖余当作箴规看，要把忧劳益几分。

况鍾三任苏州府知府以后，一切都照过去规章办事。其他比较突出的事件是和吴讷的交往。

常熟人吴讷历任御史、佥都御史等官职。出巡贵州时，有人送黄金给他，他不接受。光禄寺丞董正等偷窃官家财物，被吴讷检举，此案充军者四十四人。此人不仅铁面无私，生活清苦简朴，而且对审理案件、分析案情有深入的研究，著有《棠阴比事》，是中国古代有关司法的一部名著。他于正统四年（1439年）就致仕家居了。虽然常熟县属于苏州府，但是两地相距在百里以上，况鍾却经常去拜访他，所谈何事，缺乏具体记载，可能况鍾遇到疑难案件去向他讨教的。

正统七年（1442年），况鍾卒于任上，一共做了十三年苏州府知府。

第五章

周忱与况鍾

一、理财名臣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并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选拔其中二十八名进文渊阁，周忱也在内。永乐十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升刑部员外郎。永乐二十二年任越府右长史。宣德五年（1430年）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宣德六年，朝廷命令“巡抚直隶侍郎周忱兼督苏、松、常、镇并浙江嘉、湖各府军卫，巡捕贼盗”。九年考绩一次，改为工部左侍郎衔。正统六年（1441年），他的职权范围本来就把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地区大都包括在内了，这时又扩充了军权。正统十四年升户部尚书，又改为工部尚书，具体职务仍为巡抚江南。景泰元年（1450年）才致仕，第二年逝世。

周忱巡抚江南的经过比较复杂。本来巡抚江南的是大理卿胡概^①，这个人的做法基本是酷吏的一套，滥用严刑，造成了一些冤案。工部侍郎罗汝敬路过苏州，看到了这些情况，对胡概有所劝告，胡概不理睬，罗汝敬就

① 《明史》卷九《宣宗本纪》：“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黄大华《明七卿考略》：“熊概，江西丰城。”按胡概、熊概同为一人。其复姓经过，见《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又同治刻许应荣修《南昌府志》卷三十九《名臣志》：“熊概字元节，丰城人，直子。永乐进士，乡会试榜皆胡姓，官大理卿时始奏复姓。”又云“其幼孤随母改适，冒胡氏者，乃概父直。”《明史》误以为熊概本人随母改嫁，有误。

奏本给朱瞻基，朱瞻基召回胡概，派周忱前往替代。此事弘治年间的进士苏州人都穆在他的著作^①中作了如此的记载。

了解民间疾苦，是周忱的一贯作风，和老农们也有接触。苏州府何以欠税粮如此之多？这问题又该如何解决？他都从和老农的谈话中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当时征粮都要加很多成，是作为运费和损耗的，但是这里面流弊不小，官田民田耗不一样，老百姓的田和官绅们的田又不一样，周忱加以整顿，使之划一。苏州府建立济农仓，也是周忱的大力支持。《明史·周忱传》说：“周忱抚南畿，别立济农仓，他人不能也”。又据《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每岁征收毕，踰正月中旬，辄下檄放粮，曰：‘此百姓纳与朝廷剩数，今还百姓用之，努力种田，秋间又纳朝廷税也’。于是两税无逋，公私饶足。”就是说即使不是荒年，他也经常把粮食调剂给缺粮户。

关于减免税粮，不仅限于苏州府，常州府同知赵泰提出理由，要求减免一部分税粮，周忱也予以支持。这一类事情，曾引起朝中某些大官员的攻击，说他破坏了祖宗遗留下来的制度。正统六年（1441年），他又到海盐，负责监督修筑海塘的工作，后来一直继续修了五年，使海塘工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忱还颇有随机应变之才，有一年赴京述职，半途遇见了钦差，说是宫殿在重新粉刷重新彩绘，急需牛皮胶万余斤，要周忱折回江南采办牛皮。周忱说他已知道，没有回江南。到了京中，他把仓库中贮藏已久即将朽腐的牛皮煎了胶，以供急用。回江南后，又用积余粮买了牛皮补足了贮藏。

周忱在处理案件时，和况鍾同样审慎。对于人命案件尤其审慎，尽可

^① 《都公谈纂》一书对胡概评价最苛。《明史》评价稍高。同治刻许应荣修《南昌府志》卷三十九《名臣志》谓：“按常、镇、苏、松、浙东诸郡，扶植单弱，威名赫赫。”看来胡概对乡官和大地主是有所抑制的。都穆是苏州人，所以对胡概反感较多。

能从宽处理。有一次研究一件公案，府县已判主犯死刑，但周忱觉得情有可原，不至于死，一时又苦于找不到法律依据，他就让书吏从档案中找相类似的旧案卷来作参考，从中得到了启发，主犯终于免于死。^①

又有运粮的差役向周忱谎报某月某日船只在江上遇大风，因而损失过半。哪知周忱每天都记录晴雨和风向，当时就向差役指出那一天江上并未起大风。差役们为之惊服。

周忱巡抚江南二十二年，政绩是很显著的。离任以后，朝廷派李敏继任，虽然叮嘱他不要輕易更改周忱行之有效的成法，但实际上却没有能这样做。户部把周忱任上积余的米当作税粮要去，仓库里面就空了。

嘉靖年间，吕光洵上奏疏说：“先时大臣奉命经理吴中者，凡数十人，惟正统间巡抚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吴民至今思之。”^②后来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尚书周文襄公传》也说他为每出会计，视地丰凶、事缓急，为弛张调剂变通。民无逋负，官有余积，前后理财者皆不能及”。看来有明一代，周忱确是治理财政、经济的最知名的人物。

周忱胸襟很开阔，不大计较毁誉。他刚上任这一年，苏州府秋粮收成欠佳，许多人背地里替他起了个绰号，叫周白地。他知道了，不去追究，而是笑着说：“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铺地。”^③由于他的妥为规划，第二年果然得到了丰收。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尚书周文襄公传》说：“先是胡概巡抚江南，用法严刻，公济之以宽。”据说周忱自己也对这些问题作过说明，有人指责他不

①③ 杨循吉：《苏谈》。

② 多种苏州地方志都摘引了这篇奏疏。

如熊概，他也没有说熊概不对，而是说：“熊卿敕有祛除民害语，我敕但云抚安军民，朝廷委任自异耳。”看来周忱赴任前，朱瞻基确曾有所嘱咐的。

据一般的记载，周忱巡抚江南是首辅杨荣的推荐。事实上罗汝敬推荐的可能更多些，因罗汝敬和周忱都是江西吉水人，当然熊概也是江西人。但罗、周二入很相知。罗汝敬向朱瞻基奏明熊概的严苛失职时，谈到继任人选，是十分近情合理的。另外一方面，朱瞻基却并没有处分熊概，而是告诉熊概，有人说了他不少坏话，但是你还是放手去做，不必顾虑。后来熊概虽调动了职务，却是提升的，曾代理南京刑部的工作。

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以后，不过几个月，周忱便来巡抚江南了。他的工作重点是总督税粮，清理苏州府历年累积欠粮八百万石，是其中一项。他对于苏州府知府况鍾、松江府知府赵豫、常州府知府莫愚、常州府同知赵泰很重用，当作自己的左右手，许多事情都和他们反复商量。也很放手，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能力和才智。

二、周忱操守上的缺陷

况鍾基本上是一个清正严明的官员，周忱也是如此。但是周忱在节操上的缺点就比况鍾更多了。

周忱从来就以圆滑作为处世准则，从来不得罪人。可能他任越府长史时和宦官们接触较多，以后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达到互相关照的目的。他和最当权的太监的总头目王振的关系尤为亲密，当王振在京中新盖了一座府第时，周忱暗地里叫人把其中斋阁这一间尺寸量好带到江南，然后叫松江的工匠织造了一条地毯送去，王振收到就铺在斋阁中，大小完

全合适，刚刚正好。王振自然很高兴，因此周忱上奏疏有什么请求，王振都在暗中配合，让周忱的要求能够顺利达到^①。

有一次官仓里积存的粮食时间太长久了，需要卖出去，另外把新粮换进来。而卖出去的价钱是比较便宜的。周忱计算了一下，这一批粮食买来而转到市面上，可以净赚到千两银子。当时一个很权威的医生盛启东（盛寅）因为丁忧住在苏州。周忱为了讨好盛启东，劝盛启东把这一批粮食买下来。盛启东没有接受周忱的劝告，他写了一封信给周忱，信中说：“老当戒得，贫当安分，噉就之食，不敢受也。”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又附了一首诗，诗中有“鱼龙江海志，鼠雀稻粱谋”等语，对周忱加以讥讽，弄得周忱狼狈异常^②。

周忱对于京中来的大小宦官，来往经过江南的文武官员，招待得十分周到优待，可以说是求必应。事实上他个人的官俸所入是无论如何不够这样庞大的开支的。钱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再说周忱对下属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大都问不闻，装聋作哑，因此也一再引起人们议论。所以清代乾隆《苏州府志》卷四十二《名宦志》说他“以故屡召人言”。

周忱对于佛教兴趣浓厚，苏州的名山古刹既多，周忱便到处参拜菩萨，和尚们要什么施舍，他也有求必应。老百姓对他的参拜菩萨是很有意见的，觉得巡抚大人的行为未免可笑。他本人知道老百姓不以为然，但无动于衷，反而开玩笑地说：“就从年龄来说，这些菩萨也比我大两三千岁，难道我不应该拜上两拜！”^③

又有孙潼其人，书写了一本《千字文》，实在很不高明。但他硬要周忱

① 陆深：《愿丰堂漫录》。

② 王鏊：《震泽纪闻》。

③ 杨循吉：《苏谈》。

向朝廷推荐，周忱居然也照办不误。结果皇帝降旨下来：“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①由此可见周忱对别人的干请总是迁就的多。

据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下说：“巡抚周忱尝随例为子纳马得官，又出粟旌其门，缙绅颇訾之。”^②这事况廷秀的记载过于简略，详细情况无从得知，我们也没有看到比较原始的资料。但是况廷秀不可能捏造其事，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况廷秀又说“公冰兢不敢踵所为”，则也许有抬高况鍾贬低周忱之处。

三、周忱与况鍾的合作

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时，周忱以诗赠别。两个月之后，周忱来到江南的应天十府，以工部右侍郎衔出任巡抚。

周忱的来到，对于况鍾自然是莫大的喜讯。因此，他在激动之余，也写了祝贺的诗：

忆昔长安忝列班，清言如屑订余顽。

鸾声初振金陵地，早已神驰铃阁间。

吴江凋瘵最堪怜，敢不披诚籲九天。

愿借春膏频广注，万家歌续召郇篇。

这两首诗回忆了在京中相聚的日子，对周忱平时的帮助、劝告充满感激之情。对于周忱此番出任巡抚，对江南老百姓会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对自

① 都穆：《都公谈纂》。

② 道光刻《况太守集》。

己也会有所支持，颇有信心。所谓“吴江凋敝最堪怜”，既是指积欠税粮八百万石，也是指前任巡抚熊概所造成的一些冤狱的局面。“愿借春膏频广注”，则是由于既有罗汝敬对熊概的所作所为向朝廷报告过，而且更早时候，即朱瞻基刚即帝位时，“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州、松江等府，还言诸府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所以况鍾上任前、周忱赴仕前，都受过朱瞻基的敕书，这两份敕书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密切的，周忱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况鍾每遇重大政治事件便往南京去请示周忱，即使到达时已经黄昏，或已经夜深了，周忱也总是立即接见，两个人往往漏夜畅谈，以求得意见的一致。

周忱的职权本来不包括军事的调度和指挥，后来因为太湖一带颇不平靖，况鍾援引大理寺卿熊概巡抚江南兼管军事的前例，上奏请求给予周忱提督江南各卫所的权力。又鉴于当时某些诉讼案件往往不通过苏州府或江南巡抚衙门，直接到北京去告状，甚至有时并不是真有什么案件，只是以此为诬害手段，广事株连，弄得百余人往返北京，疲于奔命，把一些人家拖穷困了，况鍾也上奏请求“今后应有诉讼干碍人众及事关税粮者，俱连人词递回侍郎周忱处体勘”。这就禁止了越过苏州府和江南巡抚衙门的诉讼，既确保了苏州府的职权，也扩大了周忱的职权。这两次奏疏中所提的请求，朝廷都是照准的。

周忱对于况鍾，一直都是赞扬的。在况鍾第一次丁忧起复时、在况鍾九年任满连任时，周忱都说了况鍾不少好话。宣德十年（1435年），长洲县秦孔彦等八万人赞扬况鍾的呈文是周忱和巡按直隶御史赵奎咨转达朝廷的。周忱曾为况鍾写过一篇《重修泰伯庙记》，说况鍾到任不久，就去祭奠泰伯，使狱中犯人也很受感动。

据胡俨《苏州府重修儒学记》：“今年秋九月，教授丰城何澄校艺还自

闽，述其郡守况侯伯律兴作之勤”。“今况侯协谋侍郎周公，重为兴建，亦闻文正之风而兴起者欤！？”可见重建苏州府儒学是周忱、况鍾协力进行的。

据钱止庵《吴门补乘》卷一《田赋》：“苏守况侯抗上，请得遵优旨，又赖巡抚尚书周公设水次仓，以便输纳。立对支、易银诸法，以省远役，故民颇苏息而催征易竣。”这说明把大部分运临清、南京等地税粮改在苏州当地交拨，也是周忱、况鍾两人共同规划的。

《明纪·宣宗纪》说：“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协力成之。”这也是事实。

周忱虽较况鍾迟来江南两个月，但直到况鍾连任了十三年苏州府知府而死在任上时，周忱仍任江南巡抚，他们密切合作了十三年之久。

我曾看到原由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岩口大队况为玉（况鍾后裔）家藏的《况鍾复任唱和诗卷》，内有周忱七律与后序如下：

受命同承宠渥优，江湖岁月叹悠悠！

旬宣愧我行千里，抚字劳君镇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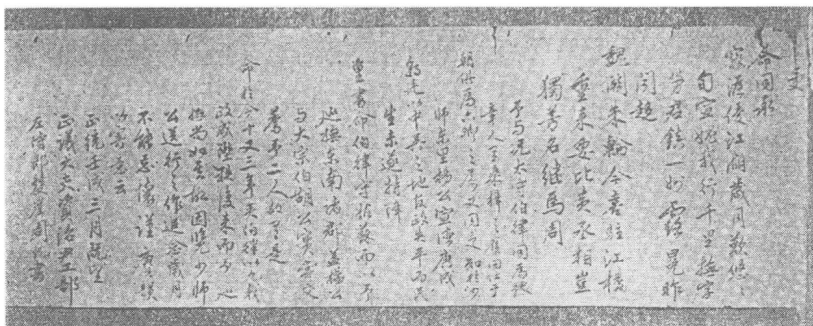
露冕昨闻趋魏阙，朱轮今喜驻江楼！

重来要比黄丞相，岂独芳名继马周。

予与况太守伯律同为豫章人，有桑梓之旧。同仕于朝，俱为六卿之属，又同受知少师东里杨公。宣德庚戌朝廷以中吴之地官政失平而民生未遂，特降玺书，命伯律守姑苏，而以予巡抚东南诸郡。盖杨公与大宗伯胡公实尝交荐予二人，故有是命，于今十有三年矣！伯律以九载政成陞秩复来，而予之巡抚尚如其故。因览少师公送行工作，追念岁月，不能忘怀。谨赓韵以寄意云。

正统壬戌三月既望

正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左侍郎双崖周忱书



周忱赠诗手迹(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从这里可以看到周忱、况鍾二人之交谊实在非同一般。说到周忱、况鍾二人曾被杨士奇同时推荐一点，也和《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所说：“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鍾之属，皆用士奇荐”相一致的。

清代张问陶替况鍾写了四句像赞：“其君用之，其上容之，公能树绩，亦幸逢时。”其实皇帝和首辅都远在北京，而周忱便是他们的代表，因此“君”和“上”实际上是一回事。

另有些人说：“定济农仓，史皆载周文襄忱项下，盖以尊统卑。据忱奏札云‘臣与况某等议’，史亦云‘据况某议……从况某请……’可见同舟共济，公之功不在文襄下也。”要把周忱和况鍾某些政绩完全分开而列于某一人名下，那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现在可以这样说，许多工作是他们同心协力进行的。不过除了苏州府以外，周忱在其他各府也有不少政绩，不过不像苏州府的政绩那样广为人知吧！再说况鍾逝世以后，周忱还再做了九年巡抚，这九年之间，政绩也是不少的。

第六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说明

一、况鍾家庭成员的生卒

况鍾曾从其父姓而姓黄，于宣德四年（1429 年）始奏明朝廷，复姓况。这在前面已有所叙述。

他的三次丁忧以及被控托同乡湛孟礼出面代买入官私盐船等事，都和他的家庭有密切关系，在这里再说一说清楚。

况仲谦（黄仲谦）原娶廖氏，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卒，当时况鍾才八岁，当然没有丁忧和夺情的问题。洪武二十六年况仲谦续娶罗氏。永乐十五年（1417 年），况鍾继母罗氏卒，况鍾离礼部仪制司主事任，丁忧回原籍靖安，朝廷予以夺情起复。不久，况仲谦卒，况鍾又丁忧回原籍。永乐十六年，朝廷予以夺情起复。

宣德五年（1430 年）十二月，况鍾庶母卒，况鍾声称宣德六年三月才得到讣告，很快便回原籍丁忧的。当时在江南的治农巡抚成均便曾控告他，说他是故意隐瞒了讣告，为了要拖延回靖安丁忧的时间。况鍾曾上《遵旨辨明诬陷奏》：“臣六年三月初八日闻继母丧^①，本月十二日就回原籍守制，别无匿丧不举情由。”但为何隔了两个多月才闻丧，则始终没有能讲清楚。

^① 况鍾在奏疏中所称“继母”实际是庶母，详见第 332 页注①。

经众官员和老百姓的请求,朝廷不久即予以夺情起复。

况鍾本人的夫人也是一再病故,一再续娶的。建文二年(1400年),娶妻熊氏。永乐元年(1403年),长子宁生。永乐四年,次子襄生。永乐六年,熊氏卒。永乐八年,续娶王氏。永乐九年,第三子宾生。永乐十八年,第四子宇生。宣德元年(1426年),王氏卒。宣德三年,娶舒氏。

况鍾于宣德六年因庶母之丧丁忧回籍,而又夺情起复,巡抚成均指使朱阿佛控告况鍾托同乡人湛孟礼出面买入官私盐船,也在此年。况鍾用来答辩的《遵旨辨明诬陷奏》,承认托人代买官船,并由皂隶朱阿佛撑船载其亡妻棺木回乡事。此一奏疏也写于此年。据此,则况鍾买船之时,舒氏尚未亡故。否则朱阿佛控告况鍾应在宣德七年况鍾已回任之后,但况鍾既已回任,朱阿佛是否敢再控告知府,亦是疑问。至于是否为宣德元年亡故之王氏的棺木,也不明确。

宣德七年,舒氏卒。宣德九年,娶李氏。正统三年(1438年),李氏卒。正统四年,娶万氏。正统七年,况鍾自己就逝世了。况鍾先后娶妻熊氏、王氏、舒氏、李氏、万氏五次。生子况宁、况襄、况宾、况宇四人。

二、和宦官们的关系

因为况鍾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这三个皇帝都有较频繁的直接的接触,虽然职位不高也有着特殊的关系。如前所述,朱棣在位时对在礼部仪制司任职的况鍾先后嘉奖三十一一次之多。在位仅一年的朱高炽也很重视况鍾,派况鍾伴随皇太子、亲王两次南下谒孝陵,也就是祭奠朱元璋的墓。而朱瞻基从南京回北京继承皇位又是况鍾伴随同行

的。这一些活动，宦官在里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例如有的记载谈到朱瞻基从南京回北京的随从人员没有提况鍾，只提了宦官海寿。不言而喻，况鍾和宦官海寿等人是有过较多的共事经历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在苏州府的宦官要对况鍾过不去的可能是不多的，他们知道况鍾虽是个四品官，实际上在皇帝面前的发言权则并不小，他们不会去找麻烦。再说，况鍾对宦官进行什么斗争，也是不能全部信以为真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况鍾的上级巡抚周忱，他对宦官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从不得罪^①。而况鍾和周忱又是密切合作的，因此，况鍾也不可能和宦官们有尖锐的斗争。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况鍾传》说：“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运遭笞缚。”又说：“鍾在，敛迹不敢肆。”这还比较有分寸。它的原始素材是何书呢？我的推测是杨循吉《吴中故语》的《况侯抑中官》一条吧！况鍾尚未到任时，所记载苏州的情况如下：

宣宗时承平岁久，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曰来内官、罗太监尤久，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厌。郡佐、县正，少忤则加捶撻，虽太守，亦时呵责不贷也。其他经过内官尤横，至缚同知卧于驿边水次。鞭笞他官，动至五六十，以为常矣！

况鍾刚到任时情况，记载如下：

下车之日，首谒一势阉于驿，拜下不答，敛揖起云：“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既乃就坐。与之抗论毕，出麾，僚属先上马入城，而已御

^① 王鏊：《震泽纪闻》及清乾隆修《苏州府志》卷四十二《名宦志·周忱传》。

轿押其后。由是内官至苏，皆不得撻郡县之吏矣！

况鍾就任以后情况，记载如下：

来内官杖吴县主簿吴清，况闻之，径往执其两手。怒数曰：“汝何得打吾主簿，县中不要办事，吴干汝一头事乎！？”来惧谢，为设食而止。

于是终况公之时，十余年间，未尝罹内官之患也。

杨循吉离况鍾的时代较近，记载当然是有所据的，但有些矛盾之处，因为当时苏州的“势阉”就是来内官和罗太监，既然况鍾到任第一天，就抑制了宦官的气焰，从此来苏州的宦官不敢再打苏州府暨所属各县的官员了，那末后来这个来内官又怎会再杖吴县主簿吴清呢？

我觉得况鍾出任苏州府知府以后，无论是常驻的或过往的宦官比起过去收敛一些，那是事实。但是《吴中故语》则又作了某些夸张。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况鍾到苏州未满一年，长洲县典史薛孟真被况鍾指控贪污后，就在京中控告况鍾私自接受来福（来内官）的黑漆大轿，用夫杠抬，而不骑官马。后来况鍾承认确有其事，说是官马太瘦，不堪坐骑，才向来内官借的轿子。这理由说不通，当时江北还向苏州府借大量马匹，其中包括上等马在内，岂有堂堂苏州府知府的骑马会发生困难的道理。这正好说明，况鍾和来内官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关系了。

其他的宦官来采办什么物件，况鍾也是很殷勤地完全照办的。例如宣德九年（1434年）七月十七日宦官安儿、吉祥^①来苏州采办促织一千个，况鍾不仅如圣旨所要求“用心协同他干办”^②，而七月二十六日就办妥，并加派

① 正统年间有出名的宦官曹吉祥，这里的吉祥是否姓曹不得而知。

②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卷九《遵旨采解物件奏》。

长洲县县丞樊敏陪同安儿、吉祥送进京去。这一方面是对朱瞻基的恭顺，同时也充分反映他对宦官们的恭顺和宦官们关系的密切。

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是科派长洲、吴县两县出钱买办猪羊糖果，在承天寺摆宴，招待路过苏州下西洋的钦差太监洪保。此事被薛孟真控告后，他的答辩是照旧例行事的。那末，他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减少对宦官的优厚的招待，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三、十五贯事件的可能性

历史上的况鍾名声似不如戏曲中的况鍾那样响亮，这主要是因为朱素臣所作传奇《十五贯》的广泛流行。究竟况鍾是否断过十五贯一案呢？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的《凡例》说：

公所断疑狱甚多，故当时有包龙图之号，然谳判语家集独遗者，由公任苏不延幕客，凡奏谕悉所亲裁，词尚简朴，不事文藻，故断狱虽多，或者有断而无谳，故不传于世也。如熊友兰兄弟之事，非藉传奇曷由考见其大略哉。

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说：

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惜一切谳断不能尽传于世。

作为况鍾的后裔，况廷秀也没有能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断十五贯疑案确有其事。传奇《十五贯》的问世，并不能反证此案确有。但“一切谳断不能

尽传于世”倒是事实。因为现存乾隆刻或道光刻况鍾文集，所有奏疏基本上都是关于税粮、水利、清军、营建等等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没有一件类乎海瑞《海忠介公文集》中的《胡胜荣人命参语》、《徐继人命参语》那样人命案件的详尽记载。是否况鍾就没有审理过一件复杂疑难的案件，使之水落石出呢？当然不是。在况鍾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审了罪犯一千五百十八名之多^①，因此，也就很难绝对地排除况鍾审理过类乎《十五贯》案件的可能性。

又《拍案惊异》中《前明苏州案卷》条说：“《十五贯》传奇，演说前明况太守平反冤狱事，当时确有其事，非尽子虚也。”又说：“案卷久存府署，鍾书材年丈知苏州府时，吊取贮库，后毁于庚申之变。”

《十五贯》一剧于1956年风行之际，范烟桥同志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曾经给我一信，就十五贯事件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他说起清代末年曾有老者在苏州市上以《十五贯》案卷牟利，要付给制钱若干，方可一阅。这一些，他在《况公祠与“十五贯”档案》一文也都谈了。

当然，这些记载离况鍾已有数百年之久，甚至离《十五贯》传奇的问世也有较长时间了，更何况并无具体记载，无内容摘录，不能作为确证，但仍不失为疑点或线索。

我们考证《十五贯》有无其事，只是从其中某些主要故事情节而言，如果从全部剧情看，和当时的行政制度、人事关系等等都是不符合的。例如：周忱对老百姓是比较关怀的，对于判处死刑的人犯从来没有草率从事，而是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尽可能找到根据，改判轻一点。

^① 清道光刻《况太守集》中《遵旨辨明诬陷疏》。

周忱和况鍾是江西同乡，在北京时就过从甚密，十分接近。到了江南，周忱任应天十府巡抚，况鍾是苏州府知府，况鍾到任之后不过两个月，周忱就来了，直到况鍾去世以后，周忱还留任十年左右。他们亲密地合作了十三年，从未发生任何矛盾或隔阂。

周忱的巡抚衙门不在苏州，而在南京。况鍾有急事从苏州到南京请示，周忱总是立刻接见，从未挡驾。

再说无锡县，从宣德五年（1430年）到正统七年（1442年），知县之中，并无过于执其人。而“过于执”三个字也很明显地是有所寓意的，是指一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代表人物。

而且无锡县不属苏州府，而属于常州府，常州府知府莫愚正是和况鍾同时奉派的九个知府之一，也是非常精明、清廉而善于判决疑案的人物，在他的具体领导之下，不可能容纳过于执这样偏激、愚蠢的知县。

无锡县判处死刑经过常州府复审的人犯，不可能在苏州府处决，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鍾监斩。现在不经过常州府，也是不合程序的。这死刑应该是在无锡县，或常州府，或巡抚衙门所在地南京（当时也称应天府）执行才比较合理。

再说十五贯的问题，十五贯制钱是很重的，搬起来并不那末方便。还有一点，当时实际上货币并不全是硬币，也施用贯钞，例如况鍾第三次任苏州府知府时，朱祁镇就赐给贯钞二千作路费的。作为货币来说，十五贯究竟能购买多少物品？从《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卷二引述的陕西布政司的奏疏中可以有所了解：“旧例布一匹折钞十五贯，棉花一斤折钞二贯”；陕西布政司根据市场价格，请求改为“每布一匹折与钞五十贯，棉花一斤折与钞六贯”。同书卷六又说：“四时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者有之，六、

七十贯有之。”则十五贯钱也不过买一匹布的三分之一，或两斤半棉花，或三四斗米罢了。

以上所谈都是从考证十五贯事件的可能性、真实性出发的，至于《十五贯》传奇，当然完全可以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剪裁历史素材重新处理的。我决无以此贬低《十五贯》之意。

第七章

关于况鍾的文物与文艺作品

一、肖像的流传

1. 生前的肖像

况鍾比较喜欢画像，而且爱在画像后面题上几句诗文。他任礼部仪制司郎中时，请人画了一幅像，他自己写了一篇像赞：

我形至陋，我德未充，生逢盛世，出遇时雍。

勒赞褻于宗伯，鸣珂珮于九重。

惟纸与墨，朝夕是从。惟卷与轴，涉猎粗通。

将若何无忝虞国之苗裔，亦允续广江之儒风矣乎！

这篇像赞主要的是抒发他自己受到杨士奇、吕震、胡濙、蹇义诸大臣们的提拔以及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这三个皇帝的信任而被重用的愉快心情，并有自勉的意思。

正统五年（1440年），况鍾任苏州府知府九年任满，即将去京由吏部调升他职，而继任苏州府知府的人选，朝廷也已派定了杨衡。苏州府七县老百姓在况鍾治理之下生活了九年，觉得比从前安定，而且有所改善，自然对况鍾也很有好感，不愿意况鍾离开，因此欢送、饯别的队伍有百里之长。长洲等县士绅、老百姓都请况鍾留一幅肖像下来作为纪念。况鍾觉得情不可

却，留了一幅肖像下来，临时又在后面题了一篇赞，对于老百姓给他的“青天”的声誉，表示受之有愧。又说：“何当留此碌碌形貌，有玷彼胥山之高耸，吴水之清涟。”

2. 郡学的遗像

况鍾于正统七年死于苏州府知府任上时，当时便由苏州官员、士绅和老百姓发起，就在郡学内辟设了况公祠，并陈列了况鍾遗像的石刻，题名《况太守像》。

太子少师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建安人杨寿夫、左谕德兼侍读学士周述、侍读学士曾棨、襄府长史周孟简、礼部祠祭司郎中孙原贞都题了像赞。这些像赞除了称颂况鍾的政绩以外，还谈到了况鍾遗像的仪态，杨溥是把况鍾的“刚毅之气、端肃之容”和“处心以正，行事以公”，相互联系起来谈的。关于况鍾暮年的风貌，他所说的“两鬓添忧民之白发”，是很具体的描绘。杨寿夫的像赞，说况鍾“体奩而丰，神完而充”。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大胖子。

郡学石刻的况鍾遗像，也很可能是况鍾生前就刻了的，因为碑阴有：“明正统元年七月十五日耆民粮里秦孔彦等一万八百五十四人为太守前传立石”的字样。这就是说，很可能况鍾生前便被苏州府的老百姓在郡学祀奉了，因为当时是有这种风气的。这个秦孔彦早在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十三日曾代表长洲等县八万余人向江南巡抚侍郎周忱、直隶巡按御史赵奎咨提出请求，提升况鍾的职衔。这块石碑的碑阴还刻了张洪于宣德九年写的《况太守前传》，所以说“为《太守前传》立石”。看上去，石刻像是为了配合张洪这篇传记而作的。为什么叫做前传呢？因为况鍾不仅在世，而且在

任,为了区别于全传起见,所以就称为前传了。

这一帧遗像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摹本,下款是“道光己酉仲春古越郭维容敬摹”。

3. 木兰堂的遗像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况鍾的家乡人靖安舒化民到苏州府任知府,很重视有关况鍾的文献和遗迹。长洲县知县王兰史在青浦地方的断垣残壁中发现了况鍾的遗像及题跋的石刻,而又发现和郡学的肖像、题跋都不同,就载回苏州。舒化民把这些石刻镶嵌在木兰堂的壁上,而木兰堂也就是当时知府办公的所在。舒化民不久调任他职,继任知府的贵池人桂超万,又将这些石刻镶嵌到花园的亭子里面。

这些石刻包括三个部分:一、孙星衍题的“明循吏况公像”篆额;二、孔继尧摹长洲顾氏景贤阁本的况鍾像;三、潘奕隼、董国琛、顾震、顾时雷诸人的题跋。这些题跋都是嘉庆中叶写的,最早的是潘奕隼,写在嘉庆癸酉年(1814年),最迟的是陈裴之,写在嘉庆丙子(1816年)正月二十八日。

题跋也有提到况鍾像的神态的,例如徐元润说:“肃然遗像垂千春,忽忽若动须臾神。”董国琛并说况鍾的像“貌清寒”,这是因为木兰堂的遗像和郡学的遗像是颇多不同的:郡学的遗像是正面略偏左,较丰腴而和蔼,胡须较短,额无皱纹。木兰堂的遗像是正面的,比较一般,也并无丰腴或和蔼之感,胡须稍长,额多皱纹。

1957年苏州苏民小学所藏的拓本,就是木兰堂的遗像及其题跋。

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也有况鍾肖像,也就是《吴郡名贤图传赞》中的《况太守像》,现在还很完整地保存在那里。一方面流行较广,一方面也

更少特点,就不多介绍了。

二、况公祠

范烟桥同志写过《况公祠与“十五贯”档案》一文,对苏州的况公祠作了比较简单的介绍。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况鍾去世时众官吏和老百姓奉祀的况公祠,是不是现在西美巷的况公祠?我想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是现在西美巷的况公祠。

钱塘人陈文述在清道光六年(1826年)所写《况公祠记》说到“前代曾许建专祠,肖像以祀,七邑及市镇皆建祠”。那末,在苏州府范围之内,至少有八个况公祠以上。这些况公祠都是以生祠改建的。

在苏州,我们现在还有文献可查考其兴建和修葺情况的况公祠有两个:

在郡学的况公祠,是明正统七年(1442年)况鍾死于苏州时众官吏和老百姓为纪念他而兴建的。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于永宁把郡学和况公祠大加修理,陈鹏年又把三国时清官郁林太守陆绩卸任带回故乡的“廉石”搬到况公祠旁,以为陈设。何谓“廉石”呢?原来陆绩为官清正,行李太小太轻,压不住船,船动荡得很,于是搬了一块大石头上船,方才把船开回苏州,后人称这一块大石头为“廉石”,搬在况公祠旁,也是歌颂况鍾的清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况鍾的长子况定观(况宁)后裔的外孙岳士景,曾写文章谈起幼年时代到这个况公祠瞻仰遗像、凭吊古迹的情况。

西美巷的况公祠,也称况公分祠,原址是辟疆园和五显庙,是清道光六年兴建完成的。

辟疆园原为晋代苏州望族顾家所筑,唐代大诗人顾况写过吟咏此园的“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等诗。在宋代,西美巷一带称为和丰坊,有一个如意庵在那里。后来庵里不住尼姑,来了和尚,法号普智的和尚奉祀婺源的五显灵官菩萨,于是改称五显庙。况鍾在五显庙南面修建了一个辟疆馆,以为读书会宾客的所在。他在正统六年,写过《辟疆馆记》,叙述了修建的意图和经过。况鍾是崇拜菩萨的,他也常到五显庙去膜拜顶礼,而且认为是有灵验的,他自己写过《五显庙大殿题梁岁月记》。又翰林刘铉也写过介绍五显庙的专文。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汤斌在江南大毁寺庙,把五显庙拆掉了,五显灵官被烧成了灰烬。后来又有人在原地盖起了大觉庵,不久又荒废了。嘉庆中叶(1807年稍前),王良士在大觉庵的废墟中发现了况鍾的《辟疆馆记》和《五显庙大殿题梁岁月记》这两块碑,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不可靠,陈文述则加以保存。道光二年(1822年)陈文述做了江都县知县,他的弟弟做了太仓直隶州同知,两个人合凑了三百两银子修建了这个况公祠,因为要有别于郡学的况公祠,所以当时曾称之为况公分祠。捐钱的人还有苏州府知府丰宁额腾伊、吴县知县万台、长洲县知县俞德、元和县知县王有庆等。因为工程规模比较大,兴建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后来由丰宁额腾伊、万台和长洲县知县王锡运、元和县知县何士祁再度捐钱,并把修城的余款二百两银子也移作此用,由陈鸿庆负责监工设计,这才完工。有人认为在汤斌所毁掉的五显庙原址建况公祠,是对况鍾的大不敬,于是陈文述的儿子陈裴之写了一篇《改建苏州府知府况公祠碑》,把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介绍。道光二十八年,苏州府知府桂超万曾再加修理,具体负责工程的是苏州府照磨胡容。

西美巷也称西米巷，所以陈文述的诗中有“荒冢杨湾曲，丛祠米巷东”这末两句。

我于1963年去苏州，拜访了西美巷况公祠，当时西美巷小学设在这里。文物仅存大石碑一块，外面已加密封，未能读及碑文，估计即是陈裴之所写的《改建苏州府知府况公祠碑》。

况鍾在苏州府知府任上，曾修建苏州定慧寺的苏公祠，后人就在祠内加上周忱、况鍾的牌位，和苏东坡放在一起祀奉。

在况鍾的故乡靖安，也还有一个况公祠的。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江西南昌郡靖安县训谕三韩吴馆谨序的《靖安县志》卷六《杂志》中有一则：“苏州知府况鍾墓在富仁都仙山万家尾地力。”我想这可能是在嘉靖年间人们对清官都有些顾虑，不敢多提的缘故。清同治刻许应鏊修《南昌府志》卷六十四《杂类》：“明苏州府知府况鍾墓在富仁都”，系引《一统志》，和上述《靖安县志》的记载也是符合的。

1979年5月我到了江西，对况鍾墓曾进行了解，原来在“四人帮”横行之时，他们对历史上所有清官都万分怀恨，毁坏了况鍾的坟墓，进行开棺暴尸，墓中宝剑等文物均被抢掠一空，迄今均无下落。

三、《况鍾复任唱和诗卷》和《秋江送别诗叙》

《况鍾复任唱和诗卷》原由况鍾后人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岩口大队况为玉家收藏。高34厘米，长931厘米。况鍾任苏州知府满九年后，朝廷给予正三品俸，命其连任苏州知府，杨士奇、胡俨、周忱、张素、丁鸿、徐辅、宋楷、周璫、陆俦、陈贇、彭颢、张洪、曾添恕诸人乃赠诗祝贺。这些诗歌都

是这些原作者亲笔的手迹,后来装裱成这个卷子。

杨士奇和周忱的诗都很能说明他们对况鍾的亲密关系以及政治上对况鍾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在前面有关章节中曾予以引用。

《秋江送别诗叙》时间较前者略早,当时况鍾离任,诸人于秋江送别,此卷即为诸人送别之诗。高 33.5 厘米,长 1 336 厘米。系张洪、章珪、赵永言、邵怀义、宋楷、李让、丁鸿、张素、杜琼、钱昌、何澄、柳华诸人之手迹。

在这两个卷子中都有诗作的张洪,是苏州府属常熟县人,名宗海,洪熙元年(1425 年)任翰林院修撰。在此以前,曾经以行人司行人的身份出使过缅甸。他是况鍾亲密的朋友,曾为况鍾写过一篇《况太守前传》。他的著作很多,《千顷堂书目》著录的达十五种之多,其中有《日本补遗》、《南夷书》、《揽辔集》和《琴川新志》等。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使规》,是作者参照汉代张骞、班超诸人出使西域之历史经验及本身出使缅甸等国之经验编写而成。并有《使緬附录》附后。但是此书《千顷堂书目》未曾著录,《四库全书总目》也没有收录,国内仅收藏明成化十年(1474 年)刻孤本一种。

章珪是苏州府属常熟县人,字孟端。宣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做过不少平反冤狱、救济灾民的工作。柳华是苏州府属吴县人,字彦辉。宣德年间进士,后在福建做御史。景泰年间调升为山东副使,是被太监王振害死的。

还有两位是出名的画家:何澄是常州府属江阴县人,字彦泽,号竹鹤老人,宣德年间做过江西袁州知州。为山水画大家,风格接近巨然。杜琼是苏州府属吴县人,字用嘉,号鹿冠道人,家住东原,人们称他为东原先生。著有《纪善录》、《耕余杂录》等书,也是书画家。此外钱昌是苏州府属吴县人,字允言。以诗歌著名。著有《未斋集》。以上两件文物均已由江西省博物馆收藏。另有况为玉收藏《况氏家谱》一部,仍藏于况家。

四、朱素臣的《十五贯》

以况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最著名的是清初戏剧家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也叫《十五贯》。故事如下：

熊家生活清苦，兄熊友兰为船工。弟熊友蕙在家苦读，因老鼠为患，于饼中放老鼠药以灭鼠，老鼠将饼衔至隔壁邻居，又将邻居金环与宝钞衔来熊家。熊友蕙正无米下锅，即将金环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问官以金环为证，断定熊友蕙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奸情故合谋杀其夫，要判问斩之罪。并认为宝钞亦友蕙所偷，用酷刑迫赃。

熊友兰听闻凶讯，向客商陶复朱借十五贯钱，前往营救。另一屠户尤葫芦，也借得钱十五贯回家，养女苏戍娟问钱从何而来，尤和养女打趣，说是你卖身钱。苏戍娟惊疑之余，逃出家门，途遇熊友兰，结伴同行。其时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死尤葫芦，偷走十五贯。案发，熊友兰与苏戍娟被邻人与差役追及，抄查到了随身携带的十五贯，问官即断定为熊、苏两人杀尤盗钱而私奔，也判死刑。苏州府知府况鍾奉命监斩，临刑四人均呼冤。况鍾回忆到任时夜宿庙堂，曾梦见两个野人（熊）各衔一鼠而哀求，于是再审，发现不少疑窦，乃临时决定停斩。况鍾连夜往见巡抚周忱，请准予缓刑复查。周忱初不允，经况鍾力争后，勉强允诺。况鍾亲自查勘现场，于鼠穴中发现宝钞与面饼。复私行察访，捉住真凶娄阿鼠。案情大白，四人均宣告无罪，熊友兰与苏戍娟、熊友蕙与侯三姑分别结为两对夫妇。

这本传奇共分《开场》、《泣别》、《鼠窃》、《得环》、《摧花》、《饵毒》、《陷辟》、《商助》、《窃贯》、《误拘》、《如详》、《狱晤》、《梦警》、《阱泪》、《夜讯》、《乞命》、《踏勘》、《廉访》、《擒奸》、《恩判》、《请罪》、《考试》、《谒师》、《刺绣》、《拜

香》、《双圆》等二十六出。

剧中自命清正严明实际上主观昏聩的问官是常州府理刑过于执。第十五出《夜讯》中，况鍾自报家门如下：

乍驾熊车出翠微，苍生百万好支持。时人莫谩轻刀笔，千古萧曹相业推。下官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也。作掾部曹，荐受主事。今蒙圣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又亲授玺书，得假便宜行事。

倒是和历史人物况鍾的出身、经历十分接近的。第十六出《乞命》中，周忱自报家门为：“下官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处。”按周忱当时职衔为工部右侍郎，其他姓氏籍贯等等则和历史人物周忱完全吻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出《恩判》，苏州府皂隶所念的诗中有“十年不愧赵清献，七载重迎张益州”两句，却正是历史上杨士奇赠给况鍾的原诗。

我不能说“十五贯”一案确有此事，但是朱素臣在创作此一传奇时，除了参考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大祸》的情节之外，对况鍾的史料是作了认真的研究的。

《十五贯》问世以后，就广泛流行。清代的梁章钜为况公祠写了“姓氏播弦歌，韦白以来成别调；功名起万笔，萧曹自古是奇才”的对联。弦歌就是指的《十五贯》。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之下，对许多古典戏曲作了整理。1956年，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对朱素臣的原作整理了一个昆曲演出本，把熊友蕙、侯三姑一条线砍去，场次也有所精炼，共分《鼠祸》、《受嫌》、《被冤》、《判斩》、《见都》、《疑鼠》、《访鼠》、《审鼠》等八场。突出了况鍾的重视调查研究和不错杀好人、不漏过坏人的认真负责的

精神,使人物形象有所提高,充分起了古为今用的作用。

由于《十五贯》整理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古老剧种昆曲也因此恢复了青春。《人民日报》于1956年5月18日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表示祝贺,并向戏曲界发出号召,要求珍视蕴藏着的艺术珍宝。

《戏剧报》于1956年6月号发表题为《反对戏曲工作中的过于执》,说到“昆曲《十五贯》象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明代封建官僚的反面形象,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高贵传统——实事求是精神。昆曲《十五贯》的演出,不但严厉地斥责了坐在观众席上患着过于执毒疮的人们,而且使得许多人面对况鍾的正义行为为之感慨系之,愧汗交并。它有力地鼓舞人们积极地关怀人的命运,加强责任感,勇敢地干预生活。”

此外,各报刊都发表了给以高度评价的文章。

根据传奇《十五贯》改编的戏曲、曲艺主要有秦腔、京剧、鼓词、弹词、木鱼书、宝卷等。

另《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为《况太守断死孩儿》。故事内容为由一个石灰腌过的死孩子而破获邵家男佣得贵与主妇的奸情案,而得贵则系受歹人支助的指使。书中说:“况鍾原是书吏出身,礼部尚书胡濙荐为苏州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为况青天,因丁忧回籍,圣旨夺情起用,特赐驰驿赴任。”他是在路过仪真时审理此案的。其判决书中有“在邵氏一念之差,盗铃尚思掩耳;乃支助几番之诈,探篋加以逾墙,以恨助之心恨贵,恩变为仇,于杀贵之后自杀,死有余愧”。况鍾断案经过比较简单,远不如《十五贯》复杂曲折。对况鍾身份与生平的介绍,与历史记载是一致的,这判决书的文采也和况鍾传世的文章有近似之处。因此,这篇小说也很可能有所依

据的。

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中《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一文说：“况鍾是明朝的能吏，本传见《明史》卷一六一，本卷事无考”，是正确的。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中《三言两拍本事源流述考》一文说：“本事见《明史·况鍾传》”，却是错了，《况鍾传》无一字提到断死孩儿事。后来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一书在《况太守断死孩儿》条下注明“按本篇资料尚未发现，俟有所得，当再续辑”。他自己也纠正了《话本与古剧》中的错误。

清代写了许多杂剧的文学家石韞玉说况鍾“折狱明冤，停史标其清节，稗官摭其轶闻”，这稗官应该就是指《况太守断死孩儿》。

第八章

历史人物况鍾评价

一、况鍾在历史上的作用

况鍾,作为一个四品官的知府,在《明实录》的《宣宗宣德实录》等部分、《明史》、《明史稿》、《续藏书》诸书都有所记载,或为之立传,是比较突出的。

在都穆《都公谈纂》、祝允明《九朝野记》、杨循吉《吴中故语》和《苏谈》、王鏊《震泽纪闻》、杨穆《西墅杂记》诸书中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和轶闻,更可见他在明代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朱素臣在清初根据民间对况鍾的景仰的心情,采集某些民间传说编写了传奇《十五贯》,立刻在民间流行开来了。《缀白裘》一书都是清代乾隆前后舞台上演出的单出中辑辑出来的,从《十五贯》中所选单出就不少,可见此剧从朱素臣的文学本开始,历经乾隆等时期,直到今天仍旧有旺盛的生命力。

历史人物况鍾究竟如何?我们应该予以一定的评价。首先,我们对于况鍾在减免税粮、废除借马等等苛捐杂税方面的政绩,应该给予肯定,他的某些措施对于农民和大中小地主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这样,苏州地区农业的再生产才得以继续进行,不仅制止了多年以来持续而累增的人口的逃亡,而且原来逃亡他乡的户口在他号召之下,回到苏州府的有数万人之多,这样本来大量抛荒的田地才又重新种上

庄稼，又有谷物好收获了。

他的兴修水利使苏州府通太湖、通长江和出海的河流都畅通无阻，发生水旱灾情，这些河流都可以起到宣泄或灌溉的作用，以为调节，使灾情得以避免或减轻。当然这样仍旧不能使灾情就此绝迹，那末灾民可以依靠济农仓的储存解决口粮问题而仍旧能活下去，继续耕作，争取下年下季有较好的收成。

对于各卫所官军军纪的整饬，制止了官军公开行凶抢劫的不法行为，并使官军能对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多少起一点积极的作用。对于清理军籍，况鍾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官府强拉的壮丁全部释放为民。这两件事情对生产虽然不像上列所举的那些措施影响之大，但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社会秩序和治安过分动乱，老百姓就不可能安心生产。清理军籍的结果则是增加了不少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在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进一步在培养人才、提拔人才方面有所努力。

对于苏州府以及所属六县一州的各级官员、吏员、皂隶等等，他所做的考核工作看来是仔细的，惩处或撤职的多一些，奖励或提升的也有。宣德八年（1433年）的《保升贤能邑令奏》要求将常熟县主簿郭南“不拘常例，保升正官，展其设施，以慰民望”，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朝廷同意了。关于疑难案件的审理，则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记载。

根据以上的政绩，他在历史记载中占有一定篇幅，在民间传说中有广泛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在肯定况鍾的政绩的同时，也应该看一看他的政绩是在什么一种客观条件之下取得的。对于当时总的政治情况，我已在本书第一章中作了介绍，这里再联系况鍾的具体情况作一说明。

况鍾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这三个皇帝既然有过较多的直接接触,受到他们特殊的恩遇和信任,实际上他的四品官已经比其他品级较高的官员权势更大。也就是说,他的权势实际上不是用四品官的级别和苏州府知府的职别所能局限的。明英宗朱祁镇自然对这位三朝宠臣也不能不另眼相看。

因为况鍾赴任之前,对于苏松一带税粮过重这一个问题,已经先后由广西布政使周幹、工部侍郎罗汝敬向朝廷作了呼吁。减轻苏州府的税粮已成为既定的必须认真贯彻的政策,所以况鍾遇到的阻力比较少,即使遇到阻力也容易突破,因为他有朱瞻基给他的法宝——敕书,在这意义上说,他是钦差知府。后来周忱来巡抚应天十府,明确了职衔是“抚民侍郎”,因此况鍾也可以说是“抚民知府”。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一切都从安抚出发的。

内阁首辅杨士奇是朝廷中江西人政治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从各方面给况鍾以大力支持是事实,但曾给况鍾以委婉的批评也是事实。况鍾第一次以苏州府知府的身份回京中述职时,杨士奇问他:“尤文度安好否?”况鍾不知所答,只能沉默。于是杨士奇说:“君为廉吏,不识尤文度耶!”话虽然还客气,其实是很严峻的。意思之间不识尤文度的话,就不配称为廉吏。这次谈话,给况鍾的震动很大,回到苏州,立刻寻访。原来尤文度就住在络丝巷中,是一个生活很清苦的老头子,也就是曾任贵州参议的颇有清誉的尤安礼。况鍾就去向他问好、请教了。到了清初,有人还为况鍾奉杨士奇之命去拜访尤文度一事写了一篇诗歌,说:“况青天,善恶簿,投奸胥,空中仆。我亦吏也除其蠹,苏州刺史称独步。生平不识尤文度,络丝巷中曾一顾。”作者是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尤侗,尤文度是尤侗的祖辈,不过是远房而非直

系。这首诗的前面几句话是写况鍾别的政绩，如在府中设善恶两簿，记录诸官员吏胥的功过，惩办舞弊吏胥等等。尤侗也认为正因为况鍾是书吏出身，所以对书吏的弄权和衙门中的积弊了解得比较深，要整顿也比较方便。后来，况鍾经常到常熟去拜访吴讷，也多少受了杨士奇那次谈话的影响吧！

况鍾有没有和上级官员因为各执己见而发生论争，甚至发生尖锐矛盾呢？从历史记载中找不到这方面的史料。因为在朝廷中以内阁首辅杨士奇为首，在江南则巡抚周忱也可以代表朝廷，而况鍾从未和杨士奇或周忱发生过尖锐矛盾，按情理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某些具体措施方面，况鍾和治农的巡抚成均有不同的做法，结果是况鍾占上风。成均本人控告了况鍾某些违反法纪的事件，也支持另外一些人对况鍾某些操守上的问题进行控告，而其中一部分事情，况鍾也承认了确有其事，承认了是错误的，结果朝廷对他并未处分，信任如初。这里面周忱很可能起了作用，周忱和成均同是侍郎职衔，同是巡抚，但周忱的权势远远超过了成均。

另一方面，由于周忱和况鍾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许多政治、经济等措施，他们也都是商量着进行的。况鍾虽然在减免赋税、开发水利这些工作上遭遇到的阻力不是太多，确实是周忱在上面顶住了。户部尚书郭资一直反对周忱的做法，本来和周忱、况鍾关系还好的胡濙附和郭资上奏疏，说周忱主张减低官田赋税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周忱把征耗米积余用于接待过往官员，也招致了不少非议。都是由周忱亲自向朝廷作了详细解释对付过去的，因而况鍾能够集中心思去做具体工作，用不着为这些纠葛去分散精力。

况鍾和宦官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亲密的，像来内官这样的宦官肯把自己的坐轿给况鍾用，而况鍾居然也愿意乘坐这个在苏州府横行一时勒索无厌

的大太监的轿子，这都不是小事情。这都是一般的清官不愿意做的事情。

有人认为况鍾所以终其身不过是苏州府知府，没有能升迁更高的官职，是有一次在交通要道，遇见巡按御史，没有下轿，得罪了巡按御史的缘故。这也完全不确，例如张文昌、赵奎咨、曹习占等直隶巡按御史，都是大力赞扬况鍾的。

这是正统七年(1442年)^①况鍾去世时明朝史官对他的评价。史官同时还把他和松江知府赵豫作了对比，说：

论者以鍾为能吏，豫为良吏。

看来对赵豫的评价更高些。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况鍾传》评论况鍾说：

鍾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鍾之后李从智、朱胜相继知苏州，成奉敕从事，然敕书委寄不如鍾矣！

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七《况鍾传》说：

鍾刚果敏达，不畏强御，尝上奏，与巡按御史争相相见仪弗惮，然度量廓如也。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诵之，以为廉洁之操，一尘不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

况鍾任苏州府知府的十三年，苏州府农民和大、中、小地主的负担都有所减轻，生产有了发展是事实，苏州府老百姓后来对他颇为怀念也是有的，但在廉洁这方面也只是比一般官员好一些，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如宋代的包拯和明代历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海瑞对自己那样严格。至于说刚正实在也无具体事例，他的可倚仗的势力有皇帝朱瞻基、朱祁镇，内阁首辅杨士

^① 况鍾逝世于是年十二月，按公历已经是1443年。

奇,江南巡抚周忱,靠山不能再硬了。他所与之进行过斗争的对立面也只是巡抚成均、清军御史李立、同知张徽这三人。与成均的斗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一些错误作辩解,很难说是对施政方针有矛盾的斗争。至于李立和张徽关于清军方面的问题,也十分可能是况鍾上任之前所发生的^①,因此没有看到况鍾与他们之间面对面斗争的记载。和宦官也没有什么大的斗争,更不必说对皇帝了,况鍾总是依顺的。根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宦官列传》:“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则况鍾完全可以对来内官、罗太监、安儿、吉祥等采取较严峻的态度的,他根本没有,而是相处甚得。

宋代的包拯在朝曾向张贵妃之叔父张尧佐进行斗争,与当时的名臣宋庠、欧阳修等都作过辩论。明代的海瑞先后与胡宗宪、鄢懋卿、徐阶、张居正等一再争执,无一事不求做到是非分明。他们都在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况鍾就完全不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皇帝,况鍾也不像包拯、海瑞那样有所规劝或提出过相反政见。他从未遭遇过这方面的风险。

海瑞曾受到江南地区的乡官、文人以及江南籍的大官僚的攻击,因为海瑞的所作所为有些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况鍾则正好相反,他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和江南的大、中、小地主和江南籍的大官僚有过尖锐矛盾,而是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撤换、罢免或法办了一批县级的官员,使这些人如愿以偿,

^① 清军御史李立和常州同知张宗琰发生尖锐矛盾在宣德三年。而配合李立的苏州府同知张徽详见钱止庵《吴门补乘》卷四《职官补》:“宣德三年,任同知,时兵部为清军事下苏州,府委徽清解,徽刻深敢忍,被冤者不可胜计。见《史志》。”则宣德五年况鍾到任后,张徽是否尚在任,是否仍在负责清军的工作,尚难断言。

所以明代清代苏州歌颂况鍾的诗文或笔记较多。

况鍾之所以没有升迁更高的官职,是因为当时有“久任”之风,所以《吴中故语》说:

然其初非吕尚书之荐,宣庙之知,杨文贞之助,则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间,使不满而徙,则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久任的确是当时行之有效的一种人事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保证某些政治、经济上的措施能够持续地贯彻,而不是朝令夕改。久任,并不是对况鍾是如此,对周忱也是如此,周忱任江南巡抚二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事例。朝廷因他政绩卓著不肯调动他的职位,为了表示奖励、提升的意思,曾把工部右侍郎的职衔改为工部左侍郎,后来又把工部左侍郎再改为工部尚书,如此而已。而且就在况鍾任苏州府知府时,吴县、常熟县等县的官员也有九年考满,政绩良好不调迁而继任原职的情况,如吴江知县贾忠、常熟县主簿郭南等人都是。

至于推荐的问题,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也是应该肯定的,也是况鍾这样的人才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一个因素。所以,《明史·选举志》说:“帝又虑诸臣畏连坐而不举,则语大学士杨溥以全才之难,谓‘一言之荐,岂能保其终身,欲得贤才,尤当厚教养之法’,故其时吏治蒸蒸,称极盛焉。”但在当时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荐大权基本上控制在三杨手里,吏部就没有多少实权可抓了,所以这办法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①。

其次,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况鍾所否定的人物的评价问题,例如治农为主的巡抚成均,况鍾的辩诬奏疏认为成均是为了报复而诬告的,但是某

^① 《春明梦余录》:“保举一事,三杨当国时谓借以攫吏部之权,部意不平,事遂渐寝。”

些不够清白之事却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成均究竟有什么劣迹，况鍾也举不出。再如清军御史李立，其他典籍中也不是全部加以否定的。按《吴中故语》中《严都堂刚鲠》一则，李立对曾任左佥都御史而获罪降黜面刺金字的严德明还是很讲礼貌的。所以李立不一定像况鍾所说的那么糟。

况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况鍾向朝廷上的奏疏的结果是各不相同的，被批驳的或被搁置的当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即使是“照准”的，有的也往往拖延了很久才付诸实施，有的是不是认真贯彻了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例如况鍾于宣德七年（1432年）要求朝廷于宣德五年宣布的官田照民田起科不要停留于纸面，要认真执行。但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又下诏令，规定苏州、松江诸府官田照民田起科。那末，这项规定虽然由朝廷颁布了，但宣德五年、宣德七年都没有执行或彻底执行，到正统元年，已经三申此令，是否贯彻到底了呢？那就很难说了。

二、古典文献论况鍾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九十九一段评论况鍾的文字，实际上对况鍾一生的鉴定。

鍾有治剧才，故郡事虽繁，理之绰有余裕，……犹有刀笔余习。

李贽所说“敏达”两字，我认为对况鍾十分确切。况鍾跟随朱棣多年。朱棣不仅性情残暴，杀人是平常事，而且对书吏很看不入眼，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但朱棣对况鍾却先后表扬奖励了三十一次。这看来单凭一般的殷勤刻苦是还不行的，况鍾机灵聪明的才能肯定是高明的。

还有和况鍾同时代的苏州府常熟县人张洪,在《况太守前传》中说况鍾:“公为郡,综理周密而不疏,施行甚易而不烦,可为为政之楷模矣!”

这虽然仅仅是从行政效率和工作方法的角度来谈,倒是说到了关键问题的。还有清代的陈文述在《况太守集》的《记》中曾说:“海刚峰称为胜作十年救时宰相。”道光刻《况太守集》的《凡例》中说:“二曰兴革利弊奏,此关系最要,海忠介所称胜作十年宰相者,此也。”都没有引证原文,我也没有发现海瑞论述况鍾的文章或奏疏,不知道他们依据何在。我是有一些怀疑的,海瑞对况鍾的评价是否会如此之高。

《况太守集》中况廷秀《太守列传编年》卷下引陈建评论:“祖宗时用人不拘一途,未尝大分流品,亦未尝限资格,与夫年劳之类,用惟其能而已,故当时号为得人”。“大抵超迁、久任、不拘流品之三法,阙一不可者也。祖宗朝三善咸备,所以周、于、柴、况之匹,克自表现于世耳。”陈建把况鍾和周忱、于谦、柴车相提并论,实际上也就是给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周忱、于谦、柴车不仅官职比况鍾高,而且对明代政局的影响比况鍾大得多。

三、当代史学家论况鍾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①(1949年)的第七章中,论明代的官田时说:

苏州松江一带田地,南宋时多括为公田,张士诚时数量更扩大,朱元璋灭士诚,凡士诚部下文武亲戚及富民所有田产,一律没收作为官

^① 三联书店版《中国通史简编》第535页。

田。据《宣德实录》所载苏州知府况鍾的奏章说：“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

引用了况鍾的奏章，虽没有置评，但至少可以这样说，范文澜同志认为况鍾奏章所反映的情况是确凿可信的。

吴晗同志写过《况鍾和周忱》一文，主要评价如下：

况鍾刚正廉洁，极重视细小事件，设想周密，不怕是小事，只要有利于百姓就做，对百姓有害的就加以改革。兴利除害，反对豪强，扶持良善，百姓敬他爱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样。^①

又说：

生性俭朴，住的房子没有什么陈设，吃饭也只用一荤一素。作官多年，没有添置过田产，死后归葬，船上只有书籍和日用器物，苏州人民看了，十分感动。作官办事，不用秘书，一切报告文件都亲自动手，文字质直简劲，不作长篇大论，说清楚了就算。在请求官田减租的报告上。直率批评皇帝失信。^②

吴晗同志对况鍾的优点谈得比较细，把过去人们往往忽略的地方都指出来了，这对于我们如何来认识和分析况鍾这个历史人物，是有启发和帮助的。至于请求官田减租的问题，实际上是朱瞻基要况鍾这样做的，到况鍾第一次上奏疏要付诸实施时，是户部从中作梗，一开始没有批准。后来的奏疏矛头主要是对准户部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批评皇帝失信，但是在这里把情况和背景介绍一下，我们就可以了解得更全面一些了。

① 《人民文学》1960年9月号。后收入《春天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② 原文见道光刻《况太守集》《再请减秋粮及抛荒粮抽取船奏》：“不惟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

实际上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还好,各地仓储的存粮也比较多,户部在减免赋税的问题上是不是会不执行皇帝的批示,不能说没有可能性,但是皇帝也往往在批准这一类奏疏的同时,授意户部等衙门暂缓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户部当然是批评皇帝失信了。

初 版 后 记

写完《况鍾》以后，觉得有几点要向读者谈谈清楚：

况鍾这一历史人物最近二十年来受到较多的重视、注意，一方面是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十五贯》的改编演出以及电影的流传。我在本书介绍了他一生的事迹以及某些对老百姓有利的措施。对《十五贯》是否确有其事也作了探索。从实事求是这一点出发，不能证实其确有，但也不能排除况鍾审理过类似案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朱素臣完全根据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错斩崔宁》）写了传奇，仅仅把况鍾作为其中的审官而已。朱素臣还是多少有一点历史依据或线索的。

有关叙述和评价，都根据历史资料，除了以主要篇幅叙述况鍾在苏州府知府任上，在税粮、吏治、水利、军籍、救灾等各方面的贡献之外，他在操守上的一些缺陷，以及和宦官的过分亲密的关系，也作了客观的述评，并没有对他作任何美化，而是还了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这个形象基本上是清官的形象。但其斗争性不如《十五贯》中艺术形象的况鍾强，没有像艺术形象的况鍾那样更高大、更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不能由此反证艺术形象的况鍾不真实。朱素臣为了使况鍾这一人物更富于典型性，把某些清官的特征概括集中在况鍾身上，应该是许可的。

一个封建社会的知府，在历史上，在文学艺术上，起了这样深远的影响，是罕见的。所以要为他写传记，即由于此。

我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明史》、《明纪》、《明史纪事本末》和《续藏书》。也参考了一部分地方志和《吴都文粹续集》。

况鍾本人的文集《况太守集》,实际上只有他所写的奏疏,还有极少几篇铭、赞、记等短文。余外就是别人的题词,后人编的传记、年谱等等。书信和案件的判决书一份也没有,对于研究的深入带来不少困难。另外有一种乾隆刻的所谓况鍾的全集,篇幅较现在的道光刻广仁堂板《况太守集》多一倍,但是所增加的也无非是当时人和后人的赠诗、题跋之类,属于况鍾本人的作品,仍旧只有《况太守集》所收的那么多。而且这一种乾隆刻本又比较少,所以我仍旧用道光刻《况太守集》注引文的出处,以便查核。

1979年3月1日在上海完成初稿之后,又去江西南昌等地作了一些资料核实工作和文物的调查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展览组的大力协助,江西省博物馆为我复制了极为名贵的周忱赠给况鍾的诗歌手迹和现由况鍾后人收藏的《况氏家谱》中况鍾的肖像,江西省图书馆提供了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刻的《江西通志》,让我通读了有关篇章。我附带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1979年9月10日于上海

二 版 后 记

《况鍾》能够二版,使我颇为欣慰。把原书重读了几遍,想不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能否补充呢?我也与苏州市政协和况鍾故乡江西省靖安县(属南昌市)政协联系,都没有新的史料或文物发现。苏州重修了况公祠,靖安县重修了“文革”被开掘的况鍾墓,如此而已。

况鍾之所以重新被人们谈论、纪念,起因是昆剧《十五贯》的演出,《人民日报》为之发了社论《从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这件事。《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老作家巴人(王任叔)《况鍾的笔》一文,文章不长,相当尖锐。他认为笔捏在当权者手中,应该慎重又慎重,硃笔一点,就是一条人命也。

人们知道《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两剧的上演,虽然当时得到肯定,“文革”时却成了大冤案,吴晗、马连良、周信芳都被迫害致死。事情则经过了六年。而《十五贯》获盛誉不过一年多,从组织改编的领导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黄源副部长到具体执笔考陈静等一批干部,都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固然,他们都熬过了苦难,最后也改正了,但仍使我颇为困惑,附带在这里对已逝世的华东时期老领导黄源老同事陈静表示无限悼念。

蒋星煜

2009. 3. 15

写在书后

因为《颜鲁公之书学》、《况鍾》二书篇幅不大，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柏伟在编辑《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二版之际，向我提出将这两种小书附在后面，合成一册。我觉得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完全赞同。

好在三种书虽然内容不一样，但都属于文史类，合成一册，对于出版社、对于作者、对于读者，还都合式，并没有“大杂烩”的感觉。

三种书分别初版于1943年、1948年、1981年，当时都不是畅销书，所以印数甚少。这是因为我从事学术研究，从不看风向、赶时髦，而是定下心来，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开挖，加以甄别、梳理，尽可能客观地予以系统化。决不是先有了成见再去研究，以迎合某一方面的观点。正因为这些书史料比较充实，看法上也客观，所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隔了这许多年还能再版，还能有参考价值，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

对于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为《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作序者蒋星煜，系我堂兄。建国前在重庆、南京，执教于政治大学。建国后，应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5年病逝。

蒋星煜

2009.3.15